
台灣文學史綱

(日譯註解版)

- 葉石濤 原著
- 中島利郎 日譯本註解
- 澤井律之 日譯本註解
- 彭 萱 日譯本註解 漢譯及校釋

日文版自序

葉石濤／作・彭萱／譯

在一九八七年的暑假，我終於完成了《台灣文學史綱》，好不容易才鬆了一口氣。利用了前後三年時間的暑假，我在這件工作上頭傾注了我的生命。當時由於我還是個小學教師，幾乎沒有什麼寫東西的時間。因為這個緣故，暑假才是我竭盡心血創作長篇作品的時間。

戰後，台灣又再度成爲中國人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利用台灣的資源，全部使用在和中國共產黨的內戰上面。台灣人民的生活變得非常的貧困。並且，政府還以把台灣人中國化爲目標，強制要台灣人說「國語」（北京話），堵塞住台灣歷史啦，台灣文化、文學等的研究之路。忘記了台灣人早在日本殖民地時代就已經創立了台灣新文學，並且擁有許多的作家以及了不起的作品。持續了四十幾年的戒嚴令、二二八事件，還有接下來的白色恐怖，完全地抹殺了台灣歷史的記憶和台灣新文學的存在。由於我的這部《台

《台灣文學史綱》是在戒嚴令下完成的作品，所以並非是充分表達了我的思想的作品。台灣文學是建築在台灣的土地以及人民之上的，絕對不是中國文學或日本文學的支流。就算是用日文或中國話所寫成的作品，台灣文學也絕對不是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那就和美國文學即便是用英文所寫成的，也絕非屬於英國文學的一部分是相同的道理。

幸而我在日本時代向西川滿老師學習用日文來創作。再加上因為和當時的台灣人家以及日本人作家都有來往，所以對於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梗概也大致上有了了解。以這樣的記憶作基礎，好不容易寫成了《台灣文學史綱》的重要部份。當然，文獻和資料幾乎都是欠缺的情況，靠著當時我所屬的文學團體《文學界》的諸兄拚命努力地收集資料，好不容易勉強完成了敘述三百多年的台灣文學史的綱要。當然這部作品只是綱要而已，絕對不是完美無瑕的文學史。

今年夏天，承蒙台灣文學研究的權威中島利郎教授以及年輕的台灣文學學者澤井律之教授兩人翻譯這本書，感到無限的歡喜，並打從心底的感謝他們二位。我一直到二十歲為止都被當成日本人來教育長大，更曾經是帝國陸軍的一等兵。我的國家若是台灣，那我心靈的故鄉就是日本。這本書能夠被翻譯成日文，對於像我這般的老人而言，將是最後的安慰了。

—台灣新聞報，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九日

《台灣文學史綱》日譯註解版出版序

彭瑞金

葉老的《台灣文學史綱》出版於一九八七年，是一部空前的台灣人觀點的台灣文學史著作，不僅於台灣文學之詮釋權掌握，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也是世界各地學者一窺台灣文學全貌的重要管道。一向對台灣文化、文學研究早覺的日本學者，於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即推出日文譯本，為史綱的第一種外文譯本。我所知道的史綱外譯本，除了進入最後階段即將完成的英譯本，還有進行中的韓文譯本。英譯本由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杜國清教授主持的台灣研究團隊負責，韓文譯本由在台灣任教職的金尚浩教授負責。

日文翻譯是由令我敬佩的在日本研究台灣文學的勤學者中島利郎教授及澤井律之教授共同完成。他們兩位幾乎在史綱出版的第一時間，即決意翻譯此書，最後仍窮數年之力始完成此繁瑣又艱鉅的翻譯工程。這其間，他們更不知往返台日兩地多少次，親訪葉老、查證資料，也向各相關作家、學者請益，此書的翻譯過程，讓我充分感受到兩位學人實事求是的為學態度。在此強調這

些，與其說是推崇兩位學者的治學精神，還不如說是強調史綱日譯版何以又有「漢譯版」，也就是「日譯註解版」出版的必要和重要。史綱原著扣除後面所附之年表，僅有一七八頁，總字數不到十二萬字。這也就是葉老主張以「史綱」為名，不以文學史為名的原因，他在原版自序中也強調，寫的只是「台灣文學史的主要輪廓(outline)」。回想史綱完成的戒嚴年代，以及彼時台灣文學史料、研究的雙重荒疏情形，相信很多人都能同意史綱述作的條件和著述者的勤奮，已被發揮到最上的極限。中島和澤井兩位譯者的身份和譯述年代，則完全不受戒嚴影響，有充分的學術述作的揮灑空間，可敬又可貴的，正是他們充分掌握也發揮了史綱被譯述的學術功能和能量。我個人十分肯定，透過作者和譯者二人共同的努力和貢獻，可以說把《台灣文學史綱》的文學史地位、文學史功能，以及這部文學史出現的時代性，充分地彰顯出來。這也是我個人「讀」過史綱日譯版之後，極力促成「漢譯本」出版的動機。

中島、澤井兩位教授合力完成的史綱日譯本，逕名《台灣文學史》，由東京的山本書店出版部「研文出版」出版，原著部份有一七九頁，約十七萬字，真正呈現兩位學人譯者功力的是「譯註」和「解說」，兩者合計有一二〇頁，約十二萬字，另有譯者編的「索引」，約二十頁。鉅量、綿密的「譯註」及「解說」，彷彿讓史綱的骨架都長出肉來，有了實體和整體感，不再只是提供台灣文學的發展輪廓而已，已經是可以撫摸、揉捏、掌握、擁抱的真實體。骨架是冷硬的挺立，譯註則傳達了文學史的體溫、呼吸和觸感。原著到譯註本的可讀性和閱讀必要性，可以說是很理性、旁觀的考察，到有感覺的擁抱和擁有。易言之，譯註本大大縮短了閱讀台灣文學史和台

灣文學的距離。透過譯註，文學史裡的作者和作品，不再只是名字和名詞，文學的實體被突顯出來，名之為文學史，不沿用史綱之名，或許已經暗藏玄機。

葉老看到日譯本之後，原有意將「譯註」和「解說」的部分，自行翻譯出來，也動手做了一些筆記，終因眼力不繼而作罷。日文版每頁十九行，每行五十二字，每頁印了近千字，的確看得吃力。適小女彭萱立志從事翻譯工作，過去的一些譯作也獲得葉老認可，乃極力鼓勵彭萱接替他未盡的譯事。年輕人的譯筆，每有生澀、僵硬之弊，我在幕後則扮演順讀的工作，這本譯作能出版，我也有幕後之功勞。其實，我在順讀時，也發現了一些原作和譯註的錯誤，有的可能是排印錯誤，有的顯然是受限於著作年代或翻譯年代的文獻資料錯誤，我都一一責成小女查證，以按語的方式註明、補正、增訂，特別是，日譯注解版從徵得兩位譯者同意到翻譯、資料查證、排印、校對到準備正式出版，整整過了六年時間，有些資料的更新，已經是不勝其「按」了，這方面只好說「盡力而已」。進行解說、譯註翻譯時，葉老健康、精神都還不錯，往往都能提供重要的解題之鑰，葉老對此書之出版，也有殷切的期待，但期間工作之繁瑣，實在很難以量、以時程計，工作團隊停下來出版《葉石濤全集》也是原因。我們不避繁瑣地於原文也做了查證的工作，這些查證議題；有些是日譯者提出來的，如果新出土的資料可以按覈時，就根據新資料增訂。有些是翻譯發現的，有些則是順讀或校對才發現的，讀者於原文中也可以發現按語，原由在此。都是本諸為史綱求得盡善、盡正確的原則下，戮力而為。這也是「日譯注解版」只聞樓梯響、久久不見人下來的主要原因。葉老本人則等不及看到這本書的出版，就先行告別人間，不免令人有憾。不

過，史綱本來就不是寫給葉老自己看的，是寫給天下人看的，也是寫給後來者看的，把它做得更正確、更充實、更好用，也更貼近葉老著述本書的本意。

史綱日譯本註解版的出版，其實集合了許多人的力量才得以完成，最大的功勞者，當然是中島利郎和澤井律之兩位教授，他們提供譯註和解說（第一章、第二章中島利郎教授，第三章以後澤井律之教授），還有慷慨允諾逐譯，謹此再次致謝。我個人在順讀的過程，得以一再閱讀葉老的原作，則充分體會到葉老當年寫此作時，有口難言、言不由衷的悲哀，更進一步感受到日譯注釋及解說為葉老討還學術公道的俠情義舉。是為序。

二〇〇九年十月於高雄

序

從遙遠的年代開始，台灣由於地緣的關係，在文化和社會型態上，承續的、主要是來自中原漢民族的傳統。明末，沈光文來到台灣開始播種舊文學，歷經兩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灣的舊文學才真正開花結果，作品的水準達到跟大陸舊文學並駕齊驅的程度。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也曾受到五四文學革命的刺激。日據下的台灣新文學作家大多數也和大陸作家一樣，用白話文寫作，保持了濃厚的民族風格。儘管在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統治者禁止台灣作家用漢文寫作，因此，一部分台灣作家不得不改用統治者的語文——日語去寫作，且達到了可與日本作家一較長短的文學水準，但作品所反映的，仍是被壓迫的台灣民眾悲慘的生活現實。台灣作家共同揹負了台灣民眾苦難的十字架，跟台灣民眾打成一片，為反日抵抗的歷史留下嚴肅的證言。

台灣光復後，台灣的作家重新學習使用中文創作，仍然負起了歷史的責任，以寫實主義的風格，在作品裡反映了台灣的現實社會、台灣民眾多彩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生活

的進步與挫折。

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日本的侵略和統治，它一向是「漢番雜居」的移民社會，因此，發展了異於大陸社會的生活模式和民情。特別是日本統治時代的五十年時間和光復後的四十年時間，在跟大陸完全隔離的狀態下吸收了歐美文學和日本文學的精華，逐漸有了較鮮明的自主性性格。現代台灣文學的重要課題之一，便是如何在傳統民族風格的文學中，把西方前衛文學的技巧熔於一爐，建立具有台灣特質及世界性視野的文學。

我發願寫台灣文學史的主要輪廓(outline)，其目的在於闡明台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了它強烈的自主意願，且鑄造了它獨異的台灣性格。究竟「史綱」不同於完整的文學史，它充其量只是給後來者，提供了一些資料和暗示而已。由於資料的搜羅困難，金錢和時間兩者俱缺，我這一本《台灣文學史綱》的寫作幾乎耗去了三年時光。自一九八三年起開始蒐集資料，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兩年的整個夏季，分別寫成了光復前的部份和戰後的部分；總算把三百多年來的台灣文學面貌勾勒出來。然而很慚愧，在滿清時代兩百多年來的舊文學的敘述部分，我遇到很大的困難。因此，清朝舊文學的部份，只好參考及引用了前輩作家楊雲萍和黃得時兩位教授的重要論著，勉強完成。沒有可敬的拓荒者的引導，這部份的論述也就無從下筆了。

連雅堂先生曾經慨然興嘆說：「台灣固無史也！」就台灣文學而言，這句話最適切不過。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台灣知識份子莫不一致渴望，有部完整的台灣史出現，以紀

錄在這傷心之地生活的台灣民眾血跡斑斑的苦難現實，特別是最能反映台灣民眾心靈的文學，要有一部詳實的紀錄，以保存民族的歷史性內心活動的記憶。然而由於歷代統治者的無情摧殘，使得每一時代的知識份子知難而退，頹然擲筆。我之所以敢於嘗試，並非我膽識過人或才華高超，而只是盡一份台灣知識份子責任的使命感驅使我，使我這庸碌的人，發憤圖強罷了。

我很希望台灣民眾能夠瞭解台灣文學以往的一段歷史，認識三百多年來台灣民眾力求上進，建立美好的社會的強烈意願。

最後我向幫助我完成這一部文學史綱的《文學界》同仁曾貴海、鄭焜明、陳坤崙、彭瑞金以及海內外許多台灣文化先進，特別是蔡明殿、王淑英夫婦，致上我最高的敬意和謝忱。此外，趙天儀先生對新詩活動部分的指正，使我獲益不少。林瑞明先生又完成了年表這一部分，使這部簡陋的文學史綱得到可信度較高的印證，非常感謝！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台灣左營

（彭萱按：日譯註解版不再附載林瑞明教授所編年表。）

日譯註解版編輯凡例

- 一、原著書名、雜誌名，一律改用《》符號標示。單篇作品名，則以〈〉符號標示。
- 二、原註釋悉予保留，以註1，註2，註3……等原著標示方式標示，並保留分章編排之方式，置於各章之末。「日譯註解版」之註解，以①②③……等方式標示，列於註解文當頁。
- 三、原著內文中，部分針對日文讀者之解說，悉依日譯版之解說位置，以（日譯解說……）標示之。
- 四、「日譯版註解漢譯」之「彭萱按……」，係註解漢譯者，依已有資料逕行增補或訂正者。原著中之錯字或資料訂正，亦以「彭萱按」表示。
- 五、日譯本書名爲《台灣文學史》，註解版則沿用原著名稱。

目錄

- 日文版自序／1
- 日譯註解版出版序 彭瑞金／3
- 序（原序文）／7
- 日譯註解版編輯凡例／11
- 第一章 傳統舊文學的移植／1**
 - 第一節 先史時代的台灣／1
 - 第二節 傳統文學的播種和移植／2
 - 第三節 日據時代初期的舊文學／20
- 第二章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31**
 - 第一節 語文改革和新舊文學論爭／31
 - 第二節 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39
 - 第三節 台灣新文學的三個階段／44
 - （1）搖籃期／44

(2) 成熟期／58

(3) 戰爭期／95

第三章 四〇年代的台灣文學／117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第四章 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141

——理想主義的挫折和頹廢

第一節 撤退／141

第二節 官方文學思想／144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152

第四節 突破與革新／171

第五章 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179

——無根與放逐

第一節 工業起飛／179

第二節 橫的移植／182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197

第六章 七〇年代的台灣文學／211

— 鄉土乎？人性乎？

第一節 波瀾壯闊的時代動向／211

第二節 鄉土文學論爭／217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227

第七章 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學／249

— 邁向更自由、寬容、多元化的途徑

第一節 八〇年代的展望／249

第二節 什麼叫做台灣文學？／253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257

□ 附 錄

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 日文版解說 澤井律之、中島村郎／265

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 文學年表 彭瑞金／288

第一章 傳統舊文學的移植

第一節 先史時代的台灣

臺灣位於東海的大陸棚上，在古生代的晚期，即在二億二千萬年前，始由海中褶曲隆起成爲海島，那時華中、華南還是一片汪洋。中生代時華南、華中自海中升起形成現時的大陸，臺灣也第一次和大陸接連（註1）。之後，在更新世冰河期間數次與華南以陸地相連；其間並有源源不斷的華南相動物群往臺灣遷移，包括以狩獵採集爲生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約在一萬五千年前，臺東長濱八仙洞^①住有舊石器晚期時代的人類。他們所使用的礫石器，跟日本、菲律賓等地所發現的舊石器文化不相類似，倒是繼承了亞細亞舊石器文化的傳統；這證明第四冰河期臺灣與大陸相連，大陸舊石器時代人類已遷移至臺灣活動。更新世結束，臺

^①長濱鄉的八仙洞。一九六八年三月，由台灣大學教授林朝棨和宋文薰發掘的B.C.一萬五千年—B.C.三千年左右的舊石器文化。

灣成爲孤島以後，臺灣進入以磨石器、陶器爲主的新石器時代，從一萬年前開始一直持續到漢人大量移民臺灣時期爲止。居住於臺灣島的人種，無論是舊石器時代的長濱人或左鎮人^②，抑或新石器時代的山地土著種族與平地土著種族，主要來自大陸；大多屬於古代越族的印度尼西亞語族。臺灣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分爲七文化層。其中四層文化源自華南，二層文化可能傳自中南半島，而最晚的一層才是經由菲律賓賓諸島北上（註2）。

如上所述，從地質學年代、先史時代開始，臺灣在地緣、血緣、史緣上曾受大陸的影響。

第二節 傳統舊文學的播種和移植

在文獻上出現臺灣，可遠溯到三國時代。公元二二〇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甲士萬人，浮海進征夷洲，俘虜了夷洲土著數千人。所謂夷洲便是臺灣。中國的統治權力雖未曾建立，但是揚威的目的已經達到（註3）。這是經營臺灣的最早記載。自隋至元，歷代都有派使者或武將到臺灣撫慰或武力征討。但臺灣仍然爲海外孤島，定居的漢人稀少。

直到一二九七年才把澎湖收入中國版圖。當時澎湖居民約二百戶，每年有商船數十艘，來往於泉州和澎湖之間從事貿易。大約在一三三五年到一三四〇年間，才正式置巡檢司，隸

② 左鎮人。一九七〇年代夏天在台南縣左鎮鄉發現的約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期男性人骨。

屬於泉州同安。雖然從宋、元以來，大陸人民逐漸移民定居臺灣；但來者愈眾，形成村莊，卻是明朝嘉靖、萬曆之間。到了明朝末年來臺移民的大陸人民，大多依附在顏思齊或鄭芝龍的根據地周圍，生產少許農作物並以漁獵為輔。十七世紀以後，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前後入侵臺灣，貿易和農業都有長足的進步。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驅逐了盤據在臺灣的所有外國勢力，把臺灣開發為「反清復明」的據點。同時不願做清朝順民的明末遺臣也陸續來臺，其中也有些享有文名的舊知識份子存在，如一六五二年因颱風漂泊而來到臺灣的明太僕寺卿沈光文^③（註4）。他就跟季麒光^④等十三人發起詩社「東吟社」，致力於舊文學的播種，培養了許多詩人。因此，沈光文是臺灣文學史上頭一個有成就的詩人。正如季麒光（註5）所寫的一樣：「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始有文矣！」除沈光文之外，明末尚有盧若騰^⑤（註

③ 沈光文（一六二一—一六八八）。明末清初浙江鄞縣人。是南明桂王的太僕寺卿，拒絕清的招降。之後，從廣東前往海路泉州的途中漂流到台灣。被鄭成功當作貴賓招待。不過當鄭成功死後，窩在羅漢門（內門）中開設書塾，教育移民。最後歿於台南善化鎮。葉氏在本文當中雖然當作他是在「一六六二年」來台的，不過在比鄭成功早的一六六二年以前，比如說一六五二年（順治九年）就來台，是比較有力的說法（全祖望〈沈太僕傳〉）。除此之外也有諸多說法，不能斷定為「一六六二年」。關於東吟社，收載在《臺灣府志》二十二卷、沈光文自己所著的《東吟社序》有詳細的敘述。著作有《臺灣賦》、《文開詩文集》等。此外，龔顯宗編的《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台南縣立文化中心）提供了關於他的詳細資料。（彭萱按：葉氏原著，二〇〇三年再版時，已將沈光文來台時間修改為一六五二年，日譯所據為舊版。）

④ 季麒光。江蘇無錫人。字聖昭，號蓉洲。康熙十五年的進士，二十三年成為諸羅縣（嘉義）知縣，致力於當地的文教工作，與沈光文有親密交情。著有《臺灣雜記》，也有《蓉洲文稿》、《山川考略》、《海外集》等著作。其他雖也編了《臺灣府志》卻沒能完成，後由高拱乾完成。

6)、徐孚遠^⑥、張煌言^⑦等詩人。這些舊知識份子的詩作充滿著鄉愁，同時燃燒著悲憤慷慨的愛國情操。

此時期臺灣的漢人移民社會人口已逾十萬，由於鄭經時代陳永華^⑧的極力提倡，文教機構已粗具規模。因此，在明鄭時代，傳統舊文學的種籽廣泛地被播種。可惜，一六八三年明鄭滅亡，臺灣成爲福建省的一部分，被置於清朝統治之下。

之後，漢民族的移民和土地的開發迅速地發展，一八八五年臺灣脫離福建省而建立爲獨立的一個省。此時，漢人的人口已逾二百五十多萬，米、糖、茶、樟腦的生產與輸出突飛猛進，使得臺灣社會蓄積了可觀的商業資本。

繁榮和富裕促使民族傳統文化的紮根，從萌芽到茁壯的流程迅速開展。但是真正表示臺灣的舊文學水準達到可以與大陸並駕齊驅的程度，卻是邁入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而臺灣舊

^⑤ 盧若騰（一五九八—一六六四）。福建同安金門人。字閑之，號牧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進士。以明末遺臣的身分在永曆十八年時和沈佺期、許吉燦等來台，卻因病發而死於澎湖島，享年六十六歲。以性格剛直、有「興利革弊」之才爲人所稱。著有《留庵詩文集》、《島噫詩》等。

^⑥ 徐孚遠（一五九九—一六六五）。江蘇華亭人。字闇公，號復齋。崇禎十五年舉人，明朝遺臣。曾經和同鄉陳子龍等結成幾社與魏忠賢對峙。文學聲譽高，與盧若騰、張煌言等人有親密交情，在台灣他們也組織了幾社。跟隨鄭成功來台，四年後歿於台灣。著有《釣璜堂集》。

^⑦ 張煌言（？—一六六四）。浙江鄞縣人。字元著，號蒼水。崇禎舉人。明朝魯王授與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之後，和鄭成功一同來台，卻在鄭成功死後遠走杭州。在連雅堂的《臺灣詩薈》中收錄有《蒼水詩錄》。

^⑧ 陳永華（一五九三—一六八八）。福建泉州南安人，和鄭成功同鄉。字復甫。一六四四年進士。在鄭政權的手下進行土地改革等種種改革。因劉國軒的讒言而下台，在鬱悶中過世了。

文學到了清末，才帶有豐富的本土為主的鄉土色彩。舊文學的播種歷經兩百多年，臺灣社會才擁有廣泛的舊知識份子階層，有了這個階層做背景，才有通過科舉的進士出現。

在康熙、雍正時代，在本地培養成功的作家文人尚未出現（註7）。例如，《裨海紀遊》的作者郁永河⁹為浙江仁和人，為了採硫磺，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來臺，在北部逗留約半歲，採硫工作完成後才回到原鄉。郁永河除《裨海紀遊》之外，還有臺灣竹枝詞及土蕃竹枝詞等著作。他的行文流利，作品以精確的寫實主義風格著稱。

此外，黃叔瓚¹⁰為順天大興人。朱一貴起義¹¹後，清廷才重新注意到臺灣的政治。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新設「欽命巡視臺灣御史」，特派一七〇一年（康熙四十年）中進士的黃叔瓚，歲巡臺灣以察民間的疾苦和吏治的情形。黃叔瓚來臺以後頗通曉臺灣山川

⁹ 郁永河（一六四五—？）。浙江仁和人。清朝官吏。字滄浪。由於福州火藥庫的硫磺因為火災而燒毀，而來台採硫填補。《裨海紀遊》（又名《渡海輿記》、《採硫日記》）是收錄其駐台日記的作品，以簡潔的文體客觀地描繪當時的歷史、地理、風景等。其他還有《番境補遺》這樣的著作，談到關於當時的平埔族文化，這是相當珍貴的資料。他約在台灣停留八個月之久。然而，日後取材郁永河事跡的小說中，於戰前有西川滿的《採硫記》、於戰後有葉石濤的《採硫記》。

¹⁰ 黃叔瓚（？—一七三六）。順天府大興人。字玉圃，號篤齋。康熙年間鴻儒黃叔琳之弟。為人溫厚篤實，學問以「立誠」為宗旨，研究元明之學問，被眾人公認可與其兄匹敵。約在台灣駐留兩年。其他尚有《南征紀程》、《南台舊文》、《臺灣蕃社圖》等數本著作。甚至有他是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之進士的說法。

¹¹ 朱一貴起義。朱一貴（？—一七二二）。漳州張泰人。羅漢門（現在高雄縣內門以及旗山一帶）的養鴨業者。反抗知府等的暴虐行為，在一七二二年，自稱己為明的末裔而起義。有杜君英等響應。一時佔領了臺灣府，號稱中興。可是，終究還是失敗被捕，而在北京被處以凌遲之刑。西川滿有以此次起義為題材的小說《鴨母皇帝》（臺灣時報）。

風土民俗，其著作《臺海使槎錄》，由「赤嵌筆談」、「番俗六考」、「番俗雜記」三部分所構成，跟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相提並論，為描寫臺灣風土人物景觀的散文雙璧。現摘錄兩段，以見其觀察與敘述的風格。

「臺邑額載厝餉、磨餉二項，俱始於偽鄭，志載瓦厝、草厝共徵銀一千二百零四兩。數十年來，有片瓦寸草俱無、子姓零落及孤寡不能自存者，亦必按冊拘追。而大井頭一帶，行店碁布，終歲不出分文。雍正元年五月，所司查驗府治房店，將破壞瓦厝、草厝悉為開除；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卷一、賦餉）。

「賣肉者吹角，鎮日吹呼，音甚悽楚。冬來，稻穀、糖、靛，各邑輦致郡治；車音脆薄，如哀如訴，時與吹角若相和然。……」（卷二、習俗）。

藍鼎元^⑫為福建漳浦人，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義時，隨著族兄臺灣鎮總兵藍廷珍來臺，擅於經世理亂之方策勝於文才。他的統治臺灣的政策，後來影響到臺灣的實際政治。其著作有《鹿洲全集》行世；包括有《鹿洲全集》、《東征集》、《平臺紀略》、《鹿洲公案》、《修史試筆》等。特別是《平臺紀略》一卷及《東征集》六卷，記述在鳳山縣下發難的朱一貴的起義始末，為研究朱一貴的重要資料。

臺灣現存的「方誌」中編得最為特出的應推《諸羅縣誌》。由陳夢林^⑬所編纂。陳夢

^⑫藍鼎元（一六八〇—一七三三）。字玉霖、任菴，號鹿洲。一七二二年，為了鎮壓朱一貴的起義，而與族兄藍廷珍一同來台，動用智謀策略，平定了動亂。之後，於一七二九年當上廣東普寧知縣，卻逝世於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享年五十四歲。其履歷詳細刊載於《鹿洲全集》的「初集」。（彭萱按：以下文字，係日譯本誤植於「朱一貴起義」條下，逕移於此。）還有《平臺紀略》完稿於雍正元年。在他死後由長男雲錦發行。《東征集》刊行於雍正十年。

林，漳浦諸生。他應周鍾瑄（嘉義知縣）之聘，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來臺。修史以外，著有《臺灣遊草》、《遊臺詩》、《臺灣後遊草》，作品風格以雄浩奇偉著稱。朱一貴起義時再次渡臺，參藍廷珍的幕府，深沈多智略，出奇制勝。夏之芳¹⁴爲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恩科進士。雍正六年作爲巡臺御史來臺，編有《海天玉尺編》初集、二集。

江日昇¹⁵以《臺灣外紀》一作而聞名於世。《臺灣外紀》詳述鄭芝龍以下四代的事跡，但不能視爲正史。由於江日昇過份潤色史實，往往有失真之處。然而，以明鄭的傳記文獻而言，首尾一貫，頗有價值。其實《臺灣外紀》爲一本歷史小說兼有報導文學之體裁，其文學精神和寫作風格，應該說爲臺灣文學樹立了一個風範。

邁入乾隆、嘉慶時代以後，宦遊人士激增，自然采風觀光的詩作和散文也多起來。譬如朱仕玠¹⁶在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六月抵任臺灣府鳳山縣學教諭，次年八月，丁母氏

¹³ 陳夢林（一六七〇—一七四五）。福建漳浦人。字少林。雖然在福建巡撫張伯行門下學習，不過考了七次鄉試都未能及第，於是放棄仕進。在一七二三年的時候，也曾滯留在台灣數個月，遊歷各地。被稱爲「他齋先生」。《諸羅縣志》是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的書，共有十二卷。當時的漢人、蕃人（平埔族）的風俗紀錄值得注目。於雍正三年第三度訪台。

¹⁴ 夏之芳。江蘇高郵人。字荔園，號筠莊。靠著恩科進士而進入翰林院，轉任督察院以後來台。來台的時候也兼任學政事務，在台一年間努力振興文教。《海天玉尺編》的初集、二集是順應歲考而挑選優秀童生的作品編成的應考範文。

¹⁵ 江日昇。福建九閩珠浦人。號東旭。《臺灣外紀》另有別名叫做《賜國姓鄭成功全傳》，與其說其爲史實，不如說是傳記小說要貼切一點。本書在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時，終於如願以償獲得發行。一般通用本雖然有十卷版本和三十卷版本兩種，但是內容幾乎完全相同。戰前，楊雲萍在《臺灣公論》雜誌上發表日文翻譯版本。

之艱而去。在臺僅一年又兩個月，卻撰述了臺灣文獻史上值得紀念的一部大作《小琉球漫誌》。「漫誌」共分十卷，即〈泛海紀程〉、〈海東紀勝〉、〈瀛涯漁唱〉、〈海東賸語〉、〈海東月令〉、〈下淡水寄語〉等，刊於乾隆年間。現在摘詩作一首以見他底作品風格。

〈鳳岫春雨〉云：「鳳山南望海天遙，春至空濛暮復朝，氣動蛟龍初起蟄，聲催螺蚌盡乘潮。瀟瀟餘響紛傳幄，淅淅輕寒鎮入宵。羈旅有情誰遣此，短檠相對伴蕭寥。」

（日譯解說：從鳳山向南方望去，海和天在遙遠的另一方連成一片。春天來臨，春雨中從早到晚天色都是朦朧的。春天來臨的氣息將蛟龍從睡夢中呼醒，春雨的聲音正誘惑著貝殼們乘上波浪。從我的房間也可聽見交錯著的春雨之聲，漫長的春寒也歸於寧靜，夜也深沉了。來到台灣的作者羈旅在外，縱有滿腔的感慨，該向誰述說好呢？與燭臺相對，只有與寂寞相伴。）

除朱仕玠之外，尚有張湄¹⁷，一七三三年，癸丑（雍正十一年）進士，錢塘人。由翰林院改御史巡臺灣，著有《珊瑚集》、《瀛孺百詠》。此外還有范咸¹⁸，浙江錢塘人，雍正元

¹⁶ 朱仕玠。福建邵武人。字碧峰，號筠園。「漫誌」是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在赴任鳳山縣學教員的途中，以及住在鳳山期間的所見所聞，並穿插自己創作的詩而寫成的作品。發行於一七六五年。

¹⁷ 張湄。浙江錢塘人。字鷺州。據說他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以巡臺御史的身分來台。《珊瑚集》是模仿夏之芳的《海天玉尺編》，集結應付歲考所創作的文章而成的作品。《瀛孺百詠》被認為是吟詠台灣風景的作品。停留台灣一年即離去。

¹⁸ 范咸。一說他是浙江仁和人。字貞吉，號九池。是雍正元年進士，於乾隆十年四月成為巡臺御史。《重修臺灣府志》是與其同為巡臺御史的六十七（人名）共同編纂的。

年進士，來臺後負責《重修臺灣府志》二十五卷外，著有《婆娑洋集》二卷。錢琦¹⁹為浙江仁和人，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進士，一七五一年春就任巡臺御史而來臺，作品未結集，多散見於臺灣府誌。趙翼²⁰為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進士，乾隆五十一年被聘為當時閩浙總督李侍堯的幕僚，為平定林爽文、莊大田的起義²¹而渡臺，著有《平定臺灣述略》一卷，記事件的始末。

如上所述宦遊人士的作品多富於異國情趣，還未能深入到站在本土人民的立場，來描寫民生疾苦的層面。由於府吏大致上也規定任期三年，但正如俗話所說：「三年官兩年滿」，他們一開頭就隨時準備開溜，希望趕快調回內地。自然而然，他們因循苟且成性，作品裡未能反映當時漢蕃雜居的臺灣移民社會的現實（註8）。

在這個年代裡，逐漸有本土出身的文人出現且有著作。

¹⁹ 錢琦。字湘如，號瓊沙。所著詩集中有《澄碧齋詩鈔》。本文中葉氏所說的「尚未整理成一冊」，所指的是關於和台灣有關聯的詩作。在《彰化縣志》卷十二中錄有其作品，錢琦來台的時候，當時以性靈派著名的袁枚贈詩《心中賢人歌》以及《玉山歌》。

²⁰ 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二）。江蘇陽湖人。字耘松，號甌北。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林爽文之亂的時候，因為閩浙總督李侍堯的懇求而來台。其詩作足可和袁枚、蔣士銓等匹敵，不過卻特別熟知史學，《二十二史劄記》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他尚有《甌北詩話》，《陔余叢考》等。

²¹ 林爽文、莊大田的起義。林爽文（？—一七八八），是福建漳州平和人。幼年時期和父親一同渡海來到台中。一七八四年加入天地會。一七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針對臺灣知府孫景燧對鄉民的暴政而起義，自稱「盟主大元帥」，聯絡南路天地會的領袖，鳳山的莊大田（？—一七八八）共同奮戰，不過隨著清朝派遣的陝甘總督福康安來台，而於一年三個月之後被平定了。

如諸羅王克捷²²，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進士。除通曉詩文之外，善寫賦，留下〈臺灣賦〉巨篇。陳輝²³為臺南人，乾隆三年舉人，五年被巡道劉良璧所聘而續修臺灣府誌。作品大多是遊覽時所作，風格敦厚。詩作二十七首，後來收在連雅堂主編的《臺灣詩薈》。章甫²⁴也是臺南人，收錄其詩文的有《半崧集》六卷。

邁入道光、咸豐年代以後，仍然有宦遊人士的作品出現。如姚瑩、周凱、徐宗幹、劉家謀（字世川）之外，缺少才華洋溢的作品。倒是本土出身的文人佔大多數，作品也非常優秀，到如今仍然為一部分人士所喜愛。本土作家群，以澎湖出身的蔡廷蘭為首，有彰化的陳肇興和黃銓，淡水的黃敬和曹敬，新竹的鄭用錫和林占梅等人。

姚瑩²⁵為安徽桐城人，一八〇八年（嘉慶十三年）進士。歷任平和、龍溪知縣，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任臺灣縣知縣，一八二二年（道光元年）署噶瑪蘭通判，道光十八年任臺灣道，後陞廣西按察使。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的鴉片戰爭，其影響波及到臺灣。

²² 王克捷，諸羅人。字必昌，是台灣最早的進士。著有《通虛齋集》。（彭萱按：〈臺灣賦〉作者王克捷另有其人，非諸羅人。）

²³ 陳輝，字旭初。其詩作在《臺灣詩薈》上被整理成《陳旭初先生詩集》。

²⁴ 章甫（一七五五—一八一六），字申友，號半崧。三十二歲時移居到現在的台南。貢生。《半崧集》是著者在世時由門下統整而成的詩文集，於一八一六年在福州發行。另外有《選贈和齋詩集》。

²⁵ 姚瑩（一七八五—一八五三），字石甫。歷任福建平和等的知縣，一八一九年歷經臺灣知縣、噶瑪蘭通判，於一八三六年成為分巡臺灣兵備道。本文中一八四一年的英國船為 *Nerbudda* 號，一八四二年的被稱為 *Ann* 號。締結了「南京條約」之後，不但被免職，還被流放到四川、西藏，但是卻在一八五〇年時復職，成為湖南按察使。是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的姪孫。雖然另外有《東溟奏稿》、《石甫文鈔》等，不過這些幾乎都收錄在《中復堂全集》九十八卷當中。

姚瑩和當時的臺灣鎮守總兵官達洪阿協力防守。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一年）英船犯基隆，砲臺參將邱鎮功手發一砲正中夷舟，夷舟倉皇退出衝礁立碎，生擒黑夷百餘名。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夷舟三犯大安港，謀以計誘入口擒之。夷舟爲暗礁所擊，擱淺中流，官兵鄉勇乘危追擊，遂俘其眾，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

之後，因當時大吏對於姚瑩之嫉妒及英方的報復，使得姚瑩等蒙受「臺灣之獄」之難。姚瑩幾被逮問，因臺灣士民憤激罷市才免，後仍被革職。姚瑩之所以遭受英方報復乃因把大部分俘獲的「夷囚」在臺灣就地正法的關係。姚瑩著有《東溟文集》及《東槎紀略》。

周凱²⁶爲浙江富陽人，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進士，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任臺灣道。周凱因一生的德行事業甚獲民心，著有《澎湖紀行》、《內自訟齋文集》、《內自訟齋詩鈔》。徐宗幹²⁷，江蘇通州人，一八二〇年（嘉慶二十五年）進士，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任「分巡臺灣道」。徐宗幹到臺之後，正當鴉片戰爭之後，外國的侵略勢力日甚一日之時。當時的臺灣民眾爲抵抗這些以英國爲首的帝國主義侵略，成立「全臺紳民公約」，反對夷人在臺地貿易，反對「習教惑眾」，反對「占地蓋房」，反對「霸攬貨稅」，反對「買用男婦」。簡言之，臺民反對列強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徐宗幹著

²⁶ 周凱（一七七九—一八三七）。字仲禮。一八三六年爲了鎮壓嘉義沈知、岡山吳福的叛亂而再度來台。再者，巡視宜蘭地方，並向閩浙總督建議台灣的治政方法。

²⁷ 徐宗幹（？—一八六六）。字樹人，號伯楨。一八四八年成爲分巡臺灣道，致力於台灣的軍隊改造。之後歷經福建按察使，成爲福建巡撫。《虹玉樓試帖選》是道光三〇年刊行的，爲了科舉考試的童生而收錄一些具有示範代表性的詩。此外另有《渡海前記》、《渡海後記》等。

作頗多，有〈紅玉樓詩選〉一卷，〈期末信齋文集〉二十一卷（彭萱按：《紅玉樓詩選》應作《虹玉樓詩選》，〈期末信齋文集〉二十一卷應作《斯末信齋文編》四卷）。

劉家謀²⁸福建侯官人，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舉於鄉，後「累上春官不第」，道光二十九年任臺灣府學教諭。劉家謀是一個「教士嚴」，但又「衛士尤勇」的人，他不怕上官的「不喜」而保衛士子。劉家謀有許多作品；如《外丁卯橋居士初稿》八卷、《東洋小草》四卷附《斫劍詞》一卷、《開天宮詞》二卷、《攬環集》一卷。其中最有名的是收錄臺灣掌故的《海音詩》二卷。「海音」是「留心文獻，所至輒搜羅掌故」的書。

蔡廷蘭²⁹為澎湖雙頭鄉出身的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澎湖本來是「其土瘠，其產嗇，其民勞，其俗樸」的貧苦地方。蔡廷蘭出生於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竟能發揮他的文才，十三歲補弟子員，真令人敬佩。他的作品《越南紀略》四卷、《災荒紀略》四卷、《香祖詩草》一卷（彭萱按：蔡氏作品有〈滄溟紀險〉、〈炎荒紀程〉、〈越南紀略〉，《香祖詩草》）。蔡廷蘭所有詩作品中，吟詠因風災頻臨饑餓的庶民疾苦的〈請急賑歌〉最著名。這是本土出身的文人，吟唱清朝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無依無靠的可憐生活最逼真的詩作。節錄其第二首於下：「炊煙卓午飛，乞火聞鄰婦，涕淚為予言：恨死乃獨後。居有屋數

²⁸劉家謀（一八一五—一八五三）。字芑川，又稱仲為。在台灣停留四年，病逝。《海音詩》是其病死的前年，病中所作的詩，描繪當時的歷史、典故以及台灣庶民的現狀，成為重要的當時台灣經濟史、風俗史、社會史之史料，此外更是賦予這些史料一些文學性的價值。各詩之後另附有作者本身的注釋。

²⁹蔡廷蘭（一八〇二—一八五九）。字香祖，號秋園。受到來澎湖視察的周凱的知遇，於一八三四年時成為台灣府引心書院的主講，之後也被周凱徵用。成為最早出身於澎湖的進士（一八四四）以後，歷任峽江知縣、南昌水利同知等，逝於豐城。另外有《海音雜著》等。然而，本注釋中關於他的生卒年是根據陳昭瑛的《台灣詩選注》而來。葉氏、陳氏到底哪一方正確，仍然不明。

椽，種無田半畝。夫婿去年秋，東渡餬其口。高堂留衰翁，窮饑苦相守。夫亡訃忽傳，翁老愁難受。一夕歸黃泉，半文索烏有。嫁女來喪夫，鬻兒來葬舅。家口餘零丁，幼兒尙襁負。吞聲撫遺孤，飲泣謀升斗。朝朝掇海菜，采采不盈手。菜少煮加湯，菜熟兒呼母。兒飽母忍飢，母死兒不久……。」（日譯解說：正當準備午餐的炊煙開始向上冒升之時，到隔壁人家去借火，鄰家的婦人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向我訴說道：「真正令我感到遺憾的是，留下我一個人以後，只剩下幾間房子，卻連半畝田也沒有。丈夫爲了生計，去年秋天就到東方去了。家中留有年老的公公，雖然家中貧窮連吃的東西也沒有，我仍然誠懇盡心地照料他。不料，卻突然收到丈夫死去的噩耗，公公也因為過度哀傷而過世了。嫁女兒來埋葬丈夫，賣兒子來埋葬公公。家中剩下的只有我跟幼子。孩子年紀還小，只能強忍住悲傷，撫慰著他罷了。忍住眼淚，思考將來該如何過活下去。每天都到海邊揀海菜，不過怎麼揀也揀不滿一握，菜少只好多加點水來煮。菜要是煮熟了，就聽到孩子呼叫飯煮好了的聲音。就算孩子填飽了肚子，我還是得忍住飢餓。要是我死了，這孩子也活不久了吧……。」）咸豐二年，署南昌水利同知；六年，署豐城縣；以防堵出力，當局保升，一八七〇年（咸豐九年）三月十五日，在任病故，享年五十有九（彭萱按：高啓進、陳益源、陳英俊合著《開澎進士蔡廷蘭與《海南雜著》》，以蔡廷蘭生卒年爲一八〇一—一八五九）。

陳肇興³⁰爲彰化人，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舉人。自幼通群書，跟曾惟精、蔡德芳³¹、廖景瀛並列，世人稱爲白沙書院四傑。³²時，他和新竹的林占梅一起參

³⁰ 陳肇興（一八三二—？）。字伯康，號陶村。雖然在平戴潮春之亂上有功績，卻沒有任官，終生在彰化任書塾教師。吳德功是其弟子。一般也說他於咸豐八年成爲舉人。（彭萱按：陳肇興卒年，《全臺詩》作「一八六六？」。）

加平定。講到平亂的功業，陳肇興不及林占梅。若說到詩作，林占梅的清麗不及陳肇興的篤實。其所著《陶村詩稿》八卷，平明寫實，真情流露。由於題材多根據戴潮春變亂，很有史料價值。

黃敬³³，關渡人，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歲貢。道光、咸豐年間，北部台灣有兩位著名學者，其一為關渡黃敬，另一位是士林曹敬³⁴，世人稱「二敬」。咸豐四年成貢生以後，派任為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假莊中天后宮為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敬為人謹飭，一言一動載之日記，至老不倦。」著作有《易經義類存編》二卷等外，尚有《觀潮齋詩集》一卷。

鄭用錫³⁵，新竹人，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林召棠榜進士。鄭用錫是約六十年間台灣蔡德芳。彰化鹿港人。字香鄰。咸豐九年舉人，於同治十三年成為進士。在白沙書院跟廖春波學習，和陳肇興是好友。關於曾、廖兩人的生平事蹟則不明。

³² 戴潮春之亂。戴潮春（？——一八六四）是彰化四張犁人，字萬生。雖然有代代任北路參將書記的家世背景，卻因為難以忍受官吏的蠻橫霸道而辭職，加入天地會。一八六二年，因為台灣道的孔昭慈在彰化施行結社監督，戴攻佔彰化並自稱東王。以後，被林占梅、陳肇興所率領的義勇軍所俘虜，並被殺害。

³³ 黃敬。淡水干豆莊（今台北市北投區關渡）的人。字景寅。他為人篤實，因為他終身奉獻給教學，所以被稱為關渡先生。著作中除了本文中刊載的《易義經論》、《古今占法》各一卷之外，其他都沒有發行出版。

³⁴ 曹敬（一八一七——一八五九）。淡水八芝蘭（台北市士林）人。字興欽，號慈民。跟著陳維英學習之後，設置私塾，傳授學業。人品高潔，精通書畫、雕刻，和黃敬一起被稱作淡水的二敬先生。雖然其著作幾乎大都失散了，但是殘留下來的幾卷被門生收集作成《曹慈民先生詩文集》，收錄在一九六一年，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的《臺灣文獻》當中。

³⁵ 鄭用錫（一七八八——一八五八）。字在中，號祇亭。一八四二年，當英國的船艦正要入侵大安港時，招募民兵，防

沒有出過進士時的進士。成進士後，於道光七年督建新竹城，後主講明志書院，培養後進約有八年。晚年，築「北郭園」，池榭清幽，為台灣有數的名園之一。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歿，享壽七十一。著有《北郭園全集》十卷及《淡水廳志稿》二卷，詩作以平淡為特色。

林占梅³⁶，新竹人，祖紹賢，經商墾田，富甲一鄉。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英人犯雞籠，林氏倡捐防費，以貢生加道銜。平定戴潮春變亂有功，任布政使。他擅長於詩作之外，也懂音樂；「能詩、能畫、能琴、能射、能音樂」。晚年築有潛園。其著作有《潛園琴餘草》，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歿，行年四十九。

同治、光緒時代本土作家的詩作水準跟內地已不分軒輊，風格有強烈的鄉土色彩，文名遠播至內地。宦遊人士如王凱泰、楊浚、林豪、吳子光、唐景崧等人都很有名。本土詩人有陳維英、李夢洋、丘逢甲、施士洁等人。

王凱泰³⁷，江蘇寶應人，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進士。同治九年以廣東布政使，遷衛成功。當時，他的詩文堪稱北部第一，舊知識人都爭著想要與他唱和。《北郭園全集》是他死後的同治九年發行的，其他還有《淡水廳志稿》二冊。

³⁶ 林占梅（一八二一—一八六八）。字雪村，號鶴山。祖父林紹賢是一手掌控台灣鹽業的大富豪。十一歲時遊北京，娶客家人進士黃驥雲之女為妻。雖然因鎮壓一八六二年的戴潮春之亂有功而出名，不過另外在一八四四年的漳、泉嘉義械鬥時和一八五三年的林恭之亂時也立下功勞。於一八六五年病逝（彭萱按：非病逝，另有死因）。此外有《潛園唱和集》。葉氏認為他死於四十九歲，但是陳昭瑛認為是四十七歲。

³⁷ 王凱泰（？—一八七五）有一說說他是京師順天府寶應縣人。字補帆。道光三〇年進士及第，一八六三年納入李鴻章臣下。曾於一八六五年任浙江糧道，一八六六年任浙江按察使，而成為福建巡撫。雖然來台時期是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卻因病於當年十月回到福建，病逝。他和沈葆楨共同編纂《訓番俚言》。然而，在本文中引用的詩的第三句「少小為奴」，雖然葉氏的引用為「多少為奴」，這是根據《臺灣通史》改成的。

福建巡撫。光緒元年移居台灣，從事開山撫蕃工作。他長於詩文，爲了打破吸食鴉片、生活奢侈、錮婢等陋習，著有〈臺灣雜詠〉三十二首和「續詠十二首」。第十五首原注「錮婢之習，台郡尤甚」茲節錄於下以見他對台灣統治關心的所在：「夭桃莫賦女宜家，韻事徒傳竹裡茶。多少爲奴今老大，星星霜鬢尙盤鴉。」（日譯解說：《詩經》周南的〈桃夭〉詩中有，出嫁的姑娘一定是適合那一家人家的，我也以一個即將出嫁的女子之身學習了許多技能。不過，年少時就成了人家的奴才，現在到了這個年紀還是一樣，頭髮當中雖然夾雜著白絲，髮型卻仍然還是桃瓣型。）

楊浚³⁸爲福建侯官人，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舉人。同治八年，應陳培桂的聘請來台，編纂淡水廳志十六卷。他所著《冠悔堂詩文鈔》，有關台灣的作品不少。林豪³⁹爲福建金門舉人，同治元年七月，應淡水族人之招來台。本來擬便道南下訪友，因爲戴潮春之變路徑不通，在旅次遇著林占梅，因而住在林占梅處。同治六年，受淡水同知嚴金清的延聘，修《淡水廳誌》⁴⁰十五卷（彭萱按：未刊行，通稱《淡水續志稿》），後來受聘主講文石書院，又編纂《澎湖廳誌》十四卷。其著作除〈淡水廳誌訂謬〉一卷、《澎湖廳誌》十四卷之

³⁸楊浚。字雪滄，又爲健公。是詩人也是藏書家。任漳州、丹霞、浯江等書院教授。

³⁹林豪（一八三一—一九一八）。字卓人。一說他是福建廈門人。咸豐年間舉人，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渡海來台，住在艋舺（萬華）。之後，成爲澎湖文石書院主講，在金門度過晚年。另外也有《金門志》、《誦清堂詩集》等著作。

⁴⁰淡水廳志。一八七一年發行。爲曾任淡水同知的陳培桂所撰。全六〇卷。係鄭用錫所撰初稿。接著由接受淡水同知嚴金清招聘的林豪寫完續稿。接著陳培桂成爲同知之後，由楊浚、吳子光等人完成。

外，還有〈東瀛記事〉二卷以及〈香閨二十四詠〉。林豪是來台大陸人士中有關台灣著述數量最多的一位。吳子光⁴¹為廣東嘉應州人，同治四年舉人。戴潮春之變時流寓台灣，其詩文集《一肚皮集》，歌詠台灣風物、制度頗多，心胸磊落，可以在字句間看得出來。吳子光為丘逢甲之師。

唐景崧⁴²為廣西人，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四月，任台灣道，從光緒二十年九月到二十一年四月任巡撫。剛任巡撫不久，就碰到乙未割台，他被選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他既不願做，又不得不做。自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日受任民主國大總統至十二日從滬尾（淡水）逃回廈門，總共做十日總統。唐景崧不識韜略，缺乏處理危急的勇力和果斷的性格。唐景崧擅長於詩文，特別對詩畸有心得。詩畸別名詩鐘，是在中國南方發展的一種詩體。唐景崧來台後組織「牡丹詩社」，跟丘逢甲、施士洁、汪春源、林啓東、黃宗鼎等人唱和，著有《詩畸》八卷、「外篇」一卷。

從一六五二年（沈光文之序文提及其事萬曆四十年）

⁴³明儒沈光文漂流到台灣播種舊文學以來，直到一八四四

⁴¹吳子光。字藝閣。客家人。在科舉中試以前住在現在的新竹市（原淡水廳），之後回到故鄉成為舉人。再應淡水同知陳培桂的邀請，編輯了《淡水廳志》。後來應台中神岡鄉呂家之邀，擔任西賓教席。他的文稿被保存在呂家，近年台北史蹟研究中心將之以《吳子光全集》的形式印刷出版。

⁴²唐景崧（一八四二—一九〇三）。廣西灌陽人，同治進士。字維卿。一八八三年臣處張之洞之下。擅長詩的創作。在台南道署的斐亭經常舉辦詩人大會，聚集全台灣漢詩人唱和。另外，廖漢臣的〈唐景崧與牡丹吟社〉（《台灣文物》四一四）中，關於唐景崧與牡丹吟社有詳細敘述。

⁴³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原文是這麼寫的「一六一二年（萬曆四十年）」，說明這一年是沈光文的出生年，譯者認為這是錯誤的，所以連同本文第二節最初出現沈光文的地方，一起做訂正而後翻譯。（彭萱按：葉氏原著再版本，此處已改為「一六五二（萬曆四十年）」。只改了西元紀年，未改明代繫年。一六五二年應為南明桂王永曆六年，葉氏以本年為沈光文來臺之年代，非出生年。）

年（道光二十四年）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蔡廷蘭中進士爲止，這中間已流逝了二百多年的時間。舊文學的遲遲未能在台灣生根，這是台灣社會結構使然。台灣本來是一個漢蕃雜居的社會，移民而來的漢人大多數屬於目不識丁的庶民階層，尤以農民爲多。從事拓墾事業不須通曉文字，而一部分靠手工藝謀生的匠人，亦不必有書寫之能力；唯有一部分商人爲生計所需，必須略通文字及簡單的書寫、計算才行。因此，缺乏穩定的士大夫階級的存在。至於宦遊人士，短則三年，長則數年，台灣只不過是暫時居留地，恨不得立刻逃回大陸。因此，宦遊人士的詩文，大多數屬於文獻性質的史書；至於個人述懷的詩文，多是傷懷詠吟的富於異國情趣的作品。

到了清末，內憂外患接踵而來，激起台灣舊知識份子保鄉衛土的激烈情操，台灣舊知識份子逐漸覺醒，認識文學並非遊戲應酬的工具，它應該反映本土人民的疾苦生活及發揚民族精神。由於清末，經營台灣已有二百多年，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地主階級；大租、小租等地主階級，掌握了穩定的生產關係，同時又能利用游資投入米、糖、茶、樟腦等對外貿易，得以累積了相當雄厚的商業資本。就是從這粗具規模的士紳資產階級產生了不遜於大陸一流文人的優秀作品，跟大陸舊知識份子並駕齊驅，同時作品裡強烈地反映了台灣在特殊歷史命運下的各種遭遇。他們在清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些與台灣共生死，有些逃回大陸，有些在異族統治下消極地苟延殘喘。

陳維英⁴⁴爲台北大龍峒莊人。少入泮，博覽群書，與伯兄維藻有名於庠序間。一八五一年（咸豐初年）^元，舉孝廉方正，九年復舉於鄉，任閩縣教諭。同治元年戴潮春之變，與鄉人

辦團練以功賞戴花翎。晚年，在劍潭山麓築屋，名為太古巢，過著讀書生活，著有《偷閒錄》等。連雅堂曾在《劍花室詩草》裡批評陳迂谷（維英）不知詩而寫道：「太古巢空人已去，可憐迂谷不知詩」。其實這是對詩的觀點不同而來的批評。陳維英的詩，有強烈的平民意識，不事修辭，不怕「鄙俚」，順其自然而已。如他的詩〈鄉人〉中的一首非常幽默：「鄉人會飲盡來前，孰富孰貧我瞭然，從中敢說大聲話，便是能傭些少錢。盜賊有錢皆好友，無錢兄弟亦非親，俗情顛倒君休怪，當世論錢不論人。」（日譯解說：鄉人群集來飲酒。有錢沒錢一眼就看的出來。敢大聲說話的，就是薄有資產的人。只要有錢，即使是盜賊也可以是好朋友，沒錢的話，就連兄弟親戚也當不成了。世間人情就是這樣顛顛倒倒，你又能奈何！當今世上是論錢不論人品的。）

李望洋⁴⁵為宜蘭人，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任甘肅省河州知縣。其詩集《李靜齋西行小名水滸》

⁴⁴陳維英（一八一—一八六九）。字迂谷。是在台灣北部與板橋的林本源家族並稱的名門出身。跟隨堂兄維藻學習。雖然說他少年時期並不是那麼好學，不過，一次就考上舉人。在閩縣教過書後，因為捐官而成爲內閣中書。回台之後成爲宜蘭仰山以及臚胛學海書院的主講，致力於人才的養成。《偷閒錄》收錄詩七百首。其他有由田大熊一、陳懃厚校編的《太古巢聯集》，於昭和十二年十月發行。再者，本文中的連雅堂《劍花室詩草》所收錄的詩是以《圓山雜詩》爲題的七絕，全文是「此間山水足嶽奇，石老林深位置宜。太古巢空人已去，可憐迂谷不知詩。」雖然未見原稿，不過根據楊雲萍的說法，這是「櫟社第一集所收」。

⁴⁵李望洋（一八二九—一九〇一）。字子觀，號靜齋。是宜蘭出身的最早的詩人。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的舉人，從中國回來以後，在宜蘭的仰山書院任教。《西行吟草》是吟詠在甘肅所感的作品。再者，他也被認爲逝世於一八九七年。

吟草》，收錄了多數詠菊作品。

丘逢甲⁴⁶為彰化翁仔社人，年少時，曾寓豐原筱雲山莊，受教於吳子光。年僅十三歲即中秀才，之後跟陞為布政使的唐景崧交往，有文酒的酬酢不斷。光緒二十一年「日軍迫獅球嶺：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而去，或言近十萬云。」（註9）因此，他同唐景崧一起逃回大陸廣東嘉應州，而號倉海君，其詩作為《嶺雲海日樓詩鈔》，可以看到丘逢甲內心的苦悶和寂寞。他的詩表現了對台灣真摯的愛，及對台灣淪日的憤恨和哀痛。施士洁⁴⁷為台南人，進士出身。應唐景崧之聘，任海東書院主講，跟唐景崧一起致力於詩作的振興。

第三節 日據時代初期的舊文學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結束，清廷不得不割讓台灣和澎湖群島給日本，從此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台的清朝官員和本地士紳階層期望列強出面干涉，在承認清朝宗主權下，宣布「台灣民主國」的建國，組織義軍抵抗日軍入侵，可惜在強大的侵台軍炮火之下，義軍節節

⁴⁶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二二）。一說他是苗栗銅鑼人。字仙根。進士出身，成為工部主事。在台灣割讓時，血書「拒倭守土」，擁護巡撫唐景崧作台灣民主國總統，自己則任副總統兼義勇軍隊長。逃亡到中國之後，雖然當上廣東省代表，卻於任期中病逝了。他的詩作雖然有五千多首，現存的就只有兩千多首。其他有《柏莊詩集》等。

⁴⁷ 施士洁（一八五五—一九二二）。字應嘉，號濛舫。雖然在一八七六年成為進士，卻因為不喜好任官，而回到台灣任台南的海東書院、崇文書院，彰化的白沙書院主講。在台灣割讓時期渡海到福建，逝世於鼓浪嶼。收集其著作，集合成《後蘇龔合集》，有十七卷。

敗退，在清朝官吏紛紛離台逃回原鄉。林維源⁴⁸等本地資產階級也多步其後塵，丘逢甲也跟著唐景崧逃回原鄉——嘉應州。然而丘逢甲回到原鄉之後，對台灣淪日的哀恨並沒有停止。他把這懷鄉之愁情抒發在詩集《嶺雲海日樓詩鈔》。台灣淪日過了三年頭時，他有一首詩〈元夕無月〉：「滿城燈市蕩春煙，寶月沉沉隔海天，看到六鰲仙有淚，神仙淪沒已三年。三年此夕月無光，明月多應在故鄉，欲向海天尋月去，五更飛夢渡鯤洋。」（日譯解說：滿街都是燈籠的城市，飄盪著春天的霧氣，月亮靜悄悄地掛在海和天空的邊境那端。遠眺傳說有六隻鰲存在的東海，那邊的仙人也在哭泣。被傳說住有神仙的台灣，淪入於日本人手裡已經有三年了。第二年的元宵夜連月亮都沒有。在故鄉看的才能稱之為明月吧！欲探訪那淪於日本的海的那方的故鄉，只能在深夜的夢裡飛回台灣。）

丘逢甲回到嘉應州之後，跟屬於南社⁴⁹的梁啟超⁵⁰、黃遵憲⁵¹都有來往。辛亥革命後，⁴⁸林維源（一八三八—一九〇五）。字時甫。出身板橋的林本源。祖父是平侯，父親是平侯的三男國華（本記），之後入五男國芳（源記）的房下。國華、國芳是林本源家族的「屋號」。和巡撫劉銘傳為好友。再者，因為台北城（小南門）的建設而被賜予四品官，為了戴潮春之亂的平定而捐獻了鉅款，在土地開發或稅制改革等方面都有極大的貢獻，被稱為「台灣近代化背後的功勞者」。一般說來，現在遺留下來龐大的林本源家是維源時代完成的。台灣割讓時期逃到廈門，在當地過世。

⁴⁹南社。一九〇九年在蘇州成立的文學團體。柳亞子等想要利用文學來倡導革命而創立的。革命的最盛時期擁有千人以上的社友，也在各地成立了分社。在一九二三年左右停止了活動。再者，在台灣也有連雅堂等所主宰的同名舊詩社「南社」。

⁵⁰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廣東新會人，字任公。中國清末的啟蒙思想家。在老師康有為的門下提倡變法自強，於戊戌政變之後逃亡日本。其平易流暢的文章給予當時的青年層很大的影響。與林獻堂是在居留日本時期中的一九〇七年相識。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梁在兩個女兒的陪伴下，為了鑑定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之成果的真相而來台。在台灣時，留宿霧峰林獻堂家，受到櫟社的詩友，以及中部士紳的歡迎。在台灣停留兩個

同革命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其子丘念台⁵²，光復後回到台灣，致力於政府與台灣民眾之間的意志溝通，然因二二八事件之關係，其努力功虧一簣。施士浩、汪春源都回到廈門，隱居不問世事而去世。在台南奉劉永福⁵³之命，防守台南的光緒十六年進士許南英⁵⁴因日兵入台南搜索，從安平港乘船內渡，任徐聞縣、陽春縣等知縣。著有《窺園留草》等詩集。其子許地山⁵⁵，後來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留下特異的足跡。

月，在當時所作的百餘首詩，詞被命題為「海棠吟」。參照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⁵¹ 黃遵憲（一八四五—一九〇五）。廣東嘉應（現在的梅縣）人。字公度。詩人、外交官。一八七七年隨著駐日公使何如璋來日。在這時候讀過《日本雜事詩》。之後經歷各國的總領事，一八九五年歸國以後，和康有為、梁啟超有親密交情，協助變法運動。

⁵² 丘念台（一八九七—一九六七）。字伯琮。一九一三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一九二五年自東京大學畢業之後渡海到了滿洲，作了一陣子技師，後在一九三一年時跟隨在馬占山身邊。以後在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執教鞭。戰後立刻回台灣在國民黨中活動。一九六七年一月病逝於東京。

⁵³ 劉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廣東欽州的客家人。字淵亭，清的軍人。在二十一歲時加入天地會，之後參加了太平天國軍，卻因為被馮子材追擊而逃亡到越南。一八七三年時在諒山擊破法軍而得到名望。一八七四年當上三宣軍務副提督，一八七九年成為太原布政使。在日清戰爭時被委派防守台灣而駐留在台南，結果卻逃回了中國。辛亥革命時受到胡漢民的邀請而成為廣東民團總長。

⁵⁴ 許南英（一八五五—一九一七）。台南安平縣人。字子蘊，號蘊白，別號窺園主人。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成為進士。雖然之後也當上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但是他卻志不在作官。沒有什麼具體的原因便辭官回到台灣，傳說他進入蕃社教化原住民。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的時期，雖然當了台南的籌防局統領，受到日本軍的猛烈攻擊而渡海到大陸，歷任各縣的知縣。雖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元年）時一度回到台南，在蘇門達臘的棉蘭停留期間，逝世於當地。

⁵⁵ 許地山（一八九三—一九四一）。出生在台南馬公廟。是個作家，以落華生為筆名。一八九五年和父親一起渡海到中國，一九一七年進入燕京大學就讀，一九二一年時與周作人等設立「文學研究會」。一九二三年赴美，一九二五年進入牛津大學就學。歸國之後任教於燕京、北京大學等。一九三三年前往印度的路途上帶著整理亡父遺稿集結出版的《窺園留草》，順道經過台灣時，和陳逢源等人會面。對於印度文學的造詣頗深。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因心臟麻痺而死亡。作品有《命命鳥》、《空山靈雨》、《綴網勞蛛》、《春桃》等。

日本侵台之後，許多富有民族意識的舊知識份子，不願在異族的鐵蹄下苟延殘喘，返回大陸不再回台。但是也有一部分舊文人，時局趨平靜後再回台，從此沈淪於酒色之娛，在日本統治下過一輩子遺民生活。此外，也有像洪棄生⁵⁶這樣的文人，參加抗日義軍失敗後，終生不剪辮髮，杜門不出，把台灣社會和歷史刻劃於詩文中，發揮了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洪棄生，原名攀桂，字月樵，台灣彰化鹿港人。光緒十七年以案首入泮，割台後，絕意仕進，不再赴考，遂潛心於詩古文辭。楊雲萍說他：「近代學人之中，博聞篤學，抱樸守貞，儼然有古大師之風。」著有《寄鶴齋詩話》、《寄鶴齋古文集》、《中西戰記》、《中東戰記》等，著作甚豐。洪棄生先生哲嗣為著名作家洪炎秋⁵⁷，戰後由北京學成回台，以散文聞名於世。

進入二十世紀，特別是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國力增強，在台灣的彈壓奏效，台灣的殖民地社會逐漸趨於安定。從日本侵台到一九一三年前後的二十年間，舊文學仍然是台灣文學的主流。台灣本土人士繼承有悠久傳統的舊文學，以舊文學做教養的基本。而進入日本統治

⁵⁶ 洪棄生（一八六六一—一九二八）。彰化鹿港人。別名為一枝。一八八一年進入台南府學，頗有文名。光緒十五年時成爲秀才。在台灣割讓時期，閉門不出，且將名改作孺，表示不屈服於新政權，字「棄生」，有棄世之意。甚至將日本統治的慘狀以詩來描寫，以示抗日之志。其他有《寄鶴齋詩話》、《寄鶴齋古文集》、《八洲道草》等著作。

⁵⁷ 洪炎秋（一九〇二—一九八〇）。洪棄生之子。一九一八年留學日本，一年就回到台灣，一九二二年進入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二九年畢業之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大學執教鞭。一九三四年開設人人書店，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在日本軍統治下的北京過活，和張我軍也有交情。一九四五年回到台灣，歷任台中師範校長、國語日報社長、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於一九六九年當選增額立法委員。有《閒人閒話》、《洪炎秋自選集》等著作。

時代以後，因日本來台的官吏和其幕賓中懂詩文的不少，他們以推廣漢詩為治台一策，獎勵台人結詩社，擊鉢吟體⁵⁸盛極一時。歷代總督又舉開饗老典⁵⁹和揚文會⁶⁰，跟本土詩人做漢詩的唱和，以便懷柔及籠絡舊士紳階層。

一般說來，台灣的舊士紳階層，大多屬於大地主階層，儘管有很強的民族意識去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但在另一個層面而言，日本統治所帶來的社會安定也給他們帶來一定的利益，所以他們的作品時常脫離庶民的現實生活，很少跟日本殖民政治的現實正面對立，因而作品多流於風花雪月，多為遊戲之作。以一九二五年前後為例，全省詩社逾數百，每年舉辦全島大會⁶¹而盛況空前。大多數詩作都過份雕琢，採用擊鉢吟體，這無非是詩精神的墮落。但是

⁵⁸ 擊鉢吟體。福州的郭遠堂等人所倡導的詩體，在台灣影響及新竹的竹梅吟社，以及身為其社員的蔡啓運成為樞社的社長，被熱烈地宣傳。雖然這類詩的作者常有要討好評選者的意圖，而只著重在技巧方面，欠缺獨創的精神，不過因為在獎勵詩學方面有著無比的方便，所以廣為流行。在戰後好像也有愛好者。一九六四年所出版的周定山編輯的《臺灣擊鉢詩選》（台北，詩文之友社）當中收錄著九百餘名舊詩人的作品。

⁵⁹ 饗老典。並非所有的歷代總督都有舉辦「饗老典」、「揚文會」。總督兒玉源太郎於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九日在彰化、同年十一月五日在台南招待八十歲以上的高齡者，舉行了宴會，那就叫做「饗老典」。再者，集合彰化與會者的詩文編成《慶饗老典錄》（兒玉源太郎編）於同年發行。

⁶⁰ 揚文會。所指的是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五日，兒玉源太郎總督將清朝具有舉人身份等的舊知識人一五一一名召集到台北淡水館，而起始的漢詩人的聚會。以唐玄宗的「振武威荒服、揚文肅遠墟」來命名作會名。台北縣的李秉鈞為會長，台南縣的蔡國琳為副會長，一年一次小聚會，三年召開一次大會，保持學藝的品格、目標文運的進步，可惜不久就壽終正寢了。

⁶¹ 詩社的全島大會。日治時期的詩社，因為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在領台後不久立刻於別邸南菜園聚集全台灣的詩

也有些詩人抗拒擊鉢詩的惡習，保持柔軟的詩精神。如台南許南英的《窺園留草》。台南胡

殿鵬（南溟）⁶²的《聖符數篇》（詳見八經卷四）之書有作，與聖符銘記。。胡南溟一生懷才不遇，坎坷以終。南溟詩作之代表作品，

〈長江曲〉、〈黃河曲〉、〈湘江曲〉、〈曲江曲〉等浩浩蕩蕩，各作長達兩千數百餘言。

台南連雅堂⁶³著有《臺灣通史》巨著之外，還有《大陸詩草》、《寧南詩草》等。鹿港洪棄生有《寄鶴齋詩集》。台中林痴仙⁶⁴有《無悶草堂詩存》，林幼春⁶⁵有《南強詩集》。彰化

人墨客，舉行詩人大會，並將之作成《南菜園唱和集》（昀山逸也編）出版。還有，曾為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也發行了《鳥松閣唱和集》，而提高了詩社的機運。一九〇二年在台中有櫟社，一九〇九年在台北有瀛社，在台南有南社的創立，被稱為三大詩社。各自在每年都舉行了聯吟大會，不過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年十月）時，由瀛社主辦，在台北舉行了全島詩人大會。當時的總督田健治郎招待全部詩人百餘名到官邸，將那天的唱和編輯成《大雅唱和集》（鷹取田一郎編），出版發行。之後，內田嘉吉總督的大正十三年，上山滿之進總督於昭和二年也召開了全島詩人大會，各自都發行了唱和集。從這時候開始，變成每年一次，以台灣五州輪流的方式舉行全島詩人大會。因此，尾崎秀真統計出，昭和九年的詩社有九十八社。

⁶²胡殿鵬（一八六九—一九三三）。台南安平人。本名為嚴松，字子程，號南溟。年紀輕輕就成了博士弟子員。台灣割讓時期和父親一同渡海到廈門，於數年後回到台灣，成為連雅堂也任職過的「臺澎日報」的記者。一九〇五年，雖然協助了連雅堂在廈門創刊的「福建日日新報」，不過沒有多久就退社了。喜好酒與詩文，卻於落魄的期間結束了生涯。其詩作被統整成《南溟詩草》，還有《大冶一爐詩話》等，卻沒有任何一冊被發行。

⁶³連雅堂（一八七八—一九三六）。出生於台南馬兵營。名橫。一八九八年進入「臺灣新報社」社。一九〇五年在廈門創刊「福建日日新報」，卻於不久之後即關閉了。一九〇八年進入「臺灣新聞社」漢文部。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到一九一四年末為止，遊歷大陸各地。在一九一八年完成《臺灣通史》，於一九二〇年出版。又於一九二四年發行《臺灣詩乘》。一九三〇年時，在鴉片政策的問題上與民眾黨的林獻堂對立，隔年外出到上海，客死異鄉。其他尚有《臺灣詩乘》等。近年《連雅堂先生全集》也發行了。（彭萱按：連橫出生地為「台灣府寧南坊馬兵營」，即今台南市府前路台南地方法院檢察處附近。日文版註釋作「兵馬營」，有誤，逕改之。又「福建日日新報」，曾迺碩《連橫傳》作「福建日日新聞」。）

吳德功⁶⁶有《瑞桃齋文稿》，台北林景仁⁶⁷有《東寧草》等詩作。至於漢詩雜誌有《臺灣文藝叢志》（鄭汝南編，「曙社」發行，後改稱《臺灣文藝》月刊⁶⁸），《臺灣詩薈》（連雅堂發行，全二十二期⁶⁹），《三六九小報》⁷⁰等對於舊文學的提倡不遺餘力，有很大貢獻。

⁶⁴林痴仙（一八七五—一九一五）。林獻堂的堂兄。名朝崧，字俊堂。櫟社創社人之一。是台中文壇屈指可數的詩人，其詩被稱為飄逸不羈之作。十七歲即擁有詩名，日本割讓時期在中國遊歷，歷經三年，在二十三歲時回到台灣。卻因為不得志，晚年沉浸在酒食當中結束了生涯。《無悶草堂詩存》是痴仙死後由傅錫祺等人於昭和八年四月發行的。

⁶⁵林幼春（一八七九—一九三九）。霧峰的林家出身。漢詩人，字資修，號南強。櫟社創設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發行漢詩雜誌《臺灣文藝叢志》。一九二一年參加林獻堂的「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三年因為治警事件被逮捕入獄，一九二七年成為台灣民眾黨的顧問。之後，歷任霧峰鄉長、區長和《臺灣民報》社長。

⁶⁶吳德功（一八五〇—一九二四）。彰化人。字汝能，號立軒，貢生，同治十二年秀才。主編《彰化縣志》，於一八九四年完成。日治時期成為彰化以及台中廳參事，一九一八年與吳汝祥共同創立彰化銀行。其生涯對台灣的社會福利也有貢獻。有《瑞桃齋詩稿》、《讓臺記》等著作。

⁶⁷林景仁（一八九三—一九四〇）。海山郡板橋人。林本源第二房林爾嘉的長男。能英語、法語，是林家最有學問的人。字少眉，號健人。昭和七年成為滿洲國的外交部歐美科長。《東寧草》收錄大正十三年從中國回台灣時所創作的詩。另外有《林小眉三草》、《天池草》、《摩達山漫草》等著作。

⁶⁸《臺灣文藝叢志》。櫟社所屬的漢詩人林幼春、蔡惠如、林獻堂、傅錫祺、鄭汝南等為發起人，由大正七年七月創立的臺灣文社創刊發行，以漢詩為主的文藝雜誌。從大正十三年起改題作《臺灣文藝月刊》發行。關於本文中的「曙社」則不明。

⁶⁹《臺灣詩薈》。由連雅堂主辦的臺灣詩薈出版社所發行的漢詩文藝雜誌。整理刊載舊文人的遺稿和著名的作品原稿，企圖復興漢詩文。本文學史中所提及的作品也有相當多數被收錄在其中。大正十四年十月，出版二十二冊後停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有台灣·成文出版社的影印本。

⁷⁰《三六九小報》。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至一九三五年十月為止共發行了四七九期。由連雅堂、趙雲石等編輯。以歷史、漢詩、散文、研究等古文為主，白話文的作品很少。不過卻連載了相當多的長篇小說。

(註10)。

在這些詩社中，努力於保存民族文化，有濃厚反日色彩的是林痴仙、林獻堂⁷¹、林幼春、蔡啓運⁷²、連雅堂、蔡惠如⁷³所共同組織的「櫟社」⁷⁴，他們所刊行的詩雜誌便是前述的《臺灣文藝叢誌》。後來，台灣抗日政治運動的眾多結社，多受到「櫟社」成員的幫助和擁護。

⁷¹ 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台中霧峰的名家出身。名為大椿，號灌園。二十二歲當上霧峰的區長，二十五歲當上臺灣製麻會社社長。一九〇七年與在日本亡命中的梁啓超相識。一九一三年時協助板垣退助的「臺灣同化會」，一九二〇年成爲在東京成立的留日台灣學生組織「新民會」的會長，推動六三法廢除運動。再者，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指導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同時成爲臺灣文化協會總理，而後分裂，組織臺灣民眾黨，成爲顧問。期間擔任臺灣民報社的社長等職務，是日治時期在台灣的代表性政治運動家。戰後，擔任彰化銀行董事長和省府委員等，一九五六年病死東京。有《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等著作。

⁷² 蔡啓運（一八六二—一九二一）。新竹客雅人。字振豐。在新竹組織了「竹梅吟社」。一八九五年時參加了表兄弟丘逢甲所領導的台灣民主國，卻在失敗後過著放蕩的生活。其詩艷麗。著作有《養余軒詩鈔》、《臺灣擊鉢吟集》等。

⁷³ 蔡惠如（一八八一—一九二九）。台中清水的名家出身。字鐵生。民族運動家。一九〇六年參加櫟社，一九一八年設立了鰲西吟社。一九一九年在東京組織啓發會，一九二〇年組織新民會，和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有相當關連而成爲理事，也爲了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奔走。一九二二年參加北京臺灣青年會，一九二三年參加上海臺灣青年會，在同年因爲治警事件而被逮捕入獄。著作有《鐵生詩草》。

⁷⁴ 櫟社。日治時期的一八九八年，由林痴仙、林幼春、賴悔之發起，一九〇二年在霧峰創立的漢詩詩社。和台北的瀛社、台南的南社並肩領導了當時的漢詩界。初代的社長是蔡啓運。每年舉行春秋兩次大會，唱和漢詩。所屬的詩人們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等會，積極地和政治運動密切聯繫，培養了高昂的台灣意識和對日本統治的反抗精神。其創立的沿革詳細地記載在一九三二年傅錫祺發表的《櫟社沿革志略》中。

台灣淪日後，大陸來訪問的文人幾乎絕跡，只有章炳麟⁷⁶、梁啟超、許地山、郁達夫⁷⁶等幾個人。章炳麟在台灣淪日後不久來台，任「臺灣日日新報」⁷⁷記者，在台北居住一年（註11）。梁啟超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來台，那時台灣已淪日十六個年頭了。他自台北到台中客居於霧峰林獻堂的「萊園」，著有《海桑吟》等詩作，以抒發台灣之行的感想。梁啟超在台灣，的確為台灣的啟蒙運動播下促進的種籽（註12，參照譯註⁵⁰）。許地山為台南進士詩人許南英的第四子。台灣淪日後，跟父親返回大陸。一九三三年前往印度留學途中來過台灣。許地山雖生於台灣，但其有關台灣的作品不多，有一短篇〈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一九二四年五月《小說月報》十五—五）回憶台南武館街舊宅和祖母（註13）。郁達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來台，造成轟動，在台北、台南等地都有台灣作家舉行歡迎座談會。然而郁達夫似乎沒有留下有關台灣的作品（註14）。台灣淪日後，台灣舊

⁷⁶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字枚叔，號太炎。參加變法維新運動。戊戌政變之後，逃亡到台灣，列席「臺灣日日新報社」。之後，轉為革命派，成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機關雜誌《民報》的主筆。

⁷⁶ 郁達夫（一八九六—一九四五）。浙江富陽人。本名文，達夫是字。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一九二一年和郭沫若、陶晶孫等成立文學團體「創造社」，發行《創造季刊》、《創造週報》等，發表了作品。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版的小說集《沉淪》是其代表作。關於台灣，他於昭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來台，於二十九日離開台灣。回顧達夫訪台的作品有，郭水潭的〈憶郁達夫訪台〉（《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探討其訪台的真意的作品有，戴國輝的〈郁達夫訪台的周邊〉（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國》一〇二）。

⁷⁷ 臺灣日日新報。由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創刊的「臺灣新聞」和一八九七年創刊的「臺灣日報」合併而成的報紙。從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發行到一九四四年三月為止，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系最大的日刊報。在戰爭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和其他的五報合併，被統合成「臺灣新報」。

文學，由於得不著大陸的影響和刺激，逐漸由盛而衰，完成了歷史性使命。

註：

- 1 陳冠學《老台灣》，一九八一年九月，東大圖書有限公司，一頁。
- 2 宋文薰《史前時期的台灣》，一九八〇年四月，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黃富三、曹永和主編「台灣史論叢」第一輯。
- 3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一九五四年三月，正中書局，二頁。
- 4 楊雲萍《台灣史上的人物》，一九八一年五月，成文出版社，八頁。
- 5 楊雲萍《台灣史上的人物》，五十九—六十頁。
- 6 楊雲萍《台灣史上的人物》，二十一—二十一頁。
- 7 以下作者所述的清朝詩人都取材於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序說》，一九四三年七月《臺灣文學》三卷三號，五—十頁。
- 8 王育德《台灣》，一九七九年八月，台灣青年社，八十頁。
- 9 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三十六《丘逢甲傳》。
- 10 塚本照和《台灣文學年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南方文化》第八輯。天理南方文化研究會出版。
- 11 龍瑛宗《台北時代的章炳麟》，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中華日報日文藝欄。
- 12 陳逢源《梁啟超與臺灣》，一九四一年九月《臺灣文學》一卷二號，七十頁。

- 13 陳逢源〈許南英和落華生〉，一九四二年七月《臺灣文學》二卷三號，一二〇頁。
- 14 尙未央〈會郁達夫記〉，一九三七年一月《臺灣新文學》二卷二號，六十頁。

第二章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

第一節 語文改革和新舊文學論爭

一般說來，一個近代國家的形成，有賴於能夠擔負國家內外事務重責的國民的存在。國家的主體是國民，因此，每一個國民擁有共同的語言，以便讀、寫及互相能夠清晰地表達意志，是必不可缺少的。可惜，近代以前的落後的封建社會，不但各地方的方言繁多且分歧，意志的溝通甚為困難，而且讀寫的能力和知識為士大夫階級的獨佔物，民眾如一盤散沙，不容易統合為一個近代化國家的國民。因此，辛亥革命後，國語文的統一成為政府努力的目標。

因此，否定舊中國，建設科學、倫理、民主的新中國為鵠的的五四運動^①，不但是抗日

^①五四運動。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日本以強硬的態度向北京政府提出強壓性的二十一條要求。那是為了執行一九一九年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的巴黎和談會議時的承諾。五月四日，為了抗議這件事的北京的大學生等引起放火燒駐日公使館等事件，這事件波及各地，不只是學生而已，甚至連商人、勞動階級也有組織性地參加罷工。把這個

的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正如胡適^②和陳獨秀^③所提倡的一樣，這個新文化運動的目標之一，便是廢止文言文，建立民眾易讀易寫的共同語文白話文，而從白話文的發展中，進而創造健全的國民文學。

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運動以至於辛亥革命，新中國走向近代化的動向和步驟，都影響到台灣。譬如「櫟社」的成員，便是深刻地受到影響的一個例子，他們後來參與文化協會的政治啓蒙運動，就是這影響所結出的果實。此外，一九一三年的苗栗事件^④也是深受大陸近

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運動當作表現中國近代意識覺醒的運動，叫做「五四運動」。包含在那前年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在內，也叫做「五四文化運動」。在台灣關於「文學革命」以及「五四運動」的影響尚未有深入的研究，不過早先有王育德的〈給文學革命的台灣帶來的影響〉（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日本中國學會報》十一），以及在近年有陳芳明的〈五四精神不在台灣〉（一九九六年九月，聯合文學出版社《危樓夜讀》收錄）。

②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四二）。（彭萱按：胡適卒年應為一九六二）。安徽績溪縣人。本名洪驊，字適之。赴美國的康奈爾、哥倫比亞兩間大學留學，給中國介紹了實用主義。一九一七年向雜誌《新青年》投稿〈文學改良芻議〉，提倡口語文學、八不主義，是「文學革命」的開端。《嘗試集》是依口語作成的創作詩集，實踐了自己的主張。戰後任職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長。

③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甯縣人，字仲甫。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了《青年雜誌》（之後改名為《新青年》在北京發行），標榜「科學與民主」。延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在同一雜誌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倡導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和主張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書記。

④ 苗栗事件。也叫做羅福星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身為客家人的羅福星（一八八四—一九一四）。羅在一九〇三年時，跟隨祖父來台，住在苗栗。不過卻因為厭惡日本的統治而回到故鄉廣東嘉應州（現在的梅縣），在那邊認識了丘逢甲（參照第一章）。因為丘的介紹而渡海到南洋，在那邊加入了孫文的革命同盟會。因此再度來台，組織中國國民黨台灣分部，在台灣也試著想要發起革命，卻在起事前就被逮捕處決了。

代化的刺激而展開的。不過，大陸的文化運動給台灣帶來強大且正式的影響，當推五四運動的發軔。五四運動的語文改革主張，促使台灣真正覺醒，產生規模宏大的抗日民族文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

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一直到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⑤為止的二十年間，台灣民眾一直以武裝抗日來反抗日本統治，企求獲得解放。但是西來庵事件，這一次最後的彈壓使得台灣大規模的武裝抗日運動終止。台灣民眾避免採取流血的抵抗運動來爭取自由。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論調高唱入雲，台灣又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因而逐漸採用新形式的抗日民族運動。許多在東京留學的台灣舊士紳階層的子弟，聯絡大陸來日的留學生或朝鮮的革命青年共同組織結社，傾向於台灣的民族自決運動。他們的這種思想動態在台灣也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凝結為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規模宏大的政治性運動，接著一九二二年民族主義文化啓蒙運動的大本營臺灣文化協會宣告成立，跟朝鮮的三一運動^⑥互相

^⑤西來庵事件。一九一五年以余清芳（一八七九—一九一六）為中心所發起的日本統治期最大的武力抗日事件。在礁吧岬（玉井）附近所發生的激烈游擊戰，所以也叫做礁吧岬事件，以台南的廟西來庵作為根據地而有此名。被逮捕者將近有兩千名，九〇三名被法院宣判死刑，實際上有兩千餘名被處決了。在這以後台灣的抗日運動由武力轉換成由台灣文化協會所代表的文化運動。

^⑥朝鮮的三一運動。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所發起的獨立運動。在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有新知識份子三十三人（或者四十八人）宣告朝鮮的獨立，各都市的勞動者、商人、還有農民也都積極地響應的抗日運動。有四萬人以上被檢舉，七千人以上被殺害。運動終究還是以失敗結束，不過還是給予國民主權的樹立、庶民的政治以及社會意識的涵養、甚至亞洲其他殖民地的民族運動等帶來很大的影響。

呼應，成爲民族解放運動的據點。台灣文化協會採用的是漸進、溫和、迂迴的方式，以便灌輸民眾以民族精神，打破迷信和陋習，改革台灣社會以造就擁有新知識、有近代性格的民眾。而這個文化啓蒙運動所面對的最大課題，跟大陸的五四運動如出一轍；那便是改革舊語文採用口語化的白話文，促使民眾透過易學易寫的白話文，去接受和吸收世界新思潮，發揚民族精神，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進入文化抗日的階級。

然而，大陸的白話文運動並不單單是語文改革運動，它和中國近代文學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中國近代文學是一九一七年的文學革命⑦爲起點而逐漸形成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便是否定舊文學，主張以白話文創造新文學。否定文學爲士大夫階級的獨佔物，主張把文學還給一般民眾的白話文運動，立刻受到大陸民眾的共鳴和接受，有希望形成中國近代的國民文學。惟有民眾能自由應用語文說出心聲，近代文學才有成立的可能性。這新文學的具體表現，便是魯迅⑧的〈狂人日記〉（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四卷五期）爲首的眾多新文學

⑦文學革命。從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以及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這樣的近代文學理論開始，通過魯迅的實際創作〈狂人日記〉被實踐了。這是爲了確立中國近代文學的運動，在廣泛的意義上也包含了新文化運動和白話的提倡。發生在五四運動的前夕，是民族近代化覺醒的預備行動，這樣的意義上，被統稱爲「五四文學革命」。

⑧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浙江紹興人。本名周樹人，字予才。一九〇二年留學日本，目標是成爲醫生，而在仙台醫學校學習，卻轉換志向到了文學。回國後，在北京成爲教育部職員，在一九一八的「文學革命」期間，將那篇成爲中國近代文學中最初的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上。〈狂人日記〉是篇批判小說，以「吃人」來形容儒教一路侵蝕著中國人心的歷史。在這篇小說中，初次使用了魯迅這個筆名。然而，討論魯迅對台灣文學的影響的研究有拙作《台灣新文學與魯迅》（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十日，東方書店）。

作品的出現。這證明白話文是適於表現新思想的語文，同時新文學作品的陸續發表，也磨鍊了白話文達到更完美的境界。

台灣的白話文運動便是在大陸五四運動的刺激下開展的。一九二〇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以蔡培火為發行人刊行了中、日文並用的綜合雜誌《臺灣青年》。它刊行的主旨，在於喚醒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以建立新思想、新文化的台灣社會，迎頭趕上歐美國家。同時暗地裡鼓吹台灣民眾，抵抗殖民統治的壓迫。這期雜誌一共刊出了三篇討論跟文學有關的語文問題的論文；分別是陳忻⁹的〈文學與職務〉，他主張文學的任務在於傳播文明思想，負有改造社會的使命。甘文芳¹⁰的〈實社會與文學〉，抨擊吟花弄月的舊文學。可惜，這兩篇文章都用古文所寫，還沒有捕捉到時代的新潮流。最後一篇是陳端明¹¹所寫的〈日語文鼓吹論〉。他是用稚拙的白話文所寫成，主張以簡便的日語文（白話文）以改革文學，啟發民智。不過，他此篇論文的用意，並不是要討論白話文與建立新文學的關係，而是非難古文的

⁹ 陳忻（一八九三—一九四七）。台中大甲人。慶應大學畢業之後，到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一九二五年回台灣，到台灣經營的大東信託擔任專職。是《臺灣青年》編輯者之一。一九三〇年任台中州協議員，一九四一年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委員。戰後進入金融界，卻在二二八事件時被殺害。〈文學與職務〉（漢文），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六日，刊載在《臺灣青年》的創刊號上。

¹⁰ 甘文芳。〈實社會與文學〉刊載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五日的《臺灣青年》三卷三號上，原文是日文的口語文。因而，這和葉氏的「兩篇論文都是古文」的論述不一致。

¹¹ 陳端明。〈日語文鼓吹論〉刊載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的《臺灣青年》四卷一號（前年的三卷六號也刊載了同一文，卻被禁）。葉氏雖然描述說「雖然不成熟，不過確實使用著白話文」，不過，〈日語文鼓吹論〉是用古文寫成的，難說其是白話文。

使用導致文化停滯，發生弊害，總算抓到了正確的方向。

一九二二年《臺灣青年》改組成為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雜誌，更名為《臺灣》，在島內普遍刊行（請參照譯注²⁸）。此時已經是大陸一九一七年文學革命後流去五年多的時間了。從大陸回來親眼目睹大陸白話文運動蓬勃發展的黃呈聰¹²和黃朝琴¹³，分別在《臺灣》發表兩篇關鍵性的論文，〈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以及〈漢文改革論〉。黃呈聰一面介紹大陸使用白話文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實際狀況，一面提倡在台灣也應使用白話文。他說：「我們的社會上沒有一種普遍的文體，使民眾容易看書、看報、寫信、著書」，所以民眾不瞭解世界概況，落後而愚昧。黃朝琴即勸台人，不要寫日文，摒棄古文，用白話寫信及演講。他們以為推行普及國語（以標準語寫的白話文）以統一方言，啟蒙民眾才是改革台灣社會的急務。他們所主張的白話文並非以方言為基本的，卻是以白話文為準的。依他們看來要解放台灣，並非自囿於台灣島內便可達成的，除非和大陸的革命採取同一個步驟，否則不容易達成。因此白話文不僅是啟蒙民眾的工具，乃是更進一步地吸收中國革命理念的工具。他們所

¹² 黃呈聰（一八八六一—一九六三）。彰化線西人，字劍如。國語學校畢業後的一九二五年，赴廈門、南京、上海學習神學。一九三二年成為「臺灣新民報社」社會部部长。〈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刊載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的《臺灣》四卷一號。

¹³ 黃朝琴（一八九七—一九七二）。一九二三年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畢業後渡海到大陸，進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歷任各國的總領事等，戰後不久立即回台灣擔任台北市長。之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常任委員和台灣省議會議長等職。是國賓大飯店的創始者。〈漢文改革論〉（漢文）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二月一日的《臺灣》四卷一、二號連載。

走的方向，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共同方向。白話文的提倡刺激白話文雜誌《臺灣民報》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創刊（後改爲臺灣新民報）以取代日文和文言文併用的《臺灣》。

在台灣新文學起步的這個階段，我們清楚地看到五四運動的影響。但是在前述的五篇論文中，我們卻看不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那種徹底地想要改革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的鮮明的主張。真正主張建立台灣新文學以白話文爲寫作工具的是當時在北京唸書的張我軍（註1）。他曾經明白地指出舊文學的墮落與絕望，他猛烈地抨擊舊文學的腐敗和封建社會。舊詩和詩社的蓬勃發展固然代表了台灣社會裡民族主義高昂的事實，同時跟本地資產階級的勢力也有密切的關係。張我軍敢於批判舊知識份子，這說明張我軍的民族主義已經不同於舊文人所懷有的「清朝遺民」似的民族主義，而是受到大陸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鼓勵下產生的近代民族主義，傾向於民主與科學的民族主義。張我軍主張「建設白話文文學，改造台灣語言」，說穿了就是胡適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他們兩個人的主張有共同意念。惟有建立統一的國語文，台灣才有新文學的誕生，同時這新文學跟大陸的文學是互相交流而溝通無礙的，這樣才能攜手合作，創造新的國民文學¹⁴。

¹⁴ 新舊文學論爭。張我軍（筆名一郎）從北京投稿〈糟糕的臺灣文學界〉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行的《臺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這篇攻擊台灣舊文壇的文章，掀起了新舊文學論爭。這之後，於刊載在十一月發行的《臺灣詩薈》一〇號的林小眉的《臺灣詠史》的跋中，連雅堂反駁先前張我軍的論點，接著張也發表了〈爲臺灣的文學界一哭〉來反擊，以這樣一來一往的狀況持續著論爭。其後，舊文學擁護派的鄭軍我、蕉麓、赤崁王生、鯁舄黃衫客、一吟友等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等發表文章，新文學派的張我軍、蔡孝乾、前非、懶雲等主要在《臺灣民報》上發表各異的論文。一九二五年左右，以新文學派佔大多數作收，不過之後火種並沒有消失，論爭更加持

以張我軍爲首的大陸留學生，拚命地介紹大陸文學革命的內容和理論，同時在「民報」上也依次轉載了魯迅、郭沫若、胡適等人的作品。不久賴和、楊雲萍等台灣作家的白話文學也陸續出現，台灣新文學也就水到渠成，有了具體的形式和內容，得以締造富有民族性格、又反映台灣本土色彩的台灣文學。

張我軍，一九〇二年生於台北縣板橋，原是林本源家的佃戶。他的祖父也是粗通文墨的。張我軍幼年也讀過塾堂。一九二一年由服務的臺北新高銀行派到廈門鼓浪嶼的支行去服務，後來隻身北上，進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讀書。一九二九年才畢業，定居北平，一直到台灣光復後才返鄉，任職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去世。張我軍的寫作生涯，大約可以分四個階段；第一是自北平留學到北伐前，是做台灣新文學運動開路先鋒的時代，發表作品有〈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九二四）、〈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一九二五），小說〈買彩票〉，詩集《亂都之戀》（一九二五）等。第二是自北伐前後到七七事變，翻譯兼寫日文教材爲主；第三是抗戰期間在北平淪陷區生活，曾代表華北參加一九四二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四是光復回鄉以後，以新的眼光、新的心境，重新發現那「如在葫蘆底」的故鄉的時期（註2）。

然而，張我軍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在北平師範大學時代完成，並爲台灣新文學的奠定與發展的重要基石。

續著。廖漢臣則說，以一九二五年—一九三〇年爲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以後爲第三期。不過三〇年以後，論爭中心就轉移到「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建設」上去了。

第二節 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

一般說來，在台灣新文學的發軔時期，張我軍主張：「白話文學的建設，台灣語言的改造」，使沒有辦法完全用文字表達思想情感的台灣話文整理改進後統一為普通話，是大致正確的方向。然而，殖民地台灣的現實狀況，有時跟他的理想主義背道而馳。一九三〇年前後的台灣，離開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的台灣割讓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同時離開最後一次武裝抗日的西來庵事件（一九一五年）也流失了十五年的時光。台灣總督的殖民統治越來越堅固，各級學校的日語文教育已紮根，逐漸有茁壯的趨勢。較富裕的地主階級和商人而言，子弟如果不懂日語文，不但失去求學的機會，同時做殖民地各級政府的小僱員，或在工商業界就職的機會也很難得到。因此，他們不得不把子弟送到公學校¹⁵唸書，同時如果經濟狀況許可的話，也可以讓子弟遠渡重洋到日本去留學。日語文的學習是中、上階級不得不接受的過程，也是官方規定的殖民地人民，企求飛黃騰達的必經流程。然而，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屬於一無所有的佃農，他們三餐要求溫飽尚且困難，哪有閒錢讓子弟進學堂？同時農村的幼小兒童也是不可缺少的勞動力的一環，他們必須做放牛、汲水、撿柴等工作，或下田幫忙大人耕田。因而，台灣的農民大多數是目不識

¹⁵公學校。台灣總督府所設置的台灣人讀的小學的稱呼。一八九八年依公學校令所創立的，不過，在戰爭末期，和日本人所上的小學校一同成了國民學校。

丁的文盲，充其量也只是在村裡的私塾讀一點兒古文，或簡單的數算技術罷了。以日本語文傳播知識、教化民眾是台灣知識份子極不願意，又違背民族意識的途徑。那麼，用傳統的古文做為溝通意志的工具，又如何呢？不幸這也是一條行不通的路。台灣三百年來舊文學只是士大夫階級的獨佔物，一般大眾跟它也是無緣的。而以白話文作為溝通意志的工具，是最理想的途徑；可惜，台灣的社會是個移民社會，除去閩南語、客家話¹⁶之外，尚有將近二十萬的土著種族¹⁷，通行數種語言，在這種情況下，白話文跟古文一樣，只是「文」不是「話」，離開言文一致，距離還很遙遠，顯然還須費一番工夫才能變成道地的民眾語文。

語文是抗日民族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給民眾灌輸民族意識，授以打破迷信陋習的觀念，衛生常識的培養，以改革台灣社會結構，促進近代化，獲得民族解放，必須依靠普及民眾的語文才行——這就是台灣話文的構想萌芽的基礎。以蔡培火為首的基督徒是主張用羅馬字去書寫台灣口語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可惜，這違背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只在一部分台灣新教教徒中流行，未能成為普及化的工具。

其實，在新舊文學論爭展開的時候，就已經孕育著關係到台灣文學形式與內容的「鄉土閩南語和客家話」。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口構成是由從福建省來的漢民族，和由福建、廣東省來的客家人以及高砂族（原住民）所組成，從福建來的漢民族在人口比例上是最多的，使用閩南語。其次，約占人口數比例十五%左右的客家人使用客家話，人口最少的是高砂族，有九族且各自使用著獨自的語言。各自的語言都不相通，隨著日語的普及，日語逐漸地達到成為共通語言的任務。再者，以客家出身的作家來說，在戰前有龍瑛宗，戰爭時期有李喬、鍾肇政。

¹⁷ 原住民。是在漢民族以前居住在台灣的先住民族，現在是九族。清朝時被叫做蕃族，日治時期被叫做高砂族，一九四五年以後被稱作高山族等，而現在則是根據他們本身的希望而被稱為「原住民」。

文學」和「台灣話文建設運動」¹⁸兩個課題。說穿了，這兩個問題是一個盾牌的兩面，互相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古文是屬於封建舊知識份子的發表工具，白話文和日文屬於新一代知識份子的表達思想工具，難免都有貴族化的傾向，未能打進廣大民眾裡，而且愈來愈脫離民眾現實生活至遠，所以鄭坤五¹⁹首先在《三六九小報》（一九三〇年）首倡鄉土文學，嘗試用台灣話文學寫短文，可惜鄭坤五是舊文人，未能看清鄉土文學的時代意義。

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在這一年中黃石輝²⁰在《伍人報》²¹和臺灣新聞²²上發

¹⁸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建設運動。所謂台灣話文建設運動所指的是台語的言文一致，還有，主張取代日語，使用中文的文言和白話的運動。關於台語的主張，早先鄭坤五在《三六九小報》雜誌上主張「臺灣國風」，強調台語的使用。關於鄉土文學的論爭，以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六日，刊載在《伍人報》上的黃石輝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為開端，之後到一九三四年為止，演變成郭秋生、朱點人、賴明弘等在《臺灣民報》、《南音》、臺灣新民報、臺灣新聞、新高新報等報紙上面進行論爭。但是，與其說是提出如何建設鄉土文學這樣的課題，不如說是，關於將台語當成使用用語，或者以中國白話文當成使用用語，以及台語使用時，其表記方式該怎麼作，才是論爭的重點。最近一九三三年的臺灣新民報被發現了，一直被認為在一九三二年就結束的這個論爭，被確定一直持續到一九三四年為止。

¹⁹鄭坤五（一八八五—一九五九）。原籍福建漳浦縣，出生在楠梓。幼兒期回到原籍，自漳浦中學畢業，回到台灣住在鳳山郡大樹庄九曲堂。父親是清朝的五品武官。三〇年，連雅堂創刊《三六九小報》時，被聘作顧問，在該報發表了許多文章。是漢詩社屏東礪社的社員，提倡「臺灣國風」，身為鄉土文學提倡的先驅，被認為帶給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觀重大的影響。代表作是文言和白話並用的章回體小說《鯤島逸史》（昭和十九年三月南方雜誌社），值得注目的是，其在戰爭期間以中文創作、刊登。其他有《活地獄》、《愛情的犧牲》等作品。（彭萱按：「礪社」為「礪社」之誤，漢譯逕改之。）

²⁰黃石輝（一九〇〇—一九四五）。高雄縣屏東人。本名黃知母，雅號心影，筆名有瘦儂、瘦童、黃石輝等。自公學校畢業以後，以雕刻印鑑維生，一九二〇年前後，參加屏東礪社。之後，入會分裂左傾向化的臺灣文化協會，成為屏東分部中央委員。還有，成為《伍人報》的地方委員，在該雜誌上提倡鄉土文學，主張以台語來創作。在那之後在臺灣新聞、昭和新聞、臺灣新民報等展開論爭。特別是和賴明弘有激烈的論戰。逝世於高雄旗山。

表了〈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再談鄉土文學〉等評論。他的論旨大致歸納為下面幾點：既然居住在台灣的人，大家都喝台灣的奶水長大，眼看耳聞都是有關台灣本土的消息，所有經驗都來自鄉土台灣，那麼作家描寫台灣事物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的任務。他的論旨很明白，所謂鄉土文學就是只描寫「台灣事物」的文學。爲了文學能夠激發感動廣大民眾——即勞苦大眾，文學語言不能採用統治者的語文——日文，也不能採用屬於封建地主階層的古文，也不好採用貴族化的新知識份子提倡的白話文，而一定要使用勞苦大眾慣用的台灣話文。台灣話文的文法、文字都可應用漢文建立起來，這樣鄉土文學必定會往寫實主義的路上跑。

一九三一年，另外一個作家郭秋生也在臺灣新聞發表〈建設臺灣白話文一提案〉；他以爲台灣的教育被日本人所控制，受了六年奴化教育懂了日文以後，一無用處，除非到日本去留學，否則不容易吸收新知識。假若在私塾裡學古文，結果同樣和新知識脫節。因此要消除文盲，必須使用言文一致的台灣話文。使台灣話文可以建立能深入民眾、撥動民眾心弦的鄉土文學。

如上所述，黃石輝和郭秋生的主張，是紮根於台灣殖民地社會的特殊環境和時代需要而

⑲《伍人報》。台灣共產黨的王萬得等人於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六月二十一日創刊，而後改名爲《工農先鋒》。不過卻被認爲在當年的年尾時停刊。黃石輝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刊載在第九號到第十一號（八月十六日—九月一日），之後成了鄉土文學論爭的開端。

⑳臺灣新聞。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四年）創刊。最初叫做臺中每日新聞，一九〇三年時改名作中部臺灣日報，一九〇七年時變成臺灣新聞，是日本人在台中經營的報紙。是作家巫永福在一九三六年前後，當實習記者時所屬的報紙。

萌芽的。黃石輝曾經寫過：「台灣在政治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話來支配，為適應台灣的現實社會情況，建設獨立的文化」起見，所以不得不提倡鄉土文學。郭秋生也曾寫道：「他極愛中國白話文，每天生活在白話文裡，但是白話文不能滿足他的需要，時代不許他心滿意足的使用白話文。」由此看來，他們兩人之所以提倡鄉土文學是「歷史性的權宜措施」吧？

當然有些作家是反對鄉土文學的，他們以為鄉土文學是田園文學，只描寫鄉土的特殊自然風俗和感情思想，缺乏普遍性，有礙於同大陸的文化溝通，是落後的文學。又有些人認為台灣永遠是大陸的一環，在民族文化上是分不開的，不必標新立異去建立台灣特殊的地方性文化。

總之，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一年，在這十年間的台灣新文學運動裡，從新舊文學論爭到鄉土文學，台灣話文的建立活動，顯示著台灣新文學已經從語文改革的形式進到內容的追究，向前跨了一大步。這些各種主張，其目的在於如何使台灣新文學打進廣大的台灣民眾裡，使得台灣新文學成為台灣民眾的精神食糧，影響民眾的精神結構，使得民眾變成近代化的人民，獲得民族解放。

然而，在這主要活動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得出除受大陸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之外，台灣本身也逐漸產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學的意念。離開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的台灣割讓已流失了大約三十多年的時光，台灣從次殖民地變成真正的殖民地，而跟原鄉分離三十多年的時光裡，台灣受到異民族強有力的殖民統治，在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有巨大

的改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台灣新文學必須走上自主性的道路，毋寧是正確而不可避免的途徑。

第三節 台灣新文學的三個階段

設若把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的起點設定在一九二〇年《臺灣青年》創刊號的誕生，而把終點設定在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光復，那麼台灣新文學大約有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二十五年歷史。

通常我們把這二十五年分做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從一九二〇年《臺灣青年》的創刊到一九二五年，賴和的第一篇散文〈無題〉發表於《臺灣民報》為止的五年間，這可以稱做「搖籃期」。第二是從一九二六年賴和的〈鬥鬧熱〉、楊雲萍的〈光臨〉出現於《臺灣民報》開始到一九三七年總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楊逵主編的《臺灣新文學》停刊，七七事變發生的這一年為止。這時期可以稱做「成熟期」。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的大約八年間稱做「戰爭期」。

(1) 搖籃期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當然是透過報刊雜誌的發行去實踐的。但是所有的資訊媒介都在統治者控制下，台灣民眾必須以自力來創辦報刊雜誌表達心聲與意願。然而，由於被殖民者，特別是作家文人等知識份子大多經濟能力薄弱，加上殖民者肆無忌憚的迫害，使得這些

報刊雜誌維持困難，壽命不長，大多夭折。但卻也能前仆後繼，努力傳遞香火。

這些眾多刊物中，雖不是純粹的文學刊物，但代表台灣民眾輿論的臺灣新民報²³卻享有歷久不衰的生命。在台灣新文學的「搖籃期」和「成熟期」裡，新文學作家詩人的重要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民報」上。而且賴和等新文學的旗手或成爲新民報副刊的主編或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臺灣新民報由本地的資產階級所支撐，發行面廣，普遍打入民眾裡，跟台灣人民打成一片，成爲台灣民眾唯一的喉舌。

臺灣新民報如果把以興南新聞的名義刊行，清一色日文的時期也算在內，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享有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壽命跟台灣新文學共存亡。臺灣新民報在一九二〇

²³臺灣新民報。在東京創設的台灣民報社於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四月十五日所創刊發行的報紙，《臺灣民報》的改題誌。《臺灣民報》最初每個月發行兩回，卻於同年十月時變成十日刊，隔年六月時成了週刊。還有，從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開始被許可在台灣島內發行。從昭和五年三月發行的第三〇六號開始，和大東信託合作，改名作臺灣新民報發行，之後從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開始成爲日刊，後來，從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一日開始成爲興南新聞。標榜「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是台灣人經營的唯一的報紙，也是《臺灣青年》、《臺灣》等先出的雜誌的後繼報紙。甚至連日本統治的細節部分都加以批評，除了積極地支持臺灣議會設置運動以外，從亞洲情勢到世界的動向和思潮都報導給台灣民眾知道，培養台灣人意識。因此，整份報紙也屢次遭到發行禁止令。可以看到昭和十一年當時的編輯局長林呈祿、經濟部長陳逢源、社會部門記者吳希聖、學藝部門記者徐坤泉、東京分局長吳三連的名字，也培養了其他許多的台灣人作家。然而，《臺灣青年》（大正九年七月十六日創刊）、《臺灣》以及《臺灣民報》的第一六六號爲止，在東京發行，從第一六七號（昭和二年八月一日）開始，在島內的發行被許可了。依此，本文中葉氏的敘述是錯誤的。附帶一提，刊載著賴和的〈無題〉的創刊五週年第六十七號（大正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發行部數是一萬部，最高記錄曾有五萬部的發行部數。有楊肇嘉的〈臺灣新民報小史〉（三民書局《楊肇嘉回憶錄》）。

年，起初以《臺灣青年》的雜誌形態發行，直到一九二二年共發行了十八期。這是一本中、日文並刊的雜誌，有關於討論文學的論說、小說發表的並不多。從一九二二年四月改稱為《臺灣》繼續發行到一九二四年，共刊行十九期。一九二三年《臺灣》雜誌社決定增刊半月刊的《臺灣民報》，從一九二三年四月開始發行。到此時為止，它是在日本東京付印刊行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臺灣民報》遷回台灣繼續發刊，後來變成週刊，從一九三〇年改稱臺灣新民報，一九三二年從週刊變為日刊，這才算是名副其實的報紙。一九四一年改稱興南新聞。

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臺灣新民報始終是台灣民眾真實心聲的代言人，同時亦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根據地和大本營。它提供園地給台灣作家耕耘，發表作品，在新文學運動中迭起的各種富有時代、社會意義的論爭中，提供筆戰的陣地；那便是提倡白話文語體文的使、新舊文學論爭、台灣話文建設論爭、鄉土文學論爭等。此外，大陸文學的轉載，五四文藝思潮的剖析，日本、歐美作家作品的介紹與翻譯，世界文藝思潮的引進等，善盡它啟蒙民眾，維持民族精神於不墜的歷史性使命。

一九二四年連雅堂發行了以漢詩為主的古文體刊物《臺灣詩薈》（請參照第一章譯註 69），共二十二期。這個漢詩詩刊曾經在新舊文學論爭時，發揮了相當的效能，它站在擁護舊文學的立場上，對新文學有所抨擊，但時代社會的轉變已否定舊文學作為民眾抒發意見的工具的價值，舊文學在眾多詩社裡苟延殘喘地保存下來。「詩薈」除刊載連雅堂的詩作之外，也刊載了許多清朝時代台灣詩人的作品，如胡殿鵬的詩作，或登載舊詩人作品的介紹，

如〈書陳星舟先生遺著〉等，對於保存舊文獻及介紹盡力不少。

一九二五年由楊雲萍和江夢筆²⁴創刊白話文文藝雜誌《人人》²⁵共二期。這是台灣最初的白話文文學雜誌（註3）。除楊雲萍的新詩和一篇小說〈罪與罪〉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期刊出張我軍的新詩〈亂都之戀〉。

在這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搖籃期」裡，主要展開的運動是新舊文學論爭。因此論評作品特多，小說和散文稀少，顯示台灣作家正忙著建構台灣新文學的理論體系，還沒有進入實際的作品創作。除前述的陳焯、甘文芳、陳端明、黃呈聰和黃朝琴，有關文體的爭論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張我軍的許多闡釋台灣新文學的本質、內容、形式等論評。張我軍論評的主要特徵，在於把台灣新文學視作整個大陸文學的一環，並不考慮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這一個政治性的事實。由長遠的歷史來看，這固然有它的道理，但從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何嘗不是構成了諸多窒礙不通的障礙；這也是後來為什麼有台灣話文、鄉土文學等理論

²⁴ 江夢筆。台北人。父親是中國人，因為經營中藥藥房的關係，江也經常到中國去，持有中國發行的《小說月報》、《禮拜六》等新文學雜誌。筆名叫做器人。在《人人》的創刊號發行以後，因為離開了上海，在第二號中也就沒有作品了。之後遠渡東京，又再次回到台灣來，卻從台北橋跳入淡水河自殺。楊雲萍的詩〈巷上盛夏〉（《山河》所收錄），是紀念江之死的作品。

²⁵ 《人人》。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三月和十二月發行的兩期。第一期幾乎被楊雲萍的小說〈罪與罪〉和新舊詩以及器人的論說和新詩等兩人的作品所佔滿了。第二期由楊雲萍單獨編輯，除了他以外另有鄭作衡、鄭嶺秋、江肖梅、張我軍等人的投稿。

相繼出現，以台灣政治性現實為基礎展開台灣新文學的主張的緣故。張我軍的主要論文有：
 〈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一九二四《臺灣民報》）、〈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一九二四
 《臺灣民報》）、〈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九二四《臺灣民報》）、〈為臺灣的文學界一
 哭〉（一九二四《臺灣民報》）、〈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下的破舊殿堂〉（一九二五《臺
 灣民報》）、〈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一九二五《臺灣民報》）、直到〈文藝上的諸
 意義〉（一九二五《臺灣民報》），在短短兩年間發表了十多篇長短不一的論文（註4）。

除張我軍之外，對於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還有許多探討性論文出現；如秀湖生（許乃昌）

26 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一九二三年《臺灣民報》）、蔡培火 27 〈臺
 灣新文學運動與羅馬字〉（一九二三年《臺灣民報》）、蘇維霖 28 〈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

26 秀湖生（一九〇七—一九七五）。彰化北門人。本名許乃昌。一九二二年進入上海大學就學，成為一九二三年十月
 結社的「上海臺灣青年會」的會員。一九二五年時，渡日進入日本大學就學，一九二六年和楊達、蘇新等設立「臺灣
 新文化學會」。一九三二年時和興南新聞關係密切，一九三七年時成為昭和製紙的負責人。戰後創立「臺灣文化協進會」。

27 蔡培火（一八九九—一九八三）。雲林北港人，號峰山。自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成為公學校的訓導。一九一五
 年接受林獻堂的援助赴日本留學，一九二〇年從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在日本時期和其他的台灣留學生共組啓發
 會，接著又組織新民會，編輯發行《臺灣青年》。一九二二年時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協會分裂以後組織
 台灣民眾黨。再者，為了推動使用將台語羅馬字化，發表了〈新臺灣的建設與羅馬字〉（《臺灣民報》一三號）等
 論文。一九四五年以後成為立法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

28 蘇維霖（一九〇二—？）。新竹人。號薌雨。台北帝國大學畢業，修完東京帝國大學研究所心理學系，之後在哥倫
 比亞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學習。戰後成為台灣大學教授，兼任台灣大學圖書館長。（彭萱按：蘇氏字薌雨，以字行。
 一九二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三五年入東京帝大進修心理學，一九五〇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
 研究所進修。蘇氏於一九八六年去世。）

及文學革命的略述》（一九二四年《臺灣民報》）、悶葫蘆生²⁹《新文學之商榷》（一九二五年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半新舊³⁰《「新文學之商榷」的商榷》（一九二五年《臺灣民報》）、蔡孝乾³¹《中國新文學概觀》（一九二五年《臺灣民報》）等。

在這個搖籃期裡出現了五篇小說，分別是追風所寫的日文小說《她將往何處去——致苦惱的年輕姊妹》（一九二二年《臺灣》第三年四一七號）、無知《神秘的自製島》（一九二三年《臺灣》第四年第三號）、柳裳君《犬羊禍》（一九二三年《臺灣》第四年第七號，第八號重刊一次）、施文杞《台娘悲史》（一九二四年《臺灣民報》）、鷺江TS《家庭怨》（一九二四年《臺灣民報》）。

追風（謝春木）³²的日文小說《她將往何處去》，是紮根台灣現實社會的寫實主義小說，最具道地的小說風格。駕馭日文的能力已達到日本大正文學的水準，只是技巧稍差，帶

²⁹ 悶葫蘆生。正確是「悶芦蘆生」。在新舊文學論爭（註¹⁴）當中，將舊文學擁護派的論文《新文學之商榷》刊載在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五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上，反駁了張我軍。

³⁰ 半新舊。在《臺灣民報》三卷四號上刊載反駁悶葫蘆生的《「新文學之商榷」的商榷》，擁護新文學派。

³¹ 蔡孝乾（一九〇八一—一九八二）。彰化花壇人。在上海大學就讀，創刊雜誌《赤星》，宣導共產主義。一九二六年回台，在彰化組織共產黨，卻被逮捕。以在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的機會渡海到中國，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也參加了長征。在延安擔任中央政府內務部長，創立台灣獨立先鋒社，戰後成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回到台灣來。

³² 追風（一九〇二—一九六九）。是謝春木的筆名。南光也是筆名。彰化二林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一九二一年參加「臺灣文化協會」，也成為《臺灣民報》的主筆。一九二七年加入臺灣民眾黨，一九三〇年時和黃白成枝一同創刊《洪水報》（《洪水報》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創刊，總共持續了十期）。一九三二年赴上海，一九三七年進入重慶的國際研究所。一九四八年暫時回中國，再度遠渡中國，著作有《臺灣人的要求》（昭和六年一月十日，臺灣新民報社）。

有通俗小說的味道。他描寫的是台灣留日學生的婚姻問題，儘管是以台灣資產階級的生活為主，但作者看出台灣封建制度束縛個性自由發展的弊害，希望台灣女性從封建的桎梏下被解放的意念相當強烈。因此，這篇小說帶著濃厚的啓蒙色彩，說教意味甚強烈。在小說中作者藉著女主角的告白說出作者心底強烈的意願：「這都是我們社會的習慣不良所致的，結婚制度不好的關係。男人雖擁有少許自由，但我們女人必須絕對服從。社會強迫我們有奴隸根性呢！不僅如此給男人毀了婚約之後，社會就用懷疑的眼光看我們——隨便說些流言出來。因此，自縊而死的也不少。」「我們必須在台灣婦女社會，甚至在一般社會非點燃革命之火不行的時間已到來，爲了真正被虐待的台灣婦女，我們要吸收知識。」追風這位作家觀察相當銳利，在《臺灣》第五年第二號又寫了一篇旅行記〈透過玻璃所看到的南朝鮮〉，把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現實相當忠實地報導出來，讓我們看到朝鮮人民落後、貧窮的生活。

無知³³的〈神秘的自制島〉是一篇用中文寫的寓言小說，諷刺和挖苦充滿了整篇小說；這也是弱小民族作家在強有力的殖民統治下往往採用的隱晦的手法吧！自制島當然是指台灣。作者寫自制島的人民項下都「帶上一具像枷一樣的東西」，那麼這枷一樣的奇異的裝飾品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作者藉一個不帶枷的士紳的敘述說出這個枷的妙用出來：「略舉數端，已算是世界上獨一無二之寶。第一呢，是使人餓了不想食飯，寒了不想穿衣。第二呢，是使人勞不知疲，辱不知恥。第三呢，使人不必需要什麼新學問，不得感受甚麼新思潮。」

³³無知。此人物身份不明。然而，雖然不清楚是否爲同一人物，以「無知」爲筆名，在《臺灣民報》二卷十二號有一篇叫做〈可怖的科學家〉的文章。下村作次郎的日譯版收錄在《杏仁》（昭和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這種枷本來是木造的，由於容易損毀，人民就請求改用金屬打造的更牢固的枷。那麼，這些帶枷的人民是為誰而勞動呢？那當然是為統治階級——包括統治者和封建士紳階級了。作者控訴台灣已變成奴隸社會，台灣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餘孽的壓迫下痛苦呻吟的事實。同時作者也把矛頭反過來對準自制島人民，說他們已失去努力向上之心，甘為做奴隸的劣根性。

柳裳君³⁴的〈犬羊禍〉有英文副題寫做「The Evil of Dogs and Sheep」。作者柳裳君是台南人謝星樓（註5）。這是篇中文寫的舊章回小說形態的諷刺小說，可惜在《臺灣民報》一九二三年第八號全文重刊一次後就不再續作出現。作者的目的在於諷刺林獻堂是個御用紳士。作者可能聽到「林獻堂已保證停止台灣議會請願，且獲得總督府酬庸土地三百餘甲」的惡毒誣蔑，而激起寫剖析御用士紳心態和行為底小說的意念。雖然，作者對林獻堂的認識根據捕風捉影的流言，中了帝國主義者挑撥離間之毒，但設若不談小說的背景，純粹對小說而言，這是篇相當優秀的小說；藉用章回小說的體裁，充分描寫出當時台灣御用士紳的一副醜惡的嘴臉。柳裳君另外有一篇小說〈家庭怨〉刊在《臺灣民報》。不過這篇小說沒頭沒尾，描寫台灣學生在台灣從事反日啓蒙運動處處受到掣肘，決心去大陸求學的心路歷程。

³⁴柳裳君。台南人，謝星樓的筆名，也叫做鷺江柳裳君、鷺江T.S.。本名是謝國文。一九二二年參加臺灣文化協會。臺中州知事常吉德壽為了達成阻止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目的，而介紹林獻堂、楊吉臣（林獻堂的妹婿）、甘得中、林幼春、洪元煌等八名給總督田健治郎。田要求停止運動。同時，臺灣銀行也威脅林，要是不停止運動的話，將要追討二〇萬元的債務。因為各方的壓力而使林對運動的關注變薄弱了。使人將此諷刺為「八駿馬事件」，關於林，流傳著如同本文中所述的謠言。〈犬羊禍〉是受到那些謠言影響而寫成的。書中的主角壬山就是指林獻堂，書名的〈犬羊禍〉中的「犬」指的就是「獻」字旁，「羊」指的就是其妹婿「楊」的音所作的諷刺。

施文杞³⁵的〈台娘悲史〉是以中文寫成的寓言小說。不過他的寓意很淺顯，一看就看得出來。以「華大」來暗示中國，以「台娘」來暗示台灣，以「日猛」來暗示日本。日猛希望能夠討貌美的台娘為妾，使用各種毒計逼使她的父親「華大」就範，結果台娘淪為日猛的妾了。終於一個聰明敏慧的女子「台娘」：「不幸而墜入暗無天日底『人間地獄』裡，受萬般苦楚，整日痛哭傷心，都是無可告人。唉！台娘之不幸！作者的淚痕！」

在這個台灣新文學的「搖籃期」裡，小說和新詩的創作並不多。新詩方面大約有張我軍、楊雲萍的新詩較有規模，仿效了五四文學革命初期的新詩形態。

台灣新文學「搖籃期」以賴和的處女作散文〈無題〉³⁶的出現而告結束，而這篇散文〈無題〉也預告了台灣新文學的開花結果的日子將會到來。在〈無題〉這一篇作品裡，賴和以一半散文一半新詩，來表現年輕時所受到的愛的挫折和寬容的人道精神。儘管年輕的賴和還沒有學會以社會性觀點來凝視台灣殖民社會現實的手法，但散文裡卻有濃厚的現代人意識的陰影，顯示這台灣新文學之父在年輕時代所吸收的西方文學的影響。

由於本土作家的作品稀少，因此，《臺灣民報》不得不轉載大陸的許多新文學作品；如胡適〈終身大事〉（一九二三年）、胡適〈新式標點符號的種類和用法〉（一九二四年）

³⁵ 施文杞。彰化鹿港人。有留日的經驗，一九二二年時到菲律賓去，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的南方大學讀書。一九二三年時「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他是當時主要的成員。詳細經歷不清楚。在《臺灣民報》發表了相當多的文章。

³⁶ 〈無題〉。在《臺灣民報》第六十七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以「懶雲」這個筆名發表的創作散文。如同本文中也有提到的，這是台灣文學史上具有紀念性質的作品，可以說台灣近代文學的序幕正式開啓。

③7、魯迅〈鴨的喜劇〉（一九二五年）、魯迅〈故鄉〉（一九二五年）、冰心③8〈超人〉（一九二五）、魯迅〈狂人日記〉（一九二五年）、郭沫若③9〈詩：仰望〉（一九二五）、〈阿Q正傳〉（一九二五年）。進入台灣新文學的「成熟期」和「戰爭期」後，轉載的大陸文學作品逐漸減少以至於全無，但代之而起的是像張冬芳④0和黃得時那樣把中文新文學作品譯成日文的作品。這在戰爭期裡特別顯著，由此可見，台灣新文學在這個階段活動的情形。

③7 胡適「新式」。根據《胡適文存》第一卷的說法，這的確是胡適之作沒錯，不過標題是〈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修正案）〉。

③8 冰心（一九〇〇—）。出身於福建省閩南縣。本名是謝婉瑩。在福州女子師範、燕京大學求學。一九一三年移住北京，處女作〈兩個家庭〉發表在《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的〈超人〉發表在《小說月報》，得到文壇的認同。參加了文學研究會之後，發行詩集《繁星》。以後，到威爾斯大學留學，在學中在《晨報》副刊上連載《寄小讀者》，一九二七年發行。回國後成為燕京大學的教授。一九三四年所發表的〈冬兒姑娘〉也是其代表作。一九四九年以後雖然擔任了文聯和作家協會的理事等，卻在文革時被批判。戰後頻繁地訪日。（彭萱按：冰心於一九九九年去世）

③9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出身於四川省樂山縣。本名為郭開貞。一九一四年到日本留學，在六高、九大醫學部求學。在學中與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發行《創造季刊》、《創造週報》等。一九二一年出版詩集《女神》。一九二六年時發表〈革命與文學〉，倡導革命文學，創造社也左傾化了。一九二六年時雖參加了北伐，國民黨卻發出逮捕令，於一九二八年時逃亡到日本，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日中戰爭開始之後回國，成為國共合作的文化工作委員會首席等。一九四九年後擔任中國科學院長等要職。文革時期發表了〈李白與杜甫〉，造成話題。再者，作為他與台灣相關連的資料，有昭和十年二月一日《臺灣文藝》中，賴明弘的〈訪問郭沫若先生〉等。

④0 張冬芳（一九一七—一九六八）。台中豐原人。台中一中畢業後，從台北高校到東京帝國大學的中國哲學科就學。在《臺灣文學》雜誌上發表新詩和老舍的〈離婚〉的翻譯。日文作家。戰後成為台灣大學的教授。詩雜誌《笠》第六〇號中有陳千武編輯翻譯的〈台灣新詩的回顧·張冬芳詩抄〉。

一般說來台灣新文學的搖籃期自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是台灣殖民社會逐漸趨於安定的時期。日本殖民者已鎮壓了台人最後一次反日武裝起義西來庵事件（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九年開始臺灣總督爲文官田健治郎⁴¹所擔任。日本爲了加強建設台灣爲農業台灣，實行了各種近代化的措施。隨著社會的安定，台人求自治的意願也愈來愈高漲，採用合法、迂迴、漸進的溫和底文化啓蒙運動的方式展開。然而台灣的反日民族運動，並非從島內發動，而是由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爲主的一群知識份子所推動的。其第一個團體便是一九一九年末，宣告成立的聲應會⁴²。成員包括有來自大陸的馬伯援、吳有容、劉木琳⁴³，台灣的林呈祿⁴⁴、蔡培火、彭華英⁴⁵及蔡惠如。顯然這個團體企圖聯絡政治性處境相同的大陸、朝鮮的知識份子以推動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可惜未見有任何活動而解散（註6）。

⁴¹ 田健治郎（一八五五—一九三〇）。號讓山。男爵。生於丹波國（兵庫縣）冰上郡。因爲同鄉前輩的推薦而出任官職，在歷任各縣的警部長等職之後，得到後藤象二郎的認同。一九一六年成爲寺內內閣的遞信大臣。一九一九年十月成了第八任臺灣總督，是最早的文官總督，在他成爲山本權兵衛內閣的農商務兼司法大臣爲止的五年間，提倡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內台一致、內地延長主義，也建設了嘉南大圳。

⁴² 聲應會。根據《臺灣警察沿革誌》的說法，這是組織作爲從中國和台灣來的留學生的聯誼團體，卻由於會員的離散而解散了。

⁴³ 馬伯援、吳有容、劉木琳。馬伯援是當時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的主任幹事。關於其他兩人則不明。

⁴⁴ 林呈祿（一八八六—一九六八）。桃園竹圍人。一九〇四年自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之後，就職於臺灣銀行。一九一〇年，通過文官考試，成爲台北地方法院書記官。之後在明治大學讀書，一九一九年成爲啓發會幹事，一九二〇年成爲臺灣青年雜誌社幹事。以後，參與雜誌、報紙《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的編輯。也參加了臺灣文化協會以及議會設置運動。一九四一年成爲總督府評議員，一九四二年成爲皇民會文化部長。戰後當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顧問。也經營東方出版社。流通的《臺灣民報》以及臺灣新民報就是該社影印出版的。

「啓發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末，到了一九二〇年，由於組織上有缺陷，重新改組爲「新民會」⁴⁶。「啓發會」是受到林獻堂、蔡惠如的影響而籌組的。改組以後，由林獻堂擔任會長。「新民會」的行動目標是爲增進台灣同胞之幸福，從事政治改革運動擴大宣傳主張，發刊《臺灣青年》雜誌。實際上負擔雜誌經費的是蔡惠如。「新民會」是台灣第一個有組織、有目的、有行動綱領的政治團體，也成爲台灣文化運動的母體，同時也是刺激台灣新文學運動展開的原動力。「新民會」也前後出版了三本文存，其中一本便是葉榮鐘⁴⁷所著的《中國新文學概觀》；這是第一本由台灣作家執筆的完整的大陸文學革命的報導。

⁴⁵ 彭華英（一八九五—一九六八）。新竹竹東人。號少漢。一九二二年自明治大學政經學系畢業之後，停留在上海三年。這個時候投稿到《臺灣青年》，介紹婦女問題和社會主義。回台後成爲臺灣文化協會的主要成員，以後加入民眾黨。一九三二年渡海到滿洲，成爲滿洲電信的社長秘書。戰後回台歷任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主任秘書以及專門委員等。

⁴⁶ 啓發會、新民會。啓發會是大正八年底，以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爲中心，組織而成的。會長是林獻堂，幹事是林呈祿。新民會在大正九年一月十一日於東京成立。會長是林獻堂，副會長是蔡惠如，幹事是黃呂呈聰和蔡式毅。

⁴⁷ 葉榮鐘（一九〇〇—一九七八）。鹿港人，字少奇，號凡夫。十六歲自鹿港公學校畢業，接受林獻堂的援助到日本留學，學習英語等。歸國後成爲林獻堂的秘書，也參加議會請願運動等，在一九一六年時再度留日，就讀於中央大學政經學系、東大經濟學系。而後，成爲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一九三二年參加「南音社」，在雜誌《南音》上幾乎執筆寫了每一號的〈序言〉。一九三五年進入臺灣新民報社。戰後任職於彰化銀行。《中國新文學概觀》在一九三〇年由台中·中央書局當作新民會文存第三集出版，全七十八頁。最近，葉芸芸、藍博洲主編的《葉榮鐘全集》共九冊，正由台中·晨星出版社發行。（彭萱按：據葉光南、葉芸芸主編，二〇〇二年三月，晨星出版，《葉榮鐘年表》稱，葉榮鐘兩度受林獻堂資助赴日留學時間；第一次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入東京神田正則英語學校及研數學館兩預備學校。第二次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入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就讀。）

一九二〇年底，以在一月成立的「新民會」為基礎，林獻堂等十位政治領袖召集台灣留學生舉行會議，決定展開臺灣議會設置運動⁴⁸，在一九二一年一月提出於日本帝國議會上下兩院。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構想來自林獻堂，而林獻堂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原來在一九〇七年，林獻堂在日本奈良遇見梁啟超。梁啟超告訴林獻堂，今後三十年內大陸無法幫助台人獲得解放，勸告林獻堂要厚結日本中央政要，推動愛爾蘭方式的自治運動⁴⁹。一九一〇年，梁啟超來台之後，住在「萊園」朝夕相處，可能也加強了林獻堂的決心。梁啟超的這種主張，符合台灣當時已穩定的社會狀況，同時也符合台灣資產階級的意願。從一九一八年在東京成立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⁵⁰以來，留日學生的各種政治要求都匯合在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裡，統合在這個運動裡構成了雄厚的一股反日怒潮，有助於台人民族意識的覺醒。這個運動繼續了十多年，費盡精神，耗費財物無數，達不到預期的目的，終於解散。這個運動也促進了島內籌備政治結社「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⁵¹，結果遭到台灣官憲的規模宏大的彈壓，發

⁴⁸ 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為止，經歷十四回，向日本政府要求設置臺灣議會的運動。因為想要在根據日本法律第六三號（六三法）統治台灣的總督府的強權中，確定台灣人的地方自治權，請求日本的國會議員等的協助而展開的運動。被當作是要朝向台灣獨立而沒有實現。這個運動的主體是台灣文化協會。其全貌在周婉窈的《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中有詳細記載。

⁴⁹ 自治運動—勸誘。曾是林獻堂秘書的甘得中的〈林獻堂與同化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收錄）有關於這件事原委的敘述。

⁵⁰ 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所謂六三法是台灣總督未經國會的決議，憑據自己的衡量就可以發布的法令，也就是法律六三號。最初是當作以三年為限的限時法來施行的，卻再三地被延期，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為止實施。

生「治警事件」⁵²，有關人士四十九人被拘押，受警察搜索家宅及受傳訊者五十人。

一九二一年十月，以林獻堂為總理的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會員以醫事專門學校、師範學校等學生為主。文化協會是台灣反日民族運動的大本營，它雖然以文化啓蒙運動為其實踐方式，其實它的最終目的在於獲得台人的政治上的自治。它的實踐方式有下面數項：「謀台灣文化之向上……互相切磋道德之真髓，圖教育之振興，獎勵體育，涵養藝術趣味，以期穩健之發達，其歸結務在實行。」

然而由於文化協會是由台灣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文化啓蒙運動，未能反映佔赤貧的大多數台灣農民的意願，亦無能改革封建的生產體系，改善他們的窮苦生活，儘管運動層面廣闊深入廣大的民眾裡面，但究竟跟俄羅斯的民粹運動⁵³一樣，從內部結構自行瓦解。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改組，由連溫卿為主的左派所控制。

一九二五年一月，在鳳山成立「臺灣農民組合」，謀求被壓迫、被剝削的台灣農民的生

⁵¹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第二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之後，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林呈祿、蔡惠如等，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在東京會合，同月二十二日開始成立了議會請願團體。因為年底的治警事件，會員被逮捕而解散。

⁵² 治警事件。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清晨，因為台灣總督內田嘉吉的命令，臺灣議會期成同盟的會員遭到大量的逮捕的事件。一審的堀田真猿法官宣判全員無罪，不過三好一八檢察官卻不服，結果將蔣渭水、蔡培火、林呈祿、蔡惠如等七名收押監禁。

⁵³ 民粹主義者運動。這是十九世紀的後期，俄羅斯社會主義的一派，以「走入群眾」為口號，將農村作為革命的主體。由於忽視農村現狀且積極迅速地倡導革命思想，導致運動以失敗作收。

日本殖民統治，必須由農民本身直接參與的團體來展開抗議活動才有效，終於台灣西部的農民活動愈來愈熱烈。農民的這抵抗運動雖然主要敵人為日本殖民者，但構成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成員大多為大地主或資產階級，所以次要敵人乃是文化協會上層成員。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的台灣新文學「搖籃期」是以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展開的。所以儘管「搖籃期」的新文學運動作品不多，但卻包藏著長達六十多年的台灣文學所顯示出來的各種問題癥結。其中新舊文學論爭的語文改革，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等課題，在戰後的台灣文學開展中逐漸獲得釐清和解決。惟有日據時代資產階級所信奉的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弱小民族自決論，那趨向於本土自主的意願，和以農工為主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主張，一直無法統合，形成台灣文學的夢魘，延續到八〇年代中期，陰影還無法消失。

(2) 成熟期

在台灣新文學的「搖籃期」裡，始終刊載重要文學作品的是「新民報」。其餘文學性刊物常遇到殖民地政府的彈壓和查禁而不得不停刊。即使僥倖逃過殖民地政府的彈壓，也因成員的不和諧或經費短絀而不得不停刊。

一九三二年，由黃春成⁵⁴、張星建⁵⁵分別主編的白話為主的文學刊物《南音》⁵⁶出現，

⁵⁴ 黃春成。台北市人。筆名是南、天南、春成、邨城。是《南音》到第一卷第六號為止的編輯兼發行人。

⁵⁵ 張星建（一九〇五—一九四九）。台中人。筆名掃雲。臺南商業專門學校（現在的成功大學）畢業後，在一九二八年任中央書局營業部主任，一九三三年四月擔任《南音》一卷七號以後的編輯兼發行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參加《臺灣文藝》，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晚間被刺殺。（彭萱按：「臺南商業專門學校」一九二六年改制為臺北高等學校臺南分校，一九三〇年廢校。）

共出十二期。從第七號開始編輯部從台北遷到台中，改由張星建主編。第九號和第十號合併，第十二號被禁。同仁中包括有賴和、葉榮鐘、陳逢源⁵⁷、郭秋生、黃得時等人。這個刊物以思想與文藝普遍化為其目的。發刊詞裡說的很明白：「怎樣纔能夠使思想、文藝普遍化」、「怎樣纔能夠使多數人領納得思想和文藝的生產品」。

一九三二年在東京成立台灣藝術研究會⁵⁸，成員包括張文環、巫永福、王白淵、吳坤煌⁵⁹、劉捷⁶⁰、蘇維熊⁶¹等人。同時刊行文學刊物《福爾摩沙》⁶²。這個刊物的抱負寫在發刊詞上：「雖有數千年來的文化遺產，可是現在依然處在這特殊情形下的人們中，到了現在還

⁵⁶《南音》。昭和七年一月一日創刊。南音社發行的中文文藝半月刊雜誌。雜誌是由林幼春命名的。創刊號當中有當時總督府翻譯官井出季和太寄來的「賀詞」，當時井出是警務局的出版檢閱的責任者，因為考慮到這一點而邀請他執筆的。第十二期有遭到發行禁止的處分。到第一卷第六號為止編輯部在台北，編輯兼發行人是黃春成（邨城），以後則移到台中，由張星建編輯兼發行。

⁵⁷陳逢源（一八九三—一九八二）。台南市人。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進入三井物產。一九二一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以及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一九二三年時，因為治警事件被逮捕。一九二五年進入大東信託。一九二六年時，從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立場來反對階級鬥爭，和許乃昌論辯。一九二七年參與民眾黨，一九三〇年參與地方自治聯盟。

⁵⁸臺灣藝術研究會。是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本普羅文化聯盟（KOPF）之文化社團組織的「東京臺灣文化社團」的重建組織，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成立於東京的，以台灣人留學生為主體的文藝家團體。蘇維熊是主要負責人，張文環、巫永福、王白淵、吳坤煌等作家是主要的構成人員。以「持著自由主義的精神，謀求台灣文學以及藝術的向上」、「真正是台灣人所必須有的新文藝」的確立作為目標。之後，演變成臺灣文藝聯盟的成立和研究会成為聯盟的東京支部。相關於其成立的部分，在下村作次郎的《台灣藝術研究會的結成——《福爾摩沙》的創刊為止》（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左連研究》五）以及《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中有詳細說明。

⁵⁹吳坤煌（一九〇九—一九八九）。南投人，筆名梧葉。公學校畢業之後，雖然進入台中師範學校唸書，卻因投身民族解放運動而遭到退學處分。之後，於一九二九年時留日，經過名古屋第五中學，進入日本大學以及明治大學求

沒有生產過獨自的文化。」、「所以同仁等常以對這種文藝改進事業為自許，大膽的自立為先鋒」，「在消極方面，想去整理研究向來微弱的文藝作品，來吻合於大眾膾炙的歌謠、傳說等鄉土藝術；在積極方面，由上述特殊氣氛中所產生出的我們全副精神，從心裡湧出我們的思想及感情，決心來創造真正台灣人所需要的新文藝。我們極願意重新創作『台灣人的文藝』。」（註7）

簡言之，《福爾摩沙》的同仁，要承繼由大陸傳來的數千年文化遺產，重新創造適合鄉學。一九三二年參加東京的築地小劇場，在接受村山知義和秋田雨雀等的指導的同時，參加日本共產黨資金局的活動，以台灣人學生為活動對象。也成為在一九三二年時成立的臺灣藝術研究會的發起人，接著成了「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負責人。從一九三五年左右開始在《臺灣文藝》、臺灣新民報、臺灣新聞等發表詩歌、散文、評論。抗戰時期遠赴中國當教師和做買賣，於戰後回到台灣。

⑥0 劉捷（一九一〇—）。屏東縣萬丹鄉人。字敏光。筆名有郭天留、張猛三、徐路生等。畢業於屏東公學校高等科。成了臺灣新聞高雄分局的實習記者。一九二八年時插班進入日本的目白商業學校夜間部，一九三二年成為臺灣新民報的記者。之後作為東京駐日記者，再度上京，寄宿在張文環家，通學速記學校。回台之後再度在新民報負責學藝欄。也投稿到當時創刊的《臺灣文藝》。在評論方面有〈一九三三年的臺灣文學界〉（昭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福爾摩沙》第二號）以及〈臺灣文學之鳥瞰〉（同九年十一月五日《臺灣文藝》創刊號）、〈續臺灣文學之鳥瞰〉（《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三號），創作方面有〈藝妲〉（《臺灣文藝》第三卷第二號）。在一九九四年一月，日據時代遭到禁止發行的《臺灣文化展望》，經由林曙光の漢譯，在高雄的春暉出版社發行。（彭萱按：劉氏於二〇〇四年逝世）

⑥1 蘇維熊（一九〇八—一九六八）。新竹人。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畢業。英文學者兼詩人，也有台灣歌謠的研究。戰後任台灣大學教授。詩雜誌《笠》的同仁。該雜誌第二十六期中有〈蘇維熊教授簡介〉一文。

⑥2 《福爾摩沙》。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機關雜誌名稱。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創刊，出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的第三期停刊。是給予日治時代的台灣人文藝方向重大啓示的重要文藝雜誌。作品方面有張文環的〈落蕾〉和吳希聖的〈豚〉、評論有劉捷的〈一九三三年的臺灣文學界〉等，刊登了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品。

土狀況的富有獨自性的「台灣人的文藝」。

一九三四年由臺灣文藝協會創刊《先發部隊》⁶³，由廖漢臣⁶⁴主編，為白話文刊物，共有一期。曾經做過「臺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特輯。按，臺灣文藝協會是居住在台北的台灣作家所組織的。成員包括：郭秋生、廖漢臣、朱點人、林克夫、蔡德音⁶⁵、黃得時、王詩琅等人。一九三五年由於臺灣總督府的要求，《先發部隊》改頭換面，不得不接受一部分日文作品，改名為《第一線》，仍然是臺灣文藝協會的機關雜誌，由廖漢臣主編，可惜只刊行一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張深切、賴明弘等人提倡舉開第一次全島文藝大會⁶⁶，旋即成立臺灣文藝協會。《先發部隊》。臺灣文藝協會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的江山樓成立，以廖毓文為中心，郭秋生被選為幹事長，黃得時、朱點人、林克夫、王錦江、李獻璋等被選為幹事。機關雜誌是《先發部隊》和其改名稱的《第一線》。一九三五年一月時解散。

⁶⁴ 廖漢臣（一九二一—一九八〇）。台北艋舺（現在的萬華）人。筆名是毓文。一九二六年自老松公學校畢業之後，使用早稻田中學講義在家自學。在轉換了數個職業之後的一九三三年，成為新高新報的記者，接著成為東亞新報的台北分局記者。也投稿《伍人報》、《洪水報》、臺灣新民報、臺灣新聞等。另一方面，一九三三年時參與和臺灣文藝協會有關的機關雜誌《先發部隊》、《第一線》的編輯。戰後在臺灣省文獻會任職二十八年，專心台灣史的研究，編纂各種各樣有關台灣的史書。文學方面有〈台灣文學年表〉等著作。

⁶⁵ 林克夫、蔡德音。林克夫在一九〇七年出生於台北市。本名林金田，筆名有HT、孔乙己等。蔡德音生於一九二一年，台南人。寫有關台灣民間故事的文章。

⁶⁶ 全島文藝大會。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在台中市的西湖咖啡館二樓集合八十二名的台灣人作家所召開的大會。因為這個大會，臺灣文藝聯盟正式地成立了，也決定發行機關雜誌《臺灣文藝》。那是將全島的文藝家變成一元化的大會。大會的情況在《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一號所刊載的〈第一回臺灣全島文藝大會紀錄〉以及張深切的〈文聯報告書〉中，有詳細記載。

灣文藝聯盟，發行機關雜誌中、日文並刊的《臺灣文藝》⁶⁷共發行了十六期，臺灣文藝聯盟的常務委員有賴和、賴慶、賴明弘、何集璧⁶⁸、張深切等人。公推賴和為常務委員長，惟賴和固辭，即推選張深切為常委長。《臺灣文藝》並沒有發刊詞，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的創刊號卷頭有十四條「熱語」似近口號。「熱語」中有「我們以其有偽路線不如寧無路線！」「我們的方針不偏不黨」等話，可見這本文學刊物並沒有強烈的主張，因為是如此，得以把全島藝術主張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的作家熔於一爐。也由於缺乏明確的立場，所以這本刊物呈現著作家與讀者混淆不清，好像是個大雜燴。不過，這本刊物也並非沒有色彩的。賴明弘⁶⁹後來寫道：「進步的台灣政治運動被摧殘、被壓迫得零落無聲，呈現著一片蕭條景象，這使台灣知識份子必然的要找出路。一方面，自由主義思潮的澎湃是控制不住的，由於

⁶⁷ 臺灣文藝聯盟·《臺灣文藝》。以台灣人作家為中心的，第一個全島型文藝團體。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成立。張深切為委員長，黃純青、黃得時、林克夫、趙樞馬、吳希聖、徐瓊二、廖毓文、吳逸生（以上是北部）、郭水潭、蔡秋桐（南部）、賴慶、賴明弘、賴和、何集璧、張深切（中部）為委員。將本部置於台中（聯盟事務所設置在發行名義人的張星建宅），在嘉義、佳里、埔里、東京有分部。不只是為了藝術，而是把為了人生而藝術的文藝工作作為目標。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解散。機關雜誌《臺灣文藝》漢文、日文並載，從昭和九年十一月到十一年八月為止發行了十六冊。

⁶⁸ 何集璧。台中市人。為臺灣文藝聯盟創設時的委員之一，之後成為中部委員，把楊達介紹給張深切。

⁶⁹ 賴明弘（一九〇九—一九七一）。台中豐原人。本名是賴銘煌。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成為新高新報的記者。參加受到社會主義影響而成立的「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屢次投稿到其機關雜誌《臺灣文藝》去。一九三四年渡日，負責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的事務，歸國之後投稿到楊達的《臺灣新文學》等。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當中，主張將台灣文學從世界文學的觀點來研究，站在反對台語文學建設的立場。戰後，協助張文環，參與了《臺灣省通志》的編纂。

這客觀情勢的要求，台灣的知識份子自然而然的對建立新文學這一條路認真的站起來。」
「文聯團結了作家，團結了知識份子，更溶化所有反封建、反統治的，富有民族意識的台灣文化人於一爐，展開了提高文學和文化水準的工作。」屬於文藝聯盟的楊逵跟文聯持有不同見解，這埋下了後來楊逵、葉陶⁷⁰另起爐灶的原因（註8）。

一九三五年，楊逵夫婦在台中成立「臺灣新文學社」，刊行中、日文並刊的《臺灣新文學》⁷¹共十五期，另外發行了《新文學月報》⁷²兩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臺灣新文學》一卷十期「漢文創作特輯」被查禁，一九三七年四月殖民地政府全面禁用漢文，所以《臺灣新文學》也就廢刊。在第一卷第一號卷頭楊逵寫下了創刊的話。他寫道：「爲了台灣的作家和

⁷⁰葉陶（一九〇四年—一九六九）。高雄旗后人。從公學校畢業後到台南教員養成所學習，當過高雄公學校的教員，之後的一九二六年，參加農民組合運動，一九二七年和楊逵一起被選爲組合的中央常務委員，成了婦女部長。一九二八年和楊逵結婚，兩人在結婚典禮的前一天，在台南總工會演講時被逮捕。坂口禱子有〈楊逵與葉陶〉（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亞洲》六一十一）一文。（彭萱按：據彭小妍主編的《楊逵全集》年表，葉氏於一九七〇年逝世。）

⁷¹臺灣新文學社《臺灣新文學》。昭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創刊，是漢文、日文並載的文藝雜誌，創刊號的編輯兼發行人是廖漢臣，以後是楊逵。昭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時發行了十五冊，停刊。一般被認爲停刊的原因是，總督府全面禁止漢文（中文）的使用，不過還是有很難就此斷定的疑點。

⁷²《新文學月報》。作爲《臺灣新文學》的月報而被發行的。不過現在可見的只有昭和十一年二月六日所發行的第一號和同年三月二日發行的第二號而已。是由十六頁組成的小冊子，刊載了對本雜誌《臺灣新文學》的批評和雜誌經營的報導等。文藝作品來說，刊載了郭水潭的〈文學雜感〉和吳濁流最初的創作〈海月〉等。（彭萱按：〈海月〉一文，台北前衛「台灣作家全集」——《吳濁流集》，一九九一年，作〈水月〉。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亦同。）

讀者，迫切需要反映台灣現實的文學機關。」楊逵創辦《臺灣新文學》似乎有明確的目的；他本身為農民組合的幹部，他的《臺灣新文學》也就以反映台灣窮苦大眾的生活現實為依歸，因此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傾向。創刊號刊出的日本作家感言，大多數為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如德永直、葉山嘉樹、前田河廣一郎、石川達三、藤森成吉、貴司山治、細田民樹以及朝鮮日文作家張赫宙⁷³。此外第一卷第八號有「高爾基特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有王詩琅所寫的〈悼魯迅〉，黃得時所寫的〈大文豪魯迅去世〉，都表示《臺灣新文學》的視野相當廣闊，介紹大陸、日本、蘇俄等作家的現實主義文學不遺餘力。《臺灣新文學》的編輯委員包括了賴和、楊守愚、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⁷⁴、賴明弘、賴慶、葉榮鐘等人。

在台灣新文學的「成熟期」裡首先出現的小說作品有賴和⁷⁵的〈鬥鬧熱〉（一九二六年《臺灣民報》）、楊雲萍的〈光臨〉（一九二六年《臺灣民報》）以及張我軍的〈買彩票〉（一九二六年《臺灣民報》）。

⁷³張赫宙（一九〇五—）。朝鮮慶尚北道大邱出生。本名張恩重，日本名為野口赫宙，歸化日本籍。大邱高等普通學校畢業。一九三二年短篇小說〈餓鬼道〉入選雜誌《改造》的懸賞小說，在日本文壇一舉成名。《文藝首都》同仁。使用朝鮮語、日語來描寫朝鮮民族的現實。作品有《開墾》、《美麗婚姻》等。（彭萱按：張氏於一九九七年逝世。）

⁷⁴王登山（一九一三—）。出生於台北北門的鹽分地帶詩人。台南二中畢業。一開始學習俳句，之後轉為新詩。成為多田利郎《南溟藝園》的同仁。在《福爾摩沙》、《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以日文為主發表了詩作。現在住在屏東。（彭萱按：王氏於一九八二年逝世。）

⁷⁵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彰化人。筆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生、灰等。幼年時期在漢學塾學習，之後進入公學校。一九〇九年進入臺北醫學校就學，一九一六年在彰化開業。一九二一年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在「治警事

賴和的〈鬥鬧熱〉是他所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這一篇小說之所以值得紀念，是因為這是一篇完全用西方文學的手法反映台灣民眾現實生活的作品。小說的主題是台灣常見的迎神賽會，但並沒有特定的人物為主要描寫對象，而是以台灣普遍的典型街鎮的居民為其小說的主角。簡言之，就是以一群普通的台灣民眾為描寫的對象。賴和以寫實主義的手法捕捉了迎神賽會前後的歡樂狀況，同時也指出貧苦民眾為迎神賽會不惜一擲千金的陋習、迷信和愚昧。這是一篇成熟的短篇小說，充分顯示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反封建、反帝的寫實主義風格。

賴和原名賴河，字懶雲，一八九四年生於彰化。十六歲時入台灣醫學校，畢業後在彰化開業，過懸壺濟世的生涯。他一面行醫，一面寫作，同時參與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二三年因治警事件被日警搜查並被扣押，從十二月十六日到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共坐牢二十多天後無罪釋放。至一九四一年再度被捕，出獄後身體大損而患心臟病，不幸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去世，享年五十歲。賴和的寫作生涯共有二十多年，留下〈一桿秤仔〉、〈不如意的過年〉、〈前進〉、〈蛇先生〉、〈彫古董〉、〈棋盤邊〉、〈辱〉、〈浪漫外紀〉、〈可憐她死了〉、〈歸家〉、〈惹事〉、〈豐作〉、〈善訟的人的故事〉、〈一個同志的批

件〉時被收押監禁。從一九二六年開始成了《臺灣民報》文藝欄的主編之外，也在《臺灣新文學》和《南音》等刊發表作品。一九二七年加入民眾黨，一九三〇年時和許乃昌等人創刊《現代生活》。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五年之間發表了許多作品，是戰前的台灣人漢文作家代表。近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了賴和研究第一人林瑞明所編的《賴和全集》（全六冊）以及同樣由林瑞明編輯的《賴和手稿影像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出版，全五卷）。

信〉、〈赴了春宴回來〉等經典之作。此外，尚有舊詩、新詩、隨筆、雜文等無數。賴和終其一生用白話文寫作，建立了台灣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寫實主義風格，又樂意幫忙台灣後輩作家，獎掖後人，為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和台灣新文學鞠躬盡瘁，所以世人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

張我軍⁷⁶在此時期裡共發表了三篇小說，除〈買彩票〉外，有〈白太太的哀史〉（一九二七年《臺灣民報》）、〈誘惑〉（一九二九年《臺灣民報》）。〈買彩票〉和〈白太太的哀史〉都取材於北平生活。〈買彩票〉描寫小市民籌不出歸鄉的旅費把美夢寄託在中彩票的心情。〈白太太的哀史〉則描寫日本女人嫁給大陸官僚被折磨而死的過程。由於張我軍只能以北京生活為其題材，跟台灣現實不發生關係，所以這三篇小說給台灣新文學的影響不大；倒是跟八〇年代留美的台灣作家的寫作方向有一丁點兒類似，這證明被「剷根」的作家很難表達出本土民眾的心聲。另有詩集《亂都之戀》出版（一九二五年）。

⁷⁶張我軍（一九〇二—一九五五）。出生於台北板橋。筆名有一郎、速生、野馬、憶等。公學校畢業之後在新高銀行廈門分店工作，該行解散後的一九二三年赴北京。受到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從北京在《臺灣民報》上刊登新文學介紹報導和論文，攻擊台灣的舊詩人，開啓了新舊文學論爭。一九二五年自中國大學、一九二九年自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在北京大學和中國大學教書，創辦雜誌《少年臺灣》。也和張深切一起創刊《中國文藝》。一九四二年時作為華北代表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北京時代被稱「北張我軍、南魯迅」。戰後回到台灣，在合作金庫工作。參考文獻彭小妍編的《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一九九六年五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具有資料的價值。（彭萱按：《張深切全集》卷十二〈張深切年譜〉，張深切於一九二九年創辦《中國文藝》，同年十月，張深切返台奔喪，張我軍代為編輯。）

楊雲萍除〈光臨〉之外，有〈罪與罪〉、〈月下〉、〈弟兄〉、〈黃昏的蔗園〉、〈咖哩飯〉、〈秋菊的半生〉、〈青年〉等白話文小說。此外有日文詩集《山河》（譯註：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水書店出版）及未完成的日文日記體小說〈部落日記〉。楊雲萍和日據時代的一些作家一樣是中日文素養俱佳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都很短，採用近似散文詩的體裁，節奏緊迫，頗能抓住事物的真相，讓人看見字句裡隱藏的另一個又廣又深的世界。〈光臨〉描寫保正林通靈邀請伊田警部大人來家喝酒，結果落空的惆悵心情。他透過小說要告訴我們的是，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台灣人民染上的巴結、阿諛統治者的可憐的心態；這也是弱小民族的通病吧？〈黃昏的蔗園〉描寫製糖會社剝削蔗農的現實，〈秋菊的半生〉描寫窮苦的台灣婦女任有錢人糟蹋、欺凌的情形。

楊雲萍⁷⁷原名楊友濂，一九〇六年十月生於士林。祖父為士林宿儒，父親行醫，可說生於書香世家。一九二二年入學台北第一中學校，後畢業於日本大學，頗受日本作家的薰陶。

⁷⁷楊雲萍（一九〇六—二〇〇〇）。台北士林出生。本名楊友濂，筆名是雲萍生。是位從新文學草創期開始就活躍於舊詩、新詩、隨筆、散文、台灣史研究等的士林文人。從小受漢文教育，進入台北一中就學。受到友人江夢筆所有的《小說月報》、《禮拜六》等雜誌所帶來的白話文創作的影響，而在《臺灣民報》雜誌上發表各種各樣的作品，緊接著在一九二五年創刊台灣最初的白話文藝雜誌《人人》。一九二六年到日本大學留學。並進入文化學院就讀，親炙菊池寬和川端康成的聲言警效。不過，回國之後，比起文學，對歷史的研究更見熱心。一九四三年由台北的清水書店出版收錄二十四篇日語詩集的《山河》。戰後任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就任台灣編譯館台灣研究組主任。一九四六年編輯台灣文化協進會的《台灣文化》，也在其中執筆。一九四七年成為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另有，《部落日記》從《新建設》的第二〇號（昭和十九年五月一日），配合立石鐵臣的插畫開始連載，一直到昭和二十年五月第二十八號前後為止斷斷續續地刊登。

一九二五年跟江夢筆創刊台灣第一本白話文雜誌《人人》。光復後，跟許壽裳⁷⁸等大陸作家從事文化運動，參與《臺灣文化》⁷⁹的刊行。初任職國立編譯館⁸⁰，後受聘台灣大學，對晚明歷史有深湛的研究。一九七七年退休，現仍為博士班兼任教授。

楊守愚是「成熟期」中創造力豐沛、作品量甚豐的作家之一。如果以筆名「靜香軒主人」、「村老」、「翔」、「洋」所寫的長短不一的短篇小說都算在內，他的作品不下二十多篇。他由於是彰化人，跟新文學之父賴和很親近，作品的風格和傾向受到賴和的影響很深，而且同賴和一樣，一輩子用白話文寫作。其中如描寫一群農民抓魚的〈斷水之後〉，方言用得過多，五十年之後的今天去讀，已經有許多地方很難知道作者的意思了。楊守愚仍沿

⁷⁸ 許壽裳（一八八二—一九四八）。浙江紹興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回國擔任譯學館的工作，一九二二年進入教育部，也在北京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書。一九一七年任江西省教育廳長，一九二二年起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國文系教授、西北聯合大學史學系主任等，一九四六年來台，成為編譯館館長，一九四七年成了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卻於一九四八年被殺害。是魯迅的好友。在台灣也由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著作《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九四七年六月）。可以參考黃英哲的〈在台灣的許壽裳的足跡〉（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月《東亞》第二九一、二九二號）。

⁷⁹ 《臺灣文化》。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開始發行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為止的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雜誌。目的是要抹去日據時代的文化，弘揚中國文化。楊雲萍是主編，楊守愚、呂赫若、王白淵、黃得時等台灣人，和許壽裳、臺靜農等從中國來的讀書人共同執筆。第一卷第一期中有「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共二十六冊。近年由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開始將全系列都影印複製出版。

⁸⁰ 國立編譯館。戰後初次成立於台灣的公家機關，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以戰後台灣的教科書編纂等台灣文化的再建構為目的而設立的機構。館長是魯迅之友人許壽裳，編譯館在他的指導之下，分成了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台灣研究組等四個部門。一九四九年六月開始改組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著反帝、反封建的路線反映殖民地人民痛苦的生活為主。小說的對象從沒有土地的佃農到工人以及小資產階級，其範圍頗廣。以〈升租〉這一篇小說為例，他描寫佃農要租田耕耘，必須要先繳一筆積地金（押租金）給地主，每年繳租每甲六十多石米的情況。當然，豐收的年份農民也很難吃飽，凶年也就不免於死亡了。這篇小說〈升租〉同時也把封建地主階級的心態和嘴臉描寫得栩栩如生，使我們感受到統治者和地主階級勾結在一起，欺凌農民的現實。地主動不動就威脅要把欠租的佃農送官府嚴辦呢！然而，楊守愚的小說，還未能深入描寫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窮苦台灣民眾，如何從被壓迫到覺醒，以至於把抗議付之於實踐的重要流程，只管描寫台灣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層面，使得作品缺少某種鼓舞的力量。

楊守愚⁸¹，一九〇五年三月九日生於台灣彰化，他父親是前清秀才，所以雖然只唸過彰化第一公學校，但漢文基礎深厚。他曾經參加過台灣文藝聯盟。他的作品多發表於「民報」、「新民報」、「臺灣新文學」，直到總督府禁止漢文為止，才結束創作生涯。光復後任教於彰化工業職業學校。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去世。他的重要作品有〈凶年不免於死亡〉（《臺灣民報》一九二九年）、〈醉〉（《臺灣民報》一九三〇年）、〈元宵〉（臺灣新民

⁸¹楊守愚（一九〇五—一九五九）。出生於彰化。本名是楊松茂。筆名有靜香軒主人、村老、翔等。幼年時在貧困的環境中成長，不過通過漢學塾，學習漢詩，且年紀輕輕就與賴和和陳虛谷有往來。一九二七年因為涉及台灣青年黑色聯盟的檢舉而被逮捕。一九二九年發表處女小說〈獵兔〉，之後一直到漢文禁止為止好像發表了數十篇小說的樣子，描寫的幾乎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也因為他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筆名，導致部分作品到現在都還無法確定是否為他的作品。漢詩之作也很多。

報一九三一年)、《一群失業的人》(《臺灣新民報一九三一年》)、《移溪》(《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年)。

蔡愁洞在「成熟期」裡也是創造力豐沛，作品甚豐的一個作家。蔡愁洞曾經參加過「臺灣文藝聯盟」，與郭水潭同為南部委員。作品多發表於臺灣新民報、《臺灣文藝》及《臺灣新文學》。重要的小說作品有《保正伯》(《臺灣新民報一九三一年》)、《奪錦票》(《臺灣新民報一九三一年》)、《新興的悲哀》(《臺灣新民報一九三一年》)、《興兄》(《臺灣文藝》一九三五年)、《理想鄉》(《臺灣文藝》一九三五年)、《四兩仔土》(《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年)等。

蔡愁洞由於二十二歲就任保正，而且一幹就是二十五年，所以他非常熟悉農民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眾多苦難。同時他也明白統治者在農村橫行跋扈，而給窮苦農民帶來的許多傷害。在《四兩仔土》這篇小說裡，他描寫一個善良樸實的農民「土哥」，年紀到了五十多歲仍然窮苦得不敢討老婆，奉養眼盲的母親辛苦度日的可憐生涯。五分旱田養不活他，他必須靠做短工維持生活。日本統治者又常徵他去沒工錢的苦工，使他的生活更陷入苦況。小說的末尾，描寫他好不容易領到「二圓半」的貧民救濟金，原本懷著滿腔希望過年，結果納了租稅，又變成身無一文的慘況。蔡愁洞的小說都紮根於赤貧農民的日常生活，以解剖殖民政府的荒謬政策，和地方警察和官吏的苛刻的統治方式。

蔡愁洞⁸²一九〇〇年生於雲林元長，公學校畢業後，入私塾接受漢文教育。先後參加「臺灣文藝聯盟」、「文化協會」，並創辦《曉鐘》雜誌共三期。光復後任元長鄉鄉長。

朱點人也是在「成熟期」裡作品較多的一位作家。他不同於楊守愚和蔡愁洞，寫作的對象並不是農民而是都市裡的中產階級和庶民。他雖然反殖民的意識很濃厚，但不像楊守愚和蔡愁洞那樣，直接強烈地表現出他的抗議和反抗，他讓小說的情節和人物的行為自然地表現出銳利的批判精神。〈秋信〉這一篇小說描寫前清秀才斗文先生往台北參觀紀念「始政四〇年」的萬國博覽會⁸³的情形。斗文先生看見萬國博覽會的雄偉建築時，禁不住有「王侯茅宅皆新立，文武衣冠異昔時」的感慨。另外，他說斗文先生雖然爲了維持民族意識的發揚，參加詩社提倡擊鉢吟，但他也知道「擊鉢吟不是詩，從凡夫俗子的口中唱出來的山歌才是詩。」朱點人成功地刻畫了台灣舊文人的典型。〈脫穎〉寫的是給仕（工役）陳三貴，入贅日本人，終於躋身統治階級的經過。這篇小說描寫日據時期一部分台灣人認同日本人，卑視台灣人的心態。這一類人物後來也出現在吳濁流、龍瑛宗、陳火泉、王昶雄的小說裡。

朱點人⁸⁴一九〇三年生於台北萬華，一九四七年去世，（彭萱按：應是一九四九年遭槍

⁸² 蔡愁洞（一九〇一—一九八四）。雲林縣元長鄉五塊厝的人，出生於地主之家。本名蔡秋桐，其他筆名還有愁洞、蔡落葉、匡人等等。幼年時期在漢學塾學習，十五歲時上公學校，二十一歲畢業。畢業後成爲保正，以保正的立場，把他身邊所發生的大小事件寫成了小說。也參加文化協會和臺灣文藝聯盟。雖然說賴和與陳虛谷也在小說中使用了台語，不過他的小說中的台語使用頻率特別頻繁。在現在也許有些難以理解，但在當時他也被稱爲台語創作的前輩。新高新報當中也有許多作品，但是尚未被整理出來。

⁸³ 萬國博覽會。正式名稱叫做「臺灣始政四〇週年博覽會」，在台北舉行。從臺北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到小南門面對西門町的道路爲第一會場，新公園（現在的三二八紀念公園）爲第二會場，其他設置草山（北投）會場，於一九三五年（昭和一〇年）十月十日到隔月二十八日之間舉行。爲了這次的活動，主辦單位發行了詳盡的導引圖，用來作爲認識當時的台北中心的資料是相當方便（近年，由台北，南天書局複製出版）。

決)。曾參加過「臺灣文藝協會」、「臺灣文藝聯盟」的活動。重要小說作品有〈島都〉(臺灣新民報一九三二年)、〈紀念樹〉(《先發部隊》一九三四年)、〈無花果〉(《臺灣文藝》一九三四年)、〈蟬〉(《第一線》一九三五年)、〈安息之日〉(《臺灣文藝》一九三五年)、〈秋信〉(《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年)、〈長壽會〉(《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年)、〈脫穎〉(《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年)等。

除去楊守愚、蔡愁洞和朱點人作品甚豐之外，「成熟期」的中文作家甚多。其中有很多所謂「一作作家」，就是用筆名發表了一篇小說後，便再也沒看到他的另外作品出現。這種「一作」作家，在日據時代新文學裡是甚為普遍的現象。這些「一作」作家也許是成名作家匿名所寫的作品之一，但是年代一久也就無從查考了。日據時代日帝以鐵腕政策控制所有言論機關，台灣作家動不動就因文學活動而得咎，終於養成台灣作家「放了炮」就跑的習慣。這便是「一作」作家所以存在的緣由。這類作家的作品，有些非常卓越，令人慨嘆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不知埋沒了多少有才華的作家⁸⁵。

⁸⁴ 朱點人(一九〇三—一九四九)。出生於台北艋舺(現在的萬華)。本名是朱石頭(之後改名朱石峰)。筆名有描文、文苗、點人等。公學校畢業後成為臺北醫事專門學校職員。一九三〇時發表處女作〈一個失戀者的日記〉，之後發表十數篇的小說，也在三〇年代時發生的「鄉土文學論爭」當中主張白話文的普及。一九三三年加入臺灣文藝協會，一九四一年渡海到廣州，與王錦江一起編輯廣東迅報。戰後，追隨中國共產黨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蔡孝乾成了共產黨員，卻遭到國民政府逮捕，被槍殺了。從目錄的地方可以看到〈秋信〉被發表在《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二號，不過作品本身卻被刪除了。另外刊載了〈脫穎〉的《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號也遭到禁止發行的處分。

⁸⁵ 一作作家。一九二九年二月臺灣新民報二四九號，太平洋〈夜聲〉，一九三〇年十月同報第三三三號鐵濤〈阿凸舍〉、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南音》第一卷第十二號(發行禁止)所收錄的自滔的〈失敗〉等，都符合一作作家的說

作品量雖然不多，但在日據時期新文學運動裡，留下值得紀念的足跡的作家也很多。

虛谷（陳滿盈）⁸⁶ 一八九六年生於彰化和美，一九六五年去世。虛谷是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早年參加過「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三二年臺灣新民報創刊，（彭萱按：一九二九年一月，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成立，一九三〇年三月合併《臺灣民報》，二十九日改稱臺灣新民報。）他就任學藝部主編。他的小說〈無處伸冤〉（《臺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他發財了〉（《臺灣民報》一九二八年）都是以日本警察為描寫的對象。他描寫日本警察好色成性，像豺狼一般蹂躪貧農女兒，或藉名目搜刮貪污的醜惡嘴臉，小說富有故事性，很受賴和的影響。

郭秋生⁸⁷ 一九〇四年生於台北縣新莊，一九八〇年去世。公學校畢業後，在廈門集美中法吧。全部一作作家的經歷、身份等都不明。

⁸⁶ 虛谷（一八九六一一九六五）。彰化縣和美。本名是陳滿盈，也使用一村這個筆名。放棄漢學塾，選擇了進入國語學校，卻中途退學進入明治大學。一九三三年畢業之後，參加臺灣文化協會以及舊詩社「應社」。和賴和有往來，虛谷的作品被認為有受到他的影響。一九三二年與賴和等成為臺灣新民報社學藝部的編輯員，在《臺灣民報》以及臺灣新民報發表作品。戰後成了臺灣省通志館（編譯館的後身）顧問。一九五一年因為腦溢血而變成半身不遂。作品除了〈無處伸冤〉、〈他發財了〉等小說四篇以外，還有大量的雜文、新詩以及漢詩。（彭萱按：「編譯館」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之誤，「後身」亦係「前身」之誤。）

⁸⁷ 郭秋生（一九〇四—一九八〇）。台北縣新莊人。筆名有芥舟、街頭攝影師、KS、秋生等。公學校畢業後在廈門的集美中學讀書，回到台北成為台北江山樓的經理，在職中勤讀文學。一九三〇年前後，為了對抗禁止中文，且為了教育文盲的大眾而提倡台語文建設，在臺灣新聞、臺灣新民報、《南音》等發表許多的論文，到一九三三年後半期為止，都擔負著鄉土文學論爭的一部份任務。一九三三年和廖毓文等組織了臺灣文藝協會。小說有〈鬼〉、〈王都鄉〉等。

學讀書，很受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返台後任江山樓經理。一九三三年與廖漢臣兩人共同發起「臺灣文藝協會」創刊中文雜誌《先發部隊》，後改名為《第一線》。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間的「文學改革運動」中，他提倡台灣話文。重要小說有〈死麼？〉（《臺灣民報》一九二九年）、〈王都鄉〉（《第一線》一九三五年）等。由於他曾任酒樓——江山樓經理，所以對藝姐、妓女的世界很熟悉。〈死麼？〉很深刻地描寫一個命運不佳的可憐養女被輾轉出售六次的經過，令人窺視到日本統治下台灣婦女被糟蹋和欺凌的辛酸情況，令人覺得心情沉重。

楊華⁸⁸一九〇六年生於屏東，一九三六年懸樑自盡。楊華本質上為一詩人，曾任教私塾維生。一九二七年被捕入獄，在獄中撰寫新詩「黑潮集」五十三首。小說只寫了兩篇，分別是〈一個勞動者的死〉（《臺灣文藝》一九三五）、〈薄命〉（《臺灣文藝》一九三五）。〈薄命〉，曾經與楊達的〈送報伙〉，呂赫若的〈牛車〉同被選入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的《山靈》⁸⁹。〈一個勞動者的死〉，缺乏小說應有的人物塑造和情節的展開，

⁸⁸楊華（一九〇六一—一九三六）。屏東人。本名顯達，字敬亭，筆名有楊花、器人、器等等。其短暫的生涯終結於貧困和疾病。一九二七年時被捕，在獄中寫了詩集《黑潮集》，其中吟詠著台灣民眾受到壓迫的樣子以及對這情況鬱鬱不樂的詩人的心情。參照林載爵的《黑潮下的悲歌——詩人楊華》（《夏潮》第一卷第八期，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集四、詩選集》中也有收錄）。（彭萱按：楊華出生於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九日，原籍台北，十七歲始遷屏東，其後並定居屏東。）

⁸⁹《山靈》。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譯文叢書」的一冊，胡風譯。正值胡風將「弱小民族」的小說翻譯刊登到雜誌《世界知識》時，想到朝鮮以及台灣的小說當中，當翻譯刊載楊達的〈送報伙〉時，得到中國讀者極大的迴響，那時也翻譯了朝鮮的作家張赫宙的〈山靈〉，和呂赫若的〈牛車〉等，而集結成一書出版。

似近散文詩。〈薄命〉描寫封建制度下任命運播弄的「媳婦仔」⁹⁰可怕的生涯。

王錦江（王詩琅）⁹¹一九〇八年生於台北萬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去世。公學校畢業，曾參加「臺灣黑色青年聯盟」⁹²，「臺灣勞動互助社」⁹³，早年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抗戰期間前赴大陸，光復後返台，任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⁹⁴。張良澤編有《王詩琅先生全集》

⁹⁰媳婦仔。買了年幼的女兒來養育，當作家僕使用的習俗，與中國的童養媳是同樣意思。在日治時代的小說中也屢次被提出，代表性的作品有張文環的〈媳婦〉（昭和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木書房《台灣文學集I》）。關於作為媳婦仔的研究書，可以參考胡台麗的《媳婦入門》（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時報文化出版）。

⁹¹王錦江（一九〇八一—一九八四）。出生於台北萬華。王詩琅是本名，有一剛等的筆名。幼年時入漢學塾，九歲進入公學校求學。參加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而被逮捕，受到刑罰，之後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入獄。一九三七年遠渡上海，一九三八年編輯廣東迅報，之後一直在中國待到戰後為止。戰後回台灣成為和平日報的主筆，且在加入國民黨之後，因為和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省文獻委員會有關係而編輯了《臺灣風物》。有張良澤所編的《王詩琅全集》（一九七九年，高雄，德馨出版社，全十一冊），文學作品收入第九、十冊。（彭萱按：王詩琅共入獄三次：第一次是「臺灣黑色青年聯盟大檢舉事件」，判懲役一年六個月。第二次是一九三二年，「臺灣勞動互助社事件」，入獄十個月。第三次是一九三五年，受日本本土無政府主義事件波及，遭拘禁約二個月。）

⁹²臺灣黑色青年聯盟。受到山川均的勞動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台北，由日本人小澤一及王錦江、王萬得、周和成等人所創立。他們和王敏川、連溫卿等文化協會左派合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和東京黑色青年聯盟之間往來的信件洩漏，聯盟成員有四十四人被逮捕，直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左右撤銷為止。

⁹³臺灣勞動互助社。從彰化的無政府主義派和共產黨的對立，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誕生的無政府主義結社。民眾黨也和文化協會對立，廈門和泉州的同志也互相合作，一時間熱烈地活動著，卻於一九三一年八月時，因為社員被日本當局逮捕而解散了。一九三〇年七月，王錦江、張乞食等發行了機關雜誌《明日》（共四期）。

⁹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整理出版台灣史以及相關文化資料的機構。一九四八年成立的臺灣通志館是其前身，一九四四年時變成這個名稱。發行季刊《臺灣文獻》。

十冊。他跟大部分日據時代台灣作家一樣，是中、日文素養俱佳的作家。重要的小說有〈夜雨〉（《第一線》一九三五）、〈青春〉（《臺灣文藝》一九三五）、〈沒落〉（《臺灣文藝》一九三五）、〈老姨頭〉（《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十字路〉（《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等。王錦江出身於都市，所以小說大多取材於都市裡的中產階級和庶民。有二、三篇小說著重描寫對反日民族運動灰心，變成沒有理想，失去希望的知識份子心態，呈現了日據時期知識份子消極、頹喪的一面。〈老姨頭〉是一篇力作，描寫壓搾妓女為生的〈老姨頭〉冷酷無情又自私的嘴臉，跟郭秋生的〈死麼？〉的小說世界很類似。

以白話文寫作的作家，除此以外，作品較多的有林越峰⁹⁵。他的小說有〈到城市去〉、〈無題〉、〈月下情歌〉、〈紅蘿蔔〉等。大多數小說都取材於農村，描寫農民生活上的困境。唯有〈紅蘿蔔〉（《臺灣文藝》一九三五），這一篇小說卻是描寫農民組合的活動中，被同志所出賣的農民。這個題材別出心裁，有力地指出日據時代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被扭曲的台灣人心靈。林越峰一九一〇年生於豐原。一九三五年加盟台灣文藝聯盟。

張慶堂⁹⁶也是小說作品較多的一位，有〈鮮血〉、〈年關〉、〈老與死〉、〈他是流氓

⁹⁵ 林越峰（一九〇九—？）。台中縣豐原人。本名是林海成。一九二三年自公學校畢業以後在德育軒書房學習漢文。

一九二八年在豐原的大眾書局老闆的推薦下，參加臺灣文化協會豐原分部的讀書會，而喚起了他的文藝活動。這時因為某人的推薦而擔任活動照片的解說員。他和貂山子（何春喜）的論辯，擔負了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的一部分任務。一九三三年成爲新高新報的記者，參加一九三四年的臺灣文藝聯盟，一九三六年時，也和楊達的「臺灣新文學社」扯上了關係。戰後，放下文學，轉向商業發展，在豐原漁市場工作十二年，且又擔任豐原鎮代表會秘書之職八年。今天也依然健在。

淚了）等小說發表。他的小說也大多取材於農村，把台灣農民被剝削的情形以各種角度寫出來。特別是〈年關〉（《臺灣新文學》一九二六），這篇小說描寫得不著土地去耕種的農民，離鄉背井來城市求生存，仍然三餐不繼而淪為強盜的慘境。由於農村的經濟破產，農民被迫離開農村，來到城市以後，他的生活仍然陷於絕境。這類題材，也是「成熟期」的作家喜歡描寫的。

張深切⁹⁷在日據時代雖只有一篇小說〈鴨母〉（《臺灣文藝》一九三四）發表，但他作為小說家的卓越技巧和深厚的文學素養，都可以從這篇小說看得出來。〈鴨母〉把台灣的土豪劣紳如何勾結日本人來欺壓無辜養鴨人家的情形，以散文詩般的體裁，節奏明快地透露出來。他把地方上作威作福的土豪的生活情形及其奸詐的嘴臉，描寫得栩栩如生，令人清楚地

⁹⁶張慶堂。台南新化人。生卒年不詳。筆名為唐得慶。和趙樞馬、董佑峰、鄭明等組織「臺南市藝術俱樂部」。戰後離開文壇從事農業。

⁹⁷張深切（一九〇四—一九六五）。南投草屯人。字南翔，筆名者也、楚女等。三歲時成為漢詩人張玉書的養子。在歷經漢學塾以及公學校的教育十七年之後，跟隨林獻堂前往東京求學。一九二〇年在東京府立化學工業學校，一九二二年在青山學院唸書，一九二三年到上海去，一九二四年成為「臺灣自治聯盟」的成員。一九二七年進入中山大學和魯迅相遇。一九三三年回台灣，隔年成為「臺灣文藝聯盟」的委員長。一九三七年到東京去，在國立新明學院教授日語。一九三九年遇見創刊《中國文藝》的周作人。戰後曾設立電影公司等活動。張深切的著作雖然很多，跟文學有關的卻不多。近年有兩篇小說被發現，日語的〈總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櫻草》第一〇號）和〈兩個殺人犯〉（一九二五年七月《櫻草》三卷二號）。然而，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台中，聖工出版社，共四冊）。再者，一九九八年一月，由台灣，文經出版社出版了由陳芳明、黃英哲等主編的《張深切全集》（共十二冊）。

看到封建勢力與殖民者的勾結，君臨在窮苦台灣民眾頭上的事實。張深切長篇小說《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有自傳性的意味。張深切一九〇四年生於南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逝世。小學、中學都在日本唸書，曾經進入青山學院就讀。一生來往於台灣與大陸之間，從事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三四年在台中組織「臺灣文藝聯盟」，刊行《臺灣文藝》共十五期。張深切是中、日文俱佳的作家，除小說之外也寫戲劇，取材於霧社事件的劇本《遍地紅》很著名。

黃得時⁹⁸只有一篇中文小說〈橄欖〉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三月的《臺灣新文學》上。〈橄欖〉詮釋愛情與結婚應是一體的真諦，富於可讀性。黃得時也是中、日文俱佳的作家，一生為台灣新文學盡了心血。不過他是個屬於學者型的作家，最大的貢獻在於台灣文學史的研究

⁹⁸黃得時（一九〇九—一九九九）。台北縣樹林人。父親是著名的舊詩人黃純青。中學畢業後，從台北高等學校進入台北帝國大學，學習中國文學以及日本文學。一九三三年參加「臺灣文藝協會」，成為幹事，一九三四年時成為「臺灣文藝聯盟」的北部地區委員。於大學畢業後的一九三七年進入臺灣新民報社，負責文藝欄，之後成為文化部長。一九四〇年成為臺灣文藝家協會所屬的《文藝臺灣》的編輯委員，卻於隔年參加由張文環、王井泉組織的啟文社，活躍於《臺灣文學》雜誌上。戰爭末期，台灣的五份報紙被統合成臺灣新報，就任文化部長。戰後成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黃得時的文藝活動相當廣泛，除了隨筆、評論、小說、詩等的創作活動以外，也有從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台灣文學研究到台灣鄉土史研究的相關著作。有關台灣文學方面有，本書第一章「原注」所引用的〈臺灣文學史序說〉、〈臺灣文壇建設論〉（昭和十八年九月《臺灣文學》一卷二號）、〈晚近的臺灣文學運動史〉（同十七年十一月《臺灣文學》二卷四號）、〈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說〉（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月、一九五五年八月，台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文物》三卷二期、三期，四卷二期）等。然而，葉氏將〈臺灣文學史序說〉翻譯刊載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的《文學台灣》十八期。

究。一九四三年七月發表於《臺灣文學》的〈臺灣文學史序說〉闡明了滿清統治下台灣舊詩人的活動和作品，是日據時代唯一的有關此領域的重要論文。黃得時一九〇九年生於台北樹林，日據時期臺北帝國大學畢業。一九三二年參加「臺灣文藝協會」，一九三四年參加臺灣文藝聯盟。一九三七年進入新民報主編副刊。一九四一年參與張文環《臺灣文學》的創辦工作。戰後，任教台灣大學。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成熟期裡以中文寫作的作家佔大多數。他們大多數居住於廣大的台灣農村，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性經濟恐慌下，台灣農村面臨瓦解的慘苦情形。他們筆下所出現的殖民統治者猙獰的真面目，封建地主勾結統治者榨取農民的情形都那麼真實，使我們看到佔農民八十%之多的佃農瀕臨饑餓與死亡邊緣的慘境。這些小說還反映出反日民族運動的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活動的各種層面。一般說來，這些小說都是寫實主義的作品，所有作家都對窮苦的農民和工人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胸懷，他們都盡了作家為廣大民眾心聲的代言人的一份責任。然而，由於小說變成反日民族運動的宣傳工具，有時小說的廣度和深度都不夠，往往流於淺薄的教條式的發洩。

從一九三三年創刊的日本文學刊物《福爾摩沙》開始，逐漸有日文作家的抬頭，這離開一八九五年的台灣割讓已流去了三十多年的時光。在日本天年的事實下，台灣民眾不得不接受異民族語文，依靠日文去吸收西方國家的文化和新知識，以開展更現代化的反日運動。因此，日文也成為台灣知識份子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一九三四年十月，楊達的〈送報伙〉被刊登於日本的《文學評論》，接著呂赫若小說〈牛車〉也被刊登於一九三五年一月的《文學評

論》，再過兩年龍瑛宗的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日本《改造》雜誌的佳作，至此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業已登峰造極，在文字的駕馭技巧和藝術意境上可與日本作家並駕齊驅了。

在《福爾摩沙》一九三四年六月第三期刊登的吳希聖⁹⁹的日文小說〈豚〉，是早期日文小說中的傑作。吳希聖在小說裡呈現的仍然是窮苦疲憊的台灣農村，窮苦農民阿三的一隻母豬是向「養豚組合」租來的，結果賣小豬的錢賠光，母豬又病死，負了一生還不盡的債。他的女兒阿秀被地方土豪進財玩弄淪為妓女，染了一身梅毒。阿秀設計引誘進財把梅毒傳染給進財報了仇，但已失去活下去的意志，懸樑自盡。吳希聖的〈豚〉，把日據時代台灣農民的苦難描寫殆盡，情節曲折，技巧卓越，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說。吳希聖一九〇九年生於台北淡水，曾任新民報記者，另外有〈乞食夫妻〉、〈人間，楊兆佳〉等作品。

巫永福¹⁰⁰也是參與《福爾摩沙》創刊的日文小說家之一。曾經發表過〈首與體〉、〈黑

⁹⁹ 吳希聖（一九〇九—？）。淡水人。曾經當過臺灣新民報的記者。〈豚〉收錄在昭和八年七月十五日的《福爾摩沙》第三號。〈人間，楊兆佳〉收錄在昭和十年三月五日的《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三號。戰後在華南銀行任職。退職後的行蹤不明，關於他戰前的情況也不是非常清楚。

¹⁰⁰ 巫永福（一九一三—）。南投埔里人。公學校畢業後，入學台中一中，接著赴日，因為兄長在名古屋帝國大學就讀的關係，進入名古屋五中。其後在明治大學專攻文學。一九三二年加入臺灣藝術研究會，大學畢業後回到台灣，進入臺灣新聞社，成為社會部記者，也加入了臺灣文藝聯盟。戰後歷任臺灣信託株式會社、臺灣大公企業、台南市政府秘書、新光保險公司副總經理等職。一九九六年五月，由台灣傳神福音文化事業發行了《巫永福全集》共十五冊。（彭萱按：巫永福曾於一九五〇年出任台中市長楊基先之機要秘書及市政府秘書，非台南市政府秘書，《巫永福全集》於二〇〇三年出版續集，「全集」共二十四冊。巫氏卒於二〇〇八年。）

龍》、《山茶花》、《河邊的太太們》、《慾》等作品。他的小說風格近似自然主義，銳利地解剖人生醜惡的層面。代表作《慾》最能代表他的小說風格。在描寫複雜的人際關係中，點出人類貪慾、自私、不擇手段的人性弱點。巫永福一九一三年生於埔里，明治大學畢業，一九四一年參與創辦《臺灣文學》。戰後除擔任新光公司的副總經理外，吳濁流去世後，一直擔任《臺灣文藝》發行人，他個人設有「巫永福評論獎」，以獎勵台灣文學評論家。

吳天賞¹¹¹一九〇九年生於台中，一九四七年去世。他在東京唸青山學院英文系時，曾參加「臺灣藝術研究會」，及《福爾摩沙》刊行的工作。吳天賞的日文小說《龍》、《蕾》、《野雲雀》等，都以青年男女的戀愛為描寫的對象，有細膩的抒情，微妙心理的分析。

王白淵¹¹²也是「臺灣藝術研究會」成員之一。《唐璜與加彭尼》是他所寫的唯一日文小說，是諷刺的寓言作品。王白淵，一九〇一年生於台北，本質上是詩人，一九三一年曾在東京刊行日文詩文集《荊棘之道》，一九三三年赴大陸任職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一九六五年去

¹¹¹吳天賞（一九〇九—一九四七）。台中市人。筆名使用吳鬱三。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在青山學院學英語。加入台灣藝術研究會以及「臺灣文藝聯盟」東京分部。回台灣後，成為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的記者，也寫小說。戰後成了臺灣新生報的台中分社主任。作品有《龍》、《蕾》、《野雲雀》等小說。

¹¹²王白淵（一九〇一—一九六五）。彰化二水人。讀過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二六年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成為盛岡女子師範學校的教員，卻因為參加了非合法組織的「東京臺灣文化社團」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被逮捕而遭免職。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荊の道》是台灣人以日文所出版的第一本詩集。一九三五年轉移到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卻被當作抗日份子而被逮捕收押監禁在台北。戰後成為新生報的編輯主任，在二二八事件時被逮捕。近年，小川英子、坂谷榮城的《盛岡時代的王白淵》（一九九八年九月三〇日啞啞學會編《台灣文學的諸相》收錄）逐漸釐清了盛岡時代的王白淵。

世。

〈送報伕〉這篇小說的出現，使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達到尖峰。這篇小說不但表示台灣作家的日文小說，無論從其文字技巧和內容而言都達到日本文壇的水準，同時也是所有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台灣小說的集大成。楊逵的這篇小說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把台灣新文學作品的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思想，以巨視性的觀點跟全世界被壓迫的農工階級的解放運動連結起來，使得台灣新文學運動，成為世界性被壓迫的所有農工和弱小民族的抗議運動的一環。這篇小說也附帶地闡明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不但是台灣資產階級文化啓蒙運動的一部份，同時它也是台灣無產階級心聲的真摯的代言人。台灣新文學始終與廣大的台灣民眾打成一片，這篇小說是最好的證據。〈送報伕〉描寫了日本資本家在台灣凶殘、貪婪的豪奪，同時通過一個離鄉背井的青年在東京的生活歷程，刻劃眾多善良的日本勞動者的形象，以象徵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團結。

楊逵 ㉒ 一九〇五年生於台南新化，就讀於台南一中，還沒有畢業就在一九二四年東渡日

㉓ 楊逵（一九〇六一—一九八五）。台南縣新化人。本名楊貴。進入大目降公學校接受日本語教育，向老師沼川雄定借了日文翻譯版的世界名著，而打開了他的文學之眼。十七歲進入台南一中就讀，醉心於托爾斯泰和雨果的小說。一九二四年赴日，白天工作，晚上在日本大學夜間部學習文學，受到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由此經驗寫出了〈送報伕〉。一九二六年加入許乃昌主導的「東京台灣青年社會科學研究部」。回到台灣後，參加農民組合運動，一九二七年時，和被選為組合的中央常務委員葉陶相識，結婚。楊逵因為這些社會運動，在日據時代入獄十次。將在台灣被禁止刊登的〈送報伕〉應徵一九三四年日本《文學評論》主辦的文學獎，得到第二名（第一名從缺），刊登在該雜誌上，一舉在台日文壇成名。以後成了《臺灣文藝》的日文編輯委員，因為和張星建意見不合，而於一九二六年

本，在日本大學專門部夜間部攻讀文學藝術。一九二七年返回台灣從事農民組合的工作，負責政治、組織、教育工作，一九三二年撰寫〈送報伕〉在臺灣新民報登載上半部後被查禁。楊逵一面從事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一面寫作。曾經參加過「臺灣文藝聯盟」，一九三五年創刊《臺灣新文學》，戰後曾坐牢十二年，被釋放後仍然活躍於戰後的台灣文壇。重要作品有〈送報伕〉（《文學評論》一九三四）、〈頑童伐鬼記〉（《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無醫村〉（《臺灣文學》一九四二）、〈泥娃娃〉（台灣時報一九四二）、〈鵝媽媽出嫁〉、〈剿天狗〉、〈春光關不住〉等。他的文學活動從新文學運動的「成熟期」、「戰爭期」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連綿不斷，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去世。

郭水潭^㉓一九〇七年生於台南佳里，參加過「臺灣文藝聯盟」及《臺灣新文學》的活動。郭水潭與吳新榮、徐清吉、林芳年等為「鹽分地帶」文學集團的靈魂人物。戰後，轉而

創刊了嶄新的《臺灣新文學》，卻遇到總督府的漢文禁止令而停刊。戰後創刊了《一陽週報》、《文化交流》等雜誌，一九四九年因為發表〈和平宣言〉的關係，被監禁在火燒島十二年。一九九八年六月，由彭小妍主編的《楊逵全集》（台灣·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現在已出版第六冊）。（彭萱按：《楊逵全集》全套十四卷，已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出齊。據全集年表，楊氏出生於一九〇五年。又：日治時期台南二中，戰後改稱台南一中。）

郭水潭（一九〇八一—）。台南佳里人。號千尺。鹽分地帶的詩人。一九二四年畢業於佳里公學校高等科，一九二五年在北門郡役所工作。一九二九年成為多田利郎（南溟）主導的南溟藝園的同仁。從一九三三年開始在臺灣新民報、臺灣新聞等上面發表文學批評。一九三四年參加臺灣文藝聯盟，一九三五年設立佳里分部。其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由台南縣立文化中心發行《郭水潭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成名作：〈向棺木慟哭〉發表在昭和十四年的臺灣新民報，〈世紀之歌〉發表在同年十二月一日的《華麗島》上。（彭萱按：郭氏於一九九五年逝世。）

研究台灣史。他本來是個詩人，一九三五年發表於大阪每日新聞的小說創作〈某個男人的手記〉，描寫脫離農村的青年流浪漂泊的歷程，呈現台灣農村的凋敝，都市底層庶民生活的哀樂。詩代表作有〈向棺木慟哭〉、〈世紀之歌〉。從七〇年代末期參加「鹽分地帶文藝營」的工作，貢獻很大。

在「成熟期」裡作品量較多，在小說領域上開拓新傾向的作家是翁鬧¹⁰⁵。翁鬧已經有了現代知識份子的懷疑精神，用敏銳的感覺捕捉現實世界的複雜現象，用心理分析來剖析內心生活，以嶄新的感覺來描述四周環境，皆有獨到的成就。他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文化人，但基本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他的作品影響到龍瑛宗和呂赫若等人，使得這些作家都多少帶有蒼白的知識份子、世紀末的頹廢。翁鬧的小說分爲兩種傾向；其一是以客觀的眼光來凝視台灣現實的；這便是〈憨仔伯〉（《臺灣文藝》一九三五）和〈羅漢腳〉（《臺灣新文學》一九三五）。另一種小說是富於詩精神的，表現現代人複雜的心思和感覺的小說，如〈殘雪〉（《臺灣文藝》一九三五）、〈青春鐘〉（《臺灣文藝》一九三五）、〈天亮前的戀愛故事〉（《臺灣新文學》一九三七）。翁鬧一九〇八年生於彰化，畢業於台中師範，任教公學校，後東渡日本，就讀日本大學。曾參加過張文環、吳坤煌、蘇維熊、施學習、巫永福、王白淵、劉捷的「臺灣藝術研究會」。一九四〇年左右病死東京，據說患有精神病。

¹⁰⁵翁鬧（一九〇八—一九三九）。彰化社頭人。是台中師範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同學有吳坤煌、楊逸舟、吳天賞。畢業後，歷經教員的工作而後赴日本留學。參加了《福爾摩沙》的創刊，關於他的履歷的詳細情況尚未明瞭。傳說他因爲罹患精神病而客死日本。

成熟期的日文作家還有賴慶（〈納妾風波〉）、陳瑞榮、徐瓊二、藍紅綠、陳華培、邱富¹⁰⁶、賴明弘等作家。可惜，他們的作品不多，未能完成自己的風格。

在這「成熟期」裡，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吳濁流的日文小說也逐漸抬頭，有相當的影響力。不過他們重要的文學活動大多在「戰爭期」或戰後才展開，所以應歸入於「戰爭期」的作家。

自從一九二一年十月臺灣文化協會¹⁰⁷成立，以林獻堂為總理以來，它積極推行文化的啓

¹⁰⁶賴慶、陳瑞榮、徐瓊二、藍紅綠、陳華培、邱富。賴慶是台中市北屯人，生卒年不詳。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後成為公學校的教師。一九三四年加入「臺灣文藝聯盟」，成為常務委員。一九三五年也加入臺灣新文學社。陳瑞榮是豐原人，一九一六年生。筆名為垂映、垂映生、陳狼石等。台中二中畢業後，於一九三三年赴日，一九三九年自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一九四〇年回到台灣，進入大和拓殖有限公司。一九四二年赴新加坡，戰後回到台灣任職於彰化銀行。一九七二年進入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之後成為副總經理。戰前在《臺灣文藝》（聯盟）和《臺灣新文學》雜誌上，以日文發表了詩、散文、小說等。一九三六年時從臺灣文藝聯盟東京分部發表了長篇小說《暖流寒流》。徐瓊二是台北市人，生年不詳，本名是徐淵琛。開南商工畢業後，一九三二年參加臺灣文藝協會，一九三四年參加臺灣文藝聯盟。也有一段期間當了臺灣新民報的記者。死於一九四八年。藍紅綠是台中市人，經歷不詳，是日文作家，有《臺灣新文學》一卷五號上的小說《邁向紳士之路》，以及一卷八號的戲曲《慈善家》。陳華培是台中市人，經歷不詳，是日文作家，在《臺灣新文學》一卷六號上有小說《王萬之妻》。關於邱富，則沒有任何和他生平相關的線索可稽。不過在《臺灣新文學》一卷九號中有創作〈大妗婆〉。（彭萱按：藍紅綠，本名陳春麟，一九一一—二〇〇三，日治台中州人，今南投埔里。）

¹⁰⁷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十月創立，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林幼春、連溫卿、蔡培火等為理事，所設立的抗日文化團體。以提升台灣文化為目標，謀求振興教育，獎勵體育，以藝術興趣的涵養為宗旨展開文化運動。其具代表性的活動有，在各地舉辦文化演講和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其他也有話劇運動等跨越多方面的活動，受到官方的鎮壓。一九二七年分裂後，林獻堂等退會，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甚至協會還分裂成王敏川派和連溫卿派，於一九三一年終結其活動。詳細請參照林柏雄的《臺灣文化協會滄桑》（一九九三年六月台原出版社）。

蒙運動，同時也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的活動，表面上是一種文化啓蒙運動，它在各地方設置讀報社啓發民智，舉辦各種講習會灌輸台灣歷史、法律、衛生、經濟、宗教等的知識，鍥而不捨地舉辦文化講演會傳授有關世界局勢、台灣現狀的知識，以啓發文盲的認知，同時也展開話劇運動，設立美台團組等，放映電影，直接到民間去使廣大的農民能夠獲知新知識。然而骨子裡頭這個協會真正的目的在於昂揚民族意識，乃是反帝、反封建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然而，由於文化協會的構成份子大多數為台灣資產階級，總理林獻堂以下的重要幹部，不是屬於大地主階級，就是醫生、舊知識份子等地方上的開明士紳。而且文化協會並不是激進團體，它以溫和、迂迴、漸進的方式展開各種啓蒙性運動，力求在法律的許可範圍內推動。儘管在殖民者的百般阻撓下它仍能堅毅地完成了歷史的使命。可是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正值第一次歐洲大戰後世界性經濟恐慌，使得台灣農村瓦解荒蕪，民不聊生的時期。台灣大多數農民為佃農，不但租田地須向地主繳一筆可觀的墾地金，同時所有田租號稱「鐵租」，不管豐年、凶年，佃農必須交給地主一筆可觀的田租，一甲田地可能達到六十石。此外，殖民地政府的苛捐雜稅猶如鐵鏈把農民牢牢地綁住，使得農民動不動因不納田租或稅金而被捕坐牢。農民在豐年尚且不得溫飽，若是凶年更是一籌莫展，坐以待斃。因此，沒有土地耕稼的農民便離鄉背井到城市裡求生存，而城市裡少許工廠也瀕臨關門，正在裁員，那裡容得下這一批襁褓的農民？因此，農民面對的不僅是殖民者的搾取，更是封建地主的無情。而面對農民的實際生活上的困境，文化協會所能做的是以談判、妥協、溫和的請求來幫助農民獲得苟延殘喘，未能為農工獲取徹底的生活改善。這顯示

資產階級領導的文化協會的活動有限界存在。

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倡的弱小民族自決論，固然在台灣知識份子中引起很大的共鳴，但面對頑強的殖民者，弱小民族往往找不著旗鼓相當的有力方式去抵抗。由於新知識和新思潮的陸續輸入，使得屬於農工階層或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知識份子逐漸覺醒，吸收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摒棄以往的溫和的抗議方式，改以激烈、直接、徹底的、以農工爲主的鬥爭方式。當然，這群農工所要反對的並不單單是台灣總督府的殖民統治，同時也針對島內的封建地主。這樣的傾向必然地招致文化協會從內部開始分裂而瓦解。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直接領導農民以鬥爭方式抵抗日本資本主義的「農民組合」在鳳山結成。不久在一九二六年成爲全島性的組織，成立了「臺灣農民組合」¹⁰³。旋即在台灣各地展開激烈、急進的抵抗運動。到了一九二八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¹⁰⁴在上海成立。謝

¹⁰³臺灣農民組合。一九二四年四月，彰化二林的蔗農和林本源製糖公司引起爭議，六月時，醫師李應章組織了「二林蔗農組合」。這是台灣農民運動的開始。之後，曾爲小學教師的簡吉組織「鳳山農民組合」，這個運動因此擴張到各地。一九二六年簡吉等人將各地的組合統一，成立了臺灣農民組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台中召開第一回全島代表大會，這時楊逵被選爲中央委員之一。一九二七年底達到十七個分部和擁有兩萬餘名的組員。但是，接下來和謝雪紅所領導的台灣共產黨結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第二次大會時，和警察之間爆發抗爭。一九二九年擔任中央委員長的黃信國遭到逮捕後，就聲明轉向了。以後，組織內的對立持續著，一九三二年左右停止活動。從昭和六年十一月的一月的《臺灣民報》第三九〇號開始有江賜金的〈臺灣農民組合小史〉的連載，可以當參考。

¹⁰⁴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日本共產黨的佐野學和渡邊政之輔起草台共綱領，準備日共台灣民族分部的成立。隔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秘密設置分部，卻因爲日共的指令無法傳達到上海，委託中共領導，導致未能充分發揮其機能而消滅了。也可參照注釋¹⁰⁵。

阿女^①爲主的台共^②返台，陸續展開農工運動。特別注重組織工人結成工會，尤其因蘇新^③的活動在北部的煤山礦工間獲得穩定的支持。

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下，醉心於孫中山先生^④的三民主義理論的蔣渭水^⑤，擁護文化協會

①謝阿女（一九〇一—一九七〇）。彰化人。謝雪紅比較爲一般人所知。本名阿女。十三歲時成爲台中富商之妾。一九一七年與台中人結婚，在神戶待了三年。一九二〇年回到台灣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五年從上海赴莫斯科東方大學，一九二七年回到上海，一九二八年參與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成立。同年因爲上海讀書會事件被日本警察逮捕，回到台灣。回台後立刻在台灣農民組合本部設置社會科學研究部，同年十一月召開台灣共產黨第一回中央會議。一九三一年再度被逮捕，因生病的關係於一九三九年出獄。戰爭結束後不久就成爲在台中成立的人民協會的中央委員，在二二八事件因爲武力抗爭失敗，逃到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陳芳明著有《謝雪紅評傳》（一九九一年七月，台灣，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森幹夫的日譯版由社會評論社出版）。

②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法國租界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了。當天參加者爲，中共方面的彭華英，從朝鮮共產黨來的呂運亨，台灣人則是謝雪紅、林木順、林日高、陳來旺、潘欽信、張茂良、翁澤生。一九三一年時，主要黨員盡數被逮捕，活動因而停止。

③蘇新（一九〇七—一九八一）。出生在台南佳里的農家。一九二二年進入了台南師範學院就學，卻在一九二四年時遭到退學處分，於同年到日本留學，進入東京的大成中學，接著進入東京外語學校。一九二八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參加台灣共產黨的創立工作。一九二九年回到台灣，一九三一年成爲台灣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長，卻被當局逮捕，在獄中渡過了十二年。戰後，參與政經報、人民導報等的編輯。一九四七年從上海赴香港，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前往北京。文革中因爲勞改而下放。一九七八年恢復名譽，成了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卻於一九八一年因病去世。

④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廣東省香山人。民國的政治家，創設中國國民黨。十四歲時前往兄長所在的夏威夷，接受兄長的援助升學。之後主張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中擔當領導性的角色。在新國家建國時成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卻在不久之後就不得不將政權轉讓給袁世凱。且根據聯蘇容共、勞農合作而推動國共合作，卻於革命中途就逝世了。

⑤蔣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二）。宜蘭人。一九一〇年進入臺北醫學校，與杜聰明是同學。一九一六年在台北大稻

連溫卿¹¹⁵爲主的一派「無產青年」。蔣渭水的這個主張顯然是承認台灣左翼運動的實際意義，採取統合和折衷的方式以挽救文化協會的崩潰。然而，他的這種傾向也顯然深受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的影響¹¹⁶。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台中舉開的文化協會臨時大會上，連溫卿派十一人當選中央委員，惟有林獻堂一個人留任中央委員，惟堅決不就任委員長。至此文化協會完全由連溫卿一派掌握實權，向來以從事民族主義文化啓蒙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一變而爲階級鬥爭的團體（註9）。文協分裂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新文協裡也逐漸醞釀了對立；那便是以上海大學留學生爲主的王敏川¹¹⁷所領導的「上大派」與

埤開設大安醫院。又在隔年經營酒樓春風得意樓，和有力人士相交往來。一九二一年參加臺灣文化協會以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其傳記在黃煌雄的《蔣渭水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前衛出版社）當中有詳細敘述。

¹¹⁵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台北市人。公學校畢業後的一九一三年加入了世界語協會台灣分部。一九二三年時組織了社會問題研究會。也在同一時期由日本人小學校教師山口靜的介紹而結識山川均，在台灣宣傳山川主義。

一九二七年的文化協會分裂之後，指導新文協的工農階級路線，且在一九二八年組織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與王敏川對立。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文協第三次大會上受到台共排擠。戰爭時期則專心投入民俗研究。他的外甥是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

¹¹⁶聯俄容共政策。遵循支援蘇聯的民族解放運動，孫文所採取的政策，歷經一九二一年列寧的秘書馬林的孫文訪問，和蔣介石的莫斯科派遣，於一九二三年一月正式地和蘇聯合作了。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了，共產國際的路線，爲了尋求和中國的民主主義政黨的合作關係，一九二二年，共產黨的李大釗加盟國民黨，一九二四年有了第一次國共的合作。

¹¹⁷王敏川（一八八九—一九四二）。彰化人。師範學校畢業後，歷任公學校教員，進入早稻田大學政經系求學，參加啓發會、新民會以及《臺灣青年》的發行。一九二二年回到台灣，成爲臺灣民報社的記者，也參加了文化協會的活動。一九二三年因爲治警事件被收押監禁，卻獲判無罪。文協分裂後，以左派的身分活躍，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爲中央委員，決定了對台灣共產黨的支持。六月，在台共的黨員遭到逮捕之後，參加了赤色救援會的活動，十二月被逮捕入獄，死於獄中。

信奉日本勞動農民黨山川均¹¹⁸的連溫卿派之間的齟齬和對抗。一九三一年一月，新文協在彰化舉開第四次全島代表大會，裂痕的加深已無可挽救，大會通過支持台共的決議後，真正淪為台共的外圍團體。同年六月殖民政府開始取締台共份子，十二月取締「赤色救援會」¹¹⁹，王敏川等新文協的中央委員及重要會員十多人被捕入獄，新文協事實上已經消滅。

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後，離開文協的舊幹部為推動民族解放運動醞釀設立正式的政治結社。一九二七年六月，以謝春木名義提出政治結社組織申請書，旋即七月在台中舉行「台灣民眾黨」¹²⁰的創立大會。公推洪元煌¹²¹為議長。台灣民眾黨主張應給台灣人參政權，確立合

¹¹⁸山川均（一八八〇—一九五八）。社會主義者。出生於岡山縣倉敷市。在同志社學習，對國體抱持著疑惑。而後，參加日本社會黨，明治四十年時，發行平民新聞。一九一六年進入賣文社，站在馬克斯主義的立場談論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理論的指導者。一九二二年參加日本共產黨的成立，發表了劃時代的論文〈無產階級的方向轉換〉。關於台灣的部分，則有一篇叫做〈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論文，影響了張我軍和連溫卿。

¹¹⁹赤色救援會。一九三一年三月，台灣共產黨員被檢舉之後，得以逃脫檢舉的黨員以及其支持者所組織的救援團體，正式的名稱叫做「台灣赤色救援會」，繼承了台灣共產黨的活動。農民組合的簡吉成為負責人，文化協會的張茂良等成為常務委員，成立台共臨時中央，將黨員派遣至各地的分部，一月時被舉發。

¹²⁰台灣民眾黨。日本統治下在台灣最早出現的合法性政黨。一九二七年一月，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右派的林獻堂、蔣渭水、彭華英等想要組織「臺灣自治會」、「臺灣同盟會」，卻被總督府禁止活動。之後，謝春木的結黨申請被受理了，同年七月十日在台中宣告成立，到年底為止成立了十五個分部，黨員也超過了四百名。民眾黨的綱領是實施街、庄的自治以及普通選舉，獲得結社、集會和言論的自由，學制改革，保甲制度的廢除等。但是，蔣渭水和工友聯盟勾結，左傾化，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一八日第四次黨大會上，幹部盡數被逮捕，以同年八月五日，蔣渭水之死為契機而解散了。

¹²¹洪元煌（一八八三—一九五八）。南投草屯人。幼年時期在漢學塾讀書，之後畢業於草鞋墩公學校，歷任草鞋墩信

理的經濟組織，同時容納農工的階級運動以便獲取全體台灣人的權益。一九二九年，孫中山先生靈柩奉安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民眾黨代表謝春木、王鐘麟¹²²趕到南京提出民眾黨奉獻的大花圈一對，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受，唯未能參加典禮。其次，民眾黨反對鴉片吸食特許，蔣渭水、蔡式毅¹²³等人往訪國際聯盟派來的委員二人，陳述總督府開倒車允許台人吸食鴉片，取締不嚴的情形。

一九三一年第四次黨員大會時，遭台北警察署長命令集會解散，旋即蔣渭水等十六人被捕。直到一九三一年八月蔣渭水去世，民眾黨也就因結社被禁止而解散。

一九二七年，日本發生「昭和金融大恐慌」¹²⁴，田中¹²⁵內閣成立，日本第一次出兵¹²⁶。

用組合監事、草鞋墩庄協議會員。很早就參加民族運動，成為臺灣民眾黨的常務委員、社會部主任。也當過臺灣民報社監查員和臺灣新民報社顧問。一九二四年因為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而上京，一九三〇年時，當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理事長。

¹²²王鐘麟。台南人。文化協會理事。他的活動在《警察沿革誌Ⅲ》中有詳細說明。

¹²³蔡式毅。新竹人。新民會創設時的幹事，也是文化協會的會員，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理事。律師。他的活動在《警察沿革誌Ⅲ》中有詳細說明。（彭萱按：蔡氏生卒年為一八八四—一九七六）。

¹²⁴昭和金融大恐慌。昭和二年三月十四日，若槻內閣的財政部長片岡直溫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失言洩漏東京渡邊銀行的破綻，為此東京、橫濱的中小型銀行展開擠兌，多家銀行被迫陷入歇業的窘境。接著，在震災票據處理中，暴露三井、三菱和鈴木商店對台灣銀行的不正當融資，破產，台灣銀行和十五家銀行歇業，其關聯公司也都導致破產的金融恐慌。政府採行債務履行緩期之策對應。

¹²⁵田中義一（一八六三—一九二九）。出生於山口縣荻市。陸軍大將，男爵。陸軍大學畢業後，經過四年俄國留學，在日俄戰爭時成為滿州軍參謀。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原內閣的陸軍大臣、一九二五年時政友會總裁，一九二七年四月繼承若槻內閣之後組閣，也兼任外務大臣。次年一九二八年三月時舉發全國共產黨一千名，六月改正了治安維持法。同年，炸死張作霖的事件引發爭議，因為受到波及而於隔年總辭。

一九二八年，濟南發生五三慘案¹²⁷，張作霖¹²⁸被關東軍炸死。日本軍部一手造成「非常時」的緊張與壓力，日本國會在軍部的威脅下惶惶度日，對台灣民眾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虛與委蛇，每一次請願不是審議未了就是不採擇。另一方面，在台灣島內受到「昭和金融大恐慌」的影響，經濟凋敝、米價低落，農民淪於饑餓狀態。自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左派得勢，農民組合和工會的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但皆被統治者所摧毀。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民眾黨由左派分子所控制，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缺乏積極參與的意念，終於導致民眾黨的被禁。

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各種挫折，使得林獻堂、林柏壽¹²⁹、羅萬俤¹³⁰、蔡培火等憂心如

¹²⁶第一次山東出兵。昭和二年五月二日，想要實權支配滿洲以及華北的田中內閣的警戒行動，張作霖因為北伐而和北上的蔣介石妥協，以保護居留民為名目，出兵山東。這就是第一次山東出兵。

¹²⁷五三慘案。一九二八年四月，針對北伐軍包圍了山東濟南，田中內閣發起的第二次山東出兵，五月三日進入濟南的北伐軍和日本軍展開了街巷戰。七日，日本軍向中國軍提出了五項要求，因為中國軍的拒絕，日本軍開始作總攻擊。在日本稱作「濟南事件」。張作霖這時退出北伐軍回到奉天。

¹²⁸張作霖（一八七三—一九二八）。中華民國的北洋軍閥奉天派的首領。民國成立之後，掌握了滿洲的實權。於一九二二年時發生的奉、直戰爭中戰勝吳佩孚，軍臨北京政界，戰敗於一九二七年的北伐，退出奉天的途中，被日本的關東軍炸死。

¹²⁹林柏壽（一八九五—一九八六）。台北人，在英國的倫敦大學學習經濟學。林本源家的人。戰後歷任過台灣水泥公司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的社長。也可以在臺灣新民報上看到他的名字。然而，另有一個台中人畫家跟他同名同姓。

¹³⁰羅萬俤（一八九八—一九六三）。南投縣埔里人。一九一九年明治大學畢業。在學生時代加入臺灣青年會。之後在美國的大學學習國際政治學，回台灣後成為臺灣民報社的專務董事。一九四一年當上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委員，一九四四年興南新聞社副社長，一九四五年九月和林獻堂一起參加南京的受降儀式。戰後，歷經立法委員、臺灣銀行常務董事、彰化銀行董事長，當上台灣水泥的社長。在東京，因為生病突然病逝了。（彭蒼按：羅氏留日時參加「新民會」。一九四四年任「臺灣新報」副社長。）

焚，創立臺灣地方自治同盟¹³¹，以運動來維繫民眾的熱情，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一九三〇年八月在台中舉行創立大會。常務理事以楊肇嘉¹³²為首，分別是蔡式毅、李良弼、劉明哲、李瑞雲¹³³等人。自治聯盟成立後舉行巡迴政談演說會，以灌輸民主精神。此外，更積極地向太田總督建議實施地方自治。至一九三五年台灣自治制度改正¹³⁴，卻把議員分為官選、民選，臺灣自治同盟的一部分意願落空，而且限制須納稅五圓方有選舉權。同年十一月舉行第一次民選議員的選舉。一九三六年五月發生「祖國事件」¹³⁵，到了六月林獻堂因祖國事件受

¹³¹臺灣地方自治同盟。民眾黨穩健派脫黨，以實現台灣之自治以及參政權為目的而組織的政治團體。顧問以林獻堂、楊肇嘉、蔡式毅、劉明哲、李瑞雲為中心，共有三〇七名參加。於一九三一年八月一六日在台中的聯盟大會上，成員拒任公職，力行禁酒禁菸，決定不遵守法令，拒絕一切的公共負擔。在一九三五年最初的台灣地方選舉上出現了一名當選者，卻於一九三七年時，與日中戰爭一同解散了。

¹³²楊肇嘉（一八九二—？）。台中人。關於他的傳記，詳細記載在一九六六年，由台北三民書局所出版的《楊肇嘉回憶錄（上）（下）》當中。（彭萱按：楊氏於一九七六年去世。）

李良弼、劉明哲、李瑞雲。關於此三人不詳。（彭萱按：李良弼，新竹人，一九二一年任新竹街協會會議議長。劉明哲，台南縣人，是李瑞雲之妻舅，一九二二年和沈森基創立「新柳詩社」。李瑞雲，一八九五—一九三八，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返台創高雄州米穀同業組合，任理事長，是臺灣新民報社出資者之一。）

¹³³台灣自治制度的改正。中川總督在昭和十年四月一日公佈關於台灣地方自治改正案，十月一日開始實施。台灣地方自治同盟的楊肇嘉等於前年倡議，謀求普通選舉權的授與和議員全部民選。不過改正案決定的卻是議員以半官半民的方式來選舉，州以及市有議決權，街、庄卻沒有，選舉資格限定為五日圓以上的納稅者。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第一次民選議員的選舉時施行。

¹³⁴祖國事件。一九三六年三月，林獻堂等參加由台灣新民報社所組織的華南視察團，遊歷了廈門、福州、上海等。日本的問題向台灣軍傳達了林獻堂在上海的歡迎會席上，談到有回到祖國的感覺的演說詞，由於臺灣日日新報將此消息刊登出來的，林獻堂在台中公園遭到暴徒毆打，並被痛罵非國民的事件。也稱作祖國支那事件。

殖民當局唆使的流氓所毆辱。日本本身發生二·二六事件¹³⁶，成立德日防共協定¹³⁷。在這樣「超非常時」的陰影下，日本軍部在台北橫行跋扈，使得台灣天昏地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般知識份子惶惶不可終日，林獻堂、楊肇嘉先後避難東京。自治聯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召開第四次全島大會，宣佈解散。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成熟期」從一九二六年賴和的第一篇小說〈鬥鬧熱〉出現，到一九三六年禁止使用漢文，《臺灣新文學》的廢刊為止，共歷十年。在這十年中中文作家的創作量豐富，優秀作品頗多，造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十年黃金時代。大部分作品採取寫實主義的手法，以反映台灣農村的疲憊，各階層民眾的生活困境為主。然而，由於社會性觀點頗強，受到大陸三〇年代文學的影響較深，多注重農工跟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等統治結構搏鬥的現實，被現實狀態所捆縛，未能拓展作品的深度和廣度，也忽略藝術性和美學性的探求，使作品有時墮為粗糙的意識形態的發洩。又過份使用方言，雖有效於表現強烈的本土性性格，但方言的過度使用也無可避免地造成事過境遷後，難以瞭解的困難。在這個時期的後期裡，逐漸抬頭的日文作家，其日文文字技巧和作品的表現方式，已達到日本文壇的標準，在日本文壇有少許日文作家的作品曾揚眉吐氣。新一代的日文作家較能吸收西方或日本文學的精髓，

¹³⁶二·二六事件。所指的是，在國粹主義之下，以國家改造為目標而採取直接行動的青年將校們的叛變。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一近衛師團的將校暗殺了內大臣齋藤實、前財務部長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讓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佔據了麴町區永田町一帶的事件。之後，日本進入了軍人為中心的戰爭期。

¹³⁷日德防共協定。這是一九三六年針對共產主義，以共同防衛為宗旨，日德所訂下的協定，一年之後，義大利也加入了，變成日德義防共協定。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德義變成三國同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

本土性性格愈來愈加強，表現方法多彩多姿，在寫實主義的基本寫作方式中採用了西方現代小說的多元性技巧，富於現代小說的懷疑精神和理性主義。由日文作家的出現，擺脫了一部分大陸文化的影響，使台灣新文學由近代邁進了現代。

(3) 戰爭期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台灣總督府禁用漢文¹³⁸，這也是楊達所主編的《臺灣新文學》之所以廢刊的主要原因。那麼，從此以後，台灣就完全沒有漢文刊物了嗎？並不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一隻漏網之魚，苟延殘喘，奇蹟似地僥倖生存下來。這是一本一九三七年創刊的《風月報》。《風月報》¹³⁹是中、日文並刊的雜誌，是一本吟風詠月、鼓吹風雅、文言語體並重的刊物，最後一任主編是作家吳漫沙，張文環曾擔任日文編輯。一九四一年，《風月報》改稱《南方》，直到戰爭結束才停刊。

¹³⁸禁止使用。以昭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附〈府令〉第二號爲依據，修正了部分公學校規則，作爲全台灣六二五校中三十七校的「漢文科」，從此被廢止了。（《臺灣教育》第四一六號）。接著，臺灣日日、臺灣、臺南等各報紙，從四月一日開始，新民報從六月一日開始，協議廢除「漢文（中文）欄」（臺灣時報第二〇九、二一〇號）。因此，報紙並不是根據「府令」的禁止，在形式上是由各報之協議下的「自主規定」，關於雜誌的規則是根據什麼而來的，則不清楚。

¹³⁹《風月報》。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創刊，直到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爲止，發行了一三二期的漢文（葉氏的文中表示，日語也有一併刊載，卻只限於短時間的合刊）休閒雜誌。由風月俱樂部發行，採會員制，簡荷生、林荊南、吳漫沙等參與編輯。有一段時期張文環也有參與日文部份的編輯。一九四一年起更改雜誌名稱爲《南方》。關於《風月報》持續以漢文發行的經過，到現在都不清楚。然而，最近由台灣，南天書局全部複製出版。

一九四〇年，由黃宗葵¹⁴⁰成立「臺灣藝術社」刊行《臺灣藝術》¹⁴¹，這是一本日文的通俗文藝雜誌。

一九三九年，日本在台作家西川滿¹⁴²、北原政吉¹⁴³、中山侑¹⁴⁴等人籌備成立「臺灣詩人

¹⁴⁰黃宗葵。生卒年不詳。發起台灣藝術社，發行了《臺灣藝術》。一九三二年左右在東京經營中華餐館，被指稱從側面支援當時台灣留學生所成立的「臺灣藝術研究會」等活動。戰爭結束以後，出版承續了《臺灣藝術》改名後的雜誌《新大眾》（參照下一項）承接中文雜誌《藝華》之出版旨趣。

¹⁴¹《臺灣藝術》。一九〇四年三月四日創刊。編輯兼發行人是台灣人黃宗葵，由黃個人經營的綜合商業雜誌。實際上擔任編輯工作的是張健次郎。一九四一年九月時，移交給江肖梅（江尚文）。從開始追求大眾性和娛樂性起，就倍增到比創刊時的一千五百部的十倍的發行部數。執筆者也是各式各樣都有，也刊載了楊達、蘇文石（金關丈夫）、西川滿、呂赫若、濱田隼雄、石田道雄、吳濁流、龍瑛宗、矢野峰人等的作品。再者，臺灣藝術社也發行了西川滿的《西遊記》全五冊等的單行本。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左右時，改雜誌名為《新大眾》，卻在隔年二月時就停刊了。還有，葉氏認為這是「日文雜誌」，卻連載了用中文所寫的小說，吳漫沙的《繁華夢》（第一卷第一號—第六號）、李逸濤的《蠻花記》（第一卷第七號—第九號），另外在詩、隨筆、小品方面也有中文的作品。和前一項一同都參照河原功的《雜誌《臺灣藝術》與江肖梅》（綠蔭書房《台灣文學之現狀》收錄）。

¹⁴²西川滿（一九〇八—一九九八）。出生於會津若松。明治四十二年滿兩歲時渡海來台。從小學時開始對文學抱持興趣，透過中小學校動手製作文藝雜誌。昭和三年進入早稻田高等學院專攻法國文學，師事吉江喬松、西條八十、山內義雄。昭和五年，進入早稻田大學法文系，畢業論文是《蘭波研究》。昭和八年回到台灣，進入臺灣日日新報社，也參與《愛書》的編輯。昭和十年，發行詩集《媽祖》以後，又發行許多的詩集。昭和十五年，成立臺灣文藝家協會，成爲其中中心成員，編輯其機構雜誌《文藝臺灣》。十二月在該雜誌上發表代表性的小說《赤嵌記》，十八年得到台灣文化獎。是戰爭時期活躍一時，具代表性的日本人作家。

¹⁴³北原政吉（一九〇八—）。岐阜縣惠那郡出身。大正年間渡海來台。台北師範學校畢業之後，成爲小學教員。是位詩人，與西川滿有親密交情，協助台灣人協會的創立。是台灣發行的詩雜誌《笠》的同仁，一九七九年編輯發行《台灣現代詩集》（MOGURA書房），一九八九年和陳千武一起編輯出版《續·台灣現代詩集》。（彭萱按：北原政吉於二〇〇五年逝世。）

協會」¹⁴⁵；成員還包括有台灣作家楊雲萍、黃得時、龍瑛宗等人。同年九月九日成立以後，以設置文藝協會為其前提，決定會則細節，並舉行各詩人的演講會。同年十二月，「台灣詩人協會」的機關雜誌《華麗島》，由西川滿、北原政吉主編共發行了一期。《華麗島》共收有六十三人之作品，卷頭言由日本右翼作家火野葦平所執筆（註10）。

同年十二月四日，「臺灣詩人協會」改組，組成「臺灣文藝家協會」¹⁴⁶會員共有台、日

¹⁴⁴ 中山侑（一九〇九—一九五九）。出生於台北。筆名有鹿子木龍、志馬陸平。是詩人、劇作家，對電影也有興趣，也是作詞家，也寫很多小說和評論。從台北一中晉升到台北高校。在初期時創刊了《青桐》、《水田與自動車》、《紅色支那服》、《水晶宮》等歌雜誌、詩雜誌，卻都持續不長久。昭和五年，在台北成立劇團「螳螂座」，進入戲劇活動，也在這時候和廣播界有了接觸。昭和九年得到總督府警務局的職位，編輯臺灣警察時報。昭和十二年轉移到台北廣播局的戲劇部門。昭和十五年成為《文藝臺灣》的編輯委員，因為與西川滿的雜誌經營方針不和，而和張文環一起創刊了《臺灣文學》。昭和十八年被徵召赴廣東戰線。戰後成為NHK的場記員。

¹⁴⁵ 臺灣詩人協會《華麗島》。昭和十四年，西川滿和北原政吉等創立了包括台灣人會員的「臺灣詩人協會」，創刊了以詩為中心的雜誌《華麗島》（昭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可是，其他的日本人作家對西川滿要求道，應該發行不特別限定為詩的綜合性文藝雜誌，臺灣詩人協會於是在隔年一月一日發展成在台灣的文藝家的統合性組織「臺灣文藝家協會」，而解散詩人協會。因此緣故《華麗島》只發行一號就終止了，而由《文藝臺灣》承接下去。

¹⁴⁶ 臺灣文藝家協會。昭和十五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全島性文藝家的團體。為了「提升發展在台灣的文學以及謀求會員彼此間的和睦」（會規第二條），而創刊作為機關雜誌的《文藝臺灣》。會員有支持經營方面的贊助會員和普通會員之別，贊助會員以台北帝國大學的矢野峰人、神田喜一郎，台北高校的島田謹二，歌人的山本孕江，總督府圖書館長的山中樵，臺灣日日新報的大澤貞吉等日本人為主，唯一的台灣人是在斗六的鄭津梁（以後改姓名為梅里淳）。張文環、黃得時、龍瑛宗等，當時的台灣主要作家幾乎都是普通會員。隔年十六年二月時協會有改組，《文藝臺灣》從機關雜誌跳脫出來，成了以西川滿為中心的文藝臺灣社所發行的雜誌。詳細的情況參閱釋注¹⁴⁵，及河原功的〈中國雜誌解題《文藝臺灣》〉。

作家六十二人，由黃得時、西川滿為籌備委員。台灣作家參加的是王育霖¹⁴⁷、王碧蕉¹⁴⁸、郭水潭、邱淳洸¹⁴⁹、邱永漢¹⁵⁰、黃得時、吳新榮、周金波、莊培初¹⁵¹、張文環、水蔭萍¹⁵²、楊

¹⁴⁷王育霖（一九一九—一九四七）。台南市人。王育德之兄。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律師。臺灣新民報的法律顧問。戰後擔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工作，因為追查市長郭紹宗（中國人）的貪污等事蹟，而被迫辭職。在二·二八

事件時被殺。

¹⁴⁸王碧蕉。關於他的經歷不詳。在《臺灣文學》上可以見到〈臺灣文學考〉和短歌等作品。（彭萱按：本名王碧樵，台南北門人，一九五三年七月被槍決。）

¹⁴⁹邱淳洸（一九〇八—？）。彰化人。台中師範畢業之後，到日本留學。創作了短歌、俳句、新詩，戰後成了小學的教員和校長，也有漢詩的創作。一九三八年出版了最初的日文詩集《化石之戀》，一九三九年出版了第二本詩集《悲哀的邂逅》。主要在《文藝臺灣》上發表詩作，在《臺灣文學》也有作品。（彭萱按：邱氏於一九八九年逝世。）

¹⁵⁰邱永漢（一九二四—）。台南市人。本名是邱炳南。讀過台中一中，畢業自台北高校。在高中時代的一九三九年前後發行詩雜誌《月來香》，楊雲萍等也投稿於此。他深受西川滿所製作的雜誌吸引，在《華麗島》、《文藝臺灣》上發表詩作。一九四五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參加國民黨政權下的台灣獨立運動，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立刻逃亡至香港。一九五四年在西川滿的奔走下，將〈密入國者的手記〉發表在《大眾文藝》，在日本開始其作家生涯。之後，在《大眾文藝》中連載小說〈香港〉，一九五六年獲第三十四回直木賞。出版了包括近年台灣時代之回顧的《我的青春台灣·我的青春香港》（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日，中央公論社）。

¹⁵¹莊培初。生卒年不明。鹽分地帶的詩人。台灣文藝家協會會員。一九三三年從日本回到台灣，和吳新榮等結成「佳里青風會」，致力於提升鹽分地帶的文化。一九三五年時和林精鏐一起創刊了文藝雜誌《ERONA》，卻只發行了一期就停刊了。（彭萱按：莊培初，一九一六年生。台南佳里鎮人，筆名青陽哲、嚴墨嘯。）

¹⁵²水蔭萍（一九〇八—一九九四）。台南市人。本名楊熾昌，筆名有水蔭萍、南潤、島亞等。台南二中畢業後，於一九三〇年到日本留學，在大東文化學院學習日本文學。在學期間發行日語詩集《熱帶魚》，一九三二年也發行了日語詩集《樹蘭》和小說集《貿易風》。一九三三年回到台灣，在台灣新聞、台南新報上發表新詩，也編輯了台南新報的文藝欄。同一年，和李張瑞、林永修等創立「風車詩社」，發行《風車詩誌》，主張「超現實主義」，被稱為台灣現代詩的先驅者。

雲萍、藍蔭鼎¹⁵³、龍瑛宗、林精鏐（芳年）¹⁵⁴、林夢龍¹⁵⁵等人。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臺灣文藝家協會」機關雜誌《文藝臺灣》¹⁵⁶創刊，由日本作家藍蔭鼎（一九〇三—一九七九）。宜蘭羅東人。水彩畫家。羅東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以後，成為該校的教員。之後，受到石川欽一郎的賞識而成爲台北第二以及台北第一高等女校的美術老師。一九二四年，參加當時曾爲台北師範學校美術老師的石川欽一郎指導成立的台灣最初的畫壇——七星畫壇。同年也加入了同樣是在石川的影響之下由台北師範學校的學生們所組織的美術研究會「臺灣水彩畫會」。畫風被認爲承襲了其師石川的風格。一九二九年入選第十回帝展，一九三二年六月時成爲日本水彩畫展的會員，一九三四年成爲中央美術展的會員，多次入選。一九三九年，在羅馬舉辦個展。一九四一年四月時，改名爲石川秀夫。戰後也活躍在台灣的美術界以及文化界。

¹⁵⁴林精鏐（一九一四—）。台南佳里人。號芳年，筆名是李秋華。鹽分地帶的詩人。父親林芹香是鹽分地帶的傳統文人，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抗日意識非常強烈，因此精鏐也受其影響。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在佳里鄉公所就職。一九三五年參加台灣文藝聯盟佳里分部。詩作有〈某女之詩〉（《臺灣文藝》三卷二號）、〈可以看見荒地中的煙囱〉（《臺灣新文學》一卷二號）等，並且也寫小說。戰後由中華日報社發行了《林芳年自選集》。（彭萱按：林氏於一九八九年七月病逝。）

¹⁵⁵林夢龍。只有臺灣詩人協會的《華麗島》上的〈寂靜之夜〉、《文藝臺灣》一卷一號中的〈仲冬詩稿〉，兩首詩爲人所知，經歷不明。

¹⁵⁶《文藝臺灣》。昭和十五年一月一日創刊，到同十九年一月一日的七卷二號爲止，總卷三十八號，停刊。在台灣的綜合文藝雜誌上來說是最長壽的雜誌，編輯、執筆的中心都是日本人作家。雖然是作爲臺灣文藝家協會的機關雜誌而創刊的，實際上可以說是由西川滿主導，和由他橫跨多方面的人脈所編輯經營的。從昭和十六年二月的二卷一號（通卷七號）開始，由於臺灣文藝家協會的改組而離開協會，改由文藝臺灣社發行，越來越朝向依照西川滿的個性來作爲編輯的方針。執筆者，從西川滿開始，有矢野峰人、濱田隼雄、立石鐵臣、宮田彌太郎、龍瑛宗、張文環、中山侑等，後來張文環、中山侑等和西川滿意見不合而退會，創刊了以台灣人爲中心的文藝雜誌《臺灣文學》，雙方對峙、二分台灣文壇的情形一直到兩雜誌停刊爲止。關於《文藝臺灣》的書誌以及發行情況可以參考河原功的〈中國雜誌解題《文藝臺灣》〉（昭和五十二年二月《亞洲經濟資料月報》一八六號）。

西川滿擔任主編兼發行人。

一九四一年二月，「臺灣文藝家協會」爲了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體制和響應皇民化運動¹⁵⁷而改組，會長爲臺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¹⁵⁸，事務組長爲西川滿。矢野峰人爲象徵派詩人，譯詩甚多，與西川滿一樣帶有濃厚的殖民者統治意識。矢野曾以「文藝報國的使命」爲題演講，可見「臺灣文藝家協會」的局部改組有政治上的某種壓力存在。

一九四一年三月，《文藝臺灣》改由「文藝臺灣社」發行，似乎脫離了「臺灣文藝家協會」的控制，由日人作家西川滿另外組織了「文藝臺灣社」，從此《文藝臺灣》也就變成西川滿一手控制的雜誌。他以浪漫、耽美的藝術至上主義，把雜誌塑造爲日本人外地文學的象徵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日軍偷襲夏威夷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

¹⁵⁷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這一個用語是從昭和十一、二年左右，也就是從「支那事變」前後開始被使用的，從昭和十五年十月，在近衛內閣下結成大政翼贊會，開始了新體制運動，在臺灣呼應此運動，長谷川清總督組成皇民奉公會，是要促使內地人、本島人、高砂族的全體島民以及官民成爲一體的國民運動，以此來推動皇民奉公運動。於是，對於包含高砂族的本島人半強制性地施行國語使用和改姓名等，推行日本人化，這此行爲的總稱叫做「皇民化運動」。對於描寫台灣人對皇民化的懊惱的作品就稱爲「皇民（化）文學」。然而，關於皇民化，可以參考鷺巢敦哉的《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昭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臺灣警察協會）。

¹⁵⁸矢野峰人（一八九三—一九八八）。出生於岡山縣久米町。本名爲禾積。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系畢業。年紀輕輕就遵從上田敏爲師，發表詩作，翻譯詩也很多。在台時，由西川滿所經營的書店出版了翻譯詩集《墳墓》（羅甸·巴哈原著），以及《四行詩集》、詩集《幻塵集》等。昭和三年從牛津大學歸來，成爲臺北帝國大學的教授。戰後，歷任同志社大學、都立大學、東洋大學教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由隸屬於「皇民奉公會」¹⁵⁹的「臺灣文學奉公會」¹⁶⁰主辦，總督府情報課奉中央本部「日本文學報國會」¹⁶¹之命令協辦，在台北市公會堂召開「臺灣決戰文學會議」¹⁶²。中心研討問題為本島文學決戰態勢之確立以及文學者的戰爭協力。西川滿

¹⁵⁹皇民奉公會。在台灣為了皇民化政策而成立的組織。在昭和十五年近衛內閣發動的「大政翼贊會」的影響之下，在隔年四月十九日於總督府正廳，在長谷川清總督、本間雅晴台灣軍司令官蒞臨的場合下舉行始會式。那是以「期待貫徹皇國精神」、「以赤誠盡職奉公」、「期待戰爭後方生活體制的確立」、「協助非常時期經濟的推動」作為宗旨。詳細參照臺灣時報，昭和十六年六月號的「皇民奉公會實踐綱要」以及「皇民奉公會運動規約」。

¹⁶⁰臺灣文學奉公會。臺灣文藝家協會被改組，作為皇民奉公會的下部組織，成立於昭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臺灣文藝家的統一化組織。會長是山本眞平、皇民奉公會事務總長，理事長是林貞六（呈祿）、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常務理事為矢野峰人，瀧田貞治、西川滿、濱田隼雄等九人被選為理事。再者，從昭和十九年五月開始發行《臺灣文藝》（共八冊），原則上文藝發表雜誌也統一化了。

¹⁶¹日本文學報國會。代替昭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散的日本文藝家協會，而成立的國策性文藝團體。「遵從國家要求，徹底了解國策，挺身宣傳普及，協助其實行實踐」為其目的。會長是德富蘇峰，常任理事是久米正雄、中村武羅夫，理事是長與善郎等十六名，分成小說、戲劇文學、評論隨筆、詩、短歌、俳句、本國文學、外國文學等八個部分。作為機關雜誌繼承了日本文藝中央會發行的《日本學藝新聞》（之後改標題為《文學報國》）。然而，在台灣也於昭和十八年四月十日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分部」，分部長是矢野峰人，理事長是西川滿。

¹⁶²臺灣決戰文學會議。在台北市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舉行了文學者會議。有當時頗為活躍的五十八名（包含台灣作家十一名在內）作家和非作家，擔任議長的是山本眞平，台灣文學奉公會兼皇民奉公會事務總長，副議長矢野峰人、台灣文學奉公會常務理事，來賓有總督府情報課長森田民夫和皇民奉公會中央宣傳部的大澤貞吉等參加。議題是「確立本島文學決戰態勢，文學者的戰爭協力，其理念和實踐方法」，總督府意圖統一台日作家的會議。席上，西川滿宣告將自己主宰的《文藝臺灣》「獻給臺灣文學奉公會」，會場一片騷動，由於這個原因，不只是《文藝臺灣》，連帶著張文環主辦的《臺灣文學》也毫不容緩地被停刊。依照這次會議主辦者的意思，台灣人作家們便也不得不執筆協助台灣文學奉公會的《臺灣文藝》了。會議的情況詳細記載在《文藝臺灣》的停刊號（昭和十九年一月

當場提議「撤廢結社」而決定《文藝臺灣》的廢刊，遭池魚之殃的是張文環等的《臺灣文學》，就這樣不得不壽終正寢。

《文藝臺灣》到停刊為止，共刊行三十八期，在台灣所有正派的純文藝性刊物中，是壽命最長的刊物，至於其影響力如何，則令人懷疑。它是屬於統治階級的刊物，大多數台灣民眾都不諳日文的狀態下，它可能由一部分台灣知識份子所接受。

《文藝臺灣》以「台灣文藝家協會」機關雜誌的名義共刊行六期。在這六期中張文環、楊雲萍、黃得時、龍瑛宗、邱永漢、林芳年¹⁶³、黃鳳姿¹⁶⁴、邱淳洸、王育霖等台灣作家都有作品發表。雖然以日人作家為主，台灣作家是點綴性的存在，但總算是初次台、日作家共同耕耘的園地。台灣作家作品之發表少，可能台灣作家不願意淪為日本作家的附庸，謳歌侵略戰爭的關係吧？改組為「文藝台灣社」同仁雜誌後，楊雲萍、黃得時、龍瑛宗、周金波、水蔭萍等作家仍然列為同仁。雖名曰同仁雜誌，其實是由西川滿個人出資、編輯、發刊的雜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龍瑛宗較重要的小說如〈村姑逝矣！〉、〈白色的山脈〉、〈不被知

一日〉的「臺灣決戰文學會議特輯」中。還有，拙稿〈西川滿與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太田進先生退休中國文學論集》收錄）。

¹⁶³ 林芳年。芳年是林精鏐的號。參照譯注¹⁵⁴。

¹⁶⁴ 黃鳳姿（一九二八—）。出生於台北艋舺（現在的萬華）。昭和十五年二月，公學校五年級時，由西川滿經營的日孝書房出版了也可稱之為台灣民俗誌的《七娘媽生》，受到注目，同年十一月出版《七爺八爺》（東都書籍台北分店）。昭和十六年時進入台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就讀。在學中的昭和十八年八月，由東京的東都書籍發行《台灣的少女》，被高度評價為「台灣的豐田正子」。昭和二十二年一月和池田敏雄結婚。

道的幸福》都是在《文藝臺灣》發表。

《文藝臺灣》是外地文學傾向的以異國情趣 (exoticism) 為特色的日人文學雜誌，代表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對台灣民眾的現實生活毫無關心，自然其作品都是象牙塔裡的產物。

一九四一年，張文環脫離《文藝臺灣》成立啓文社，刊行《臺灣文學》共十一期。《臺灣文學》¹⁶⁵雖有一部分日人作家參加，但大致上是承繼台灣新文學運動反日民族解放運動的精神，力求反映台灣民眾在殖民者皇民化運動下的苦悶和抵抗，同時也刻劃戰爭期台灣民眾苦難的歲月。因此，這本雜誌所刊出的作品，都屬於寫實主義的作品，有時暴露了日人推動皇民化運動企圖剷除台人民族意識過程遭受的各種反抗和批判。《臺灣文學》刊登張文環、呂赫若、楊逵等日文台灣作家的力作，充分發揮了台灣作家的良知。

一九四一年，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發行《民俗臺灣》¹⁶⁶。第一期到第八期由末次

¹⁶⁵啓文社《臺灣文學》。昭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創刊的以台灣人為中心的文藝雜誌。曾為西川滿主辦的《文藝臺灣》同仁的張文環和中山侑等人，因為在雜誌運作方面與西川滿意見不和，而創刊以台灣人作家為中心的雜誌《臺灣文學》。出版社到第二卷第四號為止都是啓文社，之後變為台灣文學社。其資金由曾為同仁的王井泉等台灣人協力籌出。昭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之後毫無預警地就停刊了。共十冊。

¹⁶⁶東都書籍有限公司《民俗臺灣》。東都書籍的本社在東京，是三省堂的子公司。出版《民俗臺灣》的是東都書籍的台北分部（分店長持田辰郎是池田敏雄的親戚）。《民俗臺灣》是以介紹和研究台灣的民俗、習慣等為目的的月刊誌。由池田敏雄（總督府情報部）發起，金關丈夫、岡田謙（台北帝大講師）、須藤利一（台北高校教授）、黃得時（興南新聞記者）、陳紹馨（山中彰二）等成為發起人，從昭和十六年七月號到同二十年一月號為止發行了四十三號。編輯者名義上是金關，不過實際上是池田敏雄。從當時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變成以移川子之藏為中心，相對於高砂族中心的研究雜誌《南方土俗》的出現，《民俗臺灣》變成以研究在台灣的漢民族的風俗和習

保主編，第九期到四十三期由金關丈夫¹⁶⁷主編，至一九四五年停刊。實際的編輯任務，可能由池田敏雄¹⁶⁶負責。這本刊物雖然是探討台灣民俗爲主的刊物，但不乏有許多鄉土色彩濃厚的文學作品發表，台灣作家寫稿的很多。

一九四三年，《臺灣文學》和《文藝臺灣》同時廢刊。旋即從一九四四年開始由「文學奉公會」刊行《臺灣文藝》共八期¹⁶⁸，編輯委員包括有張文環、西川滿等台日作家。

慣爲主。近年，台北南天書局將包含之前因爲戰爭而變得不能出版的第四十四號（昭和二十年二月號），全部複刻出版了。關於東都書籍，參照河原功的〈戰前在台灣的文書籍之流通〉（平成九年三月《成蹊人文研究》第五號）。關於《民俗臺灣》的書誌以及發行情況，在譯注¹⁶⁹中引用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所刊載的池田麻奈（殖民地地下台灣的民俗雜誌·解題）等有詳細介紹。然而，最近川村湊在《「大東亞民俗學」的虛實》（一九九六年七月十日講談社）中，針對《民俗臺灣》提出批判性的見解。

¹⁶⁷金關丈夫（一八九七—一九八三）。醫師，台灣民俗研究者。香川縣人。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一九三四年以台北醫事專門學校助教授的身分來台。一九三七年任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一九四三年時和池田敏雄等一起創刊《民俗臺灣》。以林熊生的筆名在台灣出版了最初的真正的偵探小說《龍山寺的曹老人》等。戰後，歷任九州大學和帝塚大學的教授。

¹⁶⁸池田敏雄（一九一六—一九八一）。出生於島根縣莊原町。八歲時渡海來台。台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結識西川滿，而和他一起活動。之後，離開西川滿，從事台灣民俗、風俗的研究，和金關丈夫一起編輯《民俗臺灣》，也以黃雞、牽牛子、月英、李氏杏花等各式各樣的筆名發表文章，致力於雜誌方面的經營。著作有《臺灣的家庭生活》（昭和十九年八月東都書籍有限公司台北分店）。夫人是黃鳳姿。在《台灣近代史研究》第四號上有「池田敏雄氏追悼紀念特集」。

¹⁶⁹文學奉公會《臺灣文藝》。昭和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刊，台灣文學奉公會（譯注¹⁷⁰）的機關雜誌。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時，兩大大文藝雜誌《文藝臺灣》、《臺灣文學》一同停刊之後而創刊的。執筆者也有《臺灣文學》派，不過《文藝臺灣》派的作家比較多。編輯兼發行人是任職於當時總督府情報課的長崎浩。昭和二十年一月五日爲止，發行了八冊。

在太平洋戰爭的戰鼓聲中，日本文學報國會爲了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者完成侵略戰爭，共舉行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①。其第一次大會一九四二年在東京召開，第二次大會一九四三年仍在東京召開，第三次大會一九四四年在南京舉行。第一次大會有台灣作家張文環和龍瑛宗參加。第二次大會由楊雲萍和周金波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開會目的，爲「在大東亞戰爭下，擔負文化建設底共同任務的共榮圈各地的文學者會聚一堂，互相溝通抱負，互相打開胸襟傾訴」，其實是日本軍部的統戰工具，要求日本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亞洲各國知識份子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的妄想，幫助日本軍國主義者完成征霸全世界的野心（註11）。

在這樣惡劣的政治體制下，台灣作家不是被迫沉默，就是期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全面潰敗，台灣能早日獲得解放。因此，像楊逵這樣的作家就想盡方法，在作品中力求抵抗精神的表現，而吳濁流卻在暗地裡寫作《亞細亞的孤兒》，以紀錄台灣人悲慘的命運，等待著黑暗逝去，光明來臨的日子。

張文環^②是日據時代日文作家中的翹楚。一九〇九年生於嘉義縣梅山鄉，曾在日本東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由日本文學報國會主辦而舉行的。第一次是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到十日爲止於東京和大阪舉行。從台灣來的日本人作家有西川滿和濱田隼雄，第二次是從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開始，在東京舉行三天，從台灣來的日本人作家是齊藤勇和長崎浩，第三次，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在南京舉行三天。然而，以日語作爲大會用語。詳細參照尾崎秀樹的〈關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勁草書房）。

張文環（一九〇九—一九七九）。嘉義梅山人。一九二一年小梅公學校畢業後，一九二七年赴日，進入岡山中學讀書。一九三一年進入東洋大學。是一九三二年臺灣藝術研究會創立者之一。一九三五年回到台灣以後，在台灣電影有限公司工作。也從事《風月報》的日文編輯工作，一九四〇年參加台灣文藝家協會。雖然成爲從文藝家協會脫離

大學文學部就讀，一九七八年去世。一九三三年，張文環在日本東京參加臺灣藝術研究會，同時在《福爾摩沙》發表第一篇小說〈落蕾〉，在《福爾摩沙》第二期發表〈貞操〉。一九三五年一月〈父親的顏面〉入選日本《中央公論》小說徵文第四名。從此創作不輟，在《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風月報》等雜誌發表作品。然而他的創作顛峰期當是一九四一年，他脫離《文藝臺灣》，組織「啓文社」創辦《臺灣文學》開始。他的重要作品有〈辣荳罐〉（《臺灣藝術》一九四〇）、〈藝日之家〉（《臺灣文學》一九四一）、〈論語與雞〉（《臺灣文學》一九四一）、〈夜猿〉（《臺灣文學》一九四二）、〈閩雞〉（《臺灣文學》一九四二）等作品，此外有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在日本出版一九七五）。其中〈閩雞〉在一九四三年由林博秋¹⁷²改編為閩南語話劇，由厚生演劇會在台北永樂座（戲院）公

的《文藝臺灣》的同志，因為和西川滿的編輯方針不和，而在王井泉的協助下由啓文社發行了以台灣作家為中心的文藝雜誌《臺灣文學》。一九四二年由臺灣文藝家協會被派遣到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一九四三年時，〈夜猿〉獲得皇民奉公會的臺灣文學獎。一九四四年成為台中州霧峰街區公所的主任，一九四五年成了同州大屯大里庄庄長兼農會會長。戰後也歷任了台中縣議會議員、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兼總務組長等。最大的作品是一九七五年時由日本的現代文化社所發行的《在地上爬的人》。現在，台灣清華大學的陳萬益教授正在編纂他的全集。（彭萱按：《張文環全集》八卷，中、短篇小說集二卷，長篇小說集二卷，隨筆集二卷，文獻集一卷。已於二〇〇二年三月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張氏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病逝。）

¹⁷²林博秋（一九二〇—一九九八）。桃園人，本名搏秋。進入新竹中學以後，十六歲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大學高等學院以及明治大學讀書。大學在學中進入新宿的紅磨坊文藝部。畢業後成了東寶的副導演。回到台灣以後，活躍於台灣的電影、戲劇界。厚生戲劇研究會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由張文環主辦的《臺灣文學》的成員為中心所成立的。同年九月三日在台北的永樂座上演了林博秋的脚本及演出的「閩雞」、「高砂館」等四齣戲劇，大獲好評。負責人王井泉、文藝演出部主任是林博秋、擔當顧問的有呂赫若、謝火爐、張文環、名和榮一、呂泉生。可以參考石婉舜的〈嘎然絃斷——林博秋與新劇〉（一九九四年《文學台灣》第十一期）等一系列的論文。

演，在台灣話劇史上是劃時代的活動。〈夜猿〉在同年獲得皇民奉公會第一屆「台灣文學賞」。

張文環的畢生大作，當是長篇日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這是以梅山鄉為舞台描寫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的台灣民眾的真實生活，特別注重台灣農民，在「沒有做人條件」的殖民地統治下的被虐待的生活。張文環的文學最接近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文學巨匠托爾斯泰或巴爾扎克的風格，透過台灣民眾四季的風俗習慣的描寫，來刻劃台灣民眾的民族性傳統生活，同時用深厚的人道主義胸懷擁抱了他們。

呂赫若¹⁷⁸一九一四年生於豐原，大約在一九五〇年前後死亡。呂赫若的死至今仍是一個謎。畢業台中師範後曾赴日學習聲樂，為一個男中音歌手。曾擔任公學校教師及興南新聞編輯等職位。一九三四年他的處女作〈山川草木〉發表於《臺灣文藝》創刊號，次年〈牛車〉

¹⁷⁸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一）。台中豐原人。本名呂石堆。台中師範學校畢業的隔年一九三五年一月時，在日本的《文學評論》二卷一號發表了〈牛車〉，得到名聲。之後在《臺灣文藝》和《臺灣民報》等發表作品。一九三九年赴日，在武藏野音樂學校聲樂科學習聲樂，同時在東寶劇團演出歌劇。一九四二年回到台灣繼續在雜誌上發表作品，另一方面也參加厚生戲劇研究會，也是《臺灣文學》的同志，也當了興南新聞的記者。一九四三年以〈財子壽〉獲得「台灣文學賞」。另外，一九四四年時由台北的清水書店出版了小說集《清秋》。他和張文環、龍瑛宗可以說是戰爭時期最活躍的日語作家。葉氏評論《清秋》為「偽裝的皇民化謳歌」。戰後也以中文發表了〈改姓名〉、〈一個獎〉、〈月光光〉、〈冬夜〉等小說。傳說他在一九五二年時因為被「毒蛇」咬而身亡的，不過其真相不明。最近戰爭期的〈呂赫若日記〉被發現，不只是為呂赫若研究，也為這時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然而，在台灣已出版了《呂赫若全集》（一九九五年聯合文學出版社）以及《呂赫若作品研究》（一九九七年，同前），在日本可以參考垂水千惠的一系列的研究。（彭萱按：呂赫若初作應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發表在《文學評論》二卷一號的〈牛車〉。〈山川草木〉發表於一九四四年五月，「皇民文學奉公會」發行之《臺灣文藝》創刊號。）

發表在日本《文學評論》上，因而聲名大噪。一九四四年呂赫若刊行了唯一的短篇小說集《清秋》共收錄了〈鄰居〉、〈柘榴〉、〈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清秋〉等七篇。〈財子壽〉於一九四三年獲得《臺灣文學》的「臺灣文學賞」¹⁷⁴。

呂赫若是很徹底的寫實主義者，他描寫殖民統治下台灣家庭的各種變遷，他刻劃封建性大家庭制度下的頹廢和拮据，記錄了大家族制度的興起和衰亡。同時他在〈牛車〉一篇上，透過沒有土地的農民楊添丁，在「日本天年」下的悲慘生活。呂赫若的小說技巧卓拔，充分吸收了現代西方作家的表現技巧，因此意象鮮明，人物的刻劃真實而實際不流於類型化，在日據時代作家中是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戰後，呂赫若用中文在《新新》等刊物發表了四篇小說，然後因參加政治活動，死於非命。

龍瑛宗¹⁷⁵一九一一年生於新竹北埔庄。一九三〇年台灣商工學校畢業，歷任台灣銀行雇

¹⁷⁴ 台灣文學賞。這是頒發給在雜誌《臺灣文學》上發表的作品文學獎，發表在昭和十七年十月的《臺灣文學》二卷四號雜誌上。受到王井泉的友人、實業家的福嶋清港（張清港）的援助而施行的。獎金五百日圓。第一回由呂赫若獲得，作為第一候補獎勵獎，坂口禰子獲得獎金一百日圓（參照《臺灣文學》四卷一號）。然而，在這之前，因為西川滿主辦的《文藝臺灣》也設置了「文藝臺灣賞」，可以認為可能是針對這件事才設立的。

¹⁷⁵ 龍瑛宗（一九一一年—一九九九年）。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的客家人，本名劉榮宗。一九二五年畢業於北埔公學校高等科。一九三〇年從台灣商工學校畢業後，進入台灣銀行。在學中透過日文熟讀莫泊桑、左拉、杜思妥也夫斯基等海外文學，受其影響。一九三六年，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應徵《改造》的徵文小說，得到佳作，在日本的文壇造成話題。一九四〇年加入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為《文藝臺灣》的編輯委員，同時辭掉銀行的工作，進入「臺灣日日新報」。是在戰前留下二十四篇小說的代表性日文作家。戰後成為「中華日報」的日文版主任，一九四九年進入合作金庫，成為人事室副主任，最後在任職該行稽核室主任時退休。現在《龍瑛宗全集》編輯中。（彭萱按：《龍瑛宗全集》中文卷八卷已於二〇〇六年；日文卷於二〇〇八年，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

員，臺灣日日新報編輯，戰後曾主編過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嗣後任職合作金庫，至一九七六年退休。一九四〇年加入「台灣文藝家協會」為《文藝臺灣》編輯委員之一。同時又參與日本《文藝首都》¹⁷⁶的編務。

他的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一九三七年《改造》第九回小說徵文「佳作推荐榜」。他是多產的日文作家，戰前共發表了二十四篇小說。其中較著名的有前述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日本《改造》一九三七）、〈黃家〉（日本《文藝》一九四〇）、〈黃昏月〉（日本《文藝首都》一九四〇）、〈白色的山脈〉（《文藝臺灣》一九四一）、〈獏〉（日本《風俗》雜誌一九二九）（彭萱按：據前衛版《龍瑛宗集》應為一九四一年作品）、〈一個女人的記錄〉（《臺灣鐵道》一九四二）、〈不被知道的幸福〉（《文藝臺灣》一九四二）等。其中，〈白色的山脈〉曾被上海《文藝春秋》¹⁷⁷譯載。

龍瑛宗跟翁鬧一樣，較具有世紀末蒼白的知識份子的傷感性。他的作品主要以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日據時代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苦悶和彷徨。作者透過知識份子的灰色

¹⁷⁶《文藝首都》。保高德藏以發展性的方向繼承季刊雜誌《文學季刊》而創刊的同仁性質的文藝雜誌。從昭和八年一月發行到同四十五年一月為止，刊載了許多新進作家的作品。主要的作家有戰前的金史良、芝木好子，戰後的北杜夫、Nadainada、中上健次等。

¹⁷⁷上海的《文藝春秋》。《上海「孤島」時期文學報刊編目》（一九八六年十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中收錄上海洪荒文藝出版社發行的《文藝春秋》之四十一年十月號和十一月號兩期。卻沒有看見台灣人作家的作品。但是，林曙光〈相逢何必曾相識〉（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文學台灣》第二期）當中，謹譯刊載了〈白色的山脈〉，並且，因為某種原因而擔任《文藝春秋》主編的范泉，在自己的創作集《范泉創作集》（文藝春秋社刊）當中敘述著，當作自己的作品收錄了〈白色的山脈〉的經過。

生活，連帶地刻劃日本黑暗的殖民統治和台灣民眾的困苦生活。龍瑛宗描寫了這些台灣知識份子的動搖、抵抗和妥協，而成功地呈現了他們精神結構的荒蕪（註12）。

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的這一段「戰爭期」裡，一般說來，台灣作家因各自的意識形態不同，遭遇不同，資質不同而分別走上了四條途徑；其一是輟筆不寫，做沉默的抗議。這類作家大多數為中文作家，既已失去了發表的園地，又被禁用漢文寫作，當然他們都無法從事文藝工作了。不過，台灣作家之中既能用日文又能用中文的人也不少，可是面對剷除民族的根為目的的皇民化運動洶洶勢力，他們寧願保持沉默。賴和在一九四一年被捕入獄，備受虐待之後，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去世。中文作家失去了精神領袖，這給中文作家帶來的影響很大（註13）。也有王錦江這樣的作家兩度被繫獄，心灰意冷，抗戰期間赴大陸直到戰爭結束後才返台。其二是始終堅決地擁護反帝反封建的路線不妥協、不屈服的作家。像楊逵這種雖表面上虛與委蛇，其實骨子裡頭仍反對侵略戰爭的，他在戰爭時期中所寫的〈剿天狗〉，藉著撲滅惡性瘡疾的主題，其實寫的是反日反封建的故事。其次有吳濁流¹⁷，他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寫成《亞細亞的孤兒》，戰後才得發表。吳濁流在日據時代作品發表的並不多，一九三六年以〈泥沼中的金鯉魚〉入選《臺灣新文學》小說佳作獎，〈水月〉發

¹⁷吳濁流（一九〇〇—一九七六）。出生於新竹新埔。本名吳建田，〈海月〉是他的處女作。葉石濤氏的原文中說明其刊載在《臺灣新文學》中，訂正為刊登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發行的《臺灣新文學月報》第二號。〈泥沼中的金鯉魚〉作為同年六月五日出版的《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的臺灣新文學獎的「入選候補」而被刊載出來。成為「入選作品」有七部，橫跨三號，刊載在同一雜誌上，結果沒有「適當入選的作品」，包括吳濁流之作的所有作品都成了「佳作」。（彭萱按：〈海月〉漢譯多作〈水月〉。）

表於《臺灣新文學》一九二六年三月號，他的大部分小說都在戰後陸續付梓。

戰爭期中出現的日文新作家寥寥無幾。這些年歲二十歲左右的作家涉世未深，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影響很大，縱令對民族的歷史有些認識，但缺乏堅強的抵抗精神，因此他們的作品都是耽美的，逃避現實的。如楊千鶴¹⁷⁹的《花開時節》（《臺灣文學》一九四二）、葉石濤的《林君的來信》（《文藝臺灣》一九四三）、《春怨》（《文藝臺灣》一九四三）等。戰爭的黑暗愈來愈加深，皇民化運動的浪潮越來越洶湧的時候，有些作家在理念上認同了殖民地政府的政策，走向親日的路。如周金波¹⁸⁰的《志願兵》（《文藝臺灣》一九四一）、《水癌》（《文藝臺灣》一九四〇）等。王昶雄¹⁸¹的小說《奔流》發表於《臺灣文

¹⁷⁹楊千鶴（一九二一—）。出生於台北市。公學校畢業後，於一九三四年進入靜修女校，跟濱田隼雄學習國文。一九三八年進入台北女子高等學院就讀，畢業後的一九四一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社。成為「家庭文化欄」的女記者。上司是西川滿。除了小說《開花的季節》（《臺灣文學》二卷三號）之外，還有隨筆類，在當時來說是很稀奇的台灣女作家。有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一九九三年私家版，一九九八年台灣·南天書局版／一九九五年前衛出版社漢譯版）。（彭萱按：林智美、張良澤譯，南天書局一九九四年出版，一九九九年再版。）

¹⁸⁰周金波（一九二〇—一九九六）。出生於基隆。壽公學校畢業之後，經過日大附屬三中，進入日大齒科。成為一九三八年文學講座的第一期研究生。同期的有衫村春子。在京中的一九四二年寫了處女作《水癌》，投稿到《文藝臺灣》。同年九月《文藝臺灣》刊載了《志願兵》，成為話題。一九四二年時獲得文藝臺灣獎。一九四三年在《文藝臺灣》發表《鄉愁》，八月，作為台灣代表參加「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被貼上「唯一的皇民作家」的標籤，被台灣文壇忽視了。卻於近年逐漸被重新評價。詳細參照中島利郎、黃英哲編的《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綠蔭書房）以及拙稿《被構築的皇民作家·周金波》（綠蔭書房《台灣文學研究的現在》）。（彭萱按：中島利郎、周振英編有《周金波集》中文版出版，二〇〇二年十月，台北、前衛，「台灣作家全集」「別集」。）

¹⁸¹王昶雄（一九一六—二〇〇〇）。淡水九坎街的人。本名王榮生，一九二三年進入淡水公學校就讀，一九三二年留學日本，最初在日本大學讀文學，之後轉向齒科。畢業後回到台灣，在淡水開業。留日期間參加日本人主辦的《青

學》一九四三年七月號。「是一篇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傾訴皇民化苦悶心聲的寫實小說。」（註14）同樣的情形也許可適用陳火泉¹⁸²的小說〈道〉；〈道〉曾獲日本芥川獎候補。

吳新榮¹⁸³雖沒有寫過小說，但有一篇散文〈亡妻記〉刊登於《臺灣文學》一九四二年十

鳥》、《文藝草紙》等同仁雜誌，回台灣後的一九四一年，除了加入《臺灣文學》以外，也在《文藝臺灣》、《臺灣公論》、《臺灣藝術》、興南新聞、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了日文作品。〈奔流〉也曾經和〈志願兵〉、〈道〉一起被認為是皇民化小說的代表作，不過現在已被認定是，站在台灣人立場的寫實小說。其他有中篇小說〈淡水河的漣漪〉，不過到現在都尚未被找到。（彭萱按：許俊雅編《王昶雄全集》十一冊，已於二〇〇二年十月，由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淡水河的漣漪〉已收入小說卷。）

¹⁸²陳火泉（一九〇八一—一九九九）。彰化縣鹿港人。筆名有耿沛、安岵林，戰時改名作高山凡石。七歲時在鹿港的文開書院學中國古文，在鹿港第二公學校接受日語教育。十七歲時考上台北工業專門學校，學了五年應用化學。昭和十八年，在《文藝臺灣》第六卷第三號發表處女作〈道〉，造成話題，也獲得芥川賞候補。之後將姓名改成日本名，以台灣人皇民化作家的代表受到矚目。〈道〉的評價是各式各樣都有，不過根據戰後鍾肇政〈問題小說〉〈道〉及其作者陳火泉（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民眾日報）等的再評價，重返文壇，且自己將〈道〉翻譯成中文，發表在民眾日報。由九歌出版社出版了《悠悠人生路》等著作。

¹⁸³吳新榮（一九〇七一—一九六七）。台南縣將軍鄉的人。日治時期鹽分地帶具領導地位的文藝家。別號震瀛、史民、兆行等。滬汪公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南的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就讀，受到台灣最早的文學士、即英文老師林茂生的影響。一九二四年到岡山的金川中學留學，一九二八年進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就讀，在學期間加入臺灣青年會，也和從大陸來的學生往來。畢業之後在山本宣治紀念醫院從事醫療及研究，一九三二年九月回到台灣。回台灣之後和莊培初、郭水潭等成立「佳里青風會」，除了謀求區域文化的提升以外，一九三五年爲了臺灣文藝聯盟佳里分部的設立而奔走，也活躍於《臺灣新文學》編輯委員和《臺灣文學》。戰後歷任臺灣省醫師公會監事 and 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編輯《南瀛文獻》，致力於鹽分地帶的文獻收集。一九九七年三月，由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了日中對照翻譯版的《吳新榮選集》（共三冊）。

月號，及若干詩作發表。他是鹽分地帶文學集團的領導者，有關台灣史、民俗、掌故的研究多刊登於《民俗臺灣》。一九〇七年生於台南縣將軍鄉，一九六七年去世。其著作的校訂、刊行，由後嗣吳南圖及張良澤整理，甚為齊備，為台灣作家中罕見的例子（註15）。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戰爭期」從一九三七年禁止使用漢文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開始，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完成侵略戰爭，在殖民地朝鮮、台灣加緊言論統制，推動皇民化運動，以期確立積極的戰時體制。一九三七年「臺灣自治同盟」解散，同年十二月日軍佔領南京發生大屠殺事件。一九二八年台灣總督小林¹³⁴宣佈，將要實施台灣人志願兵制度。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次年台灣掀起改姓名運動，以及「寺廟神昇天」，殖民者進一步地從根要挖掉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一九四一年皇民奉公會成立，積極加強台灣人的「日本化」。同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發生。一九四二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東京舉行，一九四三年「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成立。一九四三年徵兵制度實施，使台灣青年充當日本侵略軍的炮灰。一九四五年四月沖繩本島被美軍攻占，同年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攻擊，夷為平地。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

¹³⁴小林台灣總督（一八七七—一九六二）。小林躋造是第十七任的台灣總督。廣島縣出身的海軍軍人。海軍軍校畢業後，於日俄戰爭時參加日本海海戰，從海軍大學出來以後，歷經海軍省軍務局長等職務，一九三〇年海軍次官，一九三二年聯合艦隊司令官，一九三三年晉升為大將軍。成為從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為止的武官出身的台灣總督，推動台灣的「皇民化」政策和米的增產計畫，擴展同化政策與教育，以及致力於地方制度改革。

件投降。

黑暗的五十多年的漫長日子終於過去，台灣獲得解放，台灣新文學運動完成了光榮的歷史性使命，結束了它多災多難的坎坷歷程，充分顯示台灣作家為真理而奮鬥不已的堅強抵抗精神。

註：

- 1 張我軍遺著《張我軍文集》，一九七五年八月，純文學出版社。
- 2 張我軍遺著《張我軍文集》，編者張我軍哲嗣張光直〈序〉，一一三頁。
- 3 楊雲萍〈人人雜誌創刊前後〉，一九八一年五月成文出版社《台灣史上的人物》，三〇一—三一頁。
- 4 關於新文學作品的發表年代和所登刊物悉依據塚本昭和〈台灣文學年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天理南方文化研究會《南方文化》第八輯。
- 5 謝松山漢譯〈犬羊禍〉，一九八三年《文學界》春季號，二一〇—二一四頁。
- 6 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一九七一年九月，自立晚報社。本段材料皆參考「海外留學生的團體活動」，八十一—一〇六頁。
- 7 施學習〈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與福爾摩沙 (Formosa) 創刊〉，東方文化書局「新文學雜誌叢刊」2。
- 8 賴明弘〈台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東方文化書局「新文學雜誌叢刊」3。

- 9 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一九七一年九月，自立晚報社。
- 10 近藤正己《西川滿札記》，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二月，《台灣風物》第三十卷三、四期。
- 11 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一九七一年六月，日本勁草書局，「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について」，十八—五八頁。
- 12 羅成純《龍瑛宗研究》，一九八三年度日本筑波大學修士論文，未出版。
- 13 楊達、朱石峰、守愚等「賴和先生追悼特輯」，一九四三年四月《臺灣文學》三卷二號。
- 14 張恆豪、林梵、羊子喬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8」，一九七九年七月，遠景出版社，二五七頁。
- 15 鄭喜夫《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一九七七年九月，瑯琅山房刊行，非賣品。

第三章 四〇年代的台灣文學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①正式成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遷台。由於日本殖民統治而與大陸分離五十年四個月之久的台灣及台灣同胞以為從此重歸祖國的懷抱，開始摸索走上通往自由與民主的道路。台灣民眾以狂熱的喜悅與期待，迎接了光復的來臨。台灣民眾的祖國熱在光復當時達到空前的高潮，這反映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到大陸的第七十軍的公署官員搭乘美軍艦四十多艘在十月十七日抵台的那六十天日子。

這六十天可以說是政治的真空時期，在台約七十多萬人的日本統治者已不具有政治權力

^①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以台灣為中國之一省，宣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在舊日本總督府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舊台灣軍司令部設置「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開始台灣的統治。

統治台灣，自然台灣民眾必須去設法維持治安，過自治的生活。戰爭中，逃難在鄉下的城市居民陸續地返回城市，開始重建家園。他們回到故居，發現門鎖沒遭到破壞，財產和傢俱無一失竊，安好一如往昔。雖然戰爭的艱辛生活使得台灣民眾變成一群藍縷的、面帶菜色的饑民，但是道德性的約束力量並沒有消退，台灣仍然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世外桃源。

吳濁流在他自傳性的小說《無花果》（一九六九年寫成）裡，描寫這六十天的日子而寫道：「置身於政治的真空時代，能夠大家一條心完成很好的自治，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例子。這些青年團員沒有報酬，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命令，確保了自八月十五日到接收人員來台的兩個月間的治安。特別是在夜間，猶如冬天的防火警備的冬防期間一樣，各地的青年輪流負起責任，很有秩序，平安無事的度過這真空狀況，這是島民值得驕傲，有必要大書特書的事情」（譯自日文原文）^②。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大陸的軍隊從基隆港登陸。台灣青年在基隆碼頭構築了望樓，日夜在望樓上遠眺，期待大陸的軍隊早日抵達。然而他們所看到的七十軍卻是軍容不整、軍紀不佳的部隊。這給台灣民眾帶來了挫折感。

台灣本來是穀倉，在一九四五年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米產量降到六十四萬公噸，但仍

② 〈無花果〉。吳濁流戰後也以日語創作，中文發表的作品則透過翻譯。吳濁流的幾部主要的作品都在日本出版。有《亞細亞孤兒》（一九五六年四月，一二三書房），《亞細亞孤兒》（一九七三年五月，新人物往來社），《黎明前的台灣》、《泥濘中生存》（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一月，社會思想社）。引用的是根據《黎明前的台灣》所收錄的〈無花果〉。

然足夠維持六百三十萬島民的需要。一九四六年的米年產量為八十九萬四千公噸，當然是足夠養活島民且綽綽有餘。然而，由於軍米的輸出和聚積佔大部份，使得一九四六年春的米價比上海更貴。島民的三分之二必須吃蕃薯簽雜糧充饑。

此外，省營貿易局、省公賣局等省營機構及長官公署壟斷了台灣全產業的九〇%。以貿易局為例，接收得來的資金約有七千萬圓。從台灣銀行借款五千萬圓，向中央信託局借債一千六百萬圓。一九四六年所得的利息為四億四千萬圓，但這些利益很少編入長官公署的預算裡，長官公署的預算主要以紙幣的增額發行去維持。民間的陳忻^③等發起的「大公」企業公司無法與省營事業競爭，後來因陳忻被殺而瓦解。同時由於缺乏民間企業去吸收在日據時代受到大專教育的六萬三千名人才，因此大部分台灣知識份子失業。

戰前的台灣銀行紙幣約發行八千萬圓。戰爭快要結束的那幾年，發行額已高達十四億三千三百萬圓，物價指數每年約上升數%，然而，由於實施強制國民儲蓄，所以流通在民間的通貨由國家銀行不斷地吸收回去。陳儀^④來到台灣的十月底，台銀的發行額已激烈增加達到二十九億九千七百萬圓，以紙幣交換台灣的物質，把生產物運回大陸售賣。陳儀離任的一九四七年底，台銀舊台幣的發行額已達到一百七十一億圓。而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陳誠

③ 陳忻（一八九三—一九四七）。出生於台中。戰前是大東信託有限公司的常務，台灣本土金融界的領導者。在二二八事件時被殺害。參照第二章注釋⑨。

④ 陳儀（一八八三—一九五〇）。浙江省出身，軍人官僚的精英份子，被任命作初代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官。對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的抗議運動施加殘忍的鎮壓，而廣為人知。

⑤ 採取換算新台幣政策時，其發行額已達到五千二百七十億元。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底爲止，物價的上升率爲六五五倍。戰前的三萬圓到了這個時候，只能買到一盒香煙。惡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台灣民眾淪爲赤貧。

此外，由於講求裙帶關係，台灣大多數知識份子得不著職業，失業者充塞於街頭巷尾，感覺前途毫無光明，自殺者激增。司法制度的紊亂使得法的尊嚴和正義蕩然無存，在台灣絕跡許久的天花、霍亂、鼠疫的流行使台灣返回到瘴癘的洪荒世界；一九四七年天花的發生件數爲四千九百九十三件，其五個月間的死亡率達到八三％。

戰後的台灣，正如坊間流行的俚謠所唱的一樣：「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警察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這些複雜的政治、經濟等諸因素，終於導致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公賣局的查緝員毆打賣私煙的林江邁爲起因，而發展到全省性的暴動，一發不可收拾⑥。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⑤ 陳誠（一八九八—一九六五）。國民黨政權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時辭退了陳儀，同時廢止長官公署，設立「台灣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爲台灣省主席。一九四八年末，國民黨在中國和共產黨的內戰轉爲不利的形勢，進行準備轉移來台，十二月任命蔣介石的心腹陳誠爲台灣省政府主席。

⑥ 二二八事件。如同本文所述，因爲取締黑市香菸引起，而擴散到台灣全土的暴動。專賣局取締人員不但將販賣香煙的林江邁的香煙和所持現金都沒收，還用槍毆打林。看見這個情形的群眾也攻擊起取締人員，取締人員一邊開槍一邊逃走了。這時候，有一個市民中彈身亡。隔天，群眾前往長官公署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治改革，公署從屋頂朝民眾開槍掃射，出現數十名的死傷者。事件一下子擴大，不只是台北，甚至波及到全台灣，台灣人爆發了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襲擊官廳和外省人。最初，長官公署採取的是讓步的態度，之後三月八日從中國來的支援部隊到達以

使台灣文學遭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大浩劫。

台灣光復後，戰爭留下的許多後遺症，使得美麗島已沒有往昔的光彩；豐饒的肥沃大地已荒蕪，遭受轟炸的城市頹垣殘牆處處，幾乎變成瓦礫堆。然而，台灣民眾並沒有屈服，爲了實現自由、民主的烏托邦的夢，他們孜孜不倦地工作，立志建設台灣爲人間樂園，充分發揮了「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祖先傳下的傳統精神。（譯者按：典出《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

然而，戰後社會統治機構的劇烈蛻變，生產體系的萎縮和退化，道德價值系統的徹底崩潰，文化的衰落，各種意識形態的混亂，使台灣變成物質和精神皆荒蕪的局面。雖然在這樣令人沮喪的日子裡，廣大的農民仍然照顧著他們的田園，少數工廠仍然艱苦地開工生產，全省各地的各級學校仍誦讀不輟。然而，日據時代的殖民地體制逐漸在解體，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舊社會的瓦解中，似乎隱藏著嶄新的種子，這新社會的種籽正在萌芽，突破堅硬的土地，準備開起鮮艷的花朵出來。

在這一群勤奮的子民中，特別顯得精神抖擻的，是一向代表無數民眾跟殖民者展開不屈不撓底鬥爭的知識份子；尤其是曾經參加過新文學運動，反映民生疾苦的一群作家。他們從

後，一下子轉爲鎮壓，殘殺了很多台灣人。犧牲人數雖然不明確，但是推測有一萬八千人到兩萬八千人左右。跟這次二二八事件有關的事情，長期以來都被當作禁忌，一九八七年戒嚴令解除以後，終於可以開始公開地查證了。一九八九年時公開放映的電影《悲情城市》就是描寫二二八事件。葉石濤執筆寫本書時，仍然無法觸碰到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戰爭的激變下復甦，亟欲繼續完成他們的未完事業——建立富於台灣色彩的台灣文學以躋入世界文學之林。因此各種形態的刊物如雨後春筍不斷刊行，傳授給一般民眾有關大陸的知識；從歷史到民俗，從政治結構到民權初步，從大陸自然景觀到生活掌故，一應俱全。特別積極推動學習中文，使台灣民眾能迅速地吸收來自大陸的各種訊息。

然而他們血淚交併的努力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社會狀況的繼續惡化，與省外同胞之間的裂痕未能彌補，民生困苦，終於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的一場狂飆徹底摧毀了復甦的幼芽，大地復歸一片黑暗。這種情形大約維持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直到光復後第一代作家鍾理和、鍾肇政、廖清秀、文心、施翠峰等人重新起步，才露出一線曙光出來。

那麼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台灣光復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在這大約四年之間，台灣有沒有文學存在？是不是一片空白？^⑦

光復不久，一向參加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的作家楊逵，就開始做一連串的出版工作。他的活動大約分作兩個方向；其一是傳授台灣民眾有關大陸的各種知識，包括語文教育也在內。因此，他刊行《一陽周報》^⑧等雜誌，以便溝通省外民眾與台灣民眾的意志。同時他也

^⑦ 戰後初期文學空白期。關於這個時期的文學狀況，王詩琅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的和平日報「社論」中有以下的敘述。「處在這個國土復原的時代之劇烈轉換期，文學方面也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兩年來，日文作家喪失表現的途徑，而中文作家則因為停筆多年，提不起勁，於是這個時期成了空白。」（《王詩琅全集第九冊》）。參照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三九頁。

^⑧ 《一陽周報》。楊逵在戰後初期編輯了以下的雜誌。《一陽周報》共九期，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月。《文化交流》共一期，一九四七年一月，與王思翔，筆名張禹共同編輯的。《臺灣文學》叢刊共三期，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月。詳細記載在下村作次郎的《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從文學讀台灣》）。《文化交流》已有複刻版。

出版中、日文並刊的魯迅小說《阿Q正傳》⁹。第二個方向是承繼台灣新文學之香火，繼續建立台灣文學。他刊行文學雜誌《臺灣文學叢刊》三期，由於經費短絀而停刊。此外，又擔任力行報副刊¹⁰編務。一九四九年楊逵因為簽名於呼籲和平的文件而被判刑十二年¹¹。一九七七年六月美國國會所舉行的有關台灣人權的公證會上，證人之一的紐約大學教授西莫亞（James D Ceymour）針對楊逵有下面的一段話：「像楊逵這人在日據時代共繫獄十次，但加起來刑期卻未滿一年。」

⁹ 中日文對照《阿Q正傳》。當時，為了當作中文學習用，出版了十多種中日對譯本。其中也採用魯迅的許多作品，出版了以下的著作。楊逵譯《阿Q正傳》，一九四七年一月，東華書局。王禹農譯《狂人日記》，一九四七年一月，標準國語通信學會。藍明谷譯《故鄉》，一九四七年八月，現代文學研究會。王禹農譯《孔乙己·頭髮的故事》，一九四八年一月，東方出版社。王禹農譯《藥》，一九四八年一月，東方出版社。魯迅以外的有以下的著作。茅盾著、楊逵譯《大鼻子的故事》，一九四七年八月，東華書局。楊逵著《送報伕》，一九四六年七月，台灣評論社。胡風譯《送報伕》，一九四七年十月東華書局。參照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台灣文壇與魯迅》、黃英哲《在台灣文化中的「中國化」與「世界化」的相克——以魯迅思想之傳播為中心》（《台灣新文學與魯迅》）。

¹⁰ 力行報副刊。一九四六年，楊逵擔任台中和平日報副刊「新文學」的編輯，一九四八年時，力行報委託他擔任副刊「新文藝」的編輯。參照《楊逵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楊逵的文學生涯》）。

¹¹ 楊逵入獄十二年。編輯力行報副刊的時候，力行報、新生報、和平日報等從中國渡海來台的編輯和楊逵有了親密的往來。編輯期望緩和二二八事件以後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產生的決定性對立關係，想要起草《和平宣言》一文，而委託楊逵。楊逵印刷了二〇份草稿，發給計畫者，委託他們修正。偶然，採訪過新生報編輯歌雷的上海大公報記者得知這個消息，而將之登載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之上海大公報上。剛好被當時經過上海的台灣省新主席陳誠看到，而被畫上共產黨份子的標記。於同年四月六日被逮捕，之後入獄十二年。參照王麗華《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楊逵的文學生涯》）二九二頁。

除楊逵之外，光復後繼續發揮影響力的有吳濁流。吳濁流除在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和《新新》雜誌登過文章之外，還刊行了探討台灣人命運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一九四六年）的日文版和中文版¹²。《亞細亞的孤兒》，在一九五九年由楊召愨所譯，改名為《孤帆》（譯者按：高雄，黃河出版社。）重新刊行一次。

雖然在此時期沒有發表過作品，但繼續摸索創作之路，終於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巨大足跡的是鍾理和。鍾理和在大陸北平逗留期間曾出版過短篇小說集《夾竹桃》（一九四五年四月，北平·馬德增書店）。

除去文學創作活動之外，在光復不久的台灣，最能與民眾溝通感情的，是以台灣話演出的話劇活動。一九四六年六月和七月，由劇作家簡國賢和演員宋非我等人組織的「聖烽演劇會」上演〈壁〉和〈羅漢赴會〉¹³。〈壁〉描寫光復後混亂的社會狀況，猛烈地諷刺陳儀的

¹² 《亞細亞的孤兒》。《亞細亞的孤兒》的原題目《胡志明》。從一九四六年起，以《胡志明》為標題，分成四篇出版。

¹³ 「聖烽演劇會」《壁》上演。聖烽戲劇研究會是由戰前的幾個劇團組織結合成立的。會長是宋非我、副會長是江金章、顧問代表是王井泉和張文環、文藝部代表是簡國賢。從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到十三日為止演出該會的第一次作品，是簡國賢原著，宋非我編譯的《壁》一幕，和宋非我編譯的《羅漢赴會》三幕。《壁》的舞台，由中央隔開，一方住著失業的勞工許乞食一家，一方住著買米囤積居奇的缺德商人錢金利一家。劇中以對照豪華奢侈的錢家生活和衣食諸事欠缺的許家的窮困生活的方式來進行。最後，許家的孩子因為偷竊錢家的雞飼料來吃被抓到，而被強迫搬家，許乞食一家集體自殺了。雖然《壁》廣獲好評，卻被警察禁止再次演出。《壁》的原作者簡國賢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隱藏行蹤，卻在一九五三年時被當作政治犯逮捕，處決。宋非我逃到中國去了。參照藍博洲的〈尋找劇作家簡國賢〉（《幌馬車之歌》）。

惡政，表現民生困苦的現實層面，絕望而黑暗。同時台南的王育德和黃昆彬等人，演出〈新生之朝〉、〈偷走兵〉和〈青年之路〉，批判陳儀的苛政猛於虎，諷刺了台灣人過度的解放感（註1）¹⁴。

跟大陸分離達五十一年之久的台灣，難免對大陸的近代文化有疏離感和隔膜。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大約兩年多的時間，大陸三〇年代的著名作品陸續地輸入台灣，而且大陸的一部分進步的文化人士也來到台灣做事，任教職或觀光。因此，在民生極端困苦的狀況下，仍有許多台灣知識份子重新吸收了大陸近代文學的精華；從魯迅、茅盾、巴金到《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等古典白話小說到中共的政論雜誌《群眾》和《文萃》等，一應俱全。大陸文學的輸入，給台灣知識份子帶來一把解決問題的鑰匙，深刻地認知了大陸近代社會的變遷狀況。此外，在上海的蘇俄新聞處，也大量把蘇聯文學的經典之作送來台灣，使台灣知識份子明白了蘇聯文學發展的大概輪廓。特別是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或高爾基的《母親》等鉅作，給台灣新一代作家帶來深度的沉思。

在這光復初期四年中，有許多刊物和作品存在；可惜四十多年來注重物質發展忽略精神

¹⁴ 王育德、黃昆彬〈新生之朝〉、〈偷走兵〉。王育德，一九二四年出生於台南。從台南第一中學校到台北高等學校，而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系。戰後任教於台南一中。一九四五年秋天，接受學生的委託，寫了腳本〈新生之朝〉、〈偷走兵〉，甚至參與製作過程以及親自演出。此劇也頗獲好評。一九四六年秋天，演出了自作劇〈幻影〉以及黃昆彬的〈鄉愁〉。參照王莫愁（王育德的筆名）〈透過戲劇〉（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華日報）。王育德之兄王育霖在二二八事件時犧牲了，王育德從香港逃亡到日本，在日本展開台灣獨立運動。於一九八五年逝世。

建設的結果，這些刊物和作品大多埋葬於歷史的墳墓裡，很少能找到完整的資料。其中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較能完整地傳下那時代文學活動的訊息，使我們明白，光復後還無法以中文寫作的台灣知識份子以日文發抒自己情感的作品¹⁵。

中華日報創刊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當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認為台灣甫告光復，亟需有一份黨營的地方性報紙以宣傳政策，剖析時事，所以在台南創刊。其原始發行人為梁寒操，首任社長為盧冠群。由於政策性需要，特地留下日文版，以便讓光復不久不諳中文的台灣民眾能夠獲悉一些中國內外的訊息。從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開始在日文版下面開闢一版園地，刊登文學性作品。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光復一周年前夕廢刊，共維持了七個多月。主編為日據時代頗負聲名的作家龍瑛宗。在這四十期的文藝欄裡所刊登的作品有論說、書評、文藝評論、小說、現代詩、隨筆等。發表作品的除龍瑛宗、吳濁流、吳瀛濤、王碧蕉、詹冰、賴傳鑑以外，還有王育德、葉石濤、黃昆彬、邱媽寅等人。此外也有一部分日本人的作品。王育德所寫的論評銳利而擊中要害，批判孔教和封建制度的相關關係頗有見地¹⁶。黃昆彬、邱媽寅皆是新進的小說家，短篇小說的技巧上，都有獨特的觀點¹⁷。主編龍瑛

¹⁵ 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根據原注所引用的，林瑞明的論文〈讓他們出土〉，一九八三年時，以台灣高雄為據點的文藝雜誌《文學界》的同仁，為了調查戰後初期的文學狀況，仰賴葉石濤氏的指示，調查了中華日報日文版和新生報副刊「橋」。葉石濤氏發表了〈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光復初期的台灣日本文學〉、〈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重要日文作品資料〉等成果，甚至，將王莫愁（王育德）、吳濁流、龍瑛宗等的日文作品翻譯成中文。全部都收錄在一九八四年二月的《文學界》。

宗一面寫世界文學名著的評介，一面以犀利的筆調，剖析大陸和台灣文化交流的現實狀況，對大陸知識份子的歷史性不幸遭遇有甚多感慨¹⁶。

¹⁶ 王育德之評論。王育德是主要的執筆者之一，葉石濤找到的是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二日刊登的〈孔教的再認識（上）、（下）〉。其他還有以下的文章。三月二十一日〈台灣戲劇的確立——閃耀榮光的荊棘之路〉（評論）、五月九日〈春天的玩笑〉（小說）、八月二十三日〈徬徨的台灣文學〉（評論）、九月五日〈爲了內省與前進——台灣人的三大缺點〉（評論）、九月二十三日〈關於相親結婚〉（隨筆）、十月二十一日〈透過戲劇〉（隨筆）。〈徬徨的台灣文學〉，對台灣在文學方面提出疑問，爲何「擁有他處少見稀有的豐富土壤」，人們也對文學「抱持著熱情」，卻產生不出「優秀的作品」呢？其原因在語言的轉換和言論的自由問題上找到。王說「台灣文學受到詛咒」，敏銳地指出一直以來纏繞著台灣文學的問題。

¹⁷ 黃昆彬、邱媽寅。黃昆彬刊載了三月二十一日的〈愚人愚想〉（隨筆）、四月十三日、十九日的〈祈禱（上）、（下）〉（小說），六月十九日〈李太太的嘆息〉（小說）。邱媽寅有五月十三日的〈天然痘〉（小說），六月三十日的〈戲劇時評（壁）〉。黃昆彬在當時是台北師範學院的學生，根據葉石濤的說法，他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兩次入獄。邱媽寅自早稻田大學和台灣大學畢業，入獄十年。參照《文學界》第九集。

¹⁸ 龍瑛宗。龍瑛宗在中華日報日文欄發表了以下的文章。三月十五日〈個人主義的終結——老舍的《駱駝祥子》〉（評論），四月二十三日〈燃燒的女人〉（小說），六月二十二日〈擁護文化吧——祝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評論），八月二十九日〈血和淚的歷史——楊逵氏的《送報快》〉（評論），九月二十八日〈傳統的潛在能力——吳濁流氏的《胡志明》〉（評論），十月十三日〈哀鬼〉（小說），十月十七日〈心情告白〉（詩），十月二十日〈貞操問答〉（隨筆），十月二十三日〈關於日本文化——從今以後的心理準備〉（評論）。其他署名「R」的〈名作巡禮〉和〈知性之窗〉專欄中，像是每期都寫一些世界文學名著的介紹以及時事隨筆。看看這些文章，就可以察知龍瑛宗的基本態度。一個就是他對知性、理性的看法和想法的重視，另一個就是和中國文化的協調。例如，關於吳濁流的《胡志明》，他說「雖然說是用日語來表現，不過這篇小說，不論是小說的構成、進行速度、還是味道，都毫無疑問的是引用中國文學的傳統」，主張著「我們在作文學的時候，必須以承接西歐文學與近代中國文學的遺產來作爲出發點不可。」

一九四六年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廢刊之後，所有全省的報紙副刊都變成清一色的中文了¹⁹。日文作家大多數放棄文學創作的路，不得不結束了作家的生涯。四〇年代未能產生新銳作家，反而許多剛出頭的作家放棄創作生涯，這構成了戰前新文學運動和戰後台灣現代文學之間的斷層和鴻溝，所有日據時代新文學的遺產，似乎都快要埋入歷史的墳墓裡去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省政府所屬的新生報²⁰特闢「文藝」副刊，由何欣主編。何欣為一卓越的英、美文學的研究者，之後，他陸續有《索爾·貝婁研究》（一九七六）、《從大學生到草地人》（一九七六）、《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一九七九）等論著出版。站在英、美文學思潮來闡釋台灣作家的創作方向和作品，向有中肯的批評。因此何欣所強調的是「文學不能『關閉自守』」²¹，世界文學是彼此相互影響的……因此，介紹世界文學也將成為我們重要的責任之一」（註2）。然而，「文藝」只維持十三期，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

¹⁹ 日文的廢除。長官公署在就職一週年紀念日的十月二十五日時決定廢除日文。從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時候起，台灣人針對經濟狀況的惡化、官吏腐敗、貪污的批判變得表面化，台灣人與外省人對立的徵兆也開始萌芽，這個決策在另一方面也有抑止這種情況的作用。把日語當成日常用語的台灣知識份子，大部分都反對廢除日語，不過長官公署不顧一切反對地作了決定。參照吳濁流的〈針對日語廢除的管見〉，張G·S〈本省人與日語〉（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新新》第七期）。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日文版最終號中作成「永別了日文版——致同志們分別的花束」之特集，刊載了以下的報導。龍瑛宗〈台灣會變成什麼〉、趙天麟〈傾聽神的聲音〉、陳金生〈直到國語熟練的那一天〉、陳輝瑜〈永別了日文版〉、陳雲鵬〈在日文版終結之際〉、孫林茂〈鼓足幹勁學習國文〉、孫土池〈擱下離別之筆〉。

²⁰ 新生報。台灣省政府的機構雜誌。第一代的社長是李萬居。是承接台灣總督府的機構雜誌《臺灣新報》而來的，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的同时創刊。

²¹ 新生報副刊。編者〈迎文藝節〉（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新生報副刊「文藝」第一期）。

日停刊²²。

「橋」副刊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創刊，維持了二十個月之久，共出刊二百二十三期，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突然廢刊²³。主編的歌雷（史習枚），是一個醉心於「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工作者，胸襟廣大，很快地找到以楊逵為主的台灣先輩作家²⁴。在「橋」副刊上，省外作家和省籍作家共同合作，展開了光復以後最熱烈而有意義的「台灣文學」應走路線的論爭²⁵。參加論爭的作家之一的駱駝英²⁶，希望台灣文學走向新現實主義的寫作形式，也就是揚風所說的「現實主義的大眾文學」。駱駝英解釋新現實主義而說道：「新現實主義是立腳

²² 新生報「文藝」停刊。根據七月三十日「文藝」第十三期的「編後記」，何欣表明辭任編輯之意。

²³ 新生報副刊「橋」之停刊。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在中國和共產黨的內戰失敗，一旦成了定局，於一月時認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正式開始清共。被貼上黑名單標籤的台灣大學和台北師範學院，在一九四九年清晨突然被逮捕了大約兩千名的學生，被稱為四六事件。此事件之後，共產黨的活動完全地潛到地下去了。隔年五月宣布戒嚴令，制定了「懲治叛亂條例」（叛亂罪處罰條例）以及開始了所謂的白色恐怖時代。四六事件的被逮捕者之中也包含了「橋」的主編歌雷，執筆者孫達人。「橋」的突然停刊就是這個事件的緣故。楊逵也在這個事件之中被逮捕，入獄受刑十二年。

²⁴ 歌雷。江西省出身，本名史習枚，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四六事件時被逮捕以後，停止了文學活動。一九九四年去世。林曙光（感念奇緣弔歌雷）（一九九四年七月《文學台灣》第十一期），孫達人（「橋」和它的同伴們）（《噤啞的論爭》）當中記載著當時活動的一部分。林曙光是當時台北師範學院的學生，由於他會中文而受到歌雷的委託，接受口譯和翻譯的工作。孫達人敘述道，歌雷身為一名非常優秀的編輯者，積極地欲刊登台灣人的文章。

²⁵ 在「橋」副刊上環繞著「台灣文學」的論爭。關於這個論戰，有以下的研究。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一九八四年五月《文學界》第十集，《台灣文學探索》收錄），（「橋」副刊始末）（一九九七年五月《台灣史料研究》第九號，《驅除迷霧、找回祖靈》收錄）。葉石濤（接續祖國臍帶之後——從四〇年代台

灣文學來看「中國意識」和「台灣意識」的消長》（《走向台灣文學》收錄）。參考以上的論文，列舉出在這個論戰中主要的論文。

以下刊登在新生報副刊「文藝」

- 沈明 展開台灣文藝運動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四期
- 江默流 造成文藝空氣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期
- 沈明 我們要這樣的新文藝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九期
- 王錦江 台灣新文學運動史料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九期
- 毓文 要打破緘默談文運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期
- 以下刊登在新生報副刊「橋」
- 稚真 論純文藝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 第三十八期
- 歐陽明 台灣新文學的建設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 第四十期
- 揚風 請走出「象牙塔」來——評稚真君的〈論純文藝〉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 第四十期
- 揚風 評「再論純文藝」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四十八期
- 揚風 新時代、新課題——台灣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九十五期
- 楊達 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九十六期
- 楊達 橋的路（第一次作者茶會總報告） 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 第一〇〇期
- 楊達、吳濁流、林曙光、吳坤煌、吳瀛濤、歌雷、陳大禹、孫達人、馬諄 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 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九日 第一〇〇、一〇一期
- 林曙光 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 第一〇二期
- 葉石濤 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第一〇四期
- 朱實 本省作家的努力與希望——新文學運動在台灣的意義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〇五期
- 彭明敏 建設台灣新文學：再認識台灣社會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 第一一二期
- 彭明敏 我的闡明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 第一一五期
- 揚風 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一一七期

- 胡紹鍾 建設新台灣文學之路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一七期
- 田 兵 台灣新文學的意義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二一八期
- 陳大禹 「台灣文學」解題——敬致錢歌川先生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二七期
- 瀨南人（林曙光） 評錢歌川、陳大禹對台灣新文學運動意見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三〇期
- 駱駝英 論「台灣文學」諸論爭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四日、六日 第一四六—一四九期
- 何無感 致陳百感先生一封信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一五七期
- 籟 亮 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第二〇〇期
- 吳阿文 略論台灣新文學建設問題 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 第二一九期

如同彭瑞金所述，這個論戰實際上要追溯到「橋」創刊以前。首先，沈明在新生報副刊「文藝」刊登了〈展開台灣文藝運動〉。受到這個影響，江默流在〈造成文藝空氣〉上有以下的發言。

近來在台灣有想要提出新文藝運動主張的人，這是一件好事。只是，不可忘記本省的狀況是有些許特殊的。受到五十多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使台灣斷絕了與祖國的關係，在文化交流上產生障礙。從我國在「五四」時代掀起的新文藝運動以來二十餘年，收到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台灣沒有機會接受這個運動的影響。因此，這裡仍然還是「文藝的處女地」。

台灣人作家王錦江（王詩琅）、毓文（廖漢臣）針對這個對戰前的台灣文學狀況毫無了解的發言提出反論，王認為在台灣「有珍貴的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有很多值得被記憶的作品」，毓文則針對江默流的「對於本省讀者的評價過低」，說道，台灣人「對文藝抱持著強烈的興趣」。在「橋」的論爭當中也是，應當如何評價過去的台灣文學，成為重要的爭論點。

然而，跟這個論戰有關係的論文，幾乎都被網羅收錄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當中。近年有丸川哲史論述這個論戰。〈一九四八年前後的台灣文學運動相關之論爭和脫殖民地化的問題——以「新生報『橋』副刊」為中心〉（《日本台灣學會報》二〇〇〇年四月第二號）。

26 駱駝英。別名羅鐵鷹，本名羅樹藩，一九一七年出生於雲南省。在上海私立大同大學求學。當一九三七年日中戰爭一爆發，就返回了雲南。四〇年代時和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的文化人開始交往。一九四七年躲避國民黨的大檢舉，逃離至香港，因為雷石榆的關係而渡海到台灣，任教於台北建國中學。四六事件時逃到上海。一九八五年死於昆明。許南村（陳映真）詳盡地寫了他的傳記〈「兵士」駱駝英的腳蹤〉（《噤聲的論爭》）。

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上，且站在與歷史發展的方面相一致的階級的立場上的藝術思想和表現方法。」一般說來，省外作家都肯定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性價值，認為它是屬於大陸的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中的一個反日民族解放運動。楊逵對這些省外作家的主張有滿腔的喜悅，這種主張跟他的文學觀十分吻合，他說：作家應「到人民中間去，對現實多一點的考察，與人民多一點的接觸」，「本省與外省作家，應當加強聯繫與合作。」

在建設台灣文學的第一階段裡，排除「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建立根據於民族與科學的文學，肯定台灣新文學運動是與大陸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方向相同，有其歷史性的價值存在。

然而，省外作家大多認為台灣文學不宜過分強調地方特殊性。歌雷說：「關於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問題，並不是我們要強調台灣文學的地域性，與地域性的獨特保持，而是說我們一定要通過今日台灣文學的特殊因素而使之發展，正如我們所能看到的國內文壇中所提的『邊疆文學』一樣，是藉著地域性的不同，來反映現實性的真實與民間形式的應用。」然而，省籍作家卻持不同的意見，楊逵、林曙光、瀨南人等強調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與成就，希望台灣文學紮根於台灣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學。

這些省外作家與省籍作家中的歧見並沒有經過這一次論爭而獲得釐清，而這種見解的對立猶如甩不掉的包袱，在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性每一個階段裡猶如不死鳥（phoenix）再次出現，爭論不休。在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裡，歷史又重演，到了八〇年代更有深度的激化。然而，台灣文學本具有承繼傳統文化而來的性格，以及在三百多年來的跟異民族抗爭的

血跡斑斑的歷史裡養成的堅強本土性格，這兩種傾向被統合共存於台灣文學裡，使得台灣文學呈現複雜的面貌，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由於大多數台灣作家都不諳中文，「橋」副刊主編就不得不請人翻譯日文作品以便刊登。林曙光和潛生（龔書森）的貢獻最大。林曙光本是一個歷史研究者，後來對故鄉高雄地方史的研究有獨特的成就²⁷；潛生後成爲台南神學院教授。依據林瑞明的研究，「橋」副刊所刊出的省籍作家的小說有〈苦瓜〉（蔡德本）、〈美子與豬〉（黃昆彬）、〈叛徒〉（邱媽寅）、〈高銘戟〉（業瑞榕）、〈女扒手〉（王溪清）、〈拾煤屑的小孩〉（謝哲智）、〈三月的媽祖〉（葉石濤）較突出。〈苦瓜〉的作者²⁸是朴子人，時爲師院英語系學生，這篇小說由林曙光翻譯。描寫兒子戰死於南洋，媳婦逃回娘家而被遺棄的一個孤苦伶仃的老阿婆，去偷摘苦瓜被毒打的故事，頗能反映光復當初，省民困苦的生活狀況。〈美子與豬〉則描寫嫁給台灣人的日本女性，戰後備受折磨的情形。作者黃昆彬，一九二五年生於台南市，現爲律師。在「橋」副刊上另外有一篇小說叫〈雨傘〉，則描寫太平洋戰爭中，欲到日本留學的學生所搭乘的輪船被美國潛艇所擊沉的故事。黃昆彬在中華日報日本文藝欄也發表過日文小說多篇。作品由潛生譯作中文。〈叛徒〉作者邱媽寅，一九二五年生於台南市，現從

²⁷ 林曙光的地方史研究。有《打狗搜神記》、《打狗瑣談》、《打狗探風錄》（春暉出版）等鄉土史研究。「打狗」是日治時期定名爲高雄以前的舊稱。

²⁸ 蔡德本。使用日語發表了自傳性的小說《台灣のいもつ子》（一九九四年九月，集英社）。（彭萱按：漢文版書名《蕃薯仔哀歌》）

商。作品由潛生所翻譯。這篇小說描寫台灣人莫可奈何的「原罪」，表現的主題與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有異曲同工之妙。邱媽寅也在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發表過小說。〈高銘戟〉這一篇小說，由當時在省立台南一中就讀的葉瑞榕以中文寫作的。他描寫日本留學歸來的台灣知識份子，在光復後面對的挫折。〈女扒手〉作者王溪清，由潛生中譯。這篇小說透過女扒手的身世，描寫光復後台灣民眾荒蕪的精神面貌。王溪清一九二三年生於台南，省立台南一中畢業，擅長於柔道，後成為台南體育場場長。〈拾煤屑的小孩〉係謝哲智的作品，由潛生中譯。描寫光復後一群窮苦人家的孩子偷煤的故事；連帶地刻畫出黯淡絕望的光復後社會景觀。謝哲智係嘉義人，省立台南一中畢業，在台南監獄當看守。〈三月的媽祖〉，由葉石濤所寫，後經陳顯庭譯作中文。這是描寫二二八事變的作品（註3）²⁹。

一般來說，「橋」副刊上出現的台灣作家的評論和小說，都是傾向批判性濃厚的寫實主義作品，藉用省外作家的話而言，是屬於所謂「新現實主義」的作品吧？他們共同的特色是台灣人意識很強，翔實地反映了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悲慘狀況，有一股抗議和控訴的激情隱藏在字句之間。可惜，這一群優秀的作家，後來有些人被捕坐牢，有些人逃離台灣埋骨於異鄉，有些人噤若寒蟬憂苦度日，由於傳統的中斷，使得他們愛與死的故事埋葬於歷史的墳墓裡。

²⁹ 〈三月的媽祖〉。林瑞明將〈三月的媽祖〉當作「在用藝術性手法表現的文學上，第一次切入二二八事件」，從作品風格來看則是當作「『橋』的代表作」（〈讓他們出土〉）。這裡所舉出的作品都曾經在《文學界》一九八四年五月第十集重刊。

一九四九年九月，公論報³⁰出刊了一個純粹的文藝性周刊「文藝」，由何欣主編。內容偏重於文藝理論的介紹，世界名作家的批評，尤注重英國、美國二十世紀文學作品與作家的介紹。其最大的特點，為盡量介紹省籍作家的作品，如葉石濤、施翠峰等的作品，不但內容充實，而文字運用的技巧也達到相當的水準，給「文藝」撰稿者，另外有李辰冬、陳紀澄、陳祖文、聿均、何欣等人（註4）。公論報的「文藝」周刊廢刊之後，改為副刊「日月潭」，可惜，失去原有的風味了。

在這一時期的文藝團體，只有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成立的「台灣文藝社」。由林紫貴主持，曾出版過一期《台灣文藝》。當時的文藝活動，只限於國語文的推行和國語教育的加強，所以「台灣文藝社」未能領導展開一個轟轟烈烈的真正的文藝運動。

除這些報紙副刊之外，前仆後繼地有很多刊物出現，但大多數是屬於官方和黨方的政治宣傳性的刊物。唯一由台灣民間人士所創辦的雜誌為《新新》。《新新》創刊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由新竹地方人士黃金穗³¹主編，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停刊，共刊行了八期，其中四、五兩期是合併號。《新新》是一本中、日文並刊的綜合性雜誌。正如其卷頭言所說一

³⁰ 公論報。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創刊。新生報的社長李萬居，隨著二二八事件以後長官公署的改組，被排斥成有名無實權的掛名理事，實際上是自己出資所設立的純民間報紙。

³¹ 黃金穗（一九一五—一九六七）。出生於新竹。從台北高校進入京都大學就讀，跟在田邊身邊學習哲學，一九四一年畢業以後任職於岩波書店。回到台灣以後擔任新竹中學教師。業餘時間在國語補習班學習中文，卻和一些在補習班認識的對文化的學習很熱衷、志同道合的同伴，計畫出版綜合性的文化雜誌。黃金穗之後受聘到延平大學去教授數學。

樣，這本雜誌注重內容，以具體的事物代替抽象的描寫，不但能供給民眾視覺上的娛樂，同時希望能提高文化的品質³²。然而更動人的話可能是下面一段：「使用他國的語文去閱讀及發表意見，非常可悲！希望雜誌全都採用國文發行的日子，盡快到來。」光復時的台灣文化人深明大義，使用日本語文去抒發意見，總是令他們覺得羞恥。這本雜誌幾乎網盡了當時著名的台灣文化人，不過以居住北部地方的作家詩人為主，如詩人周伯陽、作家江肖梅、龍瑛宗、吳濁流、呂赫若，詩人吳瀛濤、王白淵等人。龍瑛宗的小說〈從汕頭來的人〉（譯者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創刊號），描寫熱愛祖國的青年周福山未能目睹光復來臨，重新回歸祖國懷抱的台灣而患惡性瘧疾死亡的故事。呂赫若用中文寫的小說〈月光光——光復以前〉，是以戰爭時期皇民化如火如荼地推動時，爲了租個棲身的房子，一家人不得不說日本話充當皇民的苦境，頗能反映戰前台灣人被壓迫的情況。《新新》在第七期裡刊登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在台北山水亭舉辦的「談台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的全文紀錄。主席爲蘇新，參加者爲當時台灣知識份子的佼佼者；如王白淵（新生報翻譯主任）、黃得時（台灣大學教授）、張冬芳（台灣大學教授）、李石樵（畫家）、王井泉（人民導報社發行人）、劉春木

³²《新新》。《新新》的特色在於重視娛樂性。採用了版畫、插畫、諷刺漫畫、娛樂性讀物等。創刊號的「序言」中有以下的敘述。「娛樂當中也有欺騙嗎？當然在帝國主義支配下是有過的。明明一點也不想笑，卻不得不作出在笑的样子。直到現在爲止的娛樂雜誌都只有扭曲的笑容。明明就是沒內容卻還要強迫感動。我等的雜誌想要反對這種現象。內容要豐富，要打從心底讓人感動。取代抽象，以具體的、盡可能以視覺性的東西來娛樂讀者，且想要在教化上費心思。實際上是想要以高文化之姿廣泛地傳播給大眾。」再者，雜誌《新新》有出復刻版。

(大明報記者)、林博秋(劇作家)、張美惠(台灣大學研究室)等。蘇新說³³：「過去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文化史是漢民族文化與日本文化的抗爭史」，《福爾摩沙》，比台灣的民族主義具備了更廣泛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且比台灣的民族主義更進一步地，主張民族運動可由階級問題予以解決。因而未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人的彈壓。」王白淵說：「要推進到民主主義文化的方向。文化的方向是以政治為先決問題。」黃得時則說：「對於還沒有中國化的文化，我們要努力使之以符合中國文化。」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游彌堅、許乃昌、陳紹馨、林呈祿、黃啓瑞、林獻堂、林茂生、羅萬俤、楊雲萍、陳逸松、蘇新、李萬居等人成立了「台灣文化協進會」³⁴。其創立的

³³《新新》座談會「談台灣文化的前途」。葉石濤氏認為是蘇新的發言，其實是看錯了，全部都是王白淵的談話。這個座談會是由蘇新擔任司儀，而由王白淵和黃得時主持座談會。首先，在「台灣文化的過去」這一項，王白淵認為「過去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文化史也就等於是漢民族文化與日本文化的抗爭史」，其「第一階段」就是「白話文運動」，接下來的階段則是「根據日語而來的反帝國主義文化」。王白淵根據從他成為雜誌《福爾摩沙》的同仁時起的事情，到自己在第二次階段的文化運動的體驗，引述：「台灣文化應當前進的途徑」項目中，說道，現在如同引述文中的意見，應該朝向「民主主義文化的方向」前進。黃得時在「台灣文化應該要有的方向」項目中指出，即使「過去的台灣文化受到日本式文化的影響」，也「達到了世界水準」，以及「台灣的文化之現狀」，「尚未中國化」這兩點，以「如何推動世界化與中國化兩個方面同時進行」作為課題，發表了如同引用中的意見。這次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九點在台北的山水亭所舉行的座談會，看到一些在戰前的日本殖民地地下透過日語學習到知性與教養的知識份子們，如何致力於戰後的「中國化」，以及其反抗的樣子，是非常貴重的資料。

³⁴「台灣文化協進會」。台灣文化協進會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在台北的中山堂舉行成立大會(《本會的記錄》《台灣文化》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創刊號)。葉石濤氏所以為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應該是錯誤的。組織如下：理事長：游彌堅(台北市市長)。常務理事：吳克剛(省立圖書館館長)、陳兼善(省博物館長)、林呈祿

目的，是由於五十一年代的隔離造成大陸和台灣之間語言和文化的隔閡，產生溝通上的困難，故必須剷除日本所留下來的遺毒，建設民主的台灣新文化和科學的新台灣（註5）。這個會除發行月刊雜誌《台灣文化》外，還出版許壽裳的《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台灣文化》的作者，除日據時代新文學作家吳新榮、楊守愚、呂訴上、洪炎秋、劉捷、呂赫若、廖漢臣、黃得時之外，還有省外作家，魯迅的好朋友許壽裳、臺靜農、袁珂、李何林、李霽野、黃榮燦、黎烈文、雷石榆等也參加寫稿。於是正如一九四七年楊逵等人創刊的《文化交流》的主張一樣，台灣與大陸知識份子真正合作，共同為新的台灣文化的建設而努力。可惜，後來許壽裳被暗殺，《台灣文化》由陳奇祿接編，往昔的氣象已成陳蹟（註6）³⁵。

（東方出版社社長）、黃啓瑞（台北市教育局長）。理事：林獻堂（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林茂生（同前）、羅萬俤（同前）、范壽康（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劉客明（省教育會監事）、林紫貴（國民黨台灣省執行委員兼宣傳處長）、邵冲霄（長官公署參議）、楊雲萍（同前）、陳逸松（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陳紹馨（台灣大學教授）、徐春卿（台北市參議會參議員）、林忠（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連震東（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許乃昌、王白淵、蘇新。常務監事：李萬居（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黃純青（同前）、蘇維梁（同前）。監事：劉明朝（國民大會代表）、周延壽（台北市參議會議長）、吳春霖（台北市參議會參議員）、謝娥（國民大會代表）。

在這當中實際擔當活動實務的是許乃昌（總幹事）、王白淵（教育兼服務組主任）、蘇新（宣傳組主任）、陳紹馨（研究組主任）、楊雲萍（編輯組主任）。許乃昌、王白淵、蘇新擁有在戰前參加左翼運動的經歷。陳紹馨、楊雲萍是知識份子，活躍在戰前台灣的文化界。台灣文化協會本來想要在台灣紮根「三民主義的文化」、「新中國的文化」為使命，卻承接了台灣的戰前文化活動，思想方面則有左翼的傾向。黃英哲的《台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的光和影》中有詳細介紹。《台灣文化》有復刻版。

³⁵二二八事件以後的「台灣文化協進會」。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也給協進會很大的打擊。當時任常務理事，也任職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林茂生失蹤，王白淵被捕，蘇新逃亡到中國去。曾為《台灣文化》主要的台灣人執筆者呂赫若

上應為夜間部主任

在台灣幾達四十年的文學史上，光復初期大約四年間的台灣文學，奠定的基礎影響深遠。台灣文學必須由全體作家取得共識和合作，為台灣文學覓取更自由、更寬容、更多元化的創作途徑。也唯有在和諧和瞭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偉大的文學，踏入世界文學之林。台灣文學是反映台灣本土民眾現實生活的文學，它的多災多難一如它的多采多姿，它是台灣人精神、命運的象徵，它是整個世界人類的共有物，在這樣巨視性的觀點下，這四年的台灣作家的苦難歲月，又算得了什麼？

註：

- 1 王育德《台灣海峽》，一九八三年一月，日本東京中日出版社，九四頁。
- 2 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一九八四年五月《文學界》第十集。有關「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悉依照此文概要。
- 3 林梵〈讓他們出土〉，一九八四年，《文學界》第十集，二一五—二二三頁。
- 4 王白淵〈台灣的文學活動〉，一九五二年，新生報社《台灣年鑑》二十七章三—五七頁。（彭萱按：《台灣年鑑》係一九四七年出版）
- 5 張炎憲〈戰後台灣史研究的發展脈絡（二）〉，一九八四年七月，《台灣文藝》八

失蹤了，吳新榮也被拘禁了一〇〇天。來台的中國作家們也就在國共內戰，國民黨轉為劣勢，對共產黨的鎮壓轉為強硬的時局當中，許壽裳於一九四八年二月時被暗殺了。袁珂、李何林、李霽野回到中國，雷石榆從台灣被放逐出去，版畫家黃榮燦則在白色恐怖時被逮捕處決了。臺靜農、黎烈文則選擇沉默，專心往研究之路前進。

6 十九期，二二三—二二八頁。
松永正義〈台灣文學の歴史と個性〉，一九八四年二月，東京研文社《彩鳳の夢》
解説。

第四章 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

——理想主義的挫折和頹廢

第一節 撤退

一九四九年冬天，國民政府逐漸從大陸撤退，覓取一塊新天地供重整旗鼓，打回大陸去。這是台灣歷史第二次大的民族移動，台灣容納了大約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的新移民。其中八十萬人大約是軍人（註1）。但是這些移民跟四〇年代光復不久來台的移民不同。光復不久到台的大陸移民，大約可以分爲以下的六種成分。其一、是陳儀的班底，大多數爲陳儀在福建省主席任內所培養的統治幹部。其二、爲國民黨各派所派來進駐台灣的先遣隊份子。其三、是爲國內戰爭摧毀企業基礎，避免大陸的亂局，想在台灣這塊世外桃源建立一番事業的，屬於資源委員會系統的「非政治」人士。其四、是老留日份子來台灣求發展的。其五、是舊「滿洲國」、「汪政權」有關份子，爲逃避「漢奸罪」隱姓埋名來台混水摸魚。其六、是閩籍人士，依靠語言可以溝通的方便來台淘金者。因而四〇年代來台移民構成份子三教九

流包羅萬象，很少有共識，當然也缺乏依靠強有力的統治機構去做統合性的經營（註2）。

五〇年代因避共而來台的移民，卻是曾在大陸享有統治實權的有關軍政、黨務、財務、財經、學術界的精英份子。儘管驚惶未定，但他們有統治的實際經驗，以及基於三民主義的政治理論的共識，所以很快的又建立了一套統治模式，以台灣民眾的血汗勞動的收穫為滋養，迅速地確立了統治體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閻錫山的內閣在台北開始辦公，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院舉行遷台後第二次院會，決議改組台灣省政府，由吳國楨接任台灣省主席。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蔣總統復職視事，三月十五日陳誠接替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院長，至此光復以來動盪不已的五年政局，終於安定下來。

雖然表面上的政治體制已確立，但圍繞台灣內外的各種課題並沒有解決。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公開發表「對華白皮書」，明白表示放棄支持國民政府的意圖。過了四個月後的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在這樣的情勢下，國外出現了各種理論和主張；如「聯合國托管論」、「混血民族論」或「台灣地位未定論」^①等，這給國民政府帶來莫大的困擾和沮喪。在國內，由於蔣總統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強有力的號召，所以大陸來台人士都意氣高昂，以為立刻要反

①「聯合國托管論」、「台灣地位未定論」。「聯合國托管論」是台灣獨立派政客廖文毅在一九四七年時所主張的。

也就是，先暫時將台灣的統治權從中國切離分割出來，放在國聯底下管理，想在這樣的情況之後，根據住民的投票來決定回歸中國屬權或是決定獨立。「台灣地位未定論」則是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為了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政權來統治台灣，美國的杜魯門總統以此為目的而提出的主張。

攻大陸回家鄉。這使得他們都有短期居留的統治者心態，只是想要短期的利用台灣的人力與資源，並無長期居留經營這塊土地的打算。只要其統治力量與武力能夠維持短暫穩定的局面，他們並不想跟這塊土地的民眾有所同化或交流；這和台灣民眾的心願完全背道而馳。台灣民眾的利益在於台灣的長遠展望，他們需要建設台灣為人間樂園。因此，政府必須以武力的彈壓來壓碎台灣民眾的願望。直到一九五四年，美國明確地告訴蔣總統不支持「反攻大陸」以前，政府的統治方式完全是一種徹底的強壓手段。一九五〇年代前期，政府在台灣進行一場殘酷的「清共」和「肅清」。此次的肅清給台灣民眾帶來深遠的影響，使苟延殘喘的台灣知識份子變成殘缺不全的廢物（註3）^②。直到八〇年代來臨，言論自由的範圍擴大之後，才有「政治小說」一類的作品出現，追究了五〇年代荒蕪的真相。

國民政府遭遇內外情勢極端不利的情況時，幸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隨即在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防衛台灣海峽，同時宣佈該海域的中立化。從此時到一九六五年，美援大約有十四億七千萬美元，另外有軍援約二十五億美元。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中、日和平條約締結，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中、美協防條約簽字，這都有助於安定台灣的政治狀況。從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始，約繼續了兩個月的第二

^② 清共的影響。作者在這裡所參照的若林正文《台灣現代小說選III 二本足の馬》的解說當中，記載著若林氏於一九八〇年二月在台灣高雄與「Y氏」——也就是葉石濤氏會面，聽到關於二二八事件活生生的事實時所受到的衝擊等。說到一九八〇年二月，也就是因為高雄事件而有許多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家遭到逮捕的不久之後，也是有再度爆發二二八事件危機的可能時期。葉氏翻譯了這篇解說。〈歷史與文學〉（《臺灣文藝》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九十六期）。

次金門砲戰^③，使國內外震撼，但終於通過了一次重大的考驗。

於是，國民政府一方面推行激烈的「肅清」和「清共」，一方面爲了獲得廉價豐富的糧食，採取了一連串的土地改革。一九四八年魏道明爲了對付持續的米荒，實施「收購大中戶餘糧」制度，將地主所擁有的佃租米廉價賣給政府。緊接著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把向來高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佃租壓低到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一九五一年六月實施「公地放領」，把接收自日本人的農地一八一、四九〇甲中，七四、五三一甲保留爲公地，其餘售給佃農。一九五三年一月，「耕者有其田條例」終於公佈實施。至此，地主完全銷聲匿跡，成爲歷史陳跡（註4）。

第二節 官方文學思潮

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的十年間，台灣文學完全由來台大陸作家所控制，台灣作家的作品既少水準又不高，未能承繼日據時代輝煌的新文學傳統。這固然是省籍作家，面對了語文轉換的艱辛不容易運用中文寫作有關，但四〇年代到五〇年代的政治彈壓，也造成了省籍作家的畏縮和退避，所有台灣知識份子視文藝工作爲畏途，放棄了新的耕耘和開拓，

③ 第二次金門島砲擊。金門島是位在距中國福建省廈門二·四公里海面上的小島。是國民黨政府的領土，國共內戰的最前線。從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起歷經四十四天，發生了激烈的砲戰。傳說金門島在兩個小時之內受到了四萬發砲彈的攻擊。這次的砲戰是經由美國的介入而停止的，從此之後國民黨、共產黨雙方都放棄了以武力互相攻擊。

躲進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做逃避的白日夢。來台的第一代作家包辦了作家、讀者及評論，在出版界樹立了清一色的需給體制，不容外人插進。然而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也一樣面對了文學傳統中斷的尷尬局面。他們排斥三〇年代暴露黑暗統治的社會意識濃厚的文學，同時也幾乎揚棄了五四文學革命以來的民主和科學的新精神。一九三〇年代的文學旗手，如老舍、巴金、沈從文、茅盾、田漢、曹禺等沒有一個來台，他們的作品也全被查禁。這使得大陸來台作家跟三〇年代、四〇年代文學成了脫節的真空狀態。

對於這文學的真空狀態，必須以某種思想來填彌。一九五八年胡適在中國文藝作家協會發表演說，主張恢復五四文學革命的精神④；那便是「人的文學」和「自由的文學」。什麼叫做「人的文學」？那便是要有點兒人氣，有點兒人格，要有人味兒的，簡言之，是人道主義為本的文學。那麼什麼叫做「自由的文學」；那便是「文學這東西，不能由政府來輔導，更不能夠由政府來指導。……人人是自由，本他的良心，用他的自由來創作……。」後來任卓宣以「論人的文學和自由的文學」為題主張，「人的文學」就是「民族的文學」，「自由的文學」便是「民權主義的文學」⑤。

④ 胡適的演說。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也就是在五四運動紀念日舉行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八週年紀念大會，胡適作了一場以〈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為題的演說。以「中國文藝復興、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為題，收錄在《文藝季刊》第二期。

⑤ 任卓宣之演說。承接在胡適的演講之後，任卓宣以〈論人的文學和自由的文學〉為題進行了演說。任卓宣（一八九六—一九九〇），四川省南充縣出生，一九二〇年加入法國勤工儉學，在莫斯科的孫逸仙大學就讀。三民主義的理論家。

一九五〇年四月，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除定期辦理徵文及頒發獎金外，並刊行《文藝創作》月刊，以較優厚的稿費來鼓勵作家寫出好作品。省籍作家中，如鍾理和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及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等都會獲得獎勵⁶。同年五月四日，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幾乎網羅了台灣地區較有名望的文藝工作者。中國文藝協會是五〇年代最活躍的官方文藝團體，幾乎壟斷了整個文藝活動達十年之久。由法國留學歸來的當時立法院院長張道藩⁷領導，積極推動反共抗俄的文學。中華文藝協會的宗旨在於「除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活動，發展文藝事業外，更以促進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為宗旨。」故這個團體是完全配合了國策的推行，跟胡適和任卓宣所主張的「文學這東西不能由政府來輔導……指導」的觀念完全背道而馳。中華文藝協會舉辦各種文藝研習班，倡導推展軍中文藝運動，以及發起文化清潔運動，特別著重掃除黃色作品。至一九五五年提出「戰鬥文藝」，「以使戰鬥文藝，確能適合戰鬥時代與

⁶ 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略稱文獎會）」，在每年元旦、五四、雙十節、國父誕辰都定期地舉辦懸賞作品的徵文。總共十七回，在七十個領域中有一百多位作家得獎。一九五六年廢除。在台灣作家方面，有廖清秀、鍾理和獲長篇小說獎。獎金的額度，短篇小說三千元，中篇小說八千元，長篇小說一萬兩千元。附帶一提，一九五六年時得獎的鍾理和在代書行工作，月薪三百元（鍾理和〈薪水三百元〉），以當時的物價來說，是相當驚人的金額。

⁷ 張道藩（一八九六一—一九六八）。貴州出生。一九一九年赴歐洲，就讀於倫敦大學、法國國立最高美術專科學院。一九二二年加入國民黨，隔年當上倫敦分部評議部長。一九二六年回國，歷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副部長、教育部次長、交通部次長、中央宣傳部長等。一九四八年來台，一九五〇年三月，設立了「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

戰鬥任務之要求」(註5)。中華文藝協會得到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大力支持，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成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成立「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加強全民性的反共抗俄文學的建立。可惜，三十多年的日子過去了，這些團體失去影響力，逐漸淪為裝飾品，趕不上台灣文學進步的巨大步伐。

五〇年代的文學，幾手由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所把持，所以整個五〇年代文學就反映出他們的心態。他們在大陸幾乎都是屬於統治階級，依附政治權力機構而生存，所以大多數擁護中國傳統的孔子思想，且有根深蒂固的法統觀念，缺乏民主、科學的修養。因此大陸淪陷轉到台灣以後，充滿他們心靈的是沮喪和仇恨。國破家亡的沈重包袱壓碎了他們的心靈。反映這種心境的文學，自然是對中共政權的無限憤懣和怨仇；文學必須紮根於人道主義的肥沃土壤，開起花朵來才有文學的本質和效能。不幸，他們的文學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〇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策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這和出生於匈牙利的英國作家阿瑟·凱斯安勒(Arthur Koestler)在一九四〇年代寫成的小說《中午的黑暗》的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濃厚人道主義思想相比，真令人嘆惜五〇年代文學多荒蕪了。自從八年抗戰到戰後的國內戰爭，這樣一個波濤洶湧歷史的關鍵性時刻，應該是偉大不朽的民族史詩及大河小說出現的題材豐富的時代，可惜五〇年代作家都斤斤計較於意識形態的鬥爭的窄狹領域，缺乏透視全民族遠景的遠大眼光，終於在文學史上交了白卷。同時，他們來到這陌生的一塊土地上，壓根兒不認識這塊土地的歷史和人民，也不想瞭解此塊土地

上台灣民眾真實的現實生活及其內心生活的理想和心願，更不用說和民眾打成一片。一個作家的根脫離了民眾日常生活的悲苦和歡樂，他們的文學無異是空中樓閣，只是夢囈和嘔吐罷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根還留在大陸，在夢裡縈繞的莫非是未被中共佔據前的那榮華富貴、快樂愜意的大陸底舒適生活。像這樣的懷舊，把白日夢當做生活現實中所產生的文學，乃壓根兒跟此地民眾扯不上關係的懷鄉文學。雖然同屬於漢民族，傳統生活模式和民俗大致相同，而近百年來異民族侵略的慘痛經驗中，也一樣多少吸收了一些異民族的生活形態，但廣大的大陸是次殖民地，近代化的步驟甚慢。台灣卻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移民社會，所以從清末民初一直到日據時代，近代化的腳步卻是比大陸快。所以在大陸和台灣之間，民眾的日常生活細節有些差異。儘管台灣民眾毫無困難和阻礙地接受懷鄉文學的那濃厚鄉愁，但是這和本地民眾現實上的困苦生活脫節，讀起來好像是別的國度裡的風花雪月罷了。由於五〇年代作家不瞭解台灣的過去和現在，所以把台灣民眾看作是大陸反叛的民眾，誤把台灣民眾當作大陸的叛徒，助長了政府肅清政策的推動；唯一公平的是，不但大陸來台第一代人士也坐牢，而本土民眾也一樣坐牢。台灣民眾從四〇年代的「二·二八」事件以後，一直提出的是政治改革的要求。這並非同洪水猛獸一樣的布爾雪維克思想，而是根據台灣民眾的理想主義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佔多。五〇年代的肅清政策固然消滅了一小撮台共份子，同時也使台灣知識份子蒙受劫難。在這個時代裡以楊逵為首的眾多台灣知識份子被囚或死去，這造成台灣文化傳統的斷絕，使日據時代的新文學運動被打入黑暗的忘卻的深淵，造成文學傳統的中斷、扭曲和裂溝。

沮喪和疲倦也使得這些二部分五〇年代作家，逃避現實，乾脆躲在象牙之塔裡做兒女私情的綺麗的夢境；鴛鴦蝴蝶派^⑧的小說於焉復活。這也是為什麼五〇年代的文壇高舉掃蕩運動大旗的原因。這些鴛鴦蝴蝶派的小說，跟大陸時代的張恨水等言情小說不同，壓根兒缺乏了現實生活的依憑，漠視社會性觀點，只留下一些模糊的道德規範，層次很低。但是從五〇年代為起點的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一直持續到八〇年代，在文化素質較低的民眾中流傳甚廣，發揮了深湛的影響力。瓊瑤^⑨為首，以女作家為主的這些大眾小說，在八〇年代，透過多元性的資訊媒介繼續滲透於民眾的精神生活裡，電視的連續劇是這流派的堅強陣地。

理想主義的挫折和摧殘，使得五〇年代的知識份子，也逐漸把他們的憧憬寄託在多元化的政治思想上。以雷震^⑩的《自由中國》為主導，提倡言論自由，反共與實施憲政。他與本地的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企圖組成「在野黨」，以積極推動政治改革。這是大陸來台第一代知識份子重視本地人士政治意願並願意共同邁進「體制內改革」的第一步。可惜，在一九

⑧ 鴛鴦蝴蝶派。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初期，風行於文藝界的流派。以才子佳人為主人公的通俗性戀愛小說為其主流。

⑨ 瓊瑤。台灣的暢銷作家。岡崎郁子經過「數十次的交涉」，而進行了一場珍貴的訪談。〈台灣作家所認為的「文學」——訪談——〉（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神戶大學中文研究會《未名》第六號）。日文翻譯如下：《夢話六章 瓊瑤作品集1》、《銀狐 瓊瑤作品集2》、《窗外 瓊瑤作品集3》、《寒玉樓》、《我的故事》、《戀戀神話》。

⑩ 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出生於浙江省。一九一六年赴日本留學，求學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一九一七年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六年回國，歷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校長、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委員、書記長等，以後也擔任了國民黨政府許多重要的職務。一九四九年上海淪陷的前一夜渡海到台灣，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務。

六〇年雷震被捕而使這民主運動結束¹¹。《自由中國》一九四九年在台灣創刊¹²，起初由胡適擔任發行人，至一九五三年改由雷震主持。雖然雷震的憲政改革受到挫折，然而這種理想主義和思想傾向，一直是台灣知識份子的主要精神指標，影響到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蓬勃的黨外運動。《自由中國》為一政論雜誌，對台灣文學未來動向的影響極有限，但是它的理想主義傾向，一直抓住了一部分作家的心靈，構成他們思考方式的主宰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文星》月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創刊，發行人是葉明勳，社長蕭孟能，後來有一段時期主編為李敖。《文星》以「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為宗旨。《文星》替五〇年代閉鎖的社會打開了一面窗戶，讓歐風美雨吹進來。《文星》雖不是政論雜誌，但它是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雜誌，以西化和新知識來震撼中國傳統思想生活和文學藝術，促使台灣的文學藝術走向現代化，造成六〇年代作家往現代前衛文學的方向挺進¹³。

¹¹ 雷震事件。一九六〇年六月，由雷震等《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所企劃而結成一個叫做中國民主黨的在野黨，在籌備中即將要成立的時候，於九月四日以犯下叛亂條例罪名，查禁了《自由中國》，雷震被捕，並被判處十年徒刑。刑期終了出獄，就在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政府喪失聯合國的代表權之際，說服蔣介石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也就是建議在台灣建立一個國家，卻沒有被接納。

¹² 《自由中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創刊。就在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打算拋棄在國共內戰正處於劣勢的蔣介石政權之際，欲挽回外交上不利的情勢，而創刊宣揚民主與自由的反共雜誌《自由中國》，企圖改善國民黨政府給世界的印象。雷震與蔣介石商談的結果，在得到承諾之下，預定在上海出版，卻因為共產黨軍越過長江南下的緣故，國民黨撤退，不得不逃到台灣，而演變成最後是在台灣出版。

¹³ 《文星》。一九六五年底停刊。共出版了九十八期。雖然是綜合雜誌，卻也重視「文學、藝術、生活」。一九六一年，李敖加入，展開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批判，主張「全盤西化」。九十期以後加強對國民黨的批判，遭到禁止發行而停刊的處分。

這兩本雜誌都有明顯的理想主義和政治改革意願；表示來台第一代知識份子，除定於一尊的法統思想之外，另覓途徑的企圖。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一批人已摒棄了偏安的心態、仇恨和沮喪，站在反共的立場上意欲和本土民眾打成一片，建立更現代化的「新中國」。然而，由於光復不久，新世代的本土知識份子尚未形成氣候，因此，省籍作家發表作品的寥寥無幾¹⁴。

碩果僅存的幾位日據新文學作家在五〇年代被迫沉默。四〇年代曾活躍過一段時期的楊逵，因肅清被判十二年而銀鐐入獄。吳濁流雖寫了〈波茨坦科長〉等一系列的小說，但無處發表，藏在書櫃裡。四〇年代跟《台灣文化》有密切關係的楊雲萍、黃得時已任台灣大學教授，走向學術的道路。呂赫若已死，張文環和龍瑛宗都躲進金融界裡不問世事。然而，他們建立新的台灣文學，繼承新文學運動的心願未了；事實上證明從六〇年代吳濁流創刊《台灣文藝》以後，這些作家逐漸恢復了自信，隨著言論自由的擴大，他們在七〇年代末期到八〇年代中期都有作品發表，表現他們源源不絕的創作生命。在這五〇年代裡，除鍾理和、廖清秀、施翠峰、李榮春等省籍作家，跟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或中國文藝協會發生關係之外，光復後第一代作家仍在克服障礙，探索文學未來之路。然而，光復所造成的新文學傳統的中斷，只停留在少部分的理解程度罷了。

¹⁴《文星》與台灣人作家。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五卷第二期（總號第二十六期），刊登了王鼎鈞〈作品充滿鄉土色彩的台灣作家〉、林海音〈台灣作家的寫作生活〉，介紹了鍾理和等戰後第一代的代表性台灣人作家。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是戰後最早期概述由賴和開始的台灣文學之潮流的作品，此文刊登在停刊的前一期，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九十七期當中。《文星》雖然具備了自由的態度，卻始終是由大陸出生的知識份子所主辦的雜誌，關於台灣的文化 and 文學，只停留在少部分的理解程度罷了。

斷，五〇年代的荒廢，並沒有使建立以本土為主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台灣作家的意願因而消退。後來這凝視本土現實，欲把台灣文學提高到躋進世界文學之林的努力，在七〇年代經鄉土文學論爭之後，獲得歷史上的地位，陸續地產生了優秀的作品。至此，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與戰後台灣現代文學接續，構成貫徹始終的一個完整的文學體系。

五〇年代閉鎖的社會，使得一部分作家對大陸產生了幻想。他們心嚮往於「中國革命」，以為激烈的社會主義改革，可以使「新中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國家，足以恢復民族精神。這種意識形態多少源自於日據時代抗日知識份子對大陸革命共鳴的傳統。然而，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台灣消費社會迅速的現代化和富裕的物質生活，和對大陸盲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倒退、落後，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使得他們的夢破滅，理想主義遭到深刻的挫敗。因此，他們不得回頭過來檢討台灣歷史和社會變遷的情況，較具有批判性。不過，他們仍然對「父祖之國」有揮不去的思慕，打出「民族主義文學」的口號。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

在所有反共文學中，別具風格，最真實而有力的，當推姜貴的《旋風》¹⁵。《旋風》承

¹⁵ 姜貴《旋風》。夏志清給予姜貴的《旋風》很高的評價，說道「不但是現代中國小說的傑作之一，也是給予人此一啟發、作為共產主義研究的著作，和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一樣佔有重要的地位」（《中國現代小說史》〈附錄三 姜貴的兩部小說〉）。

繼了三〇年代的寫實主義，描寫了共產黨在山東的農村裡逐漸生長的歷史，其時間大約二十年，從五四經抗戰到太平洋戰爭。正如姜貴的小說寫的，中共初期的領導人物大多數是出身於地方上的土豪劣紳。《旋風》中的方祥千即出身於方鎮的大地主家庭。他相信蘇維埃社會是個「完美社會」，而腐敗的中國要現代化必須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共產社會。這種理想主義，不但是中國，而且是當時全世界所謂「前進」的知識份子共有的理想主義。甚至連出身於法國中產階級具有銳敏的理性的作家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也基於人道主義關懷，傾向於蘇聯，但是一九三六年發表的《蘇聯紀行》批判了蘇聯的鎖國主義、新官僚主義和劃一主義。可見，姜貴的《旋風》不單單是批判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同時也代表了整個世界反共的共同理想。《旋風》的所以在眾多反共小說中脫穎而出，並不只是靠描寫土共的生長和衰亡過程的刻劃入微，而是他著力描寫傳統封建制度的腐敗和墮落。如果沒有這社會制度腐爛的溫床，共產主義自然也無從萌芽了。然而姜貴的反共理念基礎頗薄弱，他的小說不但保持了濃厚的傳統白話小說的勸善懲惡思想，從某個方面來說，也頗有「才子佳人」小說的味道。小說中藉方天茂說出的一段話：「爲了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理想去吃苦，實在是沒有意義的。」後來歷史的事實證明完全是錯的。姜貴本名王林度，一九〇八年生於山東諸城，一九八〇年死於台灣。他生於一個式微的大地主家庭，在濟南和青島受中學教育，參加過北伐，抗戰時服務於軍旅（註6）。除《旋風》以外，一九六一年以武漢政權爲主題，另外寫了長篇《重陽》。著作頗多，共二十多本。

張愛玲是四〇年代傑出的作家之一。家世顯赫，典型的中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共攻

陷上海之後，有段時期她還逗留在中共統治下的上海，親眼看到「土改」在江南農村推行的狀況。在一九五四年寫成的《秧歌》裡¹⁶，她以「土改」後的江南農村，「勞模」譚金根一家為主要描寫對象，配以個性、背景各異的農民群。映在張愛玲眼裡的農村是饑餓、貧苦和恐怖的世界。張愛玲的《秧歌》著重描寫農民生活的日常性，以女作家特有的細膩觀察描寫農民瑣碎的生活細節，當然也沒有口號式的誇張批判，卻反而把共產統治下的農村現實寫活了。張愛玲的小說一向富於音樂的節奏，色彩的氾濫，及嗅覺、觸覺等官能描寫。這本小說自也不例外。除《秧歌》之外，另外有一本反共小說為《赤地之戀》。張愛玲一九二一年生於上海，河北豐潤人。現任職於美國加州大學中文研究中心¹⁷。除這兩篇反共小說之外，還有《怨女》、《半生緣》、《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等，在台灣擁有許多讀者。

在來台的大陸作家中，過去在大陸文壇曾享有名望的並不多，除王平陵¹⁸之外，陳紀澄

¹⁶ 張愛玲《秧歌》。《秧歌》於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英文版則是於一九五五年在美國出版。夏志清說「《秧歌》已經成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第十五章〈張愛玲〉）。

¹⁷ 張愛玲。張愛玲從香港前往美國，一九九五年於洛杉磯去世。她雖然沒有在台灣居住過，台灣卻是她作品的最大市場。給予台灣的戰後文學極大的影響。不過，關於張愛玲的文學是否涵蓋在台灣文學當中的意見卻有分歧。《作家作品目錄》當中將「曾經長期在台灣生活」當作作為台灣作家的條件，沒有包括張愛玲。另一方面，《半生緣》卻被選為一九九九年「台灣文學經典」（《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

¹⁸ 王平陵以及來台的大陸作家。王平陵在三〇年代主編中央日報副刊。與左翼作家聯盟對立，倡導「民族主義文學」之信條。在其他戰後從大陸渡海來台灣的文學人當中，最資深的有五四時代的胡適、傅斯年、羅家倫，二〇年代另有林語堂、新月派的梁實秋，三〇年代有倡導「第三種人」的胡秋原等。這些大約都是反共主義者之流，另外有另一支由魯迅從日本留學時代的友人許壽裳凝聚的一派。魯迅的徒弟臺靜農，三〇年代編輯申報復刊之「自由談」、「中流」的黎烈文，於戰後初期即來到台灣定居。

爲其中佼佼者之一。在大陸時代，他曾服務過郵政局，主編過大公報副刊。來台以後先後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民國筆會」等官方組織發生密切關係。張道藩歿後，他主持了「中國文藝協會」。他的作品大多以長篇小說或報導爲主，有《荻村傳》（一九五一）、《赤地》（一九五四）、《賈雲兒外傳》（一九五七）等共有三十多本，是五〇年代作家的巨擘。其中《荻村傳》最膾炙人口，有日文譯本¹⁹。《荻村傳》係透過貧農傻常順兒的喜悲劇性生活，描畫了北方農村五〇年代的變遷。作者除著重描寫北方農村的景觀以外，以多向性的角度來刻劃中國農民被剝削的窮苦生活。然而《荻村傳》有太多魯迅《阿Q正傳》的陰影，這損傷了作品的時代性意義。

鍾理和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曾獲一九五六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獎第二名（第一名從缺）。由於「文獎會」和「文藝創作」相繼停辦，所以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始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報副刊連載，那時候鍾理和已經逝世半年了。一九六一年九月由學生書局刊行，一九七一年復由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時編爲第五卷，由遠景出版社刊行。這是鍾理和從北平回來台灣以後所寫的巨作。正如所有鍾理和的小說一樣，這長篇有濃厚的自傳色彩。鍾理和以他父親經營的笠山農場爲背景，描寫了日據時代客家農民的勞動和生活。小說的主要故事爲同姓婚姻，令人感到客家人保守的一面，也同時連帶地勾勒出整個日據時代農民生活的細節。然而在《笠山農場》裡，不像三〇年代新文學的農民小說一樣，

¹⁹《荻村傳》。從一九五〇年一月開始在《自由中國》上連載。一九五一年四月重光文藝出版。日文翻譯方面有藤晴光翻譯的《荻村的人們》。

有尖銳的地主與佃農的對立，倒是地主與農場勞動者之間相處融洽。這也是鍾理和小說中的一個特色，他一向不以社會性觀點來處理題材，倒用美學和人性來安排情節，使得他的小說細膩動人有高度的藝術成就。然而，精確而優美的寫實技巧，往往也透露出小說背景慘無人道的事實真相，如「故鄉」連作²⁰把光復後台灣農村疲憊、凋零、荒蕪、窮苦描畫透徹，敢說是可以躋入世界文學之林的傑出作品。

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曾獲得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長篇小說第三獎。廖清秀是所有台灣戰後第一代作家首先獲得肯定的第一個人。《恩仇血淚記》的情節，大半以廖清秀在日據時代力求上進的奮鬥生涯為藍本寫成的。《恩仇血淚記》把日據時代日本人壓迫台人的事實刻劃得很精細，日本統治者的鷹犬，警察的跋扈，小學裡的日人教師，社會裡形形色色的日本人都勾勒得很生動。正如《恩仇血淚記》的題目所暗示的一樣，廖清秀要在小說裡呈現的是台、日人之間複雜的人際關係；有恩情，也有仇恨。有時候離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尖銳對立，也有基於人性的和諧的關係存在；這使得這長篇脫離了抗日抗議小說的老舊框框，提供了由更高層面的人性來看壓迫與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中所隱藏的另一面。然而，《恩仇血淚記》未能用高邁的哲理來處理超越民族、血統、國界、膚色的異民族相處之道，使得這本小說有通俗小說的味道；如林金火與田中愛子之間的愛情葛藤，後來愛

²⁰ 鍾理和「故鄉」連作。「故鄉」沒能在鍾理和生前發表，一九六四年首次被刊登在《台灣文藝》「鍾理和追悼集」中。由《竹頭庄》、《山火》、《阿煌叔》、《親家與山歌》等四篇短篇所組成，前頭的兩篇有日文翻譯。（《バナナポット》收錄）。其他有《山地之女（假黎婆）》（《悲情の山地》收錄）。

子變成渡邊的妻，戰後淪為神女，渡邊敗戰後自殺身亡，把愛子留給林金火等，情節的離奇脫離了現實，損害了小說的真實性。廖清秀一九二八年生於台北縣汐止鎮。從五〇年代一直到八〇年代寫作不輟，除《恩仇血淚記》之外，還有短篇小說集《冤獄》等。有一度會翻譯了許多日文小說，如張文環的日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的中文譯本《滾地郎》便是由他翻譯的²¹。另著有一長篇《第一代》至今未能出版²²。

除這些較富特色的小說以外，五〇年代作家也在反共文學的領域中開拓了相當廣深的世界。如彭歌的《落月》²³（一九五六）描寫平劇名伶余心梅學藝、戀愛、走紅的一生。這篇小說的技巧是五〇年代罕見的相當傑出的現代小說手法，以一個女人的回憶，把二十年歲月裡的各種細節用倒敘、交錯等過去和現在混合的手法刻劃出來。彭歌原名姚朋，河北宛平人，一九二四年生²⁴。他除小說之外，散文、論評、翻譯方面都有傑出成就。刊行的著作約有五十多本，為一個多產作家。在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爭時，是站在官方的立場抨擊鄉土文

²¹ 廖清秀的翻譯。《在地上爬的人》（一九七五年九月 現代文化社），漢文譯名《滾地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鴻儒堂書局）。其他譯作有川端康成的《多色的彩虹》、松本清張等的推理小說翻譯集《共犯者》。

²² 《第一代》在一九七五年的自立晚報連載。一九九四年六月由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作為北台灣文學台北縣作家作品集之系列來出版。其他有出長篇《不屈服者》（一九九三）、《反骨》（一九九三）等。

²³ 彭歌《落月》。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文獎會國父誕辰紀念獎金中，拿下了長篇小說第三名。第一名從缺，第二名鍾理和《笠山農場》，第三名就是這篇《落月》和王藍的《藍與黑》。文獎會在這一年就停止了。

²⁴ 彭歌。根據其他的資料顯示，他出生於一九二六年。（彭萱按：彭歌，本名姚朋，一九二六年出生於河北宛平。作品主要以雜文評論為主。退休後定居美國。）

學為違反人性的文學的代表性人物。

端木方的《疤勳章》²⁵是典型的反共小說，描寫從抗戰游擊、勝利，國內戰爭，到來台的一段時間，以控訴共黨暴行為其主題。

潘壘的《紅河三部曲》²⁶也是一部反共小說，不過他的這三部曲的背景，除第二部之外都以越南為背景，描寫越南華裔青年身受共黨摧殘的經過。這是一部比較傾向浪漫的抒情小說。

五〇年代是女作家輩出的時代。由於時代空氣險惡，動不動就會捲入政治風暴裡去，所以社會性觀點稀少，以家庭、男女關係、倫理等為主題的女作家的作品大行其道。如潘人木的長篇小說《蓮漪表妹》、《馬蘭自傳》²⁷等雖也以反共為主題，但是描寫「解放地區」的生活狀況呆板而缺乏具體，有力不從心之感。作者的主要興趣仍然是脫離不了女人、家庭、情愛的範圍。

女作家除潘人木之外，還有蘇雪林、謝冰瑩、林海音、郭良蕙、童真、張秀亞、張漱涵、繁露、嚴友梅、劉枋、艾雯、孟瑤等作家。蘇雪林在大陸上享有聲名，來台以後直到八

²⁵端木方《疤勳章》。獲一九五〇年十月文獎會雙十節獎金，中篇小說第三獎。

²⁶潘壘《紅河三部曲》。自費出版了《富良江畔》、《為祖國而戰》、《自由自由》等三部。之後改編成《靜靜的紅河》。

²⁷潘人木《蓮漪表妹》、《馬蘭自傳》。《蓮漪表妹》獲得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文獎會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獎金。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也同時得獎。《蓮漪表妹》得獎之後在《文藝創作》上連載。《馬蘭自傳》自一九五五年二月一五月，第四六期—四九期在《文藝創作》上連載。一九八七年改定成《馬蘭的故事》（純文學出版社）出版。

〇年代還有雜文一類的作品發表²⁸，筆觸辛辣，控訴的力量大。謝冰瑩同樣在大陸已享有文名，《女兵自傳》曾被翻譯多國語言，相當著名²⁹。林海音為台灣苗栗人，一九一九年生³⁰。自幼生長在北平，光復後回台，曾主編過聯合報副刊，在六〇年代初提拔了眾多新銳作家，曾創辦《純文學》雜誌，主持「純文學」出版社，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她的主要作品大多數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完成。有小說集《綠藻與鹹蛋》（一九五七）、《曉雲》（一九六〇）、《城南舊事》（一九六〇）、《燭芯》（一九六五）、《孟珠的旅程》（一九六〇）等³¹，另外也有散文集多本。作品的主题以家庭、孩子、老人為多，跟反

²⁸ 蘇雪林（一八九九—一九九九）。安徽省出生。一九一八年進入北京高等女子師範求學，受到胡適、周作人、李大釗等人的教導，受到影響。她是在中國近現代文學當中具領導性地位的女性作家之一。一九五二年來到台灣，在台灣師範大學等校擔任教職。

²⁹ 謝冰瑩（一九〇七—）。湖南省出身。一九二七年以女兵的身分參加北伐，以這段經驗寫成的《從軍日記》，被林語堂翻譯成英文，造成世界性的迴響，以及另有數國的翻譯。一九三六年來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在籍期間，曾因為反對滿洲皇帝溥儀來日，而被逮捕居留的經驗。當時，也和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武田泰淳、岡崎俊夫等有深入的交情。一九四八年渡海到台灣，成為台灣師範大學的教授，一九七二年前往美國。從《女兵自傳》，或稱《一個女兵的自傳》（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時開始，在日本也受到注目。（彭晝按：謝氏於二〇〇〇年去世。）

³⁰ 林海音。根據其他的資料顯示，她出生於一九一八年。

³¹ 林海音。出生於日本的大阪。四歲赴北京。一九四八年回到台灣。從一九五三年起擔任聯合報副刊編輯十年，一九六七年創刊《純文學》，持續發行了五年的時間。五〇年代末期刊載了許多鍾理和的短篇在聯合報副刊上，鍾理和去世之後，連載了他生前出版無望的《笠山農場》。林海音的代表作《城南舊事》（一九六〇年）是其少女時代的回憶，活靈活現地描寫著二〇年代北京的生活和風俗，一九八二年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所製作成電影。也有日語翻譯版。

（彭晝按：林海音，本名林含英，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去世。）

共文學無關。她的作品民族色彩濃厚，注重描寫台灣邁向消費社會中家庭的破碎，女人婚姻和愛情的挫折。懷念北平舊時生活的情景，很富於色彩與音響。郭良蕙爲山東人。她的代表作《心鎖》出版於一九六二年，由於社會風氣未開，頗引起一些爭議³²。五〇年代有《禁果》（一九五四）、《銀夢》（一九五三）等小說出版。劉枋一九一九年生於綏遠（譯按：舊省名，今內蒙古自治區。）新城，來台以後曾擔任全民日報副刊主編，「台灣省婦女會文教組長」，也參與《文壇》（譯按：一九五二年創刊）的編輯工作。一九五五年出版了《逝水》。張秀亞一九一九年生於河北平原，一九四八年抵台，一九五八年任職靜宜英專。她以散文著名，意境飄逸、辭句清麗，多爲抒發個人感情的作品。童真一九二八年生於浙江慈谿。五〇年代有《古香爐》（一九五八）、《翠鳥湖》（一九五八）等小說問世。張漱涵一九二九年生於安徽³³。來台之後有《綠堡之祕》（一九五三）、《翠鳥熱夢》（一九五三）等小說發表。繁露，本名王韻梅，一九一八年生，浙江上虞人。她是多產作家，著作有三十多本。五〇年代的《養女湖》較著名。嚴有梅，河南信陽人，一九二六年生，五〇年代有《無聲的琴》（一九五六）等小說集出版。艾雯本名熊崑珍，江蘇吳縣人，一九二三年生。她是個以散文著名的作家，五〇年代有《生死盟》（一九五三）等小說集刊行。孟瑤，本名楊宗珍，一九一九年生於漢口市，來台後任教中興大學，是一個多產作家，著有《屋頂下》（一九五六）、《斜暉》（一九五七）等長、中篇小說集四十多部。

³² 郭良蕙《心鎖》。郭良蕙出生於一九二六年。《心鎖》（一九六二年九月 大業書店），一九六三年一月遭到查禁。

³³ 張漱涵。根據其他的資料，她是一九三〇年在北京出生，生長在北京，本籍安徽省桐城。

從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以來，中國文藝協會以「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推展軍中寫作，致力於培養軍中作家。在四十年來的台灣現代文學裡，軍中出身的作家構成一特異領域，題材都描寫戰爭、軍人生活為主，這是世界各國文壇罕見的現象。一搬說來，軍中作家樸實敦厚，但思維領域狹窄，描寫範圍不廣，有特殊的風格。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高陽、尼洛、張放、田原、楊念慈、魏子雲、吳東權、舒暢、姜穆、呼嘯、鄧文來等作家一直活動到八〇年代。司馬中原本名吳延玫，一九三二年生³⁴，江蘇南京人。他的創作活動主要在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展開，五〇年代只有小說集《春雷》（一九五九）問世³⁵。司馬中原最好的作品都紮根於大陸農村生活，有濃烈的鄉土色彩和民族風格。朱西寧本名朱青海，山東臨朐人，一九二七年生。他的重要創作活動跟司馬中原一樣，都集中在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最著名的長篇《八二三注》（一九七九）是描寫金門八二三炮戰的巨作。朱西寧注重傳統民族生活的精神，民族意識堅強。進入七〇年代末期，建立三三書坊培養不少大陸來台第二代年輕作家。他的女兒朱天文、朱天心也是著名的女作家。著作有三十多本包括小說、散文和論評。田原，本名田源，一九二七年生於山東濱縣。田原為多產作家，出版長、中、短篇小說集共三十多部。其中《松花江畔》（一九六〇）曾改編為電影而著名。田原曾試圖把本土生活的題材納入小說裡，但不太成功。姜穆在一九八六年刊行《三十年代作家論》，是翔實

³⁴ 司馬中原。根據其他資料，他出生於一九三三年。

³⁵ 司馬中原。五〇年代時，除了《春雷》以外也發表了其他作品。十五歲時從軍，一九六二年退役之後成了職業作家。台灣的代表性長篇作家，著作超過六十冊。

的論評。

除軍中作家之外，還有在黨政機關服務的作家也不少；如王藍、尹雪曼、王平陵、墨人、穆中南、魏希文等。王藍，一九二三年生，河北阜城縣人。他的早期作品內容都描寫日本侵華戰爭。最著名的長篇爲《藍與黑》³⁶。這篇作品取材於八年抗戰中描寫兩個女孩子的戀愛故事，以藍色來象徵善良、力求上進的女孩，以黑色來象徵腐敗和墮落。他認爲這個社會和世界是藍與黑的戰爭，可是缺少具體的、深刻的社會背景。尹雪曼，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汲縣人，本名爲尹光榮。來台以後曾任台灣新聞報副刊主編、成功大學教授。尹雪曼作風比較保守，在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中，主張禁止三〇年代作品開放。著作共有二十多本，包括小說、論評和散文。一九七五年由他規劃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出版，是現今爲止比較詳盡的一部文學史。王平陵是在大陸時代已享有文名的作家，本名王仰嵩，一八九八年生，江蘇樊川人。一九四九年來台。作品共有三十多部，包括小說、戲劇、論評、散文及詩歌。《三十年文壇滄桑錄》，以詳細紀錄大陸三十年代作家面貌、生平、逸聞而著名。墨人本名爲張萬熙，一九二〇年生，江西九江人。墨人早年在大陸從事詩歌創作，來台後，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寫長篇小說，共寫了三十多部，是詩人兼小說家。墨人的小說常常呈現優雅的情操，注重內心生活及性靈的描寫。穆中南，筆名爲穆穆，由大陸來台的老作家。一九二二年生於山東蓬萊。一九五〇年來台³⁷，一九五一年創辦《文壇》。穆中南的《文壇》多刊載

³⁶ 王藍《藍與黑》。《藍與黑》是非常有名的作品，被電影化、連續劇化、舞台化。加上再版的數目，總發行本數有一百萬本，另有英、法、德文的翻譯版。（彭萱按：王藍於七〇年代移居美國，二〇〇三年去世。）

未成名作家的作品，特別提拔省籍作家；鍾肇政許多長篇小說如《八角塔下》（一九七五）、《大壩》（一九六四）等曾刊載於《文壇》後結集刊行。一九六五年刊行鍾肇政主編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共十本，以紀念光復二十年，貢獻很大。魏希文，一九一九年生於湖北通城³⁸。在大陸時代曾提倡民族主義運動。一九五〇年代隨軍來台。在台灣參加中國文藝協會，有多部長篇小說集刊行。《我永遠存在》（一九五四）、《春曉》（一九五六）、《私逃》（一九五八）等，魏希文，少年時喜歡舊俄、日、歐美的翻譯小說，深受其影響。

五〇年代也可以說是散文盛行的時代；這也反映了時代空氣；人心緊張，需要短篇的東西，散文也好，小說也好，馬上看完，馬上會悟於心，十分痛快（註7）。然而大多數散文皆為「風花雪月」的作品，懷鄉情緒的憂鬱與傷感通塞於中，只提供民眾茶餘酒後的一時消遣。不以「風花雪月」為題材的散文，主張「戰鬥性」，使散文走上反共八股，千篇一律，令人生厭。五〇年代的散文作家後來都改弦更張寫起小說來。五〇年代散文中較有成就的為徐鍾珮、艾雯、張秀亞、潘綺君、鍾梅音、王文漪、張漱涵、劉枋、王琰如、林海音、陳香梅、張雪茵、郭晉秀、羅蘭、葉蟬貞、邱七七、葉蘋、心蕊、侯榕生等女作家為主。另有男作家梁實秋、鳳兮、茹茵、劉心皇、宣建人、季薇、周君亮、彭歌、葛賢寧、馬各、孫陵、蕭白、文壽、江應龍、王臨泰、陳紀澄、司馬青山、王書川、尹雪曼、司徒衛、于衡、

³⁷ 穆中南。根據其他的資料顯示，他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來台的。（彭萱按：穆氏於一九九一年去世。）

³⁸ 魏希文。根據其他的資料顯示他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彭萱按：魏氏一九四九年來台，一九八九年去世。）

何凡、寒爵、柏楊、應未遲、程兆熊等。

梁實秋，一九〇一年生，北平人³⁹。一九四九年來台。一九四九年出版《雅舍小品》後，行銷三十幾版。梁實秋在大陸三〇年代就以反對左翼文藝，提倡資產階級人性說，曾受到魯迅的批判。梁實秋的小品文，清麗、樸實、富於幽默感。除散文之外，曾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及編著英漢辭典而著名。

徐鍾珮，一九一九年生於江蘇常熟⁴⁰。一九四五年任中央日報駐英特派員。把這戰時倫敦生活的經驗寫成《英倫歸來》（一九四九）及《多少英倫舊事》（一九八〇），散文集《我在台北》（一九五一）膾炙人口。此外有《哈安瑙小姐》、《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作品》等翻譯。王文漪，一九一四年生，江蘇江都人。來台以後有散文集《愛與船》（一九五一）、《晚來的明珠》（一九五六）等。劉心皇，一九一五年生於河南劉口。一九四八年來台，曾任《幼獅文藝》主編。著作有二十多部包括小說、詩、散文及論評。以《現代中國文學史話》、《自由中國文學三十年》等文學史著名。何凡，本名夏承楹。一九一一年生於南京⁴¹。一九四八年來台，一九五七年參加《文星》編務。作品有《不按牌理出牌》（一九六三）等十多部，多能鍼砭社會現象，婉曲而諷刺，立場公正。他的太太即為女作家林海音。

³⁹ 梁實秋。根據其他資料顯示，是出生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民國前十年農曆十二月八日。由於他出生於清朝時代，所以應該不是北平，而是北京。（彭萱按：梁氏於一九八七年去世。）

⁴⁰ 徐鍾珮。有一說，她出生於一九一七年。（彭萱按：徐氏已於二〇〇六年四月六日去世。）

⁴¹ 何凡。有一說，他出生於一九一〇年。（彭萱按：何氏於二〇〇二年去世。）

二女夏祖麗刊行《她們的世界》（一九七三）而有名。鍾梅音，福建上杭人。一九二二年生。⁴²。一九四八來台。有《母親的懷念》（一九五四）、《冷泉心影》（一九五二）、《小樓聽雨集》（一九五八）等。著作以散文為主共二十多本。蕭白，本名周仲勳。一九二五年生。浙江諸暨人。一九四八年來台。一九七四年在「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主編「中國新聞學叢刊」。作品以散文為主也有小說，著作共有三十多本。五〇年代除小說《破曉》（一九五二）刊行之外，散文集多在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行刊。柏楊，本名為郭衣洞。一九二〇年生，河南開封人。來台以後，一九六六年出任平原出版社社長，跟他的妻子倪明華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而出事，後繫獄達十年之久⁴³。出獄以後跟詩人張香華結婚。柏楊為小說家兼散文家。柏楊的散文，直接取材於台灣現實社會，反對特權、貪污和腐化。他的雜文所提的都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可以說做到了民眾的「喉舌」。柏楊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一九六二）、《倚夢閒話》、《牽腸掛肚集》（一九六八）等多種。小說有《異域》（一九六一）較著名⁴⁴。寒爵，本名韓道誠，一九一七年生，河北鹽山人。寒爵的雜文富於正義感、挖苦、諷刺兼而有之。著作有《信言不美集》（一九七八）、《戴盆集》（一九六四）、

⁴² 鍾梅音有一說她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彭萱按：鍾梅音一九二二年，出生於福建上杭，一九八四年病逝。）

⁴³ 柏楊「大力水手漫畫事件」。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因為柏楊所編輯的「中華日報」家庭欄的「大力水手漫畫欄」的漫畫的緣故，以侮辱元首首罪嫌被逮捕，入獄九年二十六天。漫畫的內容是，有某父子兩人買了個島嶼，島上僅有這父子二人，建立了王國，而兩人舉行了總統大選。（彭萱按：柏楊於二〇〇八年去世。）

⁴⁴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醜陋的中國人》（一九八五年八月 林白出版社），造成相當大的轟動，在中國大陸也廣泛地被閱讀，也出現大量的盜版本。有日文翻譯，在日本也成為暢銷書。

《百發不中集》（一九五四）、小說集《新儒林外傳》（一九八〇）等。

大陸新詩的發展始於五四的文學革命，五四以來的白話詩傳統，排除了舊詩的束縛，採用較自由的形式，以抒情爲主要的作品較多。然而，新的束縛又產生；即便是受了外來的歐美國律體詩的影響，注重耽美和雕琢。到了三〇年代又有一個轉變，新詩接受象徵、高蹈派的影響，注重曖昧的心理描寫。抗戰時，所有詩人都懷有熾烈的愛國情操和憂患意識，歌唱軍民的抵抗意識，描寫日本侵華的殘暴，有助於提高國民的愛國意識。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中國文藝協會獎勵反共與戰鬥性強烈的短詩和長詩。政治性很強的詩，難免損害到詩的本質，其藝術性和美學結構也受到影響。這一群反共詩人以鍾鼎文、紀弦、鍾雷、墨人、上官予、李莎、彭邦楨、葛賢寧等詩人爲主。不過，每個詩人的資質不同，有些詩人注重反共戰鬥，有些詩人卻懷念故土，將鄉愁和憂患抒發爲抒情詩。鍾雷本名爲翟君石，河南孟縣人，一九二〇年生。除詩歌以外，有戲劇和小說等創作。五〇年代有詩集《生命的火花》（一九五二）、《在青天白日旗幟下》（一九五五）、《偉大的舵手》（一九五五）等詩作刊行。葛賢寧爲文獎會《文藝創作》的主編，一九五〇年刊行《常住峰的青春》。寫懷鄉的詩最著名的當推鍾鼎文，一九五六年有《山河詩抄》，次年有《白色的花束》，皆重視意境的經營。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和李莎、覃子豪、紀弦等人在自立晚報

⁴⁵「新詩週刊」。設置在自立晚報的副刊。覃子豪主編。一九五四年三月時，被移到公論報副刊，又被改到《藍星》（不定期刊），由藍星詩社出版。一九五七年八月雖然出版了《藍星詩選》（隔月刊），兩期就停刊了。後來，一九五八年時在公論報設置了「藍星詩頁」（月刊）。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六十三期時停刊。

創刊「新詩週刊」⁴⁵。李莎的詩也懷鄉性強烈，有詩集《帶怒的歌》（一九五一）和《琴》（一九五六）等。上官予，一九四八年台，抗戰後期開始寫詩。出版詩集有多部，如《海》（一九四五）、《祖國在呼喚》（一九五一）、《自由之歌》（一九五五）等共十多部。他也較注重懷鄉情緒的發洩。楊喚，一九三〇年生，遼寧興安人，是一個早逝的軍中作家。一九五四年有詩集《風景》出版，是早期開拓兒童詩領域的詩人。

一九五四年，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夏菁、鄧禹平等籌組「藍星詩社」，並於公論報創刊「藍星週刊」。一九五八年創刊「藍星詩頁」。藍星的主要詩人除上述幾位外，尚有羅門、吳望堯、蓉子、黃用、彭捷、林冷、王憲陽、周夢蝶、張健^{（執筆名汶津）}、阮囊、龔虹、向明、曠中玉、方良、葉珊、方莘、白萩等。後來，余光中、夏菁等人相繼出國，覃子豪去世，「藍星」就無形中解體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紀弦⁴⁶創刊《現代詩》。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紀弦成立了現代派。加盟的八十三位詩人中，有方思、楊允達、蓉子、季紅、葉泥、吹黑明、羅行、辛鬱、林亨泰、黃荷生、鄭愁予、林冷、梅新、李莎、羊令野、秀陶、沙牧等人。「藍星」的成員

⁴⁶ 紀弦（一九二一—）。本名路逾，出生於河北省。一九三三年自蘇州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同年出版《易士詩集》，從一九三四年左右，開始在上海的雜誌《現代》上發表詩作。一九三五年和戴望舒相識，一九三六年時和徐遲、戴望舒共同創立了《新詩》月刊。戰後，以紀弦為筆名開始發表詩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來到台灣，編輯了和平日報副刊「熱風」。一九四九年在台北成功中學擔任教職。（彭萱按：「和平日報」疑為「平言日報」。）

大多數都接受西方新詩的影響，各自開拓自己的詩的風格，似乎也沒有什麼統一的主張，但是現代派不同，它有「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⁴⁷的主張。紀弦在大陸上曾經跟戴望舒交往頗久，很受影響，同時他也結交了不少日本詩人如草野心平，所以他是徹底的西化派。現代派要發揚光大波特萊爾以降所有新興詩派的精神，他們且認為新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他們要開拓新的形式和內容，新的工具和手法，強調詩的知性，追求詩的純粹性。也強調「愛國、反共、維護自由與民生」。現代派的主張影響台灣詩壇二十多年，直到鄉土文學論爭之後，他們的「全盤西化」才全面崩潰。

⁴⁷《現代詩》和現代派。《現代詩》以季刊的形式發行。一九六四年二月，四十五期時停刊。一九五六年一月時加入八十三名詩人，結成現代派，《現代詩》一九五六年二月第十三期，刊登了紀弦的〈現代派信條釋義〉。本文的「新詩的再革命」、「愛國、反共」之引用，可以在「釋義」中看見。「釋義」的主要部分如同以下所示。

「我等現代派的信條，六項目，是非常簡單明瞭的東西。爲了達成新詩近代化的目的、完成新詩的再革命的任務，我等希望得到文藝界人士以及一般讀者的廣泛理解和共鳴，來作爲精神上的支柱。因此，有必要再對我等之信條作更詳細的說明。

一、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揮光大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

二、我們認爲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

三、詩的新大陸的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

四、知性之強調。

五、追求詩的純粹性。

六、愛國反共，追求自由與民主。」

一九五四年十月，痲弦、洛夫、張默三人創刊《創世紀》⁴⁸。早期曾提出要建構「新民族詩型」的主張，但自第十一期（一九五九年四月）改版後，《創世紀》卻走上了現代主義的道路。《創世紀》的成員以軍中詩人為主，在沉悶的時局下，內心的苦悶鬱積，再加上受到超現實主義以及所謂純粹經驗的美學的影響，使他們的詩作後來逐漸脫離了現實生活，變成晦澀、怪異、缺乏秩序，無人看得懂的「個人夢囈」，終於在七〇年代初期受到關傑明、唐文標、尉天驄、顏元叔等人的強烈批判。事實上，《創世紀》在一九六〇年後，已淪為不定期詩刊，在第廿九期（一九六九年元月）出版後，又停了一段時期；一九七二年九月出版第卅期才繼續出刊。《創世紀》的主要參與者，除痲弦、洛夫、張默外，尚有季紅、林亨泰、李英豪、葉維廉、商禽、辛鬱、管管、白萩、大荒、葉泥、葉珊等。其中白萩、林亨泰後來加入《笠》。

王靖獻

省籍的詩人一直要等到六〇年代的《笠》創刊，才有共同耕耘的園地，在五〇年代他們是個別創作。這時期出發的有黃騰輝、黃靈芝、李政乃、謝東璧、邱瑩星、葉笛、何瑞雄、

⁴⁸《創世紀》。一九五四年創刊。平均以一年間三期的速度發刊，卻在一九五八年時中斷一年的時間，從一九五九年四月的第十一期開始，改版成爲季刊，一九六〇年又再度變成不定期刊物。一九六二年一月在第二十九期停刊。一九八〇年九月復刊。一九九四年出版了《創世紀四十年總目，一九五四—一九九四》（創世紀詩雜誌社）。《創世紀》當初主張「確立新詩的民族路線」（張默〈創世紀的路向〉，第一期），標榜了「新民族詩型的創造」（洛夫〈建立新民族詩型之芻議〉，第五期）。關於「新民族詩型」，洛夫這廝敘述著「從自然與生活當中採集詩的材料，運用新興詩派的各種技巧，透過新鮮的印象，來表現中國的『天人合一』、『心物一體』之最深遠、微妙的、被淨化、被美化的境界」（同前）。

郭文圻等人。一九五三年吳瀛濤出版《生活詩集》。一九五八年白萩出版詩集《蛾之死》。黃荷生出版詩集《觸覺的生活》（一九五六）。林亨泰在師範學院就學時，就出版了日文詩集《靈魂的初啼》（一九四九），並在台中跟張彥勳、葉翔文等作家於一九四三年共同創立了「銀鈴會」⁴⁹。桓夫、錦連、詹冰、羅浪都是日據時代末期開始以日文寫詩的詩人，五〇年代面臨了語言轉換的問題，正在力求突破。後起之秀如趙天儀、杜國清等詩人還是少年，則正在努力確立自己的風格。

另外，一九五六年四月，羊令野、葉泥創刊「南北笛」⁵⁰詩刊。同年，陳錦標也在花蓮正氣日報副刊創刊「海鷗」詩刊。

紀弦，一九一三年四月出生於河北清苑，本名路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來台，組織現代派。紀弦五〇年代刊行的詩集有《在飛揚的時代》（一九五一）、《摘星的少年》（一九五四）等。覃子豪本名譚基，一九一二年生於四川。來台以後曾組織「藍星詩社」。五〇年代有《海洋詩抄》（一九五三）、《向日葵》（一九五五）等詩集刊行。羊令野本名黃仲琮。

⁴⁹ 銀鈴會。一九四二年，由張彥勳等台中一中的學生們所組成，同仁雜誌《邊緣草》，到戰爭終結為止，出了十幾期。戰後以台中為根據地，集合台北師範學院的學生，再次組織起來，從一九四七年開始，以日語發行詩雜誌《潮流》季刊，直到一九四九年為止。林亨泰從一九四七年起加入銀鈴會，在《潮流》上面發表許多詩作。一九四九年時，他將戰前開始到一九四九年為止的詩作集結成日語詩集《靈魂の産声》出版。參照，三木直大《人類的悲哀》——詩人林亨泰之喪失與重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日本社會文學會第二回日台專題研討會「近代的日本與中國」）。

⁵⁰ 南北笛。一九五六年四月創刊，羊令野、葉泥共同編輯，利用嘉義商工日報副刊的版面，出到三十一期。一九五八年五月停刊。

一九二三年生於安徽，一九五〇年隨軍隊來台。五〇年代有散文集《感情的畫》（一九五四）出版。周夢蝶，一九二〇年生於河南新川。他的詩逃避現實，有隱士的思想。五〇年代有詩集《孤獨國》（一九五九）出版。余光中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福建永春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到台灣，一九五四年跟覃子豪、夏菁等人創辦「藍星」詩社。余光中的活動年代甚長，早期的詩回歸古典，中期加強爵士樂的節奏，近期則充滿鄉愁。五〇年代有《舟子的悲歌》（一九五二）、《藍色的羽毛》（一九五四）等詩集刊行。洛夫一九二八年生於湖南衡陽，一九四九年隨軍隊來台。一九五三年十月與痲弦、張默創辦《創世紀》。洛夫的詩大體上有超現實主義的風格。五〇年代有詩集《靈河》（一九五七）刊行。痲弦，原名王夢麟，一九三二年生於河南河陽，一九四八年隨軍隊來台。五〇年代有《痲弦詩抄》（一九五九）出版。商禽本名羅燕，一九三〇年生，一九五〇年來台，曾參加過「現代派」及《創世紀》。羅門本名韓仁存，一九二八年生於海南島文昌縣，一九四九年來台。羅門的詩追求「美」與「精神深度」的結合。五〇年代有詩集《曙光》（一九五八）出版。

第四節 突破與革新

一九五〇年，三十六歲的夏濟安來台，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他是個中、西文學涵養俱佳的學人。侯健說：在台灣大學時被擁戴為「寨主」，對朋友，一向是揶揄有加，從來不曾聽說他對任何人不滿（註8）。大陸淪陷後，他仍然非常注意歐美文學的新潮流，特別對

戰後在歐美興起的一股反共文學有濃厚的興趣。他也寫小說，有《火》和《蘇麻子的膏藥》，後一篇是反共小說。他的論評集《黑暗的閘門》由劉紹銘中譯。此外有《莫斯科的寒夜》、《美國散文選》等譯作，以及其弟夏志清在他死後編輯的《夏濟安日記》（一九七五）。著作稀少表示他是個技高一籌的藝術愛好者（dilettante）。一九五六年他創刊了《文學雜誌》，發行人為劉守宜，他負責主編。經常撰稿的有朱立民、余光中、林文月、林以亮、周棄子、夏濟安、梁實秋、陳世驥、勞榦、劉紹銘、鄭文德等一群所謂大學才子（college wits）。這本雜誌共發行四十八期，直到一九五五年夏濟安赴美印第安那大學研究才結束（彭萱按：一九五五年夏氏赴美進修，次年創刊《文學雜誌》。一九五九年再度赴美任教職。）。夏濟安在創刊號的〈致讀者〉一文裡，表明了他的信念：希望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在動亂中要保持樸實、理智、冷靜的作風。不想逃避現實，不提倡「為藝術而藝術」。反對共產黨的煽動文學，文學不是宣傳。

夏濟安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他反對五〇年代的反共文學；因為它不真實而注重宣傳。儘管他努力於吸收西方文學體系，但他卻是儒家信徒，他在〈致讀者〉裡最後寫道：「孔子的道理，在很多地方，將要是我們的南針：……。」可見，他不贊同五四的打毀孔家店的主張。夏濟安，一九一六年生，江蘇吳縣人。一九六五年二月在美去世⁵¹。五〇年代末期的《文學雜誌》的出現，的確扭轉了五〇年代閉鎖的文學風氣，提供了另一扇門，讓跟官方

⁵¹ 夏濟安。在大陸任職於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香港新亞書院，一九五〇年移到台灣，任職於台灣大學的外文系。一九五九年赴美，任職於華盛頓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一九六五年逝世於柏克萊。夏志清是其弟。

文學意見不同的作家發抒較不被束縛、自由、異質的文學理論和主張。它刺激了六〇年代「橫的移植」的浪潮的洶湧起伏。這也是繼承胡適的主張下了一個有力的註腳：文學應該是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作家必須在自由的環境下自由創作，不須任何機構的輔導。

五〇年代末期另外有一本影響力廣泛的雜誌就是《文星》雜誌。一九五七年創刊至一九六五年停刊。發行人葉明勳，社長蕭子孟能，早期由編輯委員會編，後來由李敖主編。《文星》為一綜合雜誌，但刊載的文藝作品甚多。它跟《文學雜誌》的學院派⁵²風格不同，比較容易引起廣泛的知識份子階層的閱讀興趣。這本雜誌的成員也是一群自由主義者，但比《文學雜誌》更為前進，後來演變成「全盤西化」，攻擊封建、迷信和愚昧，打毀孔家店。文星雜誌注重跟本地知識份子的聯繫，有台灣化的趨勢。

經常在文星撰稿的有文心、王尚義、汶津、李敖、何欣、金玉良、於梨華、林海音、孟瑤、郭衣洞、莊因、鍾肇政、趙滋蕃、朱介凡、李霖燦、東方望、思果、梁實秋、梁容若、張秀亞、錢歌川、王洪鈞、沈甸、童世璋、夏菁、徐道鄰、孫如陵等作家。

《文壇》月刊，一九五七年六月創刊⁵³，發行人穆中南，主編朱嘯秋。《文壇》沒有發

⁵²學院派。所謂學院，就是專科大學。指的是台灣大學的外文系出身，或者是和外文系所出版的雜誌《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有關係的知識份子們的集團，一般稱之為學院派。夏濟安可以說是其元祖。

⁵³《文壇》。一九五七年一月第四卷時停刊，同年十一月復刊，成為季刊。一九六一年六月的第十二期開始，又再度成為月刊。（彭萱按：《文壇》月刊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創刊，發行人穆中南，前五期社長王藍，第六期之後，由發行人兼社務及主編。）

刊詞，它是私人辦的雜誌，收容的作品，範圍很廣，培養了不少新作家。省籍作家鍾肇政的長篇曾經連載於《文壇》。早期在《文壇》執筆的作家有王岩、王藍、公孫嫻、朱西寧、林海音、孟瑤、師範、陳紀澄、彭歌、琦君、楊念慈、劉枋、蕭傳文、王文漪、艾雯、季薇、咸思、上官予、亞汀、紀弦、覃子豪、彭邦楨、鍾雷等。

五〇年代末期也是省籍戰後第一代作家逐漸抬頭的時代。除廖清秀和鍾理和之外，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七十萬字鉅著，也曾獲得文獎會的獎助。此外，陳火泉、施翠峰、文心、鍾肇政、鄭煥等作家，也有作品發表。一九五七年鍾肇政獲悉省籍作家漸漸出現，可是彼此之間一直未有連繫，且互相不認識，需要組織起來，發行刊物活動以便互通聲氣，互相砥礪。然而省籍作家大多窮苦，沒錢辦刊物，所以決定以油印方式編印「文友通訊」，以便對文友作品提出意見及刊載文友寫讀、生活動態的報告。「文友通訊」由鍾肇政獨自負起編務，開始於一九五七年四月，結束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共發行十六期。「文友通訊」的省籍作家有陳火泉、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鍾肇政、廖清秀、許炳成（文心）。稍後有許山木、楊紫江兩人參加（註9）。

陳火泉，一九〇八年生，鹿港人。日據時代末期以日文小說〈道〉曾入選日本芥川獎候

④芥川賞候補〈道〉。若是根據《文藝春秋》二十二卷三號，一九四四年三月號登載的芥川賞評選經過，從寄到《文藝春秋》的推薦作品中選取十篇的候補，第一回評選委員會時，從這當中選擇四篇作為通過第一次預選的作品，這當中卻沒有包括〈道〉。根據岸田國士的評選，候補作品十篇當中包括了〈道〉。參照，林瑞明〈決戰期台灣的作家與皇民文學〉（《岩波講座近代日本與殖民地6》，一九九三年五月，岩波書店）。

補⁵⁴。作品風格詼諧而諷刺有獨得的味道。一九六八年有短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問世。進入八〇年代以後有散文集《悠悠人生路》四書刊行⁴⁵。

李榮春，一九一四年生，宜蘭頭城人。戰時被日閥徵赴大陸，光復後返台。作品有長篇小說《祖國與同胞》，刊行了三分之一。另有《海角歸人》，一九五八年公論報「日月潭」連載，未結集⁵⁶。

施翠峰一九二三年生，鹿港人。五〇年代有短篇小說集《相信我》（一九六四），長篇小說《愛恨交響曲》（一九六六）、《歸燕》（一九六六）等刊行。現為研究台灣古文物、風俗權威學者。

許炳成，筆名文心，一九三〇年生，嘉義縣人。一九五八年印行短篇小說集《千歲檜》，一九六八年刊行長篇小說《泥路》。

林鍾隆，一九三〇年生，桃園楊梅人。他的著作多達六十本，長短篇小說、詩、散文、譯作、評論、兒童文學及兒童詩皆有。長篇小說《愛的畫像》（一九六七）、《暗夜》（一

⁵⁵ 陳火泉《悠悠人生路》。一九八〇年出版《悠悠人生路》、一九八一年出版《青春之泉》、一九八二年出版《個性的發揮》，合併稱為人生三書。這三本書和一九六八年時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獲得一九八二年的國家文藝創作特殊貢獻獎表揚。之後也持續出版許多的隨筆集，於一九九九年逝世。關於陳火泉，參照第二章翻譯注釋¹⁸²。

⁵⁶ 李榮春。只有在二一九五六年時出版了《祖國與同胞》當中的第一部。戰後也持續寫作，卻幾乎都沒有發表出來。一九九四年逝世。近年，由彭瑞金給予再評價，由晨星出版社出版了作品集《懷母》（一九九七）、《烏石帆影》（一九九八）、《海角歸人》（一九九九）。（彭萱按：彭瑞金主編《李榮春全集》十冊，已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由台中晨星出版。）

九六九) 爲他的代表作。

鄭煥，本名鄭煥生，桃園楊梅人。一九二五年生。長篇小說《茅武督的故事》(一九六六)、《春滿八仙街》(一九七〇) 較著名。

張彥勳，台灣台中人，一九二五年生。從日據時代末期就組織有詩結社「銀鈴會」，一直延續到光復初期。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小說，小說集《芒果樹下》(一九六三)、《川流》(一九六六)、《仁美村》(一九七三) 等，都在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刊行。著作共有十多本。

這一群以鍾肇政爲首的省籍戰後第一代作家，必須突破語言障礙，從日文轉到中文，同時他們也負有傳遞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香火，建立嶄新的台灣現代文學的使命。在生活的極端困苦下，他們必須負荷雙重的心靈壓迫孜孜不倦地寫作。其毅力與奉獻精神，促使台灣現代文學架構迅速建立，產生了可觀的作家和作品，其功不可沒。雖然五〇年代台灣戰後第一代作家中，有些作家已輟筆不寫或被歷史所埋沒，但缺少了他們建立台灣文學的熱烈意願，今天蓬勃的台灣文學也就不存在。其中具有關鍵性位置的作家鍾肇政，他的作家活動連續到八〇年代，作品源源不絕地問世，敢稱爲戰後台灣現代文學中的巨擘(註10)。

註：

- 1 董顯光 《蔣總統傳》。
- 2 戴國輝 《台灣史研究》，一九八五年三月，遠流出版社，一八〇—二〇〇頁。

- 3 《三本足の馬》，一九八五年四月，東京研文社，一七九頁。
- 4 王育德著《台灣》，一九七九年八月，台灣青年社，一七一頁。
- 5 《文協十年》，一九六〇年五月，中國文藝協會。
- 6 張素貞〈五十年代小說管窺〉，一九八四年三月，《文訊》十三期，一〇二頁。
- 7 劉心皇〈自由中國五十年代的散文〉，同前註五四頁。
- 8 侯健〈夏濟安先生的志業〉，一九八五年二月，《文訊》十六期，二三九頁。
- 9 鍾肇政〈關於文友通訊〉，一九八三年一月，《文學界》第五集，一一七頁。
- 10 鍾肇政〈艱困孤寂的足跡〉，一九八四年三月，《文訊》九期，一二三—一三四頁。

第五章 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

——無根與放逐

第一節 工業起飛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國民政府陷入內憂外患的狀態。儘管五〇年代以來依靠美國的軍經援助，推行了好幾期四年經濟計劃，發展農工商各種企業，但台灣害怕引進外資，卻讓日本的工業界、貿易界向台灣謀求發展，在台灣形成了許多合資公司，所以六〇年代初期的台灣社會，仍然停留在農業為主，工業剛起飛的狀態。

一九六二年秋天開始，中共的對日工作越來越積極。一九六三年池田內閣，准許以分期付款方式出售維尼綸成套設備給中共，這給國民政府帶來日本會承認中共的威脅。

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國正式承認中共，但法國同時宣佈無意與國民政府斷交，這使得「漢賊不兩立」的國策面臨挑戰。拖了兩個星期之後，國民政府堅持國策，毅然決定跟法國斷交。此後僵硬而缺少彈性的政策使得國府在外交上受到傷害與孤立。

一九六四年四月，舉行的第五屆縣市長選舉，台北市長一職歸於無黨無派的高玉樹。台灣民眾在選舉上表現的狂熱和激動，表示一股民主力量正在形成。

一九六四年九月，發生了彭明敏事件^①。台灣大學教授，國際上享有聲名的太空法權威彭明敏博士，因發表異端意見被捕，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獲得特赦，一九七〇年一月偷渡國外。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第一次進行核子試爆得到成功。台灣蒙受了中共核子傘的陰影。然而跟五〇年代的韓戰一樣，扭轉整個局勢的是，越戰的擴展及對岸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以一九六四年九月發生的東京灣事件為契機，一九六五年二月美軍開始轟炸北越，使越戰不斷的升級，美軍終於增派十萬大軍。這使得台灣的戰略位置益形重要，同時又在經濟發展上得到莫大的幫助。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發表演論文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以這為導火線，從一九六六年夏天起，整個大陸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中，且繼續了八年，使得中共國力受損傷，經濟活動停滯，整個大陸如同騷擾不已的蜂巢。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大陸來台人士的

^①彭明敏事件。彭明敏（一九二一—）是國際法的權威。戰前求學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戰後自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三十四歲成為教授，一九六一年當上系主任。彭明敏是「一中一台（一個中國，一個台灣）」論者，一九六四年時和他的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等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想要分發至全台灣，不料卻在未散發之前就被逮捕了。被處以八年的刑期，彭的聲望卻在國內外高漲了起來，而獲得特赦。一九七〇年秘密出國之後，在美國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一九九二年回到台灣，成為一九九六年的總統候選人，卻敗給了李登輝。

懷鄉情緒，鞏固了他們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愛國情操。

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國民政府接受美援，美國的軍經援助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停止為止，總共超過了十四億美元。美國的軍經援助，給國民政府提供了武器，彌補了貿易上的赤字，興建眾多的各級學校，打下基礎工業的根，建設了道路、橋樑、水庫、港口、上、下水。道。一九六二年，美國贈與方式的經援停止，開發援助和開發贈與也減少。因此，國民政府制定「獎勵投資條例」，設立「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接受外資，謀取投資環境的改善。如美國民營的美孚石油公司，就和中國石油公司合作在新竹生產尿素肥料。不過，國民政府始終怕強國的「經濟侵略」，所以引進外資政策不容易上軌道。

以六〇年代最後一年的一九六九年度為例，台灣的貿易總額到達二十三億一千五百萬多美元，輸出約為十一億一千萬美元，輸入約為十二億五百萬美元。入超額約為一億美元。其中，對日輸出為一億八千萬美元，由日輸入為五億美元。從六〇年代開始到八〇年代，台灣始終是日本的一塊肥肉。同時台灣的軍事預算，在一九六八年度佔中央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五，佔包括地方預算在內的總預算的百分之五十。

一九六六年三月，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總統，蔣中正四度蟬聯。然而四十名省議員聯名，向國民大會要求改選把持十九年之久的中央民意代表。中央民意代表的無限制任期，一直是國內政治體制的癥結所在^②。

② 中央民意代表。在中華民國，所謂的在國會的政治機構，稱作中央民意代表，由國民大會、立法委員、監察院組

第二節 橫的移植

一九六〇年，正在台灣大學就讀外文系的白先勇，跟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李歐梵等人創刊《現代文學》^③，後來王禎和、潛石與杜國清參加為編輯。《現代文學》從一九六〇年四月到一九七三年九月的十二年間共刊行五十一期，培養了許多年輕作家；如黃春明、七等生、施叔青、李昂、李永平、林懷民、忻約、陳映真等。此外，如成名作家朱西寧的小說〈鐵漿〉也發表在第九期。余光中、姚一葦、何欣等成名作家，也曾先後擔任過編輯工作。

《現代文學》的第一期出現了「卡夫卡特輯」，之後連續有幾期介紹了卡繆、亨利·傑姆斯（Henry James）、福克納、湯瑪斯·曼（Thomas Mann）、貝克特等歐美現代作家。他們提倡以「橫的移植」來代替「縱的繼承」，所以把存在主義、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超現實主義以至於反小說（New Roman）等現代前衛文學的意識形態和

成，其代表由中國全土以及海外華僑選出。一九四七年舉行選舉，選出了代表，卻因為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分裂國家的狀態，而依法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停止選舉。由一九四七年時選出來的代表一直沒有改選地持續當代表，長久以來持續著這種異常的狀態。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從七〇年代開始，適時地舉行了補選、增選。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當上總統之後，終於決定了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為期，停止「終身代表」的職權。

^③《現代文學》。一九六〇年創刊。一九七三年的第五十一期停刊。一九七七年七月復刊，以隔月刊的形式發行。前期的五十一期有復刻出版。

寫作技巧引進國內。

那麼，他們爲什麼主張「橫的移植」呢？這和五〇年代的文學環境有關。他們大都屬於來台第二代作家，幼、少年時在大陸度過。儘管他們對原鄉的幼、少年時代的記憶很清楚，但在原鄉缺乏謀生的生活經驗，來到這亞熱帶的新天地，他們的生活脫離了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因此，這塊土地雖給他們眾多新奇的經驗和印象，但他們還沒有充分的時間紮根於這塊土地。他們既不能承繼三〇年代、四〇年代的大陸文學，又無法跟這塊土地結合，只好大量吸收歐美現代文學潮流，在這外來的文學的基礎中建立他們的文學王國，他們正是於梨華曾說的「沒有根的一代」^④。儘管他們對五〇年代的反共懷鄉、鴛鴦蝴蝶派的文學有極端的反感，而且心裡總以爲夏濟安的《文學雜誌》的恢復五四文學傳統底主張是對的，但他們無法描寫台灣民眾的現實生活，以及不瞭解此地民眾三百多年被殖民的歷史，又無法深入地透視大陸生活的歷史性轉變，所以在如此的真空狀態中不得不以西方文學來填彌。他們不願以這塊新土地爲直接描寫的對象，是因爲五〇年代大肅清的陰影籠罩在心頭，而且他們都屬於依附權力機構生存的階層，生活環境限制他們不能摧毀自己生活之根的關係。正如白先勇在《明報月刊》一九六七年一月號發表的「流浪的中國人——台灣小說的放逐主題」所寫的一

^④「沒有根的一代」。於梨華在長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一九六七）當中，模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Lost Generation（中文翻譯爲「失落的一代」）一語，來爲自己的世代——被大陸逼迫而隨父母親渡海來台，成長於台灣，卻在台灣找不到生路，前往美國留學，雖然在美國有了工作，心中卻抱持著寂寞和對故鄉的想念的一代——命名爲「沒有根的一代」，此語風行於知識份子之間。

樣，他們這些第二代作家都有「無根與放逐」的意底牢結。白先勇在這真摯的剖析裡寫道：

「遷台的第一代作者內心充滿思鄉情懷，為回憶所束縛而無法行動起來，只好生活在自我瞞騙中；而新一代的作者卻勇往直前，毫無畏忌地試圖正面探究歷史事實的真況，他們拒絕承受上一代喪失家園的罪疚感，亦不慚愧地揭露台灣生活黑暗的一面。這自然不是易事，國府雖然很少干涉這些新進作家，出版檢查的陰影卻常常存在。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這些新一代的作者沒有機會接觸到較早時代的作品，因為魯迅、茅盾及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全遭封禁，他們未能承受上一代的文學遺產，找不到可以比擬、模仿、競爭的對象。因此，寫作生涯變成了困苦又孤獨的奮鬥。與『五四』時代的作家完全相反，這些作家為了避過政府的檢查，處處避免正面評議當前社會政治的問題，轉向個人內心的探索；他們在台灣的依歸終向問題，與傳統文化隔絕的問題，精神上不安全的感受、在那小島上禁閉所造成的恐怖感，身為上一代罪孽的人質所造成的迷惘等。因此不論在事實需要上面，或在本身意識的強烈驅使下，這些作家只好轉向內在、心靈方面的探索。」（註1）

既然這一群第二代作家以「無根與放逐」為文學的基本精神，那麼陳若曦、歐陽子和王禎和在這個寫作集團裡，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如眾所知，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光復後接受本地教育到大學的第一代，不幸他們開始也都是「無根與放逐」的。他們不但未能接受大陸過去文學的傳統，同時也不瞭解台灣三百多年被異族統治被殖民的歷史，且對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更缺乏認識。他們跟文化傳統雙重的隔絕，使他們同樣陷入「真空狀態」。然而，他們隨時代的開展，言論自由的擴大，逐漸認識了自己存在的緣由，在文學上拓開了燦爛的

領域，這些是後話。

不過，他們只是「橫的移植」，完全沒有「縱的繼承」嗎？這也並不盡然。然而他們所接受的卻是中國古典白話寫實文學的傳統。譬如白先勇的代表作，收錄其十四短篇的《台北人》（一九七二），便是以稱作「臨時首都」的大陸人最多的台北為中心，以艷麗的筆觸細刻了形形色色的來台第一代人士。這些人本籍各不相同；包括上海、南京、四川、湖南、廣西、北平等。職業亦各不相同；有將軍、侍從、各大學教授、高中老師、企業家、電影明星、舞女等。這些來台第一代，每一個人負荷著過去生活的重擔，在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的葛藤、生與死的矛盾中痛苦不堪。白先勇的這些短篇通常被人認定，描寫沒落貴族在台灣的肉體與精神的崩潰，這種描寫的主題明顯地承繼了《紅樓夢》的傳統，有極端虛無的無常感來統合主題。白先勇一九五二年來台，年僅十六歲。他的父親為著名的廣西派領袖白崇禧將軍；因此，他有機會親眼目睹來台權力階級的現實生活和心底深處的夢魘。此外，如王文興的《家變》（一九七三），以極端大膽的叛逆性，把舊倫理道德棄之如敝屣；這也顯現他們欲脫離傳統性事物，追求文學的本質所做的賞試。

然而，這種「無根與放逐」的文學主題脫離了台灣民眾的歷史與現實，同時全盤西化的現代前衛文學傾向，也和台灣文學傳統格格不入，是至為明顯的事實。台灣文學有其悠久的文學傳統，始於明朝末年，從古文學到白話文學有其脈絡可尋的傳遞。只不過是四〇年代、五〇年代的時代風暴，使其不得不斷絕而已。六〇年代中期肅清的白色恐怖已逐漸遠去，台灣社會漸漸脫離閉塞與自囚，恢復日據時代新文學的寫實精神，傳遞香火的需要也越來越迫

切。

一九六四年四月，曾經寫過大作《亞細亞的孤兒》的先輩作家吳濁流創刊了《台灣文藝》^⑤。以《台灣文藝》這種名字，日據時代也曾經刊行過好幾次，可惜都遭受殖民政府的彈壓未能長期的刊行。光復後，這一次猶如火裡重生的鳳凰(Phoenix)又復活了。吳濁流去世後，由第一代作家鍾肇政接辦，直到一九八三年一月由陳永興接棒，已歷經二十個苦難歲月。《台灣文藝》雖不曾標榜什麼意識形態，但是這本雜誌是承繼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基本精神的，主張文學反映人生，特別注重鄉土色彩，較傾向於寫實主義現實文學。因此，《台灣文藝》的根，紮在台灣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眾的風土。《台灣文藝》的主要作家包括了日據時代老作家，如張文環、楊逵、龍瑛宗、黃得時、王詩琅、吳濁流、巫永福、林衡道、吳瀛濤之外，幾乎跟大多數省籍作家發生過關係；如鍾肇政、張彥勳、鄭煥、林鍾隆、文心、葉石濤、廖清秀、黃靈芝、陳千武、徐和鄰等第一代作家，鄭清文、李喬、施明正、李魁賢、黃文相、林宗源、非馬、許達然、東方白、許其正、潘榮禮、丘秀芷、李

⑤ 《台灣文藝》。國民黨遷移到台灣之後，第一次冠上台灣之名來發行的文藝雜誌。現在也仍然持續發行中。一九六四年創刊。當初是以月刊的形式開始發行的，卻因為資金不足的緣故，從第二年起成為季刊，直到一九七六年吳濁流過世為止，總共出版了五十三期。一九七七年鍾肇政承接編輯工作，耳目一新地以革新號之姿，作為季刊發行。革新號第一期編輯「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以後每一號都編輯台灣人作家的專輯。一九八三年醫師陳永興承接下來，之後甚至有楊青矗、前衛出版社、李喬等承接編輯的工作。吳濁流編輯的時代，是台灣人作家發表作品的珍貴園地。鍾肇政編輯的時期，正好處於鄉土文學的全盛期，提供了許多爭議性之作品。八〇年代明顯表現出台灣本土化思想的立場，扮演了台灣本土化運動重要的角色。(彭萱按：該刊已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停刊。)

篤恭、鍾鐵民、七等生、江上、黃春明、張良澤、黃娟、鍾樺、趙天儀、劉靜娟、魏畹枝等第二代作家，以至於陳天嵐、陳詔華、馮輝岳、張秀民、林梵、周梅春、洪醒夫、彭瑞金、高天生、陳映真、陳若曦、宋澤萊、吳錦發等作家。

同時在一九六四年六月，由注重台灣現實狀況的一群現代詩人，白萩、陳千武、杜國清、趙天儀、林亨泰、王憲陽、詹冰、錦連、吳瀛濤、黃荷生、古貝、薛柏谷等創刊了《笠》^⑥詩雙月刊；至今也經歷了二十個艱辛的歲月，已出版一百二十多期。「笠」前後網羅了台灣中堅及年輕一代的詩人：葉笛、何瑞雄、李魁賢、林宗源、非馬、鄭炯明、陳明台、李敏勇（傅敏）、拾虹、陳鴻森、郭成義、曾貴海、陳坤崙、莊金國、黃樹根等，起初每個人的創作途徑不盡相同，之後漸漸獲得共識，走向詩人要歌唱自己生存的大地和人民這一條坦坦大道。《笠》和《台灣文藝》是以本土為重，有較自主性的兩大文學刊物，歷經二十多年的掙扎和折磨，仍然按期刊行，這也表現了台灣作家和詩人的傳統的奉獻精神、團結力和向上心。

在《台灣文藝》和《笠》兩種本土性很強的刊物裡，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的傳統精神，那便是對時代與社會強烈的批判精神。但是過份注重本土現實及社會性觀點的文學，難免也會產生一些弊端；亦即失去較寬廣的、世界的立場來分析鄉土問題的巨視性看法，以及歐美現代文學嶄新思想的吸收和容納。台灣文學無法避免要用世界性的眼光予

⑥ 《笠》。現在也以季刊發行中。（彭蒼按：《笠》至今仍以雙月刊方式發行。）

以審視，它是世界文學的一部份，由台灣本身去思考台灣的出路、抑或從較大的、世界的立場來剖析台灣社會的發展，這互有偏頗的觀點孰輕孰重，就構成了問題的癥結。由於台灣民眾與大陸隔絕幾達八十多年的時間，台灣實際也發展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學傾向；因此，主張台灣文學應有自主性，建立自己的文學，發展自己文學特性的主張也廣為流行。不過到了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陸續出現的許多代表性作品都犯了同一錯誤，過份強調鄉土性和社會性觀點的結果，所有作品失去了獨特的個性，變成如同一個樂器奏出來的，單調又統一的旋律；顯然，鄉土文學所缺乏的正是《現代文學》的前瞻性。進入八〇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歷經數次的變貌和爭執，已走向更自由、多元、寬容、巨視性的立場；這由黃凡、呂則之、王世勛、王幼華、李昂、蘇偉貞、吳錦發、蕭颯、向陽、林雙不、劉克襄、阿盛、周梅春、許台英等詩人、作家的作品裡可以看出來。

另外，一九六二年，參加中國文藝協會和詩人聯誼會主辦的新詩班結業的學員，創刊《葡萄園》詩刊，主要成員有：王在軍、李佩徵、藍雲、古丁、史義仁、宋后穎、文曉村、陳敏華、徐和鄰、楊奕彥等。他們主張詩的明朗化，反對虛無、怪誕和晦澀，目前仍繼續刊行。可惜同仁沒有強有力的創作，致對詩壇影響不大。

除屬於《現代文學》、《台灣文藝》和《笠》之外，尚有許多軍中作家，由堅強的民族立場來繼續寫作，但他們的傑出作品大多數主要題材，是以大陸原鄉的景觀和生活環境為背景的：如司馬中原的《狂風沙》（一九六五）、《路客與刀客》（一九七〇）等，六〇年代十多部長短篇小說集都是以民族傳統生活為主。同樣，朱西寧的《狼》（一九六三）、《鐵

漿》(一九六三)、《破曉時分》(一九七六)等七、八部長短篇小說集也大多數取材於大陸的社會現實。倒是田原有一些六〇年代的小說如《朝陽》(一九六五)、《圓環》(一九六八)是取材於台灣的社會狀況。此外，如段彩華的六〇年代的小說《山林的子孫》(一九六九)、《雪地獵熊》(一九六九)等，充分流露出這位作家吸收三〇年代文學的卓越技巧。尼洛，本名李明，江蘇人，一九二六年生。在六〇年代尼洛也刊行了許多反共小說，儘管那小說背景缺乏中共統治下民眾具體的生活，但描寫兒女之情確有細膩動人之處。高陽，本名許宴駢。六〇年代有《李娃傳》(一九六四)等，取材於唐朝傳奇的歷史小說刊行，不過他的重要活動皆在七〇年代，如歷史小說《慈禧全傳》(一九七二)。

在省籍作家群中也有不屬於任何寫作集團，而開拓自己寫作境界的：如林佛兒，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寫詩、散文和小說，有詩集《芒果園》(一九六一)，散文集《南方的果樹園》(一九六六)、《夜晚的鹽水鎮》(一九六八)等。林佛兒後來主持「林白出版社」，又在八〇年代開闢了大眾文學的領域，為台灣推理小說的發展盡了心力。（原在戰前學校畢業，後於日本碩大）《滄桑之後》在一九六九年出版，小說人物的刻劃生動，善用時空跳動來展開情節。一九六〇年，他和陳恆嘉、洪醒夫、黃朝湖、莊喆等作家、畫家創刊《這一代》月刊，可惜刊出數期之後夭折。詩人作家杜文靖在一九六九年已刊行散文集《踩紅磚的雨季》，後又出版了「杜文靖文輯『賦碑』等五種」(一九八二)，網羅了他所有的作品。旅居加拿大的作家東方白，在一九六九年出版《臨死的基督徒》，之後創作不斷，七〇年代有《露意湖》長篇小說出版。進入八〇年代後，竟有取材本土歷史的大河小說《浪淘沙》發表於《台灣文藝》及

《文學界》。黃海，也在六〇年代中期開始寫小說，到了末期，他開拓了SF的新領域，跟張系國並列為我國為數不多有成就的科幻作家。作品有《奔濤》（一九六四）及《銀河迷航記》（一九七九）等。隱地，本名柯青華、浙江永嘉人，一九三九年生，是小說、論評、散文等作家。一九六三年出版《傘上傘下》，一九六六年出版《一千個世界》，一九六七年出版論評集《隱地看小說》，進入七〇年代後主持「爾雅出版社」，以年度小說選的出版著名。邵峰，一九三四年生，江蘇南通人。他的創作活動集中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六〇年代有《小齒輪》（一九六六）、《在陽光下》（一九六七）、《泡沫、泡沫》（一九六九）等小說集出版，為一個多產作家，小說和散文集共有二十多部。子于，本名傅禹，一九一九年生，東北人⁷。他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寫小說，寫了六、七年，作品多登在《文學季刊》和「中央副刊」。小說集在七〇年代結集刊行，有《摸索》（一九七〇）、《艷陽》（一九七二）等。顏元叔，湖南茶陵縣人，一九三三年生。他的小說只有《夏樹是鳥的莊園》（一九七〇）、《舞會的裝飾人》等寥寥幾篇。他主要的工作是西洋批評文學的引進，是著名的論評作家（註2）。王鼎鈞⁸，山東臨沂縣人，一九二七年生。他本來以犀利的專欄或雜文聞名，在一九六九年大約寫了十多篇短篇小說。楊海宴也是五〇年代的著名作家，以《二楞子》一作著名。一九三一年生，湖南湘陰人。六〇年代也有少數小說發表。趙雲，廣東南海人，一九三三年生。六〇年代也有少量小說發表，為我國傑出女作家之一。沈萌芽，原名沈

⁷子于。根據《作家作品目錄》，出生於一九二〇年，天津出身。（彭萱按：一九五〇年來台，任教於建國中學，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病逝。）

⁸王鼎鈞。根據其他的資料顯示，出生於一九二五年。

明進，一九四七年生，台灣省雲林縣人。曾以〈鬼井〉一作獲得一九六九年吳濁流文學獎。林懷民，嘉義人，一九四七年生。六〇年代有短篇小說集《變形虹》（一九六六）和《蟬》（一九六九）出版。林懷民同時也是我國國際性的舞者之一，領導「雲門舞集」揚名世界。張曉風，一九四一年生，江蘇銅山人。有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一九六六）及短篇小說集《哭牆》（一九六八）在六〇年代刊行。舒暢，一九二八年生，湖北漢陽人，六〇年代有短篇小說問世。舒凡，本名梁光明，河北井陘人，一九四二年生。六〇年代曾有短篇小說發表。

省籍女作家中，創作力旺盛，在六〇年代大放異彩的是季季。她從六〇年代開始寫作，有小說集《屬於十七歲的》（一九六六）、《誰是最後的玫瑰》（一九六八）等。但是她較成熟而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說，如《拾玉鐲》（一九七六）、《夜歌》（一九七六）等是七〇年代才出現的。到此時，她已採取現實主義的觀點，在小說中表現了敏銳的解剖問題的能力。季季一九四五年生，台灣省雲林人，本名李瑞月，共有小說集十多本刊行。丘秀芷也是六〇年代後期嶄露頭角的女作家，有《遲熟的草莓》（一九六七）、《千古月》（一九六九）等小說集。

六〇年代除去《現代文學》、《台灣文藝》、《笠》有強烈的特色之外，一九六七年由林海音創刊了《純文學》⁹雜誌。這本雜誌色彩溫和而保守，它超越了各種流派，也容納了

⁹《純文學》。共發行六十二期，一九七二年二月停刊。

各種主張的作家的作品，很注重作品本身的品質。但由於作品所呈現的問題性張力小，逐漸走向女性化文藝路線而不得不停刊。

由於《現代文學》的過份西化與游離現實，《台灣文藝》的注重社會性觀點和強烈的地域性取向，使得六〇年代的一些知識份子覺得不滿，他們就努力找出折衷而統合的路線，以民族風格為其前提條件，以嶄新的歐美現代小說的技巧來處理本土問題的癥結。同時把台灣當作屬於第三世界的一環，追求跨國企業的經濟、文化侵略、消費社會人心的腐敗等，都變成小說的題材。

不過，這種統合「現代」與「鄉土」而另起爐灶的嘗試早就在五〇年代中期就開始。一九五九年，以政治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尉天驄為中心，接辦了《筆匯》^⑩的編輯。《筆匯》的作家陣容大多數為大學文學系的教授和學生，跟《文學雜誌》一樣有濃厚的學院派傾向。雖然《筆匯》的創作方向也帶著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往往與現實環境脫節，但他們努力於擺脫反共文藝的陰影，把文學拉回純粹文學的道路上，這是值得肯定的成就。《筆匯》的主要作家有任卓宣、何欣、劉大任、尉天驄、瘧弦、姚一葦、郭楓、白先勇、葉笛、陳映真、余光中等詩人作家。當中作品較多的是陳映真；他在《筆匯》發表了下面重要作品：〈麵攤〉（一九五九、一）、〈家〉（一九六〇、三）、〈復仇〉（一九六〇、四）、〈鄉村的教師〉（一九六〇、八），以及批評鍾理和小說集《雨》的評論（一九六〇、十一）等。

^⑩《筆匯》。一九五九年五月創刊，當時的發行人是任卓宣。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的第二卷一〇期時停刊。

一九六六年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七等生等作家，創刊了《文學季刊》¹¹，批判六〇年代文學的現代主義和游離現實。邁向新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路程，有助於七〇年代文學的欣欣向榮。一九七二年《文學季刊》停刊，改組後以新的面貌出現；那便是《文季》¹²季刊。《文季》曾經刊登了七〇年代文學旗手的王拓的作品〈廟〉和〈炸〉，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等作品，加強了現實主義文學的色彩。可是這些年輕一代的作家跟老作家吳濁流接觸較少，已經不是樸實、忠厚的老調鄉土文學了。這可能是這些新一代的作家不太認識台灣本土意識濃厚的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傳統，而是著重思考整個中國的命運。到了八〇年代工商消費社會的複雜面貌出現時，《文學界》和再次復刊的《文季》等文學刊物的相繼出現，催促了許多新作家的誕生，作品的品質大大提高，證明因《文學界》、《文季》季刊的一番處理，則「現代文學與鄉土文學的離反和統合」有了具體的效能。

五〇年代，除任卓宣對三民主義的文學理論做過詮釋以外，其餘理論文章，有些仍是炒冷飯，重彈五四文學革命主張的老調，《文學雜誌》的創刊宗旨舉出的幾條創作路徑，並沒有脫離五四的亡靈。《文星》、《文學雜誌》引進了西方文學理論：如意識流、內心獨白、

¹¹《文學季刊》。一九六六年十月創刊。發行人是尉素秋，主編是尉天驄。雖然是季刊，途中卻變成不定期出刊，總共出版了十二期。一九七一年四月停刊。

¹²《文季》。承接在《文學季刊》停刊之後，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創刊。發行人是陳達弘，召集人為何欣、尉天驄。第二期於十一月出刊，以後變為不定期，第三期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出刊。（彭管按：第三期五月出刊。）

存在主義等，除存在主義是較新的理論之外，其餘都是一九二〇年代喬哀思以後風行世界各國的創作理論。存在主義的確迷住了六〇年代的台灣年輕人，而這深奧的哲學思想，丹麥齊克果（Kierkegaard）在十九世紀初創造以來，已歷一百年，也不見得是前衛的思想。存在主義哲學風靡了六〇年代¹³，究竟它與台灣的時代社會環境有什麼關聯和意義，在此地也乏人研究。六〇年代國外的學者對古典文學的新闡釋倒別開生面，使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闡釋中國古典，如陳世驥、柳無忌、夏志清¹⁴等便是。此外，台大外文系的朱立民和顏元叔¹⁵介紹新批評、比較文學等理論，影響很大。

六〇年代的散文有一部分作家承繼三〇、四〇、五〇年代的傳統繼續寫作。雖然五〇年

¹³ 存在主義哲學風靡了六〇年代。六〇年代後半，卡謬的《異鄉人》、沙特的《嘔吐》、卡夫卡的《蛻變》等作品和存在主義有一段一同受到讚賞的時期，對於年輕一代的作家和知識份子的思考擁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參照周伯乃〈西方文藝思潮對我國六十年代文學的影響〉、何欣〈六十年代的文學理論簡介〉（《文訊》月刊第十三期）。彭瑞金指出，和存在主義同時間，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影響也很大，於梨華、白先勇、王文興等，多多少少都在作品中放入了戀母情節和亂倫禁忌（《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一一八、一一九頁）。

¹⁴ 陳世驥、柳無忌、夏志清。他們都是在美國的英文學者。陳世驥出生於一九一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文系教授，發表有關中國古典詩的論文在《文學雜誌》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柳無忌出生於一九〇七年，柳亞子之子，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到耶魯大學就讀。印第安那大學中文系教授。以蘇曼殊的研究為人所熟知。夏志清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夏濟安之弟。滬江大學畢業以後，在耶魯大學英文系就學。在密西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教書。有《中國古典小說》（一九六八）等著作。

¹⁵ 朱立民、顏元叔。朱立民（一九二〇—一九九五），上海人，出生於哈爾濱。中央大學畢業，公爵大學英美文學博士，以比較文學研究出名。顏元叔（一九三二—），湖南人，出生於南京。台灣大學畢業，威斯康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兩位都在台灣大學任教，創刊《中外文學》。

代顯著的懷鄉情緒已逐漸淡去，但仍有古典散文的風花雪月的格調。如梁實秋、陳之藩、思果等的散文就屬此類。另外受到西方文學重象徵、意象、感性、顛倒時空感的散文也出現。譬如余光中的散文跟他的詩一樣，由意識流來建構散文世界。本土作家如洪炎秋、葉榮鐘等的散文，有些根據台灣歷史、人物和掌故，跟日本文化的對照下，銳利地批判台灣的社會狀況，近似文明批評了。此外，在報刊雜誌寫專欄的所謂雜文家也不少，如彭歌、王鼎鈞、趙滋蕃等可說是小說家，寫專欄是客串性質。何凡、茹茵、鳳兮、仲父、亮軒、楊子、張健（汶津）、子敏、寒爵等人都是雜文為主的散文家。其中有些人也會寫文學評論、小說或詩。詩人兼散文家也不少，如紀弦、夏菁、管管、楊牧、蕭白等。女散文家更多，如張愛玲、徐鐘珮、潘琦君、張秀亞、葉曼、鍾梅音、艾雯、羅蘭、張菱舫、張曉風、胡品清、薇薇夫人等。

梁實秋¹⁶本名梁治華，一九〇一年生於北京。他是個英文學者，除譯有《莎士比亞全集》三十七冊以外，散文著作有《浪漫的與古典的》（一九二七）、《雅舍小品》（一九四九）等二十多本。思果，本名蔡濯堂，江蘇鎮江人，一九一八年生。思果是個翻譯家兼散文家，他的作品有《河漢集》（一九六二）、《私念》（一九五六）、《思果散文選》（一九六六）、《翻譯研究》（一九七二）等。洪炎秋，本名洪樵，台灣鹿港人，一九〇二年生，六〇年代的散文集有《廢人廢話》（一九六四）、《又來廢話》（一九六六）等。葉榮

¹⁶ 梁實秋。參照第四章譯注³⁹。

鐘，也是台灣鹿港人，有《半路出家集》（一九六五）、《小屋大車集》（一九六七）等。楊牧，本名王靖獻，早期筆名葉珊，台灣花蓮人，一九四〇年生，有詩集《花季》（一九六三）、《燈船》（一九六六）、《葉珊散文集》（一九六八）等在六〇年代出版。

六〇年代毫無疑義的是現代詩蓬勃發展的時期。以五〇年代就開始寫詩的中年詩人為主，逐漸加入了許多新秀。他們皆注重語言的創新和突破，尋求新的經驗和節奏，這使得台灣現代詩越來越脫離民眾的現實生活，變成晦澀、難解，只有詩人本身才能看得懂的詩。過份注重藝術性和美感的結果，忽略了詩的社會意義，使詩變成新的無病呻吟¹⁷，直到七〇年代，詩的本質、詩的存在條件等才重新被檢討，以至於建立了較能被民眾接受的，以大眾語言寫成，歌唱民眾生活的詩。六〇年代主要的詩人為余光中、痲弦、白萩、羅門、洛夫、周夢蝶、羊令野、葉珊、商禽、蓉子、桓夫（陳千武）、向明、張默、季紅、錦連、吳瀛濤、林亨泰、詹冰、張健、葉維廉、杜國清、趙天儀、李魁賢、林宗源、吳宏一、夏菁、鄭愁予等。

六〇年代的詩壇，圍繞著晦澀與明朗之間論爭，但毫無結果，如前所述，到七〇年代才有具體的修改和進步。一般說來，《現代詩》和《創世紀》集團一直走的是現代主義的路線。《笠》介紹新即物主義，強調現實主義。《藍星》則在古典和現代之間彷徨，有時也有更前衛的詩作出現。

¹⁷無病呻吟。胡適在一九一七年倡導文學的改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列舉了「八項」舊文學之弊害，其中第四項就是「無病呻吟」。看似玩笑卻很嚴重深刻。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

白先勇，一九三七年生於廣西桂林。一九六〇年創刊了《現代文學》。他的短篇小說集有《台北人》（一九七一）、《謫仙記》（一九六七）、《遊園驚夢》（一九六八）¹⁸。白先勇的小說主題大約有三條路線：其一是描寫大陸來台第一代人形形色色的生活。成爲這批人骨幹的是在大陸曾經掌權的一些黨、軍、政、文教界的領導者，以及圍繞著這批人生活的較下層的庶民。這一批人在大陸已形成無形的貴族階級，來台以後，他們之中有些逐漸沒落變成「斜陽族」，而依靠這權力生存的庶民有些也沒落，有些卻獲得新生。不過他們共同的憂患就在無根的飄泊感。他們無法認同這陌生的土地，也無從紮根，只能在回憶中，迷戀過去的榮華富貴而逐漸凋零。白先勇，一九六二年到美國之後，描寫的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學人等的生活。這種主題仍然圍繞著「放逐與飄泊」不放，充分表示沒落的舊官僚和資產階級的，缺少民族意識的真相。這時期的小說以《芝加哥之死》（一九六四）、《花橋榮記》（一九七〇）等做代表。第二種小說是描寫台灣下層民眾的生活如《孤戀花》（一九七〇）。唯有在第三類小說裡，可以看到白先勇的成熟和精確的寫實風格。八〇年代的長篇小說

¹⁸ 白先勇的作品。日文翻譯作品如下列。〈冬夜〉（《台灣現代小說選I 彩鳳の夢》收錄）。〈玉卿嫂〉、〈寂寞的十七歲〉、〈花橋榮記〉、〈謫仙記〉（《最後の貴族》收錄）。〈永遠的尹雪艷〉、〈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バナナボート》收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台北ストーリー》收錄）。

說《孽子》（一九八三），以玻璃圈陰濕的生活為主題，以台北新公園來代表整個六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的時代空氣，寫活了六〇年代台灣大陸人的生活動態及其生活方式。

白先勇是唯一成功地把中國傳統白話小說，如《紅樓夢》等的優秀寫實主義，和西方意識流等小說技巧熔於一爐的作家，筆觸充滿了憂悵和感傷，對大陸來台第一代人雖有些嘲弄，但憐憫多於批判，所以他的小說缺少鼓舞的力量，倒有些頹廢和沮喪。

王文興，一九三九年生於福建福州。一九六〇年參與《現代文學》的創刊。王文興的作品不多，創作態度嚴謹。一九六七年出版《龍天樓》，之後有《玩具手槍》（一九七〇）、《黑衣》，長篇小說《家變》（一九七三）和《背海的人》（一九八一）等。這些短篇小說的主題，主要是命運、人性的殘酷、軟弱和無奈。《龍天樓》是五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他這篇小說象徵性多於寫實，他注重的是文化上的懷鄉。《家變》這一本長篇小說的出版，引起了台灣文學界的震撼。《家變》描寫父子之間的矛盾、相剋和衝突，在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裡的家庭的瓦解。《家變》的主角幼年時尊敬、孝順父親。長大後，價值取向改變，在現實生活中無力改變現實，把父親趕出家門來成就心裡的改革意識。這篇小說「逆其道而行」，把傳統的倫理思想棄之如敝屣，卻也暗示了在消費社會裡的人性的頹廢和殘酷。不過這篇小說帶來的最大刺激，在於那「文學創新」。為了表現小說中設定的情況，反映那微妙的心理起伏，作者不惜用自創一體的文句，以完全否棄傳統文字秩序的文字去描寫。這本來是不足為奇的，作家有權自由創作和創新，如喬哀思（James Joyce）的「攸里西茲」不正是如此嗎？但是民族的傳統語言自有其優美和節奏的特質，任意破壞是否得到預期的效果，

實在很難論定。一九八〇年所寫的《背海的人》，這種新造句越加顯著，受到一部分評論者苛刻的批評。

張系國，一九四四年生於重慶，江西南昌人。他是一位學有成就的科學家和文學家。張系國是一位多產作家，且寫作領域很廣，在台灣開拓了科幻小說的新領域。張系國認為小說必須反映現實、關心人生、追求理想。他以為建立一個人道的、整合的社會，能照顧各階層的利益才是重要的。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皮牧師正傳》，以善意而輕快的諷刺手法揭露神職人員的欺瞞和虛偽。可是這篇小說主觀性強，批判性弱，脫離了小說的客觀性。一九七〇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地》，以人和土地的關係為主軸，描寫人們心裡尋根的慾望。但是張系國的主要創作活動都在七〇年代展開，有《昨日之怒》（一九七八）、《黃河之水》（一九七九）、《棋王》（一九七五）等長篇小說集和《香蕉船》（一九七六）、《天城之旅》（一九七七）等短篇小說，以及科幻小說《星雲組曲》（一九八〇）等的出版¹⁹。其中《香蕉船》這一篇短篇最富於現實感覺，描寫了到美國跳船想做非法移民的一個水手被押回台灣的流程；揭露了台灣居民在七〇年代裡偏差的心態。張系國是融和西化派和鄉土派寫作優點的作家，有尖銳的前衛意識。這種特質給八〇年代出現的外省籍第二代作家帶來寫作的典型和格調。

¹⁹張系國的作品。張系國的日文翻譯作品如下列。〈香蕉船〉、〈水淹鹿耳門〉（《バナナボート》收錄）。〈夜曲〉（《台北ストーリー》收錄）。早川書房的《SF雜誌》一九九〇年七月（第三十一卷第九號）中編輯了〈台灣SF特輯〉，從《星雲組曲》、《夜曲》抄錄翻譯下來。

王禎和，一九四一年生，台灣花蓮人。在台大外文系一年級就讀時，已發表處女作〈鬼、北風、人〉。不過他主要的作品如〈嫁妝一牛車〉、〈三春記〉、《來春姨悲秋》等小說，都發表在《文學季刊》上。王禎和的小說世界紮根於台灣鄉鎮，以描寫小人物悲苦的生活見稱。他主要把重點放在小人物生活中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猶如停滯一般的「尷尬」時間，來詮釋悲劇的真相。他是個寫實主義者，很少把作者的觀感露出在小說裡，但能讓人確實地感受到作者悲天憫人的胸懷。他大量地使用方言，但這些方言並不一定是實際生活中的方言，卻落實在他鑄造的「文學語言」裡，此點跟王文興的新造語有些不同。他後期的小說〈香格里拉〉、〈小林來台北〉、《美人圖》（一九八二）等逐漸加強了社會性觀點。如〈小林來台北〉對崇洋傾向有批判和蔑視。

黃春明，一九三九年（彭萱按：應為一九三五年）生於宜蘭，一九六二年在《幼獅文藝》發表〈男人與小刀〉後，短篇小說的發表漸多。他的主要短篇小說〈兒子的大玩偶〉、〈癱〉、〈溺死一隻老貓〉以及〈看海的日子〉²⁰都發表在《文學季刊》上。黃春明的早期作品如〈男人與小刀〉等根據別人的生活經驗而寫，在思想和藝術上還不能確立自己的風格。中期作品如〈籬》等描寫台灣農村，表現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及外來經濟的侵蝕下，台灣農村傳統生活方式和經濟的崩潰、以及許多小人物的悲劇。後期的作品主要描寫城市生

²⁰黃春明的作品。黃春明的日文翻譯作品如下列。〈莎啞娜啦·再見〉、〈蘋果的滋味〉、〈看海的日子〉（《さよなら・再見》收錄）。〈戰士，乾杯！〉（《バナナポート》收錄）。〈放生〉（《鳥になった男》收錄）。

活，揭露開發國家的城市居民在外來經濟的滲透下的災難，反映勞工的困境；如〈莎啞娜啦·再見〉、〈兩個油漆匠〉等。黃春明的小說表現出在生活的壓力和摧殘下堅忍的生命力，同時給這些人物賦予尊嚴的、不容人欺負和嘲弄的堅毅形象。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一九三九年生於通霄。通常人們都說他是隱遁性的作家。從參加《文學季刊》的創刊以後，一直創作不斷，到八〇年代的中期，還有作品問世。一九六九年從林白出版社上梓的《僵局》是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七〇年代是他創作的巔峰時期，有《放生鼠》（一九七〇）、《巨蟹集》（一九七二）、《離城記》（一九七三）、《我愛黑眼珠》（一九七六）及長篇小說《沙河悲歌》（一九七六）等共十多本。他的創作從初期的「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強烈衝突，進入內在的反省，轉至經由全面的批評，追求自我的實現，最後逐漸加強社會性觀點，注視現實世界，發掘現代社會的病灶，有逐漸擺脫隱遁性的傾向。七等生的小說，最能表現台灣社會的虛偽和墮落，染上六〇年代社會暗淡憂鬱的色彩。

鍾肇政，一九二五年生於台灣桃園，係龍潭人。光復後三年，他的第一篇小說〈婚後〉在《自由談》發表。一九六〇年第一部長篇小說《魯冰花》，獲台北扶輪社文學獎。鍾肇政是省籍戰後第一代作家，經過日文轉換中文寫作的艱苦過程，完成了他雄壯瑰麗的文學世界；其堅毅的文學精神和建立台灣文學的使命感，令人折服。初期的短篇小說，把試探的觸鬚伸入到台灣人心靈的每一個隱秘的角落，使用各種前衛性的現代小說技巧去表現，可以說達到台灣短篇小說的頂峰。他的小說都紮根於客家農民的生活，常表現出台灣客家人的中原

意識，古樸的生活習慣和理想主義。不過，鍾肇政擅長於寫長篇小說，孜孜不倦地寫到八〇年代，從不氣餒；這種「文學之鬼」的作家精神，可以比擬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作家的資質。他的長短篇小說集大約有二十多部，其中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間寫成的一千一百多頁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以及在七〇年代分別刊行的另一部大河小說《台灣人三部曲》。八〇年代有另一部取材於山地民族英雄史詩的「高山組曲」三部作品出現，不過除第一部《川中島》、第二部《戰火》刊行之外，第三部還在寫作中²¹。鍾肇政的長篇小說規模格局雄大，主要在呈現台灣人在歷史的各階段裡被虐待、被壓迫的生活現實。

鄭清文，一九三二年生於桃園。鄭清文跟李喬同是屬於省籍戰後第二代作家，他們都曾受過幾年日文教育，對「日本天年」的陰影猶能記得清楚。由於他們通曉日文，所以吸收外國文學的能力和領悟力頗高。借李喬的話來說，鄭清文善於描寫「悲劇的流程」。他大部分的短篇小說，都由人內心生活的透視來浮現時代、社會的轉變給人內心世界的制約和反應。一九六五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簸箕谷》，之後陸續出版《故事》（一九六八）、《校園裡的椰子樹》（一九七〇）以及長篇小說《峽地》（一九七〇）。進入七〇年代有《現代英雄》（一九七六）、八〇年代有《最後的紳士》（一九八四）、《局外人》（一九八四）、

²¹ 鍾肇政的作品。鍾肇政的「高山組曲」第一部《川中島》、第二部《戰火》，於一九八五年四月發行。鍾肇政寫了許多取材自台灣歷史的大河小說，這部「高山組曲」是描寫霧社事件和高砂義勇軍的作品。從很早以前就開始寫以原住民為主題的作品，日文翻譯有《獵熊的人》（《悲情の山地》收錄）。

《大火》（一九八六）²²等。鄭清文以平淡無奇的筆觸來呈示驚浪怒濤迭起的深層心理的活動。有人認為他有冰山理論：「留下深潛水內的部分給讀者去思索」（註3）。

李喬，本名李能棋，一九三三年生於苗栗。李喬跟鍾肇政一樣是客屬作家。他的小說自然以台灣客家人的生活為題材。李喬的父親為一抗日志士，備受日本人的欺凌和摧殘。李喬自幼在窮苦和重壓下生長，但從不屈服。他跟鄭清文一樣受過日文教育，在五〇年代荒蕪的時代空氣下長大，這留給他的心靈陰慘的記憶。他的第一本小說《飄然曠野》出版於一九六五年。之後，陸續出版了《戀歌》（一九六八）、《晚晴》（一九六八）、《人的極限》（一九六九）、《山女》（一九七〇）等短篇小說集及長篇小說集《山園戀》（一九七一）

²³。一般說來李喬是台灣作家中最善於驅使西方現代小說技巧的作家，意識流、內心獨白及時空倒錯是他的短篇小說裡司空見慣的技法。但是他不同於「現代文學派」；他的小說紮根於台灣現實大地，栩栩如生的台灣現代社會的實際人物，都活躍在他的小說世界。他的世界觀也不同於西方現代作家，他用佛教倫理的思考方式來剖析人生的各種痛苦，並觸及到「輪迴」的問題，跟他的先輩作家鍾肇政的初期小說一樣開了先河，比美國的諾曼·梅勒早了幾年。他的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從七〇年代末期開始寫作，依次為《寒夜》、《荒村》

²² 鄭清文的作品。日文翻譯的作品如下。（三腳馬）（《台灣現代小說選III 二本足の馬》收錄）。兒童文學《阿里的神木》。

²³ 李喬的作品。日文翻譯作品如下。論文《我看〈台灣文學〉》（筆名壹蘭提，《台灣現代小說選II 終戰の賠償》收錄）。《小說》（《台灣現代小說選III 二本足の馬》收錄）。《告密者》（《バナナポート》收錄）。

及《孤燈》。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才全部刊行。李喬自己曾說，這三部曲是敘述台灣島開發及歷史事件的小說。李喬這三部作品重點大約放在「台灣民主國」、「台灣割讓」，日據時期的台灣民眾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活動，以及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民眾在日本侵略戰爭中當砲灰的苦難生涯。日本批評家以為這部大河小說的構成不太令人滿意，作者避開了戰後二·二八及「白色、荒廢的五〇年代」，有避重就輕之嫌。寫了《寒夜三部曲》以後的李喬，企圖打破政治的禁忌，有短篇小說〈小說〉等的政治小說出現，給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帶來震撼和衝擊（註4）。

陳映真，一九三七年生於苗栗縣竹南，曾參與《文學季刊》的創辦，八〇年代參與《文學季刊》、《夏潮論壇》等雜誌的編務。陳映真把自己劃定為街鎮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他的作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八年的時代，以及一九七五年以降從監獄回來的時代²⁴。在第一個寫作階段也可以分為早期和近期；早期的小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主要是在《現代文學》寫作的時期。這時期的作品憂鬱、傷感、蒼白、充滿著苦悶；近期裡，理性的凝視代替感性的排拒，冷靜而寫實的分析代替了煽情、浪漫的發洩。他的代表作《將軍族》（一九七五）、《第一件差事》（一九七五）等，是「對於寄寓於台灣的大陸人的滄桑的傳奇，以及在台灣的流寓底和本地的中國人之間的人的關係所顯示的興趣和關

²⁴ 陳映真的入獄。陳映真在一九六八年以作家的身分受到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計畫的邀請，卻在赴美之前因為閱讀了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而以宣傳共產黨之罪名被捕，服刑七年。於一九七五年被釋放。

懷」(註5)。出獄以後的陳映真，主要探討跨國企業對第三世界的經濟的、文化的侵略，以鮮明的意象描畫了第三世界民眾的心靈的污染、扭曲和頹廢、有時候是抗拒和掙扎。作品有〈賀大哥〉(一九七八)、〈夜行貨車〉(一九七八)、〈上班族的一日〉(一九七八)、〈雲〉(一九八三)及〈萬商帝君〉(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開始把五〇年代的真實狀況寫成小說，如〈鈴璫花〉(一九八三)和〈山路〉(一九八三)²⁵。陳映真是富於知性的思索性作家，這個資質在海峽兩岸作家中很難覓得。

鍾鐵民，一九四一年生於瀋陽，台灣美濃人。六〇年代初開始寫作。作風承繼其父鍾理和的風格，題材多取自美濃客家農民，被稱為農民作家。一九六五年出版短篇小說集《石罅中的小花》，一九六八年出版《菸田》。七〇年代有《雨後》(一九七二)、《余忠雄的春天》(一九八〇)出版。鍾鐵民由鍾理和遺產山田二分多中獻出約一分地建立鍾理和紀念館²⁶，以便蒐集保存台灣近、現代作家資料，供後人研究。

²⁵ 陳映真的作品。陳映真的日文翻譯作品如下。〈鄉村的教師〉(筆名許南村，《台灣現代小說選I 彩鳳の心願》收錄)。〈山路〉(《台灣現代小說選III 三本足の馬》收錄)。〈歸鄉〉、〈歌唱「同期之櫻」的老人們〉(《歸鄉》收錄)。探討陳映真之作品與思想的有山田敬山〈陳映真—苦惱的台灣知識份子〉(《岩波講座現代中國第五卷》一九九〇年一月岩波書店)，岡崎郁子《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第三章 陳映真—持續對中國革命抱持希望的政治作家」。

²⁶ 鍾理和紀念館。張良澤、鍾肇政、林海音、葉石濤、鄭清文等為發起人，招募捐款，設置在鍾理和的老家所在地，高雄縣美濃鎮尖山。是台灣人作家首座文學紀念館，於一九八三年八月開幕。由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管理營運，鍾理和的長子鍾鐵民參與實際的工作。

歐陽子，本名洪智惠，一九三九年生，台灣南投人。為《現代文學》創辦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出版《秋葉》²⁷，共收十四篇短篇。她的小說表現人的複雜性與多面性，以西方心理小說的技巧來處理中國現代女性的各種遭遇。赴美後，作品減少。

於梨華²⁸，一九三一年生，浙江人。她的第一本小說《夢回清河》一九六三年出版，充滿憂鬱的懷鄉情緒。同時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歸》（一九六三），以留美學生的滯留不歸的漂泊感為主題。她的長篇小說有《變》（一九六五）、《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一九六七）及《燄》（一九六九）。其中《燄》描寫她的大學時代眾多年輕知識份子被捕繫獄的情景，反映了時代險惡的空氣。

施叔青，一九四五年生於台灣鹿港。初期小說取材於古老的街鎮鹿港的較多。六〇年代有兩本短篇小說集《約伯的末裔》（一九六九）和《拾掇那些日子》（一九七二）出版。

司馬桑敦，本名王光遯，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吉林雙城。一九六六年由文星書店出版短篇小說集《山洪暴發的時候》。五〇年代曾有《野馬傳》出版，可惜，這長篇小說在台灣難得一見。（譯註：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五九）

王默人，本名王安泰，一九三五年生，湖北黃梅人。五〇年代已出版短篇小說集《孤雛

²⁷ 歐陽子《秋葉》。一九六七年出版的《那長頭髮的女孩》增訂改題《秋葉》，於一九七一年出版。

²⁸ 於梨華。夏志清對於白先勇和於梨華都有非常高的評價，他說：「在美國的華人作家當中，擁有最強的意志，努力藝術方面的精進，是在現今的文壇當中，可能留下直到後世都值得閱讀的作品的作家，就我所知有兩位，就是於梨華和白先勇。」（《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序）（《文學的前途》收錄）。

淚》。一九六八年再出版《留不住的脚步》。進了七〇年代有《周金木的喜劇》，八〇年代有《阿蓮回到峽谷溪》等短篇小說集。王默人是持現實主義觀點的作家，紮根於台灣下層社會，描寫形形色色的窮苦人民，其挖掘的筆觸銳利而無情，充分表現台灣低收入階層的受苦和窮困。

蔡文甫，一九二六年生，江蘇鹽城人。他從五〇年代開始出版小說集，但六〇年代、七〇年代作品較多。六〇年代有《沒有觀眾的舞台》（一九六五）、《女生宿舍》（一九六四）、《雨夜的月亮》（一九六七），七〇年代有《玲玲的畫像》（一九七二）、《舞會》（一九七六）、《變調的喇叭》（一九七七）等。作品風格多吸收西方現代小說手法，不賣弄玄虛和詭奇，描寫小人物生活中的眾多挫折、無奈和空虛。

楊青矗和王拓也開始發表小說，但他們的作品集主要在七〇年代刊行。

白萩，本名何錦榮，一九三七年生，台中市人。六〇年代有詩集《風的薔薇》（一九六五）、《天空象徵》（一九六九）。後又出版《香頌》（一九七二）、《詩廣場》（一九八四）。白萩的詩富獨創性，語言鮮活，他是一位敏銳的詩人。得過特殊貢獻獎

陳千武，本名陳武雄，另一筆名桓夫，一九二二年生於台灣南投縣。日據時期即有詩作發表，戰後曾停筆十幾年。六〇年代著有詩集：《密林詩抄》（一九六三）、《不眠的夜晚》（一九六五）、《野鹿》（一九六九）。另有《媽祖的纏足》（一九七四）、《剖伊詩稿》（一九七四）、《安全島》（一九八二），及小說集《獵女犯》（一九八四）²⁹，對促進日、韓鄰邦的詩交流有很大的貢獻。他的詩充滿強烈的歷史感和現實意識。

杜國清，一九四一年生於台灣省豐原鎮。大學時代曾加入《現代文學》，對於艾略特、西脇順三郎、波特萊爾等詩人的介紹，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杜國清具有浪漫的資質，使他對感性世界的追求從不間斷。六〇年代有詩集《蛙鳴集》（一九六三）、《島與湖》（一九六五）出版。七〇年代後出版《雪崩》（一九七二）、《伊影集》（一九七四）、《望月》（一九七八）、《心雲集》（一九八三）。

趙天儀，筆名柳文哲，一九三五年生，台灣台中市人。一九七四年因台大哲學系事件³⁰，被迫離開台大。曾出版詩集《果園的造訪》（一九六二）、《大安溪畔》（一九六五）、《牯嶺街》（一九七八）及有關美學論述、詩評論。趙天儀的詩樸素而不造作，注重日常性，因而語言有時顯得過於明朗。從抒情的寫實到批判的寫實，是他的詩發展的軌跡。

李魁賢，曾用過筆名楓堤，一九三七年生，台北縣人。六〇年代有詩集《靈骨塔及其他》（一九六三）、《枇杷樹》（一九六四）、《南港詩抄》（一九六六）出版；另有《赤裸的薔薇》（一九七六）、《李魁賢詩選》（一九八五），及評論、翻譯多種。對於里爾克及德國詩的介紹，國內無出其右者。李魁賢的詩具有敏銳的感性，同時能秉持詩人特有的立場與方法，將外界現實投影於內部世界。

²⁹ 陳千武的作品。出版有秋吉久紀夫編輯的日文翻譯《陳千武詩集》。再者，同氏也有《陳千武論——一個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足跡》（一九九七年六月土曜美術社出版販賣）。

³⁰ 台灣大學哲學系事件。參照第六章譯注⑥。

註：

- 1 白先勇著、周兆祥譯〈流浪的中國人——台灣小說的放逐主題〉，一九七六年一月《明報月刊》。（譯註：一九七六年一月，《明報月刊》一二二期，原文為英語。收錄在白先勇《第六隻手指》，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爾雅出版社。）
- 2 以下作家介紹都參考爾雅出版社刊行「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年度小說選。
- 3 齊邦媛〈江河匯集成海的六十年代小說〉，一九八四年八月《文訊》十三期，五十七頁。
- 4 若林正文〈語られはじめた現代史の沃野〉，一九八五年四月，東京研文社《台灣現代小說選Ⅲ 三本足の馬》，二〇八頁。
- 5 許南村〈試論陳映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遠行出版社《知識人的偏執》，十三頁。

第六章 七〇年代的台灣文學

——鄉土乎？人性乎？

第一節 波瀾壯闊的時代動向

從六〇年代後期，逐漸開始躍登歷史舞台的鄉土文學，到了一九七六年初，鄉土文學問題論爭發生時，已經演變成台灣文學與台灣社會路線問題的討論了。這好比是光復以來台灣社會內部所隱藏的有關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未得解決的問題癥結，藉這文學路線的檢討，頃刻間爆炸開來一樣，因此鄉土文學論爭，其實是對台灣未來應走向哪一條路的，意識形態之爭的表面化和具象化。最大的問題癥結在於，國民政府遷台以後所有政治性措施，都以光復大陸國土為依歸，難免跟以台灣為中心偏重地方建設的本土民眾意願背道而馳，這使得台灣社會處處滋生了各色各樣的阻礙和挫折。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政府逐漸採取台灣化的各種措施，滿足了部分本地民眾的欲望，走向更自由、民主的道路去；這固然是七〇

年代，政府受到一連串國際性事件的衝擊，不得不採取的應變。但在這中間，代表台灣民眾意願較多的黨外，發揮了相當「分歧」的反官方思想，有助於政府的銳意革新。

要進入七〇年代台灣文學的研討以前，我們必須把當時的社會情況，予以簡略的回顧和分析；文學既是反映人生、人性和時空情況的，那麼鄉土文學的發展，變成名正言順的台灣文學，且構成台灣文學的主流，一定有其社會背景存在。

從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①簽定以後，事實上國民政府不得不修改一部分政策，以遷就瞬息萬變的國際狀況。因此，確保台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成爲迫切的課題，而建設台灣爲其首要。七〇年代出現的「革新保台」的思想，就是紮根於此種時代情勢。爲了養育日漸膨脹的人口，經濟發展成爲最重要的課題，台灣必須迅速地工業化，從農業體制爲主的國家，走向更工業化的國家。善用美援，使得台灣在一九六五年前後，已具備了以輕工業、加工業爲主導的勞力密集的初期工業國家的規模；由於時代的需要，必須從嚴密的統治經濟，走向較自由的、以民間企業爲主的經濟。五〇年代裡公營事業把所有台灣經濟的大動脈一把抓的經濟狀況逐漸解體了。同時外資的進入、跨國企業的增加，也使得台灣不得不走向更自由化和國際化的途徑；然而這種經濟體制，使得台灣經濟和文化受到摧殘和污染，

^①美華共同防衛條約。在中國大陸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中，隨著國民黨的敗戰氣味逐漸濃厚，美國的杜魯門總統於一九五〇年一月聲明不介入台灣海峽兩岸事務。不過，當六月朝鮮戰爭爆發時，又轉而聲明保持台灣海峽的中立化，以後，美國轉到軍事上保護台灣的一方。一九五一年一月簽署「美華共同防衛相互援助協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締結了「美華共同防衛條約」。

也造成台灣的固有傳統文化和民族風格蕩然無存。而向美國一面倒的政治態勢，更令台灣的現代化被人譏為「美國化」。

台灣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七年的十八年間，人口增加一·七倍。幸好國民總生產額也增到十二倍。因此，台灣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繁榮時代也就來臨。既然繁榮和富裕是由台灣人民流血流汗辛勤耕耘的結果，自然在政治層面上，台灣居民的發言來愈強勁，且獲得了重視。在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架構的支持下，一向隱藏在幕後，默默地耕耘，主張反映台灣現實社會動向、描寫本地人民真實人生的鄉土文學，也就找到了得以茁壯的肥沃土壤。

此外，從一九六五年前後開始，台灣遭受一連串由外而來的打擊，加深了孤立。先是法國、加拿大、日本等主要盟邦先後承認中共政權，國民政府堅持「漢賊不兩立」、全無妥協餘地之強硬外交政策，而與之斷交，其後演變成次要盟邦，甚至非洲剛獨立不久的國家，亦走向承認中共的行列。

一九七〇年一月，經特赦待罪中的彭明敏逃離台灣^②，旋即在美國從事反對運動。同年六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來台，掀起了一場出版界搶譯川端作品的風潮。一九七一年四月，因釣魚台歸屬問題大學生遊行示威^③。一九七一年十月，政府宣佈退出聯

^② 彭明敏。參照第五章譯注^①。

^③ 釣魚台列島的歸屬問題。一九七一年，在日美之間締結沖繩歸還協定之際，美國方面的解釋是，其中也包括了尖閣列島（在中國稱之為釣魚台列島）。針對這個，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香港、台灣的學生們發起大規模的反對運動。四月在台灣由學生發起抗議遊行，當時抗議的矛頭是指向日美雙方的，而後擴大到抗議對日美政府態度畏畏縮縮的

合國④。十二月，台灣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希望台灣變成「新而獨立」的國家⑤。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和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埋下美國承認中共的伏線。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承認中共，同時廢棄中日和平條約。一九七三年二月，陳鼓應等被捕，旋即被釋放⑥。一九七三年二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問大陸。一九七三年五月，發生水門事件至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森辭去總統職位。一九七三年秋天，石油價格的漲價，使得世界經濟陷入一片混亂。同年十一月，政府發表「十大建設」項目，積極推動台灣現代化。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承認中共的田中內閣倒閣。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中正總統去世。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國民政府。這個在台灣舉行的批判政府的遊行活動，是台灣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從此之後，在知識份子、學生之間積極地參與政治問題的態度也就日趨高漲。

④ 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了。聯合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以後，中國代表權問題根據美國的發言權力而一直被擱置著不處理。進入七〇年代以後，美國的中國政策軟化，在代表權問題上面，支持北京政府方面成爲優勢，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會議決議，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全被剝奪，由北京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

⑤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是聲明。國民黨的代表遭到聯合國驅逐，當美國尼克遜總統的北京訪問消息傳來，新耶穌教徒的長老教會於十二月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是聲明與建議」，提出台灣人民的自主權。甚至，一九七七年八月時發表「人權宣言」，向政府建議應該要成爲「新而獨立的國家」。當時雖然只有長老教會發表聲明，不過由於在台灣傳教的歷史很長，信徒也非常多，因而不畏當局的懲戒，在台灣島內倡導台灣獨立。

⑥ 陳鼓應等被逮捕。一九七三年二月，在《大學雜誌》上展開了政治改革的辯論，台灣大學的哲學系教授陳鼓應、王曉波、學生錢永祥等數人因爲被懷疑「計畫召開用來閱讀中共文獻與毛澤東著作的讀書會，招募會員，企圖發起學生運動」而被捕。之後判明無罪，立刻就被釋放了，卻在沒有多久之後，趙天儀、王曉波等十四名台灣大學哲學系的教授立刻就解聘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後在大學內部的政治改革運動逐漸趨向沉靜。

立法委員增補選舉，黨外立法委員數名進入國會⁷。一九七六年一月間，周恩來去世。四月，發生天安門事件。九月，毛澤東去世。十月，四人幫被逮捕。至此大陸文化大革命壽終正寢，大陸廢棄「不斷革命論」。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縣市長改選發生中壢事件⁸，許信良當選桃園縣縣長。一九七八年郭雨新在美國聲明參加總統選舉⁹。三月，蔣經國當選總統，副總統為謝東閔。十月，鄧小平訪日。一九七八年美國承認中共，旋即在一九七九年四月，訂立「台灣關係法」¹⁰以維持台灣現狀。十二月，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無限制延期。一九七九年一月，余登發、余瑞言涉嫌叛亂被捕¹¹。黨外人士在高雄縣橋頭舉行抗議遊行。一九七九

⁷ 黨外立法委員的當選。一直以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都因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被終止的。直到一九六九年以後，才開始舉行增補選舉。黨外方面，一九六九年有黃信介，一九七二年有康寧祥，一九七五年有康寧祥（再選）、許世賢、黃順興等三人當選。參照第五章譯注²。

⁸ 中壢事件。實力派政治家許信良，退出國民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地方選舉中出馬競選桃園縣縣長。開票當天發覺國民黨有作票嫌疑。一萬多名的民眾包圍中壢警察分局，舉行抗議。這時候有兩名青年中彈身亡。民眾憤怒失控，放火燒警局和巡邏車，市內演變成了暴動狀態。這次選舉由許信良當選，黨外人士也在其他選區有所斬獲。這次的事件，促成了日後在野民進黨萌芽的成立。

⁹ 郭雨新（一九〇八一—一九八五）。戰後活躍在台灣地方政界的政治家。一九七五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時落選，控告對方候選人林榮三違反選舉，卻敗訴。這時候，在之後成為黨外運動中心的林義雄、姚嘉文兩位律師表現亮眼，受到社會的注目。郭於一九七七年赴美，組織台灣民主運動海外聯盟，致力於政治改革運動。在一九八四年總統選舉時聲明出馬競選。

¹⁰ 台灣關係法。一九七九年一月美中外外交正常化以後，台灣與美國的外交雖然斷絕了，美國另外制定了國內法之「台灣關係法」，取代四月的防衛條約。實際上維持著正常的外交關係，直到今日。

¹¹ 余登發和余瑞言遭逮捕。黨外運動的領導們爲了要整合黨外的勢力，打算邀請余登發來擔任領袖。余是高雄的地方

年十月三日，陳映真被捕，三十七個小時後被釋放¹²。同年十月，王拓創刊《春風》¹³。同年十二月十日發生高雄事件，黨外人士多人被捕，包括作家王拓和楊青矗¹⁴。

派系的領袖，也當過高雄縣長。計劃了一九七九年二月的慶生派對，卻在一月時以「共產間諜吳泰安叛亂事件共謀嫌疑」突然被逮捕。黨外人士抗議此事，約三〇人在余的家鄉，高雄縣橋頭鄉舉行抗議遊行。這是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首次出現的政治抗議遊行活動。

¹² 陳映真遭逮捕。十月三日清晨，陳映真的住宅突然遭到搜索，以叛亂罪嫌疑被逮捕。陳將此事的來龍去脈寫在〈關於「十·三事件」〉（《美麗島》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二期）當中，偵訊的主要內容是他與黨外人士的關係、和以前獄中的夥伴的關係等。王育德《台灣海峽》四十七頁中有摘譯。

¹³ 王拓《春風》。月刊雜誌。和黃信介所發行的《美麗島》（一九七九年八月創刊）互相扶持協助的雜誌，《美麗島》是政論雜誌，《春風》卻是打著「文學、歷史、時事」作招牌，以作為綜合性雜誌為目標。因為十二月十日的美麗島事件，兩者都停刊了。《美麗島》出到第四期，《春風》則出到第二期為止。

¹⁴ 高雄事件。一九七九年二月的余登發逮捕事件之後，替黨外的演講和遊行為主的街頭政治運動加溫了。就在那樣的氣氛當中，由黨外人士所發行的雜誌《八十年代》（六月）和《美麗島》（八月）發行了。《美麗島》的發行人是黃信介，社長是許信良，副社長是黃天福和呂秀蓮，總編輯是張俊宏，擁有政黨雜誌的特質，受到了台灣各地的黨外人士的支持。十二月十日的國際人權日，《美麗島》在高雄策劃了人權紀念大會。這次的集會不但沒有獲得許可，而且當天還是國民黨四中全會開幕以及「春元七號冬防演習」的第一天，因而當局認為這是對權威提出的挑戰，出動了軍警。此次集會約聚集了一萬多名的民眾，在嚴密戒備的情勢中舉行。事前約定好不點亮火把的，卻因為興奮的民眾開始點火，憲兵出手鎮壓，而引發了大規模的衝突。憲兵方面約有百人負傷，民眾方面的受傷人數則不明。在此次事件中，包括《美麗島》的幹部，黨外人士共計有三十七人被捕。其中被定罪為叛亂罪的有施明德、黃信介等八人，被處以無期徒刑到十二年不等的嚴厲徒刑。因為這次的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瓦解於一夕之間。再者，隔年的二月二十八日被定以叛亂罪的林義雄居家住宅遭到刺客入侵，林的母親和雙胞胎女兒慘遭殺害，長女身受重傷。逮捕名單當中也包含了作家王拓和楊青矗。關於高雄事件和王拓、楊青矗，王育德有詳盡的敘述。《台灣海峽》〈第一章 恐怖與希望的夾縫間——以王拓與楊青矗為中心〉。

第二節 鄉土文學論爭

七〇年代總共受到六次的政治性重大衝擊，這些衝擊有時是足以動搖國本的毀滅性的衝擊，使國人提高了反省的層次，也使得社會上層建築的文化掀起了壯大的覺醒運動：此運動首先肯定政治體制必須迅速改革，俾能對付由大陸而來的影響，同時也要迅速推動台灣本身的自由、民主化、注重人權，使台灣成爲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在經濟上排除外國的經濟侵略與其夥伴的買辦，建立自主的經濟制度，走向技術密集的工業國家。文化上必須確立承繼民族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姿勢，積極推展鄉土色彩的文化。

在這樣的時代風潮下，台灣文學也掀起了評估過去文學路線的一場風暴，以便尋找一條嶄新的途徑，足以反映在台灣一千九百萬人民的心聲。

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的反共懷鄉文學，已僵化而流於八股，儘管那五〇年代文學活動中的民族精神必須保留，但卻不可復古，復古對現代化無疑是種阻礙，必須放眼看未來，台灣文學必須有前瞻性。來台第二代作家的放逐主題和西化，都是遠離台灣現實生活的無根的文學。然而「橫的移植」卻不能停止，惟有在縱的繼承上，繼續不斷地吸收和接納西方文學，才可以壯大台灣文學。不過在吸收和接納的過程中，必須有一番去蕪存菁的工作，否則不容易建立有民族風格的文學。簡言之，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的文學傾向，跟台灣、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的現代文學思潮脫離，不但未能發揚民族性格，反而增加台灣人民的迷惘和挫折。這

違背了文學是反映人生的根本命題。在台灣必須建立嶄新的文學觀念，而唯有落實在台灣民眾現實生活的鄉土文學，才是能滿足台灣民眾的精神糧食。有了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才使台灣作家越來越明白，鄉土文學必須有所超越，應走向接近文學本質的，注重個人資質、自由、多元、寬容的表現。台灣文學必須透過描寫台灣特殊現實的鄉土文學更上一層樓，描寫普遍的人性，尋求更哲理性的境界，使台灣文學脫離狹窄的視野，成爲具有寬廣視野的巨視性文學，才足以躋身於世界文學之廣大森林。

台灣鄉土文學有其悠久的歷史。台灣漢族系移民從明末清初爲了逃避飢荒和戰亂，從一衣帶水的大陸冒著生命的危險渡海來台；他們跟原始土著種族共同開拓了這塊美麗的大地，儘管台灣人都知道「原鄉」的存在，可是經過四百多年的歷史演變，除台灣割讓的那一段時期，有一部分士紳階層逃回大陸以外，台灣漢系移民很少有人回到原鄉，台灣已成爲他們及他們的子女賴以生存的唯一無二的故鄉；因此，對台灣漢系移民而言，保衛他們賴以生存的大地是責無旁貸的任務。台灣民眾四百年來抗拒外來民族的侵略，保鄉衛土，這種堅強的抵抗事跡，已經構成台灣歷史的全部事實，而台灣鄉土文學便是紮根於這種歷史性事實，描寫台灣民眾苦難的血跡斑斑的文學，何忍排斥於視野之外予以蔑視。然而從光復以來，被歪曲的、短視的觀念使得以台灣鄉土爲依歸的文學運動一直被疏離於文壇之外，蒙受蔑視和歧視，苟延殘喘。只靠幾個堅強的作家不屈不撓地保存傳統苦苦支撐之外，幾乎得不著任何鼓勵和重視。文學本來是紮根於現實環境的，忘卻了歷史性記憶的文學怎能反映普遍的民眾心聲？

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的大陸來台作家的作品，很少描寫台灣農民和勞工的生活現實，即使他們描寫了農民和漁民也只限於大陸的原鄉，而且來台作家都是依附權力機構謀生的，他們甚至對大陸低收入階層人民的生活很陌生，縱令他們有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同情心，由於缺少了知識和經驗，他們所描寫的原鄉勞動人民的形象既模糊又不明確，他們不懂人間的疾苦。儘管此類文學也提供了一些訊息，也不難瞭解，但是以台灣民眾的實際生活經驗而言，實在是無法滿足心靈欲求的作品；這正如我們閱讀杜思妥也夫斯基和福克納的小說，很清楚他們作品世界裡所蘊藏的哲理，但是對出現在小說世界的風土、人物的生活習慣等民族風格有些隔膜一樣。鄉土文學在七〇年代重新躍登歷史的舞台，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進而摒棄「鄉土文學」這個稱呼，變成台灣文學自有其歷史的淵源在。

本來鄉土文學這個名稱，早已在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出現過，而且也掀起一場激烈的論戰。提倡鄉土文學的作家，大多主張建立台灣話文一致的大眾語文，以描寫台灣民眾在殖民地統治下的悲慘現實，使鄉土文學滲透民間，使民眾覺醒，為擺脫殖民地統治以及參與反日的抗議活動，同時使民眾吸收新知識，改革封建體制。反對鄉土文學的作家以為文學並沒有國界，藝術是反映普遍人性的，使用方言去建立文學是本末倒置，這使得台灣文學脫離大陸文學，變成只注重本土現實的「山林文學」。然而，日據時代幾達四分之一世紀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仍然順沿著鄉土文學的初期構想完成了歷史上的使命；除以台灣話文為文學表現的工具的主張外。所以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其實就是鄉土文學，它注重地域性（regionalism）色彩的表現勝於國際性性格。同時它確實地反映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民眾的

苦難，所以無暇顧及浪漫、象徵、唯美、空想等文學的各種層面的發揮，排除無病呻吟，注重現實的控訴。這種文學傳統在光復後，經四〇年代、五〇年代的疏離和冷漠中曾一度幾乎中斷，直到老作家吳濁流在一九六四年創辦《台灣文藝》，林亨泰、詹冰、桓夫、白萩、趙天儀、吳瀛濤等創刊《笠》詩刊開始，逐漸有蓬勃的開展。一般說來主張鄉土文學的《台灣文藝》以及主張現實主義的《笠》，都是殊途同歸，以台灣本土現實為依歸的文學，然而在時代的重壓下，他們只是微弱的聲音，未能造成澎湃的浪潮。倒是從一九七〇年開始，黃春明、陳映真、王拓、楊青矗等作家的現實主義文學色彩濃厚的小說和小說集陸續出版，跟時局的動盪互相呼應，使得整個台灣文學界逐漸分為兩個陣營，爭論台灣文學應走向哪一條路線，什麼叫做台灣鄉土文學等課題。這大約開始於一九七六年前半期，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底王拓和楊青矗雙雙因高雄事件被捕繫獄為止。

一九七六年初，何言寫了〈啊！社會文學〉，但此文似乎未能引起很大的反響。到了九月，朱炎所寫的〈我對鄉土文學的看法〉，主張「台灣和大陸是一體的」、「作家必須擴大視野」（註1），華夏子的〈三民主義的文學〉建議「不可醜化社會」、「根據三民主義寫文學」（註2）。朱、華二氏的文學主張與鄉土作家具有不同的意識背景。鄉土文學承續的是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精神，若不是心向台灣、認同本土的作家，是不能領會的。王拓則主張鄉土文學是現實主義的文學，是台灣的寫實主義文學。

一九七七年五月，葉石濤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¹⁵，闡明台灣鄉土文學的歷史淵源和特性。他說：「很明顯的，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台灣人（居住在台灣的

漢民族及原住居民)所寫的文學」；「儘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

屬於軍中作家的朱西寧，在一九七七年所寫的抨擊鄉土文學的文章〈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裡，直截了當地寫道：「這片曾被日本占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他這個發問，完全暴露了他對台灣這塊土地和人民過去的歷史的無知和曲解（註3）。

同樣，在一九七七年銀正雄批評王拓的小說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的文章裡，懷疑鄉土文學是「普羅文學」。他寫道：「問題是『回歸』什麼樣的『鄉土』？廣義的鄉土民族觀抑或狹窄的鄉土地域觀？如果走的是後面這條路，我們要問那跟三〇年代的註定要失敗的普羅文學，又有什麼兩樣？」銀正雄是大陸籍的第二代作家。他也並不認識台灣的歷史性遭遇，懷疑鄉土文學是跟大陸文學呼應的「工農兵文學」。不過邁入八〇年代以後，生活的歷練和深刻的經驗，使得他不得不修正他的觀點，把他底作家的根紮進這塊大地了。

到了八月，著名的小說家兼評論家彭歌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的一篇文章裡，正面指摘王拓、陳映真和尉天驄而寫道：「如果不辨善惡，祇講階級，不承認普遍的人性，哪裡還有文學？」彭歌的這篇論評頗有煽動力，使星星之火頓成熊熊燃燒的大火。

⑮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第十四期，一九七七年五月。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收錄。

接著詩人余光中在〈狼來了〉的一篇文章裡，一口咬定鄉土文學就是「工農兵文藝」，是配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鬥爭路線；他發問：「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可見『工農兵文藝』。」

對於這些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和第二代作家措辭激烈的指控，不但王拓、陳映真和尉天聰等直接面對攻擊的作家，甚至立場客觀、地位超然的作家任卓宣、胡秋原、徐復觀，以及著名評論家何欣、陳鼓應、侯力朝、王曉波、蔣勳、齊益壽、曾祥鐸、王杏慶等，分別寫了文章，對鄉土文學有所闡釋，也對發展路線有所建議。

何欣闡釋鄉土文學是「相當於西方文學中的地區主義（regionalism）加上地方色彩（localcolor）的文學。」（〈鄉土文學怎樣「鄉土」？〉）他的立場較中立而超然，是深知世界文學潮流的持平發言，正確而中肯。

趙光漢，以為鄉土文學就是「國民文學」，綜合了「民族、平民文學和社會文學二種形式」（〈鄉土文學就是民族文學〉），表示他對鄉土文學的本質，有相當高的理解層次。

王杏慶，在一九七七年所寫的〈到處都是鐘聲〉裡寫道：「光復後的本地新文學界，除了『台灣方言文學』的一抹浪花外，多數的時期均對『台灣作家文學』視為鄉土文學或固有文學，例如吳濁流和葉石濤等的多數論評文字都是如此。這樣的劃分隨著青年一代作家不斷出現，逐漸變得無意義。」

王曉波，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所寫的〈中國文學之大傳統〉裡，暗示鄉土文學是「具有民族風格的愛國的寫實文學」。後來王曉波深入研究日據時代的文學、政治與文化，肯定了

台灣民眾的愛國和民族意識。

侯立朝，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所寫的〈七十年代鄉土文學的新理解〉裡寫道：「本土的作家們也就有理由提出『鄉土文學』以保衛鄉土，進而保衛民族文化傳統，在這本土上留一點光明，不讓資本主義的文化買辦們侮辱……堅守民族主義，這是正途。」¹⁶

一九七七年十月，著名的學者張忠棟在〈鄉土、民族、自立自強〉一文裡寫道：「爲了預防偏頗，我們在強調鄉土觀念的同時，便需加深民族意識。鄉土與民族，兩者密不可分，沒有鄉土的民族，是無根的民族、是流亡的民族，沒有民族的鄉土，是無人耕耘的鄉土、是沒有文化的鄉土……台灣和大陸是中華民族的鄉土，必須秉持這樣的認識，大家爲廣大的中國鄉土共同耕耘，才能期望開出更美好的中國文化之花。」¹⁷

蔣勳，在王拓小說集《望君早歸》（一九七七）的序文裡寫道：「台灣寫實文學的發展終於出現了這樣堅定的、具有道德力量的正面人物，不能不說是一個嶄新的階段，而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相信類似王拓這一類的文學在方向上將更確立，在局面上將更壯大，足以掃掉前一個階段爲時不短的、文學的陰霾、模糊與軟弱無能。」

尹雪曼，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代序〈清除文壇旋風〉裡，反對開放三〇年代文學，指鄉土文學「揭發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安，再抨擊鄉土文學爲「工農兵文學」，他希望建立全國性的、全民性的文學。

¹⁶ 侯立朝引用文。引用文省略了下述文句：「還有，小心不要被馬克斯、列寧主義文化的走狗瞧不起。」

¹⁷ 張忠棟引用文。引用文省略了下述一句：「我等屬於同一民族。」

一般說來，反對鄉土文學的作家心裡都有杞憂；那便是鄉土文學變成排他性的狹隘的地方性文學，或走向分離主義的文學。其次，害怕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學」，變成中共的統戰工具。

當然直接遭受抨擊的當事人王拓、陳映真和尉天驄，雖然在缺乏發表園地的重壓下力求反擊，致力於闡明鄉土文學的歷史淵源及發展方向，逐漸使鄉土文學的內涵明朗，有助於解除根深蒂固的誤解和憎恨。

王拓分別寫了〈是現實主義，不是鄉土文學〉（一九七七年四月）、〈五四與我們同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筆名李行之）、〈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一九七七年五月，筆名李拙）。

陳映真寫了〈台灣畫界三十年來的初春〉（一九七七年七月，筆名許南村）、〈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一九七七年七月）、〈鄉土文學的盲點〉（一九七七年六月，筆名許南村）、〈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一九七七年）、〈關懷的人生觀〉（一九七七年十月）。而尉天驄寫了〈我們的社會和民族精神教育〉（一九七七年七月）、〈文學為人生服務〉（一九七七年八月）、〈死亡與救贖〉（一九七七年七月）、〈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王拓的駁論大多沿順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及戰後台灣文學的變遷來看鄉土文學的歷史性位置，有相當厚重的歷史觀做後盾。特別注重分析戰後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動向，來肯定鄉土文學的存在價值。

陳映真憑其銳敏的分析能力，站在第三世界的、較國際性的立場來肯定鄉土文學，是「從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先行代民族抵抗文學的再認識和再評價，是一條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有一定的歷史、社會、經濟的基礎。」、「新一代青年，將沿著這一條曲折迂迴的道路，開發一種以台灣的中國生活為材料，以中國民族風格和現實主義為形式，創造全新的文學發展階段，帶來中國新文學在新階段中的一次更大的豐收。」（〈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六七、六八頁）

尉天驄一向反對貴族文學，提倡建立描寫民生疾苦的民間文學，因此他呼籲：「希望在台灣的作家不要身處危難，而仍然成天作新式或舊式的鴛鴦蝴蝶的夢。我們要關心我們的現實，寫我們的現實。這就是鄉土文學。它主要的一點，便是反買辦、反崇洋媚外、反逃避、反分裂的地方主義。」（〈文學為人生服務〉一五九頁）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開始，在台北市劍潭反共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二百七十多名的參加者中，曾經參加過鄉土文學論爭的作家，受邀請的寥寥無幾。余光中是主席團之一，彭歌是第四組的組長。

開幕典禮時，嚴家淦致辭說：作家必須向邪惡挑戰應戰、驅除黑暗、謳歌光明、產生偉大的文藝作品、提高民族精神¹⁸。文藝會談以強調配合國策、跟反共救國的大前提提取同一個

¹⁸ 嚴家淦致辭。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總統逝世之後，副總統嚴家淦在一九七八年三月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前，暫時任職總統。嚴家淦的致辭刊登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三〇日的中央日報上，本書引用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步驟、服膺三民主義、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家必須以全民為對象而寫作。作品應發揮自由而人性的精神、消滅奴役的、唯物論的階級文學。

繼續有一年半多，如火如荼地展開的鄉土文學論爭，終於得到一個官方的答覆；那裡面最重要的一點含有警告意味；便是鄉土文學不可為某一個特定的階層為其描寫的主要對象，不可在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下寫作。本來鄉土文學並不為任何一個特定的階層服務，它只是現實主義文學，注重本土民眾的現實生活的描寫，而佔本土民眾的大部分剛好又是以窮苦大眾為多，所以它的文學題材多來自農人、勞工，自是無法避免的結果。

給鄉土文學論爭帶來真正的結果及多少有蓋棺論定意味的。是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十九日兩天在台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評論家曾祥鐸在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中華雜誌》上寫了〈參加國軍文藝大會感想——團結的號角〉，詳細的記錄了官方藉此機會表達的對鄉土文學的評估。會中楚崧秋希望文學界「每個人要平心靜氣、求真求實地『化戾氣為祥和』，共同發揚中華民族文藝而奮勇前進。」王昇的演講長達一小時，他說：「純正的『鄉土文學』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基本上應該『團結鄉土』。愛鄉土是人類自然的感情，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是高貴的感情，不應該反對的。」當然他所說的鄉土文學，是「純正」的、應該是反共的、全民性的，這和嚴家淦的說話要旨不謀而合，代表了官方對鄉土文學的看法。

鄉土文學論爭已經不只是文學路線的爭執而已，它關係到戰後整個台灣省的經濟、政

治、文化、教育各個層面，代表了人民在日趨孤立的環境下企求創新和突破，民主與自由的革新思想。這種潮流無疑的是有助於使國家邁向現代化的工業形態，它的根本精神，是紮根於台灣人民的朝氣勃勃的、力求上進的靈性，跟日據時代的反帝、反封建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樣，也跟第三世界的被壓迫民族站在同一個立場，對外反對新的殖民主義和經濟侵略，對內反對腐化無效率的官僚主義機構，革新政治，批判以一個家族為核心的自私的封建性、財閥和買辦的貪婪豪奪，欲使國家現代化。

然而一進入八〇年代，鄉土文學的名稱已被丟棄，改稱為台灣文學，呈現了多元和嶄新的面貌。時間之流無情地做了蓋棺論定的工作，台灣文學的發展也就更上一層樓了。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

七〇年代作家最大的特徵毋寧是回歸鄉土，回歸鄉土的意念帶動許多領域的藝術活動重新出發，再度肯定藝術必須紮根於人生和社會，特別關懷低收入階層痛苦的生活；這原是藝術之所以存在的緣由之一，並不足為奇，但戰後的台灣文學都冤枉地走上了漫長的旁門左道。那麼七〇年代的作品有什麼鮮明的特徵呢？我以為這個時代的作品又恢復了以寫實主義為基本的寫作方式。本來這種寫實主義文學是十九世紀的文學特徵，由斯丹達爾、巴爾扎克、福婁拜、左拉、托爾斯泰等巨匠所締造。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受到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派及馬克斯主義的深刻影響，走向「內心獨白」、「意識流」等表現方法為主的現代小

說，喜歡描寫人的異化、疏離、深層意識下的活動，以及人性被扭曲的精神畸形，揚棄了寫實主義的客觀性，廢止了結構緊密、情節的轉變等整齊的寫作技巧。存在主義、反小說等現代小說主觀性極強，跟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背道而馳。

七〇年代的台灣文學雖然是屬於寫實主義的，保留了為人生而藝術、反映時代社會的現實、完整的傳統性結構、人道主義的關懷等基本特徵，但也不同於大陸三〇年代的文學及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淳樸和平實，它已經熔合了西方現代文學的嶄新文學技巧為一爐、更富於多變化的色彩、音樂的節奏，樹立了從深層心理來探討人類行為的面貌，較複雜而多層面。

此外，七〇年代的文學作品，努力去統合台灣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中帶來的不同文化價值系統。台灣有三百多年被殖民的歷史，因此，在台灣民眾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模式裡，保留下來以前在歷史的每一個階段所獲得的異族的文化形態。當然構成台灣文化與文學的基本文化，是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漢族的文化。既然台灣是來自大陸的漢族為主的移民社會，那麼漢族的傳統文化已經成為台灣人的血肉，捨棄了它，台灣的移民社會也就失去了核心的倫理道德。除此而外，台灣受影響最深的莫過於日本文化。台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紀，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價值觀雖不至於搖動漢族生活的傳統根性，但是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精華，只是去蕪存菁的篩汰工作卻未見徹底進行。此外，還有荷蘭及山地原住種族文化的影響的痕跡。既然七〇年代的台灣文學重視本土，尋根的意念強烈。那麼他們的作品忠實地描寫台灣人民的現實人生時，也就不知不覺地批判了各種不同文化價值系統的對立、矛

盾和拮抗。在這統合的過程中，台灣作家由於各個資質的限制，不得不上多元化的寫作方式。進入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較有多元性的題材，善於挖掘社會癥結的所在，卻是七〇年代文學所走的路線帶來的必然結局。

尋根的風潮使得台灣作家不得不重估本土的歷史。由一定的歷史觀來分析七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成為每一個作家的堅定信念。本來鍾肇政的大河小說《台灣人三部曲》（一九八〇）就是取材於光緒末年台灣割讓，及日據時代文化協會的抗日民族運動，以及自太平洋戰爭到光復的三個階段的歷史的。但這部大河小說的結構仍有缺陷；如果以台灣民主國時代的抗日戰爭為第一部的話，第二部應是描寫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而第三部應描寫戰後的生活才是，鍾肇政因某種顧慮，未能把台灣割讓到現在的台灣民眾生活搬上小說舞台。同樣的，後來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一九八一）也踏襲了同一種結構，避開了戰後這一段民眾的歷史性生活。光復以來的某種政治性重壓還沒有消失，所有作家儘量避免把題材取自於戰後生活的現實¹⁹，這使得台灣的大河小說留下歷歷可看的歷史性傷痕，同時也留下了無法彌補的瑕疵。

由於鄉土文學並非屬於社會某一個特定階層的文字，所以它描寫的範圍頗廣，但佔大多數的民眾是勤奮的勞苦大眾。因此，它積極地寫農民、工人、漁民等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卑微

¹⁹ 描述戰後史的禁忌。當時尚處戒嚴令之下，不容許碰觸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等台灣戰後史的黑暗部分。一九八七年七月戒嚴令解除了以後，鍾肇政和李喬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寫了長篇小說。鍾肇政在一九九三年發表了長篇《怒濤》，李喬於一九九五年發表了長篇《埋冤一九四七埋冤》。

人物。如王拓的描寫八斗子漁民，陳映真描寫的城市性的小資產階級和跨國公司，王禎和的市井小人物，黃春明的妓女，楊青矗的工人和工廠，都是這種寫作傾向的具體實踐。當然，這對於住在社會上層結構，安享人生美夢的人而言，是「離經叛道」的寫作模式了。

最能代表七〇年代文學精神的作家甚多。不過要進入作家和作品的討論以前，先概略性地展望七〇年代文學雜誌的動向。

六〇年代中期出版的《台灣文藝》、《笠》、《純文學》、《文學季刊》等繼續刊行。六〇年代末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都是刊登在《文學季刊》的作品。進入七〇年代後《文學季刊》廢刊，一九七二年當《純文學》停刊之後，《文學季刊》²⁰創刊。黃春明的〈莎啞娜啦·再見〉、王拓的〈廟〉、〈旱夏〉、〈炸〉、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都是刊登在《文學季刊》的作品。一九七三年《現代文學》停刊。

但是最能代表七〇年代時代精神的當推《大學》²¹雜誌。《大學》雜誌，一九六八年一月創刊，結合了大陸來台知識份子和本土知識份子，主張「革新保台」的色彩濃厚。後來《大學》雜誌分裂，分道揚鑣，一部份知識份子跟權力機構合流，一部分知識份子成爲在野

²⁰ 《文學季刊》。參照第五章譯注¹²。

²¹ 《大學》雜誌。創刊當時，介紹了文化、藝術、思想等領域，是小規模的同人雜誌。進入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期，在退出聯合國、釣魚列島問題、從蔣介石轉移到蔣經國的權力繼承等等的國內外情勢轉變的背景下，《大學》雜誌被

派。一九七五年八月，《台灣政論》²²由黃信介、康寧祥刊行，更進一步地解剖了最敏感的政治問題，而在同年十二月遭查禁。一九七六年二月，由鄭泰安和蘇慶黎²³所創辦的《夏潮》，給鄉土文學提供了良好的論爭舞台。一九七七年七月，由《大學》雜誌的成員張俊宏創辦了《這一代》²⁴雜誌。強烈地主張本土為重的意識。這些雜誌有些是綜合性的、有些是政論性的，但它們給台灣作家所帶來的思想啓發、文藝思潮的闡明等，多少影響了台灣作家的寫作方向。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創刊的《中外文學》²⁵，是七〇年代新出現的文學雜誌之

改組，許多知識份子加入雜誌經營，允為政治改革運動的先鋒。改組後的一九七一年創刊三週年紀念號上，首次刊登了取材自政治問題的〈給蔣經國先生的信〉，七月時則刊登了堪稱台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篇〈台灣社會力分析〉。一九七三年一月，因為內部對立的原因而分裂了。

²²《台灣政論》。反國民黨外雜誌的先驅。在一九六九年選舉時登場的黃信介、康寧祥、曾為《大學雜誌》成員的張俊宏等發行了這部超越黨派的民間雜誌。十二月號第五期的「選舉特大號」賣了五萬本。因為第五期當中所刊載的一篇叫做〈兩種心向〉的隨筆而受到停刊的處分。

²³蘇慶黎。蘇新的女兒。一九四六年出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畢業之後加入《台灣政論》的編輯工作。其夫鄭泰安是醫生。《夏潮》是在思想上偏左翼的雜誌，與王拓和陳映真的立場相近。也致力於台灣的歷史和文學的介紹。刊登了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彭萱按：蘇氏於二〇〇四年去世。）

²⁴《這一代》。《台灣政論》的後繼者。因為考慮到停刊處分的問題，而沒有全面地提出強烈的政治主張，立志為民主化運動提供發表言論的園地。

²⁵《中外文學》。承接學院派之潮流的雜誌。以「若是只把文學放在可以享受思想與言論自由的位置，才能成長繁榮的話，台灣是眼前唯一可能發展中國文學的國土。若是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中國文學的優秀創作和研究的話，將令人擔憂不知世界上擁有最悠久歷史的文學是否會衰退，或者中斷」為「發刊致詞」，以背負著中國文學的高昂興致來發行。雖然是以中國文學的正統為前提，卻也提起七〇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張良澤的鍾理和再評價的重要論文〈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刊登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二卷第六期。現在也以月刊雜誌持續發行中。（彭萱按：該刊二〇〇七年三月四一六期開始改為季刊。）

一，由朱立民和顏元叔等台大外文系教授所編輯，一直到八〇年代仍繼續刊行。鄉土文學論戰後，曇花一現的文學性雜誌則有《仙人掌》²⁶、《小說新潮》²⁷、《前衛》²⁸等。不過影響最廣的是以評論為主的《書評書目》²⁹，它反映了時代動向和文壇狀況。

一九六四年四月，由吳濁流獨資創辦的《台灣文藝》，第二年改為季刊發行。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吳濁流去世，共發行了五十三期。在這中間吳濁流創辦了「台灣文學獎」，後改為「吳濁流文學獎」。一九七七年三月，《台灣文藝》由鍾肇政接辦，中間大約有兩年多是由遠景出版社沈登恩負責出版，到一九八三年一月由陳永興接辦（註4）³⁰。

一九六四年六月，受到《台灣文藝》發刊的刺激，一群省籍詩人創刊《笠》詩刊。發起人有十二人，但其中薛柏谷始終未參與活動，古貝、王憲陽一年後退出。新生代的同仁林煥彰、喬林、施善繼、林錫嘉、岩上，在加入《笠》數年後，亦分別退出。七〇年代的笠詩刊

²⁶《仙人掌》。一九七七年三月創刊。打著「思想、社會、生活、藝術」為招牌的綜合雜誌。在發刊辭當中提出「中國的出發」一辭，可以說是承接當時的改革派之後的雜誌。於鄉土文學論戰最熱烈時登場，刊載了許多的論文。

²⁷《小說新潮》。一九七七年三月創刊。以季刊的形式出版。

²⁸《前衛》。一九七八年五月創刊。作為《前衛叢刊》發行。由年輕的台灣人作家、研究學者所創辦的雜誌。發行人是民間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張恆豪。也關注戰前的台灣文學，第二輯當中刊登龍瑛宗著、張良澤譯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²⁹《書評書目》。一九七二年九月創刊。當初雖然是雙月刊，中途卻變成月刊，一九八一年九月停刊，總共出了一百期。作為國內首見的書評專門雜誌而創刊，鄉土文學的興起時期刊載了許多關於台灣文學的評論，水準也相當高，是七〇年代領導文壇的雜誌之一。

³⁰《台灣文藝》。參照第五章譯注5。

結合了老、壯、少的詩人，無論創作、譯介或評論都非常蓬勃，開始逐漸影響詩壇，並對六〇年代的虛無、晦澀、逃避現實的作風提出批判。剛好關傑明、唐文標、顏元叔等人，亦對現代詩提出詰難³¹，加上客觀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以及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七〇年代末期終於將詩壇導入較正常的軌道。然而過份關注現實的結果，有的詩人未能深入表現，只描寫現實的表相，造成詩境的淺薄，這是以後八〇年代初期詩的毛病。在七〇年代較活躍的《笠》同仁有：巫永福、陳秀喜、黃騰輝、詹冰、陳千武、林亨泰、錦連、趙天儀、白萩、杜國清、李魁賢、林宗源、周伯陽、杜潘芳格、非馬、許達然、林鍾隆、靜修、鄭炯明、李敏勇、陳明台、拾虹、陳鴻森、郭成義、李勇吉、梁景峰、莊金國、陳坤崙、李篤恭、莫渝、趙迺定、楊傑美、衡榕等。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笠》詩刊曾經在日本刊行中日文對照的《華麗島詩集》及一九七一年的日文本《台灣現代詩集》³²，中文本的《美麗島詩集》。一九八二年出版《亞洲現代

³¹ 現代詩論戰。關傑明於一九七二年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九月十、十一日），批判了現代詩當中的現代主義崇拜傾向。唐文標發表了〈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龍族評論專號》一九七三年七月）、〈詩的沒落〉（《文季》一九七三年八月創刊號）等，來作呼應，指名批判《文學雜誌》、《藍星》、《創世紀》等團體和洛夫、周夢蝶、葉珊、余光中等，被稱為「唐文標事件」。以此為起因，展開了一連串的環境繞現代詩的論戰。之後，陳映真將此次論戰定位為，針對「現代詩」的「國際主義」、「歐化主義」、「形式主義」與「內省」、「主觀」主義，新世代所提出的文學之民族回歸、中國國家主義志向、文學的社會性主張（《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鄉土文學討論集》收錄）。

詩集》(第二集)，中、日、韓、英四種語文對照。《笠》詩刊同《台灣文藝》一樣，已歷二十個艱苦的年頭，目前仍繼續刊行(註5)。

另外，在七〇年代創刊了幾本詩刊³³。它們大都由年輕的詩人組成，其中較重要的有《龍族》、《主流》、《大地》、《詩人季刊》、《草根》、《詩脈》等。《龍族》，一九七一年三月創刊，共出版十六期，第九期為評論專號，主要詩人有林佛兒、林煥彰、辛牧、喬林、施善繼、陳芳明、黃榮村、高上秦、景翔、蘇紹連、蕭蕭等。陳芳明認為《龍族》³⁴所追求的，一是把握此時此地的中國，二是走民族風格的路線，三是詩人的作品必須和他的時代、他的民族攜手並進。可惜，他們奮鬥了大約五年左右，於一九七六年五月停刊。《主

³²《台灣現代詩集》。北原政吉編，一九七九年由熊本MOKURA書房出版。以日語寫成的作品就依照原本的日語版本，懂日語的人就由自己翻譯，其他則由陳千武翻譯。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了《續·台灣現代詩集》。其他的詩選集有北影一所編輯翻譯的《台灣現代詩集》(一九八六年七月 土曜美術社世界現代詩文庫一二)。

³³七〇年代詩誌。彭瑞金認為「青年詩人們的詩雜誌如同雨後春筍般一一出現，是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值得注目的現象之一」(《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當一九七一年三月的《龍族》一創刊，受到這個刺激，陸陸續續出現了詩雜誌。有《水星》、《主流》、《暴風雨》、《大地》、《山水》、《後浪》、《秋水》、《森林》、《詩人季刊》、《草根》、《消息》、《天狼星》、《大海洋》、《綠地》、《詩脈》、《落神》、《掌門》、《風燈》、《風荷》、《陽光小集》等。參照楊文雄的《風雨中的一線陽光——試論《陽光小集》》在七、八十年代詩壇的意義(《台灣現代詩史論》收錄)。

³⁴《龍族》。陳芳明在《龍族詩選》序當中，有如下的敘述《龍族》的目標：「第一，龍族的同志，要明確地把握現在這塊土地上的中國風格。第二，使用中文，誠實地表現自己的思想。第三，雖然說，詩原本就是必須要批判這個社會的，但是，要保有寬大的度量，也必須仰仗針對我等詩作的社會批判。」(《龍族詩選》)

流》，一九七一年七月創刊，共出版十三期。主要詩人有黃勁連、羊子喬、龔顯宗、凱若、杜皓暉、德亮、莊金國等。在詩的創作上，《主流》的同仁較有鄉土色彩的情調，也具有現實意識的追求。羊子喬曾跟陳千武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³⁵ 詩部份：《亂都之戀》、《廣闊的海》、《森林的彼方》、《望鄉》（一九八二）四大冊，是重要的詩選史料。《大地》，一九七二年九月創刊，共出版十九期。目前改爲《大地文學》，共出了兩期。主要詩人有王浩、王潤華、古添洪、李弦、余中生、林鋒雄、林錫嘉、林明德、秦獄、淡瑩、黃郁銓、陳慧樺、陳德恩、陳黎、童山、翔翎、翱翔、藍影等。主要成員多半先後在國內外獲得學位，在大學執教。他們認爲除了建立現代詩的「抒情傳統」，也應進一步建立現代詩的「敘事傳統」。《詩人季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創刊，主要詩人有蘇紹連、莫渝、牧尹、陳義芝、廖莫白、蕭蕭等。^{（陽明系之筆名）}《草根》，一九七五年五月創刊，共刊行約四十期，主要詩人有羅青、詹澈、李男、張香華等，曾大量發表新人的作品。《詩脈》，一九七六年七月創刊，共出版八期，主要詩人有岩上、王灝、向陽等，同仁大都是中部的青年詩人（註6）。《創世紀》在七〇年代也培養了沙穗、連水淼、汪啓疆、渡也等人。

³⁵《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七〇年代後半，同時也是戰前的文學被重新審視的時期。如同陳少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一八七八年三月）、黃武忠的《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一九八〇年八月）等，開始了由戰後一代所進行的戰前文學再評價。根據李南衡所編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一九七九年三月，明潭出版社）、葉石濤、鍾肇政主編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全八冊，一九七九年七月，遠景出版社）等，戰前使用日語寫成的作品也被翻譯成中文，能夠被閱讀了。

王拓，本名王紘久，一九四四年生於基隆市的小漁村八斗子，由於出身貧困，對窮苦人家的生活與感情有深刻的瞭解。師範大學畢業後，再進入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深造。曾經當過中學、大學教師、編輯等。《文季》是由他主編的。一九七〇年六月在《純文學》四十二期發表小說〈吊人樹〉而躍登文壇。有小說集《金水嬭》（一九七六）及《望君早歸》（一九七七）之外，尚有文學評論集《張愛玲與宋江》（一九七六）、《街巷鼓聲》（一九七七）。此外有兩本政治評論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因高雄事件被捕，一九八四年九月出獄，刊行長篇小說《台北、台北》（一九八五）³⁶。王拓以爲文學並不是孤立的，文學不但反映作家個人的生活環境，同時反映了過去的歷史，現在的社會生活環境等全體性的事物。他的小說強烈地指出台灣社會充滿著異常的拜金思想、物質至上主義，而在反面深刻地同情在窮苦生活中呻吟的小人物，憤怒地指控毒化這些底層社會小人物的愚昧、迷信、賭博、疾病及絕望。這就是承繼台灣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優越傳統。不過，由於他急於在小說裡面要展開他的思想，所以往往無暇顧及小說的整篇情調，形式內容有時流於類型化。

楊青矗，一九四〇年生於台灣台南縣鹽分地帶。幼年隨著父親搬到高雄居住。正如許多鹽分地帶出身的農民放棄耕稼變成勞工一樣，他的父親也就進入煉油廠當工人，而後在一次油輪火燒事件中殉職。因此楊青矗必須負起家計，爲生活奮鬥。他的教育都是在工餘時間完

³⁶王拓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評論〈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台灣現代小說選I 彩鳳の夢》收錄）。探討王拓的小說的論文有，山田敬山的〈叫做王拓的作家——台灣當代文學管見〉（《伊地智善繼、辻本春彥兩教授退休紀念中國語學、文學論集》一九八四年一月 東方書店）。

成。一九六九年發表〈在室男〉出現文壇，到一九七九年因高雄事件被捕為止，共出版了主要短篇小說集《在室男》（一九七一）、《妻與妻》（一九七二）、《心癌》（一九七四）、《工廠人》（一九七五）、《工廠女兒圈》（一九七八）及《女權、女命與女男平等》（一九七六）等生活隨筆集。楊青矗的小說描寫了逐漸增多的四百萬台灣勞工，強烈地指控不良的制度帶來的資方對勞工的剝削，極富於正義感和人道精神。在他的小說〈工廠人〉、〈工等五等〉、〈囿〉、〈低等人〉大多是以工廠為背景，寫盡了工人在生活上所發生的離合悲歡的故事。楊青矗的小說有時巧妙地使用了底層人物非常日常化的方言，使小說帶有活潑的氣氛。可惜，有時也免不了露出自然主義描寫過度的缺陷；而過份注重現實細節的結果，往往犧牲了小說特有的藝術香氣。楊青矗自稱為中國四千年來惟一的工人作家，這也許有些誇大，但他的確是生於勞工家庭，最瞭解工人，並且把七〇年代的台灣四百多萬勞工的生活反映在小說，為勞工抗議、指控、主張工權的作家。楊直矗一九七九年被捕，一九八三年出獄，寫有長篇小說《連雲夢》。從八〇年代起有年輕一代的工人作家繼其衣鉢出現，如小說家陌上塵及詩人李昌憲等。

陳若曦，一九三八年生於台北市，父兄的職業是木匠，因此她是不折不扣的底層社會出身。過了一段艱苦的工讀生活之後，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同時成為《現代文學》的成員。大學一年級時的小說有濃厚的存在主義和意識流的影響，早期作品多發表於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一九六一年九月發表於《現代文學》的小說〈最後夜戲〉為初期作品中的

傑作。這篇小說描寫在鄉下流浪演出歌仔戲野台戲的演員金喜仔落魄的生活和母愛的悲愁，富於鄉土色彩。她在美國留學中跟段世堯結婚，一九六六年回到大陸。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才離開大陸來到香港，在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下共度過七年的歲月。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恢復寫作發表小說〈尹縣長〉，描寫中共統治下小人物的人權被蹂躪的悲慘生活。陳若曦有強烈的正義感，她勇敢地揭露文革時期大陸的生活形態，給全世界的知識份子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一九七七年開始寫的長篇小說《歸》，把她的期望放在當過紅衛兵的中國新生代，確信這一個年代猛然醒覺後，將給中國帶來民主的改革。同時，她在這部這部小說裡也描寫台灣人民在大陸受到猜疑的情況，這跟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有很類似的遭遇。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老人》，在這一篇小說裡描寫曾經參加台共的台灣人回歸「祖國」以後所遭遇到的摧殘。陳若曦的創作欲很旺盛，到了八〇年代有《城裡城外》（一九八一）、《突圍》（一九八三）、《遠見》（一九八四）、《二胡》（一九八五）、短篇小說刊行³⁷。但陳若曦的觀點始終徘徊在台灣海峽兩岸的原鄉和故鄉之中，未能把焦點定位，這使得她的小說失去堅定的背景，擺蕩而分裂。一九八〇年一月，她應吳三連文藝獎基金會的邀請回鄉，為王拓和楊青矗的釋放奔走而備嘗中傷和攻擊，但她仍然發揮作家的人道精神，始終不屈服，道

³⁷ 陳若曦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如同下方所列。〈晶晶的生日〉、〈查戶口〉、〈尹縣長〉、〈任秀蘭〉、〈耿爾在北京〉（《北京のひとり者》收錄）。

德勇氣令人折服³⁸。

洪醒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生於彰化二林鎮。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因車禍去世，享年三十四歲。從一九六七年台中師專在學中開始寫作，一九七〇年跟陌上桑、陳恆嘉等作家創辦《這一代》雜誌，有短篇小說集《黑面慶仔》（一九七八）、《市井傳奇》（一九八一）、《田莊人》（一九八二）及遺著《懷念那聲鑼》（一九八三）。洪醒夫成長於窮苦農家，因此他的小說離不開台灣農村的景觀。除去他的前輩作家鍾鐵民之外，他可以說是泥土味最重的農民作家。早期小說多有試探性的嘗試，把觸鬚伸到各階層民眾生活裡去，有時也表現出頹喪的歐美現代小說風格。從一九七一年所寫的〈跛腳天助和他的牛〉開始，堅定地捨棄現代主義的殘渣，走向描寫紮根於農村困苦的現實，而有劃時代的佳作出現。〈散戲〉發表於一九七八年，曾獲聯合報小說獎。〈散戲〉一作最能代表洪醒夫卓拔的的小說技巧，把人生的真實和舞台的人生溶化在同一個層面，正確地剖析台灣社會從農業轉移到工業過程中，農村疲憊的現實。

李昂，一九五二年生於鹿港。李昂在十七歲時就顯露出早熟的寫作天才。初期的小說雖然把根深紮於鹿港這個古老的小鎮，但作品風格是超現實的。短篇小說集《混聲合唱》一九七五年刊行。《人間世》一九七六年刊行，同年刊行訪問作家錄《群像》。直到一九八三年

³⁸ 陳若曦與高雄事件。陳若曦利用自己在台灣「反共作家」的評價，於高雄事件結束後不久的一月七日到十六日為止，從美國回到台灣，與蔣經國總統進行兩次會面，交涉不要讓事件再擴大下去。參照王育德《台灣海峽》「第二章 祖國「回歸」帶來了什麼——陳若曦的徬徨」、《珍藏美麗島》第三冊《暴力與詩歌》「第十一章陳若曦返台」。

³⁹ 洪醒夫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市井傳奇》（《台灣現代小說選I 彩鳳の夢》）。

才又刊行長篇小說《殺夫》。李昂雖然也寫了些探討現代台灣社會兩性關係的小說，以女性為「第二性」的被壓迫的事實為主題，描寫進步的台灣女性對「性」問題的看法，但她的小說的主要題材仍然以衰微的鹿港為主，以「鹿城故事」為名的一系列小說裡，把鹿港這昔日台灣第二大港口，現在已衰微而墮為小市鎮的人情風俗、四季景觀刻劃入微。一九八五年又有長篇小說《暗夜》⁴⁰問世。

宋澤萊，一九五二年生於雲林縣。從一九七〇年開始寫作，早期的長篇小說《紅樓舊事》（一九七九）、《廢園》（一九七六），受歐美現代小說的影響濃厚，喜歡描寫深層心理的夢魘世界。從一九七八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打牛浦村〉⁴¹開始，作品的傾向和風格有蛻變。他從西方文學的迷惘裡脫身，開始挖掘台灣農村的現實。基本上他是知性的農民作家，他的小說常從敏銳的觀察出發，如果缺少了理念的架構，就往往流於素描。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勤於抒寫現代詩，以及探討禪的奧秘。一九八五年有科幻小說《廢墟台灣》刊行。宋澤萊有豐沛的創作力，出版有《糶穀日記》（一九七七）、《變遷的牛朥灣》（一九七九）、《惡靈》（一九七九）、《骨城素描》（一九七九）、《蓬萊誌異》（一九八〇）。

當鄉土文學論戰正盛的時候，由於主編《台灣文藝》的作家鍾肇政又執掌了高雄民眾日報副刊，於是在這兩個園地上致力培養更年輕一代的作家。宋澤萊的〈打牛浦村〉就是發表

⁴⁰ 李昂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一封未寄的情書〉（《バナナポート》收錄），《殺夫》、《迷園》。

⁴¹ 宋澤萊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打牛浦村〉（《台灣現代小說選II 終戰の賠償》收錄）。

在《台灣文藝》的。在這期間最有成就的，當推吳錦發和王幼華等小說家，及彭瑞金、高天生、張恆豪和羊子喬等論評家了。吳錦發一九五四年生於美濃，是客家系作家。小說的根大多紮在幼少時的泥土生活，有正確的史觀，並對現代社會尖銳的問題有敏銳的反應。著作結集的有《放鷹》（一九八〇）、《靜默的河川》（一九八二）、《燕鳴的街道》（一九八五）、《消失的男性》（一九八六）等⁴²。王幼華是屬於大陸籍第二代作家。一九六五年生，山東人。以探討人內心生活的矛盾和衝突為題材的作品居多，有小說集《惡徒》（一九八二）、《慾與罪》（一九八六），長篇小說《兩鎮演談》（一九八四）。

彭瑞金，一九四七年生，新竹縣人。他也是客家系作家。曾獲一九八一年巫永福評論獎。出版有評論集《泥土的香味》（一九八〇）。彭瑞金是當代年輕作家中最富有剖析能力的作家，從台灣的歷史、文化來透視台灣文學動向的評論，有獨樹一幟的成就。高天生，為台北南港人，曾獲一九八四年巫永福評論獎。著有評論集《台灣小說與小說家》（一九八五）。高天生的評論以綜合各家理論予以明晰的判斷為長處。

除鍾肇政的民眾副刊之外，兩大報的文學獎⁴³也培養了不少年輕作家：如廖蕾夫、吳念

⁴² 吳錦發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消失的男性〉（《台灣現代小說選IV 鳥になった男》收錄），〈燕鳴的街道〉（《悲情の山地》收錄）。吳錦發取材台灣原住民的問題，發掘了原住民作家田雅各，也編輯了《悲情の山林 台灣山地小說》（一九八七年一月）。《悲情の山林》被翻譯成日文，日文翻譯版的標題是《悲情の山地》（一九九二）。

⁴³ 兩大報的文學獎。聯合報的聯合報小說獎創設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對象為刊載在聯合報系刊物的小說。中國時報的中國時報文學獎創設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對象是以刊登在中國時報上的詩、小說、散文為主。

真、鍾延豪、林清玄、張大春、古蒙仁、小野等。廖蕾夫，本名廖風德，一九五一年生，台灣宜蘭人。一九七七年因〈竹子開花〉、一九八〇年因〈隔壁親家〉分別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廖蕾夫的小說描寫工商社會裡農村被摧殘的現實。吳念真，本名吳文欽，一九五二年生於台北瑞芳。出版有《抓住一個春天》（一九七七）、《邊秋一雁聲》（一九七八）。從一九八〇進入電影界，寫了不少劇本⁴⁴。鍾延豪，一九五三年生於台灣龍潭，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因車禍去世。其父為著名作家鍾肇政。著有短篇小說集《金排附》（一九八〇）。作品題材都以老兵、妓女等底層社會人物為主，浮現了台灣社會為生存而掙扎的小人物的悲劇。張大春，一九五七年生，為大陸籍第二代作家。著有《雞翎圖》（一九八〇），進入八〇年代中期後，開拓了嶄新的小說世界，令人刮目相看⁴⁵。古蒙仁，本名林日揚，一九五一年生於台灣雲林。著有小說集《狩獵圖》（一九七六）、《夢幻騎士》（一九七九）及報導文學《黑色的部落》⁴⁶。小野，一九五一年生。著有小說集《蛹之生》（一九七五）、《試管蜘蛛》（一九七六）等，八〇年代開始投入電影界。

非馬，本名馬為義，一九三六年生於台中市，原籍廣東，現居美國。六〇年代末期開始

⁴⁴ 吳念真。參與很多侯孝賢導演作品的編劇工作。有《兒子的大玩偶》（一九八三），《戀戀風塵》（一九八七），《悲情城市》（一九八九）等。也自己動手製作腳本以及導演，製作了描寫自己父親的《多桑》。

⁴⁵ 張大春。於八〇年代登場以後，最為活躍的作家之一。翻譯成日文的作品《四喜憂國》、《將軍碑》（《四喜憂國》收錄）、《將軍碑》（《台北ストーリー》收錄）。

⁴⁶ 古蒙仁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碧岳村遺事》（《悲情の山地》收錄）。

在《笠》發表詩作，並大量譯介美、英、俄、法等國的詩。非馬的詩意象鮮明，語言簡賅充滿現代感和機智，是典型的現代詩人。出版有詩集《在風城》（一九七五）、《非馬詩選》（一九八三）、《白馬集》（一九八四）、《非馬集》（一九八四、香港）。

鄭炯明，一九四八年生，台灣台南縣人。一九八二年曾獲《笠》詩獎。他的詩富批判精神，有如手握解剖刀冷靜地剖析著台灣的現實。鄭炯明的詩基本上是台灣知識份子內心的反省。出版詩集《歸途》（一九七〇）、《悲劇的想像》（一九七六）、《蕃薯之歌》（一九八一）。

此外有不屬於任何團體的作家，如東方白、曾心儀、林清玄、吳晟。吳晟，一九四四年生於台灣彰化。詩人兼散文家，著有散文集《農婦》（一九八二）、《店仔頭》（一九八五）及詩集《吾鄉印象》（一九八五）等。他的詩和散文表現了對鄉土深厚的感情及生活經驗，排斥崇洋媚外的思想。曾心儀，本名曾台生，一九四八年生，江西永豐人。著有小說集《我愛博士》（一九七九）、《彩鳳的心願》（一九七七）、《那群青春的女孩》⁴⁷。她的作品真實地描寫勞苦大眾被壓迫被侮辱的生活。東方白，本名為林文德，一九三八年生於台北。他是屬於台灣第二代作家，在加拿大寫作。有小說集《臨死的基督徒》（一九六九）、《黃金夢》（一九七七）、《露意湖》（一九七八）、《東方寓言》（一九七九）等短長篇小說及散文集。大河小說《浪淘沙》，分別刊在《台灣文藝》和《文學界》，尚未結束⁴⁸。

⁴⁷ 曾心儀的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彩鳳的心願》（《台灣現代小說選I 彩鳳の夢》收錄）。

林清玄，一九五三年生，旗山鎮人。著有散文集《冷月鐘笛》（一九七九）、《長在手上的刀》（一九七八）等多種，曾獲吳三連文學獎。

七〇年代除這些在台灣寫作的作家以外，尚有海外作家，他們的作品常在國內發表，其影響力也相當大，計有聶華苓、夏志清、劉大任、劉紹銘、水晶、葉維廉、許達然、楊牧、鄭樹森、吉錚、張良澤、李歐梵、叢甦、洪素麗、陳芳明、喻麗清、莊因等人。

聶華苓，一九二五年生，湖北應山人。一九四九年來台，一九六四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

此作家屬於較早時期寫作，且多於此並不在此處。

學保羅·安格爾的「作家工作室」(International Writers Workshop) ④9。來台後曾經參加過雷震《自由中國》的編務。著有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一九六〇)；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一九七〇年在聯合報連載中被腰斬，後半部在明報月刊刊完。桑青與桃紅為同一個女性的兩個名字，象徵純真與放縱的人格分裂。從大陸到台灣到美國的悲慘的流亡生活，是造成雙重性格的原因。此外，尚有中篇小說《葛藤》(一九五三)，短篇小說集《翡翠峰》(一九五九)、《一朵小白花》(一九六三)等。聶華苓最大的貢獻在於「國際寫作工作室」(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⑤0，從一九六七年成立以來提供第三世界許多作家留

④8 《浪淘沙》。超過二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前後跨越約十年的寫作時間，一開始在《台灣文藝》上連載，於一九八三年起連載於《文學界》。一九九〇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④9 作家工作室。保羅·安格爾所創設的碩士班課程。學完了就可以取得寫作碩士的學位。聶華苓於一九六四年受到安格爾的邀請，成了工作室的顧問。參照下村作次郎《從文學讀台灣》「第三章第三節 台灣作家與中國作家開始交流的時候——愛荷華大學、IWP」。

- 美進修的機會。夏志清⁵¹，一九一八年生，江蘇吳縣人，為《文學雜誌》主編夏濟安的弟弟。夏志清為著名文藝理論家及文學史家，對台灣現代派的影響至深。有英文著作《中國古典小說》（一九六八）、《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九）⁵²、《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一九七一）等。劉大任，江西永新人。他的小說多在《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發表。結集出版的有《紅土印象》（一九七〇）、《浮游群落》（一九八五）⁵³等長、短篇小說集。劉紹銘，廣東人。他有小說集《二殘遊記》（一九七六），散文集《吃馬鈴薯的日子》（一九七〇）及評論集中、英文本多種。水晶，一九三五年生，江蘇南通人。主要小說集有《青色的蚱蜢》（一九六七）、《鐘》（一九七三），此外有評論集《張愛玲的小說藝術》（一九七三）。葉維廉，一九三七年生於廣東中山縣。他是詩人及文藝理論家。詩集有《賦格》（一九六四）、《愁渡》（一九六九）、《醒之邊緣》（一九七二）等。有論評集《台灣現代小說的風貌》（一九七〇）等。許達然，本名許文雄，一九四〇年生於台灣台南。許
- ⁵⁰ 國際寫作工作室。以作家工作室的想法為本，定期召聘世界的作家，提供創作的時間和場地，同時以促進作家的國際交流為目的，由安格爾與聶華苓於一九六七年所創設的。一九六八年時，陳映真也受到了邀請，卻在出國之前被逮捕了。八〇年代初期，邀請了台灣的宋澤萊、楊遠、陳映真等，從大陸邀請了蕭乾、王蒙、丁玲、茹志娟等，從日本邀請了中上健二等。參照前列的下村作次郎的著作。
- ⁵¹ 夏志清。根據其他資料顯示，他出生於一九二一年。
- ⁵² 《中國現代小說史》。被翻譯成中文（一九七九年傳記文學出版社）。
- ⁵³ 《浮游群落》。有翻譯成日文。日文版標題名為《テイエ燃ゆ》（一九九一）。描寫一九六〇年後中期的台北知識份子思想、活動的迷思與糾葛。

達然的作品以散文爲主，著有《含淚的微笑》（一九六一）、《遠方》（一九六五）、《土》（一九七九）、《吐》（一九八四）、《水邊》（一九八四）等。楊牧，著有詩集《楊牧詩集I》（一九八五）、《北斗行》（一九七八），及散文集《柏克萊精神》（一九七七）等多種。鄭樹森，爲福建廈門人。曾參與《大學》雜誌、《文學季刊》等編務工作。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中、英文著作和編著甚多；如《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等。吉錚，一九三七年生，河北人，一九六八年去世於美國。長篇小說有《海那邊》（一九六七）等。張良澤，一九三九年生，台灣彰化人。他是文學史家及評論家，編有《鍾理和全集》（一九七六）、《吳濁流全集》（一九七七）、《吳新榮全集》（一九八一）等。早期的短篇小說二十多篇，《生存的條件》（一九七六）有濃厚的人道主義關懷。李歐梵，爲河南太康人，出版有《西潮的彼岸》（一九七五）。叢甦，一九三九年生，山東人，她的作品多發表於《現代文學》和《文學雜誌》，有小說《秋霧》（一九七二）、《白色的網》（一九六九）等。洪素麗，一九四七年生，台灣高雄人，出版詩集《十年詩草》（一九八一），散文集《十年散記》（一九八一）、《浮草》（一九八三）等。陳芳明⁵⁴，

⁵⁴ 陳芳明。七〇年代加入詩雜誌《龍族》的詩人。從台灣大學研究所畢業以後，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進入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博士班，於一九九二年回台之前一直都住在美國，參加了台灣旅居美國的作家和研究學者所組織的台灣文學研究會。一九八四年使用宋冬陽的筆名，以台灣文學本土化論的評論家身份，在《台灣文藝》登場。從此之後展開了橫跨政治與文學兩個領域的評論活動。從一九九九年八月開始在《聯合文學》上連載「台灣新文學史」。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兩夜花》（一九九八）。

一九四七年生，臺灣高雄人。他是詩人，也是出色的文學評論家，八〇年代後以「宋冬陽」的筆名，撰寫犀利的文學評論。著有詩集《含憂草》（一九七三）及評論集《鏡子和影子》（一九七四）、《詩和現實》（一九七七）等。喻麗清，一九四五年生，浙江杭州人。著有散文集《牛城隨筆》（一九七五）、《春天的意思》（一九七八）等多種。莊因，一九三三年生，北平市人，著有散文集《杏花小品》（一九七九）、《八千里路雲和月》（一九八二）。

註：

- 1 朱炎〈我對鄉土文學的看法〉，一九七六年九月，中央日報。
- 2 華夏子〈三民主義的文學〉，一九七六年九月，中央日報。
- 3 下面所提的作家論文都根據一九七八年四月遠景版尉天驄所編《鄉土文學論集》。不在這討論集中的文章另註明出處。
- 4 鍾肇政〈熬過二十年霜雪的《台灣文藝》滄桑史〉，一九八四年一月，台灣文藝出版社《台灣文藝重刊本》，五—二十頁。
- 5 李魁賢〈笠的歷程〉，一九八〇年，《笠》詩刊第一百期，三七—五三頁。
- 6 參見趙天儀〈新生代在詩壇的崛起與挑戰〉。

第七章 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學

——邁向更自由、寬容、多元化的途徑

第一節 八〇年代的展望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黨外人士在高雄市舉行「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跟政府的鎮暴部隊發生衝突，結果黨外人士多數被捕，而實際參與政治活動的作家王拓和楊青矗也跟著銀鐺入獄。一九八〇年一月，留美作家陳若曦應「吳三連文藝獎基金會」的邀請返鄉，為援救這兩位作家而奔走呼籲。後來移送法院審判，王拓被判六年徒刑確定，楊青矗起初被判六年後改判四年二個月，分別在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三年出獄^①。

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到此以悲劇落幕。從鄉土文學論爭開始以來，台灣作家始終提倡「參與的文學」(Committed Literature)，以為文學創作活動是一種實踐活動，欲以

① 王拓與楊青矗的出獄。參照第六章譯注¹⁴。

文學作品的內涵來感化民眾，使他們能夠猛然覺醒，積極的參與改革社會提高生活品質的活動，使國家早日成爲現代化的國家。作家的「參與」的意願，本來就是一種愛國愛鄉土精神的發揚；然而，正如所有屬於第三世界的作家一樣，他們面對的是現代工商消費社會的麻木不仁和腐敗，文學作品的銷路和影響極有限，他們的熱情和禱告猶如曠野裡的呼喚得不著回響，作家愈來愈感到無力感，無力感猶如揮不去的惡夢，使得他們寢食難安，而人道主義的關懷，正義感的伸展等美夢也就都成爲泡影了。王拓和楊青矗之所以直接參加政治活動，乃是自然發展的結果。

作家的無力感及理想主義的挫折，使得八〇年代的作家走向兩大互有關聯且有歧異的路線，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歷史感的作家，隨著言論自由的擴大，趁機開拓政治小說和政治詩的領域，突破了若干政治的禁忌，把作品的題材紮根於以前未敢踏進的四〇年代和五〇年代的黑暗、荒蕪的政治環境，勇於揭發政治迫害的現實，鄭清文、李喬、陳映真、林雙不、施明正、吳錦發的小說就顯示了這種傾向；詩人方面以《笠》爲中心，從元老級的桓夫以至於鄭炯明、莊金國、黃樹根，另有宋澤萊、劉克襄、廖莫白、詹澈等詩人，都有所謂批判政治動態的尖銳的詩篇出現。這些政治小說和詩，後來加深了它的力量，直接描寫政治犯獄中生活的紀錄和回顧的作品出現，例如，施明正^②、柯旗化（明哲）^③的小說和散文就是如

② 施明正。一九三五年出生於高雄。是在高雄事件被捕並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施明德之長兄。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針對獄中的弟弟，抗議當局的待遇，絕食的結果，因爲過度衰弱而死亡。因爲受到一九六二年，施明德的政治事件牽連，施明正有人獄五年的經歷。以當時的體驗爲題材，運用奇巧的文體，寫成了監獄小說。有〈渴死者〉、〈渴

此。這一種傾向是自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開展以來，未曾有過的，對於台灣歷史埋藏在晦暗的水面下冰山部分的描寫，的確在文學史上開闢了另一方廣闊的寫作領域（註1）。

但另一部分作家卻抱持「作家必須立志成爲時代良知，不接受任何人施捨的機會，獨立於權力團體之外，超越政治所有各種干擾，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埋頭於創作。」（黃凡語）。這一類型的作家儘管對政治持有批判的態度，但避免直接抨擊，站在高處，俯視社會百態，做客觀的描寫。因此，他們的題材往往是民眾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各種困擾；從公害到生態保育，從電視到資訊、從性生活到生育、從教育到文化，他們的作品非常注重日常性，排除了作家的使命感、歷史性感覺等沉重的包袱。黃凡爲首，林雙不、呂則之、王世勛、蕭颯、袁瓊瓊、康原、廖輝英、劉克襄、許台英、周梅春、蘇偉貞、韓韓、王定國、呂昱、心岱、丘榮襄、朱天文、苦苓、李瑞騰、林文義、林佩芬、東年、陳艷秋、王玉佩、阿盛等一群年輕一代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等逐漸形成，一方面批判消費社會，一方面又容納消費社會的創作路線。

尿者》等作品（《島上愛與死》一九八三年 前衛出版社收錄）。〈喝尿者〉有日文翻譯（《バナナポート》收錄）。

③ 柯旗化。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台灣高雄。第一次於一九五二年，入獄約兩年，一九六一年入獄約十五年間，被當成思想犯監禁。一九八四年，發表了〈獄中回憶〉（《台灣文藝》第八九、九〇、九十一期）。一九八六年六月創刊了全面性探討台灣的文化與台灣人身份認同爲宗旨的季刊《台灣文化》。日語的著作在日本發行。《台灣監獄島》（一九九二年七月 東洋報社）。（彭萱按：柯旗化已於二〇〇二年一月病逝。《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中文譯本由第一出版社出版。）

作家的無力感也使得一部分的作家，認為把文學帶到民眾裡面去，必須修正「純文學」曲高和寡的形態，使文學走向更能投大眾嗜好的路線去，於是從一九八四年以來文學作品逐漸成為電影的題材，從白先勇、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七等生、朱天文等的作品紛紛成為電影的題材，變成民眾精神生活的一部份^④。這也可以說，台灣民眾的文化水準已提高到應用資訊媒介的程度吧？另一方面自立晚報的主編向陽提倡「大眾文學」的推廣，注重攝影與文學的結合，新形態的報導文學「圖文並茂的作品」，也逐漸獲得一部分讀者的喜好，使大眾文學的範圍，從言情小說、武俠小說擴大到推理、科幻等新的文學領域。大眾文學的提倡方興未艾，其未來發展動向值得注意。杜文靖、劉還月、林佛兒、黃海、席慕容、三毛^⑤等作家，在這大眾文學的推展中，將會扮演怎樣的一個角色，也值得注目。而應鳳凰、鐘麗慧等人的出版報導，也吸引了社會大眾的興趣^⑥。

- ④ 文學作品的電影化。台灣現代文學作品電影化的熱潮，從黃春明原著，侯孝賢、曾壯祥、萬仁等三位導演製作的影片《兒子的大玩偶》（一九八三）開始。著名的作品如下列：黃春明原著，王童導演《看海的日子》（一九八三）；朱天文原著，陳坤厚導演《小畢的故事》（一九八三）、《冬冬的假期》（一九八四）；廖輝英原著，萬仁導演《油麻菜籽》（一九八四）；白先勇原著，張毅導演《玉卿嫂》（一九八四）；七等生原著，陳坤厚導演《結婚》（一九八四）；李昂原著，曾壯祥導演《殺夫》（一九八四）。參照田村志津枝的《フクリーンの向うに見える台湾》（一九八九年五月 畑田書店）、《発見台湾—映画が描く「未知」の島》（一九九七年五月 朝日新聞社）。
- ⑤ 三毛。一九四三年出生於重慶，一九九一年逝世。台灣頗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在中國，她的作品也廣泛地被閱讀。翻譯成日文的作品有《撒哈拉的故事》。
- ⑥ 應鳳凰。以文學資料的編纂，廣為人知。有《一九八〇年文學書目》（一九八三）、《一九八一年文學書目》（一九八四）、《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鐘麗慧共同編輯，一九八四）、《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一九八五）等。

一九八一年隨著「台灣關係法」^⑦的日趨安定，國家前途的透視也就越來越清晰；雖然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國內有黨外要求政治體制的革新，同時世界性的經濟蕭條，使治安呈現危機，但大致上國家仍然走上進步的、欣欣向榮的途徑。然而，中共的統戰，一國兩制的主張，給台灣帶來的心理威脅，一九八四年發生的劉宜良事件^⑧，十信的金融風暴導致的金融危機^⑨，經濟蕭條中的工業體制的改革等，各種問題接踵而來。八〇年代進入中期以後，社會狀況越加紛亂。台灣文學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需要自由、寬容的創作環境，去嘗試多元性的創作路徑，以表現台灣文學永遠是民眾心聲的代言人。

第二節 什麼叫做台灣文學？

從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以來，台灣的作家們一向把自己所建立的文學稱為台灣文學。在政治體制上台灣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灣作家仍然用中文寫作的較多，雖然後來也用日文寫作的，但是台灣作家的作品所反映的是被壓迫民族的殖民地生活，跟日本文學相較是

^⑦ 台灣關係法。參照第六章譯注^⑩。

^⑧ 劉宜良事件。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住在美國的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舊金山的自家住宅內被暴力集團槍殺。之後，被暴露出是國民黨的國家安全情報局驅使台灣的暴力集團竹聯幫所犯下的暴行。事件並發展到與美國的外交問題上，國民黨的威信全失。

^⑨ 十信引起的金融危機。一九八五年二月，爆發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違法借款給國泰塑膠高達一百八十億元的事件。因為這個事件，財政部長等政府官員引咎辭職。

異質的文學，自然也不是日本文學。儘管日本作家認為台灣文學是日本的外地文學，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台灣文學所表現的民族傳統風格和意識形態，跟日本文學格格不入。日本人就不得不承認台灣文學這個稱呼，而且很少有異議。以台灣作家而言，儘管因政治體制上的顧忌不得不對外標榜台灣文學這個稱呼，其實他們心目中的台灣文學受到傳統文學的影響不小，本質上不外是抗日民族運動的一部分。台灣新文學一向和台灣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聯結，以反抗日本殖民地的統治為鵠的。然而，在台灣新文學開展的初期階段，已經出現了台灣話文、鄉土文學等論爭。台灣話文儘管是主張爲了滲透民間方便起見，創作語文應用台灣話文去書寫，排除用日文寫作的途徑，但它也同時認爲，以北京官話爲準的白話文不適用台灣民眾，跟大陸的大眾語運動互相呼應，要建立更符合民眾生活的日常性語文——台灣話文。但是在這個主張裡，他們並沒有企圖建立民族之外的語文，只是想把方言提昇到某一種高水準，使創作能發揮實際效果，以便能做到啓蒙民眾的大任。由台灣話文運動引發的鄉土文學論爭也主張把台灣文學落實到民眾現實生活層面，從描寫鄉土的現實中，使民眾認識他們的民族性格，爲解放自己而努力。當然也有一部份作家反對鄉土文學，認爲鄉土文學是山林文學、田園文學，這種文學違背了文學的本質，文學本是反映普遍人性和人生的藝術，不必做地域性的限制，同時也擔憂文學只紮根於鄉土，是否侷限了台灣文學的格局。

戰後，四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在新生報「橋」的副刊上也曾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大部份來台的大陸作家大多肯定了台灣新文學爲「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但很憂慮台灣文學主張描寫台灣鄉土的結果，損害到民族性格，助長台灣文學走向更特殊化的路徑去，當時爲數不多

的省籍作家也勇於應戰，極力主張要傳遞台灣新文學的香火，以台灣現實為依歸的文學才是台灣文學應走的方向，但這些爭論跟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時的論戰一樣，得不著任何決定性的結論（註2）。之後，以六〇年代中期創刊的吳濁流的《台灣文藝》為中心，許多省籍作家並沒有放棄鄉土文學的理想，仍然以台灣現實為描寫的主要對象。《文學雜誌》、《文季》的較年輕一代的作家，雖然仍以台灣社會現實為創作的題材，但他們卻從更廣大的第三世界或整個中國的觀點來處理題材，顯然與《台灣文藝》的固執於鄉土有所分別。然而他們以大陸的變遷來衡量台灣現實的看法，儘管繼承了日據時代的作家關懷現實的傳統¹⁰，但在政治體制上，今之「大陸」非日據時代的「祖國」，所以他們的思想缺乏現實的基礎，無法落實。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有人以杞人憂天的心情，指出鄉土文學有分離主義的傾向，或者鄉土文學是不是跟大陸文學互相呼應，變成「工農兵文藝」；有人甚至故意曲解之為「邊疆文學」。事實上，台灣新文學從日據時代以來，一直在與大陸的隔絕下，孤立地發展了六十多年，有許多實質的問題是無法以流派、主義的名稱去解決的。所以七〇年代的鄉

¹⁰ 《台灣文學史》與原刊稿異同。第七章第二節葉石濤的敘述，改寫了相當多當初刊載在《文學界》第十五集（一九八五年八月）的初稿。初稿當中屢次使用著「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單行本中則剔除了這種表示。以更加强調台灣文學的獨立性的寫法來表現。例如，這個「以大陸變遷為基準，而謀求台灣的現實，他們的這種想法，是日據時期的作家持續的繼承傳統而來，在政治體制上，現在的『大陸』和日據時期的『祖國』不同。因此，他們的思想欠缺了現實的基礎，而無從實現。」當中的加線的部份，本來是「遵從祖國之命的傳統」、「他們的思想抵觸了政府的既定國策，引發了紛爭」，明顯減少了在台灣文學中，中國國家主義的影響，以否定的姿態談論中國國家主義濃厚的《文季》系統的作家。

土文學論戰不得不以「愛鄉土更愛國」的一片雄壯合唱聲中草草閉幕，然而問題卻沒有得到結論；只是再度肯定鄉土文學為現實主義文學，以發揚台灣新文學的寫實精神為其使命。

進入了八〇年代的初期，台灣作家終於成功地為台灣文學正名，公開提倡台灣地區的文學為「台灣文學」。儘管有人仍然反對使用「台灣文學」的名稱，但重要的是台灣新文學既有六十多年的歷史，無論用什麼名號，都無法抹煞鐵錚錚的內涵。由於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結構不同，同時台灣的自然景觀和民性風俗也跟大陸不完全相同，所以台灣文學自有其濃厚的地方色彩和特具的創作使命。

一九八二年三月回國的留美作家陳若曦曾下結論說：「北部作家希望學習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封建主義的經驗，與南部作家主張植根鄉土，從最眼前的事做起，這兩種不同的追求方向都應受到重視，同時彼此也要互相尊重，不要發展出對立或互相排斥的局面來。」這是明智的呼籲。

參加此種討論的有葉石濤、陳映真、宋冬陽、李喬、彭瑞金、宋澤萊、高天生、詹宏志、呂昱等諸作家，然而此種問題很容易受台灣未來命運的影響，只好讓時間之流去做根本性的澄清，留待歷史之手去處理（註3）^①。

① 環繞台灣文學的論戰。一九八一年以詹宏志的發言文引發的，圍繞著「台灣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的論戰。詹宏志在一九八一年一月發表的書評〈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書評書目》第九十三期）當中，敘述道，若是台灣成了中國的一部分的話，台灣文學不是將會被廢置在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而被看作「邊疆文

第三節 作家與作品

八〇年代由於是一個現代消費社會、資訊時代的來臨，使得文學作品並非是唯一獲得心靈經驗的藝術，多元化的藝術表現方式相繼出現。使大眾文化越趨複雜多歧：如電影、電視、電腦的廣泛開發，使得生活經驗的內心化，美感的滿足，可以由眾多資訊科技去獲得；文學於是變成較專門性的一部分知識份子的閱讀嗜好。未可否認，台灣文學要走的路越走越窄，於是大眾文學應運而生，但它的未來命運很難預卜，是否有力量抵抗多元化的資訊媒介的龐大而威脅性的勢力，就很難說了。

八〇年代初期的純文學雜誌只有《台灣文藝》、《笠》、《中外文學》繼續發行。《台灣文藝》和《笠》已超過了二十個年頭，一九八五年開始已邁入了第二十一個年頭。這漫長的歲月中，一向提倡鄉土現實文學的兩刊，培養了無數的作家，發表了無數的傑出作品，對「學」嗎？以詹的發言為契機，引發了一連串環繞著台灣文學之定義的論戰。葉石濤、李喬、彭瑞金等主張台灣文學擁有「傳統的特殊性」與「台灣意識」。針對這點，陳映真反對將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分離出去，認為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都同樣屬於第三世界，展開了第三世界文學論。從這以後，到目前為止，過去都在「鄉土文學」的旗幟底下團結一致的作家們之間，也產生了對立。特別是在台灣南部，因為「台灣意識」強烈，而被稱為「南北對立」。陳若曦介入調停，一九八二年三月中旬在高雄召開由「台灣時報」主辦的座談會。這次的論戰本身雖是一時性的東西，不過之後的「台灣意識」主張開始呈現表面化。參照高天生的〈台灣文學的歧路〉、〈新危機與新展望〉（《台灣小說與小說家》收錄）。再者，李喬的論文有日文翻譯。（我看「台灣文學」）（《終戰の賠償》收錄）。還有，該書的解說中，松永正義詳細地探討了這次的論戰。

台灣文學的發展有莫大的貢獻。《中外文學》為台灣大學外文系支持的學院派雜誌，八〇年代以後加強了探討古典文學的傾向，現代作家的作品逐漸減少。

八〇年代創刊的文學雜誌有《文學界》、《文季》、《文訊》、《聯合文學》、《陽光小集》及《新書月刊》等。不過《陽光小集》在一九八四年已停刊，其餘為以《創世紀》等歷史悠久的詩刊為首，有許多詩刊相繼出現，但都是不定期發行的居多，影響力極有限。

《文學界》為一季刊，一九八二年一月創刊於高雄，至一九八五年十月已刊行了十五期^⑫。創刊時，曾揭櫫這樣的話：「時代的巨輪不斷向前滾動，人類的文明也日趨複雜，處於時局多變的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壇，要如何才能確切地捕捉屬於這塊土地的靈魂的悸動，記錄它的子民的喜怒哀樂，應是每位從事文學創作者所面臨的迫切的課題，亦即努力以赴的目標。……希望《文學界》的出版，能為已經奠下美好基石的台灣文學，帶來更多彩、更豐碩的成果。」《文學界》主持者以詩人鄭炯明、曾貴海、陳坤崙為主，初期由小說家許振江任執行編輯，經常撰稿的有詩人黃樹根、陳芳明（陳嘉農）、非馬、李魁賢、趙天儀、陳千武、苦苓，散文家陳冠學、洪素麗、許達然、蔡文章，小說家李喬、鄭清文、鍾鐵民、吳錦發、曾心儀、東方白，評論家葉石濤、彭瑞金等人。《文學界》的編輯特色，在於詩人與小說家並重，每期都有俱有份量的詩人或小說家的專輯或特輯，尤其研究台灣文學史的專論常出現，是注重台灣文學傳統的刊物。

^⑫ 《文學界》。在第二十八集，一九八九年二月時停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時，同一團體仍然在高雄創刊了季刊《文學台灣》，現在也持續發行中。

《文季》¹³ 一九八三年四月創刊，起初為季刊，後來改為雙月刊，至一九八五年六月為止共刊行十一期，列名編輯委員者，計有何欣、許達然、郭楓、姚一葦、葉笛、黃春明、李魁賢、李南衡、蔣勳、王禎和、張錯、陳映真、王曉波、王津平、王拓、楊青矗、鄭臻、尉天驄、林俊義、許國衡等人。《文季》較能發掘尖銳的問題，對文學問題和傾向反應敏銳。

《文訊》¹⁴ 為國民黨中央文工會的評論刊物，由孫起明、李瑞騰等主持。《文訊》的發行，可能是著名文學論評雜誌《書評書目》的停刊所促成。雖是官方的雜誌，但不強調政治色彩，廣開言路，容納了意識形態不同、所屬流派不同、年齡不同的台灣地區眾多作家詩人的作品。一九八三年七月創刊，為月刊雜誌，到一九八五年八月共刊行十八期，《文訊》的最大特色在於各種文學史料的整理，有抗戰文學、古典文學、電影、戲劇、散文、五〇年代、六〇年代文學、詩社等的專輯相繼出現。

《聯合文學》¹⁵ 是聯合報系統投入龐大的資金創辦的純文學雜誌，頗能投合現代社會的需求和嗜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創刊。發行人為張寶琴，社長兼總編輯為著名詩人痲弦。

¹³ 《文季》。發行人李南衡，雖然沒有明言要延續六〇年代的《文學季刊》、七〇年代的《文季》，但是從執筆者內容來看，就是以前的《文季》之流。創刊號中刊登了首次以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為題材的作品，陳映真的〈鈴噐花〉。

¹⁴ 《文訊》。現在也持續刊行中。文訊雜誌社在國民黨中央本部設置辦公室，進行台灣現代文學的資料收集整理工作，收藏的資料一般來說是公開的。

¹⁵ 《聯合文學》。現在也持續刊行中。雖然是商業性的雜誌，近年，卻逐漸開始採用台灣文學了。從一九九九年八月開始連載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

《聯合文學》容納了海內外眾多作家，對世界文學新潮流，反應銳敏、迅速，給讀者打開了放眼看世界新文學的窗戶。

《陽光小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創刊，為一詩雜誌，至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第十三期「政治詩專輯」後停刊。發行人為向陽，社長張雪映。《陽光小集》網羅了不少台灣八〇年代才抬頭的新生代詩人和作家，可惜後來找不到共同的寫作見解而瓦解。這個集團裡較活躍的有向陽、張雪映、苦苓、李昌憲、林文義、林野、陳煌、陳寧貴、陌上塵、劉克襄、劉還月、張錯、履彊、陳克華、謝武彰等人，分別在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等方面積極創作，反應了八〇年代紛爭而多元化的台灣文學思潮。

在八〇年代一揭幕就有政治小說出現。也許政治小說的這種稱呼有些曖昧，因為政治本是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反映政治狀況也是正當的小說題材。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數執政者不喜惡劣的政治狀況進入小說世界，因此視政治小說，揭發社會黑暗為其反對者的敵對行為，常以壓制的手段去對付，台灣自不例外。從四〇年代以至於七〇年代，台灣歷史的某一個部分都被隱藏，作家也不敢以這種被隱藏的某一個政治狀況為其小說的題材，以免招來迫害。進入八〇年代以後，言論自由的範圍逐漸擴大，就有作家踏入了這塊禁地。如鄭清文的小說〈三腳馬〉（一九七九）¹⁶的主角曾吉祥，因臉相有些缺陷常受人欺負，因這情結，他就在日據時代充當殖民政府的走狗來迫害自己同胞，光復後又復認同統治者去欺凌同胞以

¹⁶ 〈三腳馬〉。參照第五章譯注²²。所謂「三隻腳」所指的是日據時代明明身為台灣人，卻甘為日本人的走狗，凌虐同胞的人之蔑稱。

便脫罪，終於自殺身亡。（彭萱按：末二句敘述與小說情節有出入，應為主角曾吉祥戰後逃離舊鎮以刻三腳馬贖罪；其妻代其受罪，後患傷寒去世。）鄭清文從曾志祥內心生活的剖析，而成功地描寫了一個「三腳仔」的悲劇發生的流程。同樣的題材也出現在李喬所寫的〈小說〉¹⁷（一九八二），〈告密者〉¹⁸（一九八二）及〈泰姆山記〉（一九八四）。〈小說〉是從《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所發展出來的短篇，主要描寫日據時代的「三腳仔」刑警鍾益紅和李勝丁，在光復後仍然以同一個手段來對付自己同胞的故事（註4），而這類小說的題材也在吳濁流的《台灣連翹》（一九八五）¹⁹裡出現過。陳映真的小說〈鈴璫花〉（一九八三）和〈山路〉（一九八三）²⁰都是發表在《文季》上的小說，是陳映真針對他所說的「白色、荒廢的五十年代」戳進解剖刀的作品。〈鈴璫花〉透過一個小學生的眼睛來看五〇年代清共的政治狀況，〈山路〉透過充滿奉獻精神的蔡千惠，經過二十多年的苦難歲月，愕然發覺自己身處於消費社會的現實，自己理想主義的破滅。黃凡，從獲第二屆時報小說獎的〈賴索〉（一九七九）²¹開始踏進文壇。〈賴索〉也是一篇政治小說，描寫台獨組

¹⁷ 〈小說〉。參照第五章譯注²³。

¹⁸ 〈告密者〉。參照第五章譯注²³。

¹⁹ 《台灣連翹》。主要是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回憶錄，其前半部於吳濁流生前，在《台灣文藝》第三十九期開始連載到四十五期，後半部卻因為某個「半山」（日據時代生活在大陸，於戰後返回台灣的台灣人）暴露了二二八事件時所採取的卑劣行動，而遵照吳濁流的意願，決定等待適當的發表時機。吳濁流逝世後十年的一九八七年六月，經由鍾肇政的決定，終於出版了。

²⁰ 〈山路〉。參照第五章譯注²⁵。

²¹ 〈賴索〉。有日文翻譯。日文版標題為〈賴索氏の困惑〉（《台灣現代小說選IV 鳥になった男》收錄）。

織的興衰，被遺棄的小人物的苦難。在自立晚報百萬元小說獎未獲入選的長篇小說《傷心城》，也對於台灣現代社會的政治狀況、思想動態有銳利的解剖。林雙不，原以碧竹筆名寫作，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小說集《筍農林金樹》（一九八四），描寫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的台灣農村被工業化所摧殘的狀況，自然也關係到政治和政策的問題了，特別是〈柯鐵虎的抉擇〉，描寫保衛土地的農民反抗統治者的故事；〈黃素小編年〉描寫農民心中對政治迫害的恐懼，都從側面剖析了台灣歷史中農村的凋零，農民的受苦，同時也批判了統治政策的偏差。

黃凡、本名黃孝忠，一九五〇年生於台北，一九七九年第一篇小說〈賴索〉獲時報文學獎登載於「人間」副刊。之後，多次獲得時報、聯合報小說獎，出版有《賴索》（一九八〇）、《大時代》（一九八一）、《零》（一九八二）、《自由鬥士》（一九八三）等短篇小說集，及長篇小說《天國之門》（一九八三）、《傷心城》（一九八三）、《反對者》（一九八四）以及散文集兩本。其中《天國之門》為科幻小說。這些小說，正如一九八二年《大英百科全書》所說：「不但諷刺中共及台獨份子，而且也批評國民黨政權。」他的小說立場，高天生曾有所抨擊：「我們可以窺見黃凡對現實生活的某種疏離和扞格，這種扞格和疏離，再加上不確定感，使黃凡的小說，表面上看起來批判力十足，處處都刀來槍往，可是深入探討，卻遍尋不著一個肯定點或否定點，致一切的批判，都因缺乏立足點而顯得零碎、尖銳和架空！」（註5）反過來說，這「曖昧」倒是構成黃凡小說的特色和媚力，使黃凡有獨立不羈的創作立場。

林雙不，一九五〇年生，台灣雲林人，本名為黃燕德，從七〇年代開始創作，散文集出版有《山中歸路》（一九七〇）等十八本，短篇小說集有《班會之死》（一九七〇）等多本，另外有評論和詩的出版。進入八〇年代以後，小說風格蛻變，多從台灣歷史和社會來凝視這塊土地上的農民的困苦生存條件和情況。這位多產作家今後的動向值得注意。

王世勛和呂則之，都是自立晚報百萬小說晉入決賽的作家。王世勛以前也寫過幾篇短篇小說，但作品不多。長篇小說《森林》（一九八三）的主題，在於抨擊台灣當前的各種污染，企求台灣變成一片潔淨的「森林」。呂則之，原是一個詩人，他的長篇小說《海煙》（一九八三）以澎湖的生活為背景，描寫澎湖民眾的命運和海洋息息相關的現實，表現生命的無常感。

八〇年代也是一群女作家活動特別顯著的時代，李昂有傑出的小說《殺夫》（一九八三）和《暗夜》（一九八五）出現。蕭麗紅有《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九八一）、《桂花巷》（一九七七）等，取材於布袋漁港的地方色彩濃厚的長篇小說。蕭颯，以短篇小說《我兒漢生》獲一九七九年聯合報小說獎；之後，有《少年阿辛》（一九八四）、《如夢令》（一九八一）等長篇小說，都是注視台灣現實、女性的處境為主題的小說。廖輝英，一九八二年以《油麻菜籽》獲時報文學獎；之後，有《不歸路》（一九八三）等中篇小說，都探討現代女性的各種遭遇為主。許台英，以《蟹行人》獲一九八一年聯合報小說獎，有《歲修》（一九八一）、《茨冠花》（一九八五）等短、中篇小說集，以舊教倫理來探討人生真諦為其小說主題。蘇偉貞，獲一九八〇年聯合報小說獎，有《紅顏已老》（一九八一）、《陪他

一段》（一九八三）等四本中、短篇小說問世。周梅春是現實主義的作家，有長篇小說《轉燭》、短篇小說集《夜游的魚》等作品。

八〇年代的這些女作家在台灣文學裡開拓了「女性文學」的領域，較尖銳的表現出現代女性的困境和挫折。

註：

- 1 若林正文〈語いはじめた現代史沃野〉，一九八四年東京研文社，《台灣現代小說選Ⅲ 三本足の馬》。
- 2 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一九八四年五月，《文學界》第十集，二一十四頁。
- 3 高天生〈新危機與新展望〉，一九八五年五月前衛出版社，《台灣小說與小說家》，二二三—二三五頁。
- 4 同註1，一八四—二〇〇頁。
- 5 高天生〈曖昧的戰鬥〉，同註3，一八一頁。

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

— 日文版〈解說〉 —

澤井律之、中島利郎 著

彭 萱 譯

一 關於作者

葉石濤是台灣著名的作家，他的著作函括了小說、評論、隨筆、回憶錄、翻譯，根據這樣的說法，超過了六十冊。特別是他的評論活動，對台灣文學的建構方面有著極大的貢獻。正如葉石濤在本書中，以「文學之鬼」來稱呼，和他同年，以台灣史為主題而創作出《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高山組曲」等許多長篇小說的鍾肇政——那是表示著兩者靈魂契合的詞語，葉石濤也正是以「文學之鬼」的姿態，自始至終開墾著、支撐著台灣文學的一片土地。理所當然的，他絕對可以說是談論台灣文學上不可欠缺的存在。以下根據葉氏的回憶錄《一個

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從府城到舊城》以及彭瑞金的《葉石濤評傳》先對葉氏的生涯作一番略述。

葉石濤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古都台南的一個小地主家庭中。雖然在父母親的那一代早已是接受日本教育了，但依然保持著漢民族的傳統式生活和民族意識。葉氏六歲時進入私塾，接受了兩年的漢文教育。一九三二年八歲時進入末廣公學校，畢業於一九三八年，接著就讀於台南州立第二中學。台南當時的中學分成一中和二中，一中是為了日本人的子弟、而二中是為了台灣人的子弟所設立的學校，除了因為成績不佳、進不了為日本人設的學校的、一個學年大約一百三十人裡有三十人的日人學生以外，其餘皆為台灣人。附帶一提的是，楊逵在一九二二年時進入二中就學，一九二四年就中途退學了。在公學校以及中學讀書時的葉氏，對文學已得到了啟蒙。公學校一、二年級時，受到名叫山口的老師的影響，從安徒生和格林的兒童文學開始讀起，逐漸地擴大閱讀的領域；雖然對泉鏡花、尾崎紅葉、國木田獨步、二葉亭四迷等明治時代的文學還一知半解的，卻仍持續的讀著，並陶醉在樋口一葉的〈比高〉之中。非常喜愛日本文學。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就已經把日本文學史上主要作家的作品，從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白樺派、新感覺派、到勞農派左翼作家都大略讀過了。之後，更涉獵了法國文學、俄國文學、英美文學以及弱小國家文學等等的世界文學，也對世界文學的主流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葉氏還在中學就讀的時代，正是從日中戰爭轉向太平洋戰爭的

戰爭時代。一九四二年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以及徵召台灣士兵上戰場，中學裡也派遣軍人來進行軍事訓練。葉氏說，軍國主義雖然統治了許多人，但是教師之中傾向於自由主義的人也有很多，也會在暗地裡批判狂熱的軍國主義者。這時，葉氏熱衷於哲學，猛讀了岩波文庫西田幾多郎的《善的哲學》、阿蘭（彭荳按：Alain 法國哲學家）的《藝術論集》、柏格森（彭荳按：Henri Bergson 法國哲學家，「非理性主義」代表，創立「變的哲學」）的《創造的進化》等等，結果發現屬性不合，終究還是回到了文學來。把學業丟在一邊不管，身陷文學，在五年級的時，就把當時在台灣能夠弄到手的所有小說幾乎都讀過了。

葉氏非常的早熟，他說，早在一九四〇年中學三年級時就已經開始了小說的創作，以〈媽祖祭〉和鄭成功為題材而寫成的〈征臺譚〉分別投稿到當時的《臺灣文學》和《文藝臺灣》等文藝雜誌。在這些作品中第一次被刊登出來的是，刊登於一九四二年四月的《文藝臺灣》的〈林君的來信〉。也由於此因緣，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畢業於二中的葉氏，成為主辦《文藝臺灣》的日本人作家西川滿的學徒，聘請他幫忙《文藝臺灣》的編輯工作。葉氏的作品，日治時期其他還有於同年七月被刊登出來的〈春怨〉。在此順便附帶一提，作品前者受到都德的《磨坊手札》、後者受到紀德的《窄門》的影響，兩者皆為描寫淡淡的戀愛情事的小品。翌年六月，他辭去《文藝臺灣》的職務，回台南。葉氏說明他是由於夾在西川滿和對西川滿反感的作家之間左右為難，漸漸懷疑起西川滿的文學觀，以及日本開始徵召滿二十歲的台灣人青年入伍的計

劃等等的理由。但是，對於西川滿對文學的態度的敬畏是終生沒有改變的（收錄於〈敬悼 西川滿先生〉，《追憶文學歲月》）。回到台南的葉氏，雖然在那裡找到了小學代課老師的工作，翌年一九四五年二月時就被徵召，以陸軍二等兵的身分入伍，一直持續到戰敗為止。

戰後，又再次回復到小學教師的身分，也恢復了教職以外的另一面的創作活動。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在龍瑛宗主編的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用日文創作隨筆。中間因為二二八事件而中斷後，自一九四八年又開始在新生報副刊「橋」以中文發表小說和評論（彭萱按：此時仍以日文寫作，發表的中文是經龔書森等人漢譯的），也在中華日報副刊「海風」、公論報副刊「藝術」等發表作品，從日文轉換到中文也算是成功。再者，讀了河上肇的《第二貧乏物語》等書，接受馬克斯主義的洗禮，自以前的唯美文學傾向蛻變而出，變成站在辯證唯物論的立場思考。葉氏說，戰後初期的四年之中，在精神上的收穫非常豐富。但是，到了五〇年代，葉氏因為在一九四六年時所結識的一個叫做辛阿才的共產主義者的關係，而不幸在一九五一年九月被逮捕入獄。

在五〇年代時，眾所皆知地，中國國民黨在和共產黨的內戰中敗陣下來，從中國撤退到台灣，像發了瘋似的展開清共的行動。從五〇年代起一直到戒嚴令解除的一九八七年為止，約有十四萬人受難，當中有三千到四千人被判處死刑（李筱峰《台灣史一百件大事》）。很多的台灣知識分子成了犧牲品，葉氏也是其中的一人。避開了「懲治叛亂條例」（叛亂罪法令）的適用，

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間諜檢舉法令）第九條「知匪不報」的罪名被判處五年的徒刑。所幸，根據一九五四年的「減刑條例」，三年就出獄了。這個五〇年代是葉氏的人生之中最為痛苦的時期了。首先是放棄了文學的夢想。在生活方面，祖先遺留下來的些微田地也因為農地改革而遭到沒收（彭萱按：指戰後的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使不在地主失去土地），又必須重新尋找新的維生食糧。一旦被貼上政治犯的標籤，甚至連友人都害怕受到牽連而不敢靠近，就業更是談何容易。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葉氏偶然找到了在離台南大約四十公里的荒村的一個叫做「過路」的小學當代課老師的工作。之後，又轉到位於台南縣仁德鄉的文賢國民小學，一九五九年與高雄左營的陳月得女士結婚、共組家庭，成為兩個兒子的爸爸。葉氏雖然掙扎度過了五〇年代，但是，和文學仍舊非常疏遠。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十四年間，持續著文學活動的空窗期。

從五〇年代後半到六〇年代初期，葉氏在位處台灣偏僻地方的文賢國小，和妻子一起過著貧困而孤獨的日子。但是，受到了一九六四年時吳濁流發行了《台灣文藝》的刺激，而萌生了想要參與籌畫台灣文學重建的信念。葉氏毅然決然地辭掉工作，為了磨鍊自己的北京話白話文，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進入省立台南師專特師科。同月，在《文星》雜誌上發表了〈台灣的鄉土文學〉（第九十七期）。從戰前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到戰後的台灣人作家的文學開始，是以一個個不同的潮流來論述的劃時代論文，可以想像葉氏的幹勁十足。一九六六年完成了台南師專

的課程，回到小學教師的職位，被派遣到宜蘭縣冬山鄉廣興國民小學，一九六七年調到高雄縣橋頭鄉甲圍國民小學，之後一直到一九九一年退休為止都在這裡工作。住處也固定在高雄左營。從這個時期起，葉氏才真正地開始他的文學活動。葉氏在〈沉痛的告白〉（《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中表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直從事著「明暗兩種工作」。「明」的是白天的小學教師的工作，「暗」的則是在夜晚書房裡的文學「打仗」。葉氏從一九六五年起就併行著短篇小說和評論的寫作，根據彭瑞金說法，到一九七一年為止接連不斷地發表將近四十篇的短篇，收入《葫蘆巷春夢》（一九六八年）、《羅桑榮和四個女人》（一九六九年）、《晴天和陰天》（一九六九年）、《鸚鵡和豎琴》（一九七三年）、《噶瑪蘭的柑子》（一九七五年）等的小說集，在評論方面嶄露頭角則是在六〇年代評論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等的台灣作家，出版了《葉石濤評論集》（一九六八年）、《葉石濤作家論集》（一九七三年）。到了七〇年代，葉氏則全神專注在評論上，評論從六〇年代後期到七〇年代登場的李喬、王禎和、黃春明、鍾鐵民、楊青矗等台灣作家的作品，同時也在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爭的時刻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一九七七年五月第二卷第五期），立定自己的台灣文學史觀。

自七〇年代末期起，出版《台灣鄉土作家論集》（一九七九年）、《作家的條件》（一九八一年）、《沒有土地、哪有文學》（一九八二年）等評論集，從一九八四年開始發表《台灣文學史綱》，一九八七年以單行本的形式付印出版。一方面，從八〇年代起開始發表《文學回憶錄》

(一九八二年)、《女朋友》(一九八六年)等回憶錄，一九八七年戒嚴令解除以後，也開始發表《紅鞋子》(一九八九年)、《台灣男子簡阿淘》(一九九〇)等觸及四〇年代、五〇年代的三二八事件或清共時期為背景的自傳性小說。當中也有直接談到自己成長歷程思想的變遷、五〇年代的下獄體驗的《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一九九一年)，這在回顧葉氏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文獻。

進入九〇年代的葉氏，在出版以平埔族為題材的《西拉雅族的末裔》(一九九〇年)、以四〇、五〇年代為背景的《異族的婚禮》(一九九四年)等小說集的同時，也出版了《台灣文學入門》(一九九七年)、《台灣文學集1》(一九九六年)、《台灣文學集2》(一九九九年)等和
研究台灣文學相關的作品。《台灣文學集》內容是從一些用日文寫成的戰前的文學作品，像是黃得時在戰前所寫的台灣文學史、現在的日本研究者所寫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論文等等的翻譯而來，乍看之下雖給人五花八門雜亂的印象。但是，我認為葉氏的用意，是在為了不十分了解日文的台灣研究學者提供資料，以及希望正確地傳達戰前的台灣文學。我想在此也可見葉氏為台灣文學獻身的態度。

葉氏在一九九八年獲得淡水學院台灣文學系的「牛津文學獎」，一九九九年被授與成功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葉氏雖然已經七十六歲了，聽說從二〇〇〇年秋季開始，他將任教於成功大學，講授台灣文學的課程。一九九八年在高雄舉行了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九九

年彭瑞金出版了《葉石濤評傳》。似乎各界已經將葉石濤這樣一個人物本身當作研究的重要對象了。

二 《台灣文學史》的成立

本書《台灣文學史》的原名是《台灣文學史綱》（以下簡稱「史綱」），如同本書的「序」所說的，在一九八三年收集資料，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執筆寫作，以《台灣文學史綱》為題，依次在《文學界》第十二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文學界》第十三集（一九八五年二月）、《文學界》第十五集（一九八五年八月）上面連載。然後，〈《台灣文學史綱》序〉刊登在《台灣文藝》第一〇二期（一九八六年九月），一九八七年二月由文學界雜誌社出版。「史綱」的出版具有兩種意義，且是劃時代的舉動。雖然蔣經國在一九八六年時已經宣佈了戒嚴令將解除，在野黨的民進黨也成立了，但終歸是在戒嚴令下行事，而「史綱」的出版正意味著向體制的挑戰。這意思是說，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台灣的文學，始終還是中國文學，公然地宣稱台灣文學仍然是個禁忌。另一個意義是，「史綱」是首開先例地論述了從戰前到現在的台灣文學全部整體的潮流的台灣文學史論。走在「史綱」前端的主要的文學史著述，只有黃得時從戰前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用日文書寫的〈輓近的台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第二卷第四號）、〈臺灣文

學史序說》（《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三號）、〈臺灣文學史第一章第二章〉（《臺灣文學》第四卷第一號），從戰後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用中文寫成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二、三期，第四卷第二期）、陳少廷著《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一九七七年）。在「史綱」之後雖然有彭瑞金所著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一九九一年），也只有整理戰後文學的部分而已。陳芳明從一九九七年八月開始在《聯合文學》連載《台灣新文學史》，卻在二〇〇〇年九月在戰前部分的階段結束了。就目前來說，「史綱」可以說是台灣人所寫的唯一的一部台灣文學通史吧！

「史綱」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明確的台灣文學史觀貫穿全篇。如同陳芳明所述，「這絕非一朝一夕即可塑造而成的東西，得經過長期的思索才能構築出來的」（收錄在〈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點亮台灣文學的火炬》），更是自不待言。葉氏最早談到有關台灣文學史，是在一九六六年《文星》發表的〈台灣的鄉土文學〉。開頭的地方這麼說著「我渴望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可以想像他老早就在構思台灣文學了，而那個模型到現在才完全地做好了。葉氏提出介紹了戰前派作家的賴和、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吳濁流、楊雲萍、黃得時、王白淵、張深切、吳新榮、徐坤泉，戰中派的陳火泉、王昶雄、葉石濤，還有戰後派的鍾理和、鄭煥、鍾肇政、林鍾隆、廖清秀、鄭清文、林海音等等，最後，做了以下的結論。

我們是否應該丟棄鄉土文學的優美傳統呢？這個答案也是否定的。由於本省過去特殊的歷史背景，亞熱帶颶風圈內的風土，日本人留下來的語言和文化的痕跡，同大陸隔開，在孤立狀態下所形成的風俗習慣等，並不完全和大陸一樣。生為一個作家這不就是豐富的題材嗎？能發掘這些特質、探求個體的特殊性，我認為可以給我們中國的文學添加更廣的領域。

在這裡所主張的是台灣和台灣文學的特殊性。用「鄉土」這個詞語，把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裡劃分出來、提出特殊性，究竟這個想法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呢？

在本書第三章所提起的，從一九四七年到四八年，在新生報副刊「橋」上所發生的環繞著台灣文學所引起的論爭當中，葉氏寫了一篇叫做〈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的文章（「橋」第一〇四期），介紹捲入太平洋戰爭的，在戰爭時期的台灣的文學。在戰時總動員體制、皇民化運動、言論壓迫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學被衝擊，精神生活極少鮮明而混亂，竟趨向反動的路線。白話文作家不得志，便緘默。日文作家就逃避現實，有的消極地指責封建餘孽，有的守著『象牙之塔』。」台灣轉化成南方進出的基地，在台灣的文學也完全地被放置到日本文學的統治下。因為這個緣故，這個時期登場的作品沒有豐富的「土壤」，也只不過是「營養不良的消

極寫實主義式的、或是亞熱帶的風土培育出來的浪漫主義式的作品」，列舉出張文環、楊達、楊雲萍、龍瑛宗、呂赫若、周金波、陳火泉、王昶雄的名字。對這個地方最令人感興趣的是，葉氏一方面批判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學，事實上在另一方面又主張著不函括在日本文學裡的台灣文學的堅定存在。並且葉氏也稱之為「日本文學壓制下的一種鄉土文學」。也就是說，依據「鄉土文學」這一個詞語，把台灣文學從日本文學中劃分出來。但是，在這個時點，葉氏尚未打算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葉氏將此歸納成以下的短文。

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形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敞開心窩，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裡頭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這句話，未必是要迎合諂媚那些來自大陸的中國作家們。葉氏再三的說明，不但在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之前或是之後絕對沒有要分離台灣和中國的想法，台灣的許多知識分子，也多半抱持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明確的自覺。起碼聚集在「橋」的人們是這樣的。可是，如同在本書第三章所記述的一樣，中國人作家和台灣人作家之間，環繞著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和獨立性的理解，雙方的認識有相當的分歧，那就算是在「橋」的論爭也不能解決，一直保持平行

線的狀態，進入到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以後的清共時代。五〇年代是中國國民黨確立了在台灣的文化霸權的時期，那時候以台灣屬性的語言（台語、日語）為首，連歷史、記憶都受到了壓迫。在國民黨的文化壓制下，台灣鄉土文學出現轉機，正如日治時代「日本文學壓制下的一種鄉土文學」——甦醒的台灣文學。五〇年代後半時，台灣人作家組織了以鍾肇政為中心的團體「文友通訊」，鍾理和登場，有栩栩如生地台灣南部農村的寫實作品，以及在一九六四年《台灣文藝》、《笠》的創刊，台灣文學逐漸創造出一個確確實實的潮流來了。葉氏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間入獄，雖然之後在台南的偏僻鄉村當國小教師，在一九六六年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又和這個潮流匯合了，延續了戰前和戰後的鄉土文學。此後，葉氏恢復文學活動，在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爭的時候，開始著手〈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彭荳按：〈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發表於論爭開始之前，是論爭導火線。）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以下簡稱為「導論」）的最大特徵是，在台灣不但有「和漢民族的文化不同的台灣獨特的鄉土風格」，還有以台灣鄉土文學為前提，明確地提出具備了「台灣意識」的主張。只是，葉氏並沒有把「台灣意識」和中國分離。把「台灣意識」定義在「即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通經驗，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通經驗」之上。但是，陳映真指出葉氏理論內涵的本質和所謂「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是不相同的（〈「鄉土文學」的盲點〉）。之後，葉氏轉往切斷台灣和中國的關係的方向思考，讓台灣文學獨立，直至構築台灣文學史觀

為止。但是，在寫「導論」的時候，葉氏是否已經透澈地看到這個地步了呢？葉氏立論的著眼點，以及過去的一切努力，都在挖掘被現今遺忘在深淵裡的台灣文學，這裡姑且將驗證留給歷史，過去和現在可是緊緊相繫的，可不是嗎？順便附帶一提的是，「導論」是為了作為「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一九七九年）的序言而寫的。（彭萱按：是全集借用導論為代序。）

「導論」還有另一個特徵，如同「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之說，是採用社會主義理論的概念。這和葉氏受到戰後初期社會主義的影響，以及支持著七〇年代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各式各樣運動的意識型態是左翼理論的這些事，不會是毫無關係的吧！松永正義指出，「導論」的理論構築和七〇年代的左翼運動有關（收錄在〈關於葉石濤〈台灣文學史導論〉〉，《點亮台灣文學的火炬》）。

甚至，「導論」還考察追溯台灣鄉土文學的歷史，直到荷蘭人統治時期，把清朝的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當作「台灣鄉土文學史上永遠不能磨滅的偉大寫實作品」。「史綱」甚至於回溯到明朝的沈光文認同台灣文學的起源，不拘泥於國家的歸屬問題，可以說台灣島的歷史重疊在台灣文學之歷史上的思考方式已經萌芽了。

這樣子一來，葉氏的台灣文學史觀也大致確立了，但是，成為構想文學史之上最大的難關，應該是戰後初期的敘述吧！要記述戰後初期時，就不得不碰觸到二二八事件和清共的問題。就算打算要避免好了，當時的刊物幾乎都散失了，關係者也都閉口不談，資料的蒐集實在非常困

難。所幸，一九八三年，像是也理解了陳映真發表的〈鈴璫花〉（《文季》創刊號，一九八三年四月）、〈山路〉（《文季》第三期，一九八三年八月）等等描寫清共的小說似的，漸漸開始開放戰後初期歷史忌諱的領域，林瑞明等《文學界》同仁發掘了《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以及新生報副刊「橋」（《文學界》第九集，一九八四年二月；《文學界》，第十集，一九八四年五月），終於《台灣文學史綱》執筆的氣勢產生了。甚至，如同從彭瑞金的〈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文學界》第二集，一九八二年四月）、宋冬陽（陳芳明）的〈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論〉（《台灣文藝》第八十六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可見到的，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脫離了，出現了認同獨立了的台灣文學實體的「台灣文學本土化論」，可以說是當了「史綱」執筆的後盾吧！如同本書第七章譯註⑩所表示的，「史綱」在《文學界》發表的時候，仍然堅持著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原則，可以見到「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是大陸的抗日民族運動的一部分」、「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台灣的中國人創造的文學」等等的敘述，可是，在單行本中就刪除了這些表現方式，被重新改寫了。這個舉動表現出，「史綱」是為了配合正在八〇年代後半時期的「本土化論」勃興的步調而寫的文學史。

一九九九年三月，行政院的文化建設委員會和聯合報副刊共同舉辦了「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史綱」被選為三十冊「經典」當中的一冊。不論是當作台灣文學的典範，或者是當作站在「本土化論」的立場而寫成的文學史論，「史綱」都已經廣泛地被認同了。如同前文所

述，「史綱」是一本貫穿作者的台灣文學史觀的，相當有吸引力的讀物，但是，問題也不少。在批判「史綱」的問題點的作品當中，有呂正惠的書評。呂氏並沒有將歷史的敘述非常的粗糙這一點加以具體的分析，而指出有些部份就結束在作家名字的羅列，太過重視省籍作家與寫實主義，敘述有偏頗，這只是「台灣文學『印象記』」而不能說是「客觀性的文學史」等等的不當之處（〈評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灣社會研究》創刊號，一九八八年二月）。這的確是非常正確的意見，但是，葉氏是在如此不周全的情況之下，用短短三年的時間，表現出橫跨三百餘年的台灣文學史的「大綱」。問題的關鍵點，應該是葉氏的台灣文學史觀吧！在前面曾經提及的「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上，關於葉氏所定位的，六〇年代《現代文學》派的「無根與放逐」是背離了台灣的現實的文學。彭小妍尖銳地指出，如果要說台灣社會是「移民社會」的話，那「無根與放逐」所謂的「移民」意象不也是台灣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嗎？這個葉氏的史觀的矛盾之處。（〈等待黑暗逝去、光明來臨的日子——論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陳芳明表示贊同彭小妍的指正，且說明葉氏的批評雖然有偏頗，但是同時也有採用張愛玲的作品或許多外省籍作家的成果，至少並沒有將他們排除在台灣的歷史之外（「講評意見」）。先前敘述過的，「史綱」是八〇年代的「本土化論」的勃興的果實，但是，在「本土化論」當中也有各式各樣的立場。葉氏的「本土化」史觀，並不是那麼樣的死板僵化的東西，而是以此為基礎來開拓的各種想法。

（第一、二節·澤井律之）

三 葉石濤的文學史觀

那麼，葉石濤是用怎麼樣的「史觀」來寫成這部文學史的呢？也就是說葉石濤所認為的「台灣文學」是什麼呢？

對於這個問題，首先，本文學史是「台灣近代文學史」，並不是所謂的「台灣新文學史」，書名命題為《台灣文學史綱》，必須要注目的地方是，其敘述是從明朝末年的沈光文開始。這是為什麼呢？以三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年當作台灣的文學起源，通覽至今為止的文學通史，葉氏這本文學史正是首開先例啊！把沈光文當作台灣文學的創作之始的說法，並不是從葉氏開始的。

眾所皆知的，台灣近幾百年來被荷蘭、西班牙、明朝鄭氏、清朝、日本以及國民黨所統治，一直到李登輝出現為止的過去，其主權一次也沒落在台灣人的手上過。甚至於為民族血肉、民族精神的文學語言也是一樣，在明清時期是中國語文言文，在近現代則是被強迫的統治者語言，日本語及北京話。因而，在台灣的文學語言通常就是統治者的語言。日清戰爭之後，進入日本統治時代，隨著近代市民社會的成立，漸漸地形成了對抗日本人的「台灣人」意識。可是，這並不是在戰後所形成的，對於對中國大陸的異化的「台灣人」意識。也可以把這種說法放在文學方面，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竭盡心力要表現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在近代文

學成立後的初期，台灣的知識分子用北京話當作文學用語。之後開始展開中日戰爭，由於廢止在學校裡的漢文科、報章雜誌北京語使用的自主限制、公共出版物的北京語使用限制等等，日文幾乎成為唯一的文學語言。然後，在日美開戰以後，由於台灣總督府推行台灣人的皇民化，又更加強化了這一點。可是，在那樣的處境之下，卻打算要以台灣人之手，整理最初的劃時代的「台灣文學史」。那就是黃得時在昭和十八年後半發表的〈臺灣文學史序說〉（《臺灣文學》三—三）以及〈臺灣文學史（一、二章）〉（《臺灣文學》四—一）。而且，這部文學史是最早把明朝末年的沈光文當作台灣文學史祖的，葉氏的文學史是受到了黃得時的影響。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由於刊登的《臺灣文學》的停刊，黃氏的「文學史」就停斷在清朝初期，之後也無法再繼續完成。

那麼，為什麼黃得時會把明末的沈光文認做是台灣文學的始祖呢？黃得時在「序說」中這麼說道，「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孤島，從很早以前就不是一個一致的國家，扣除了鄭氏時代僅僅的二十二年以外，我們一直被當作是荷蘭或是清朝的屬地，在明治二十八年我們被納入版圖。」在這裡應該注意的是，「扣除了鄭氏時代僅僅的二十二年以外」這一段話。那是因為，這短短的「鄭氏二十二年」也正是漢民族統治台灣的時代，因為除此之外的時期，全部都是異族統治的時代。在這個地方正對照到了這部文學史所寫的，黃得時首先明示出身為漢民族的自我確認。再者，由於當時的知識分子還潛在著「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這樣的理由，因

而黃得時的這部文學史才會是從明末的「鄭氏時代」開始寫起。

接下來，黃得時到底是如何具體地思考台灣文學的呢？接續上述的引用，在「序說」中就「台灣文學史以及應該提出討論的對象」來說，揭示以下的五種情況：

- (一) 作者的出生地是台灣，並且其文學活動（在此指作品的發表及其影響力，以下皆同）也都是在台灣的情況。
- (二) 作者的出生地雖然是台灣以外的國家，但是其長久定居於台灣，並且其文學活動也都是在台灣的情況。
- (三) 作者的出生地雖然是台灣以外的國家，只有一段時期在台灣從事文學活動，之後，又再次遠離台灣而去的情況。
- (四) 作者的出生地雖然是在台灣，但是其文學活動卻發生在台灣以外的地區的情況。
- (五) 作者的出生地在台灣以外的國家，甚至也沒來到過台灣，單單只是書寫和台灣有關係的作品，在台灣以外的地區從事文學活動的情況。

於是，對於上述涉及甚多方面的「對象」，以（一）（二）為主，雖然（三）以下按照必要而納入「文學史」且衡量其輕重，但是基本上「其文學活動如果是在台灣的話，不論是原住

民（譯者：在此指台灣人）和本國人（譯者：在此指的是外來的統治國），一律都納入文學史的範圍內才是正確。」

葉氏對關於以上所述的黃得時的想法這麼說道：「這種見解頗符合台灣的多種族移民社會，台灣的歷史遭遇和風土（包含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我以為是高瞻遠矚的看法。」（彭萱按：以上悉依葉氏原文，〈台灣文學的多種族課題〉，綠蔭書房《台灣文學研究的現在》，下村作次郎譯），表示全面性的贊同（這一點從葉氏刊登在《文學台灣》第十八、二十一期中，黃得時這部文學史的漢文譯本也可以了解到）。再來，關於外來民族的文學，「譬如，荷蘭統治時代最後一任太守揆一也在繫獄於荷蘭本國時，所撰寫的《被遺忘的臺灣》，應該是一部文學作品。荷蘭時代所留下的有關台灣事物的描述，也算是台灣文學遺產的一部分。說到關於日本統治時代殖民者以日文書寫的大量日文創作，以及中國古文創作，日文的短歌和俳句等文學作品，只要有關於台灣事物的描寫，也應該是在台灣文學的範疇之內。」（彭萱按：以上依葉氏原文），黃得時的「台灣文學的範圍」（同前）更加具體地說明了，並且做了以下的結論「台灣多種族共同創立的台灣文學，未來會走向哪一種結局，尚待觀察。但台灣文學的多種族特性，將影響台灣文學的發展，殆無疑義。」（出處同前）。這樣子的思考方式，若是對照到台灣的歷史性背景的話，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可以說是存在台灣文學中納入邁向世界文學的全球化的視野的說服力的一種思考吧！

如同以上所述，葉氏的台灣文學史觀，可以說受到黃得時影響相當大吧！那麼，在葉氏的

本文學史當中，論及他是否有明確地把那樣的文學史觀寫進去呢？答案是未必如此，的確很可惜。例如，以往葉氏自己也認同的「台灣文學遺產的一部分」的揆一的《被遺忘的臺灣》，在本書中完全沒有提及（雖然在葉氏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等等再三提到過），還有「日治時代殖民者以日文書寫的大量日文創作，以及中國古文創作，日文的短歌和俳句等文學作品」也只是隨處可以見到日本人作家的名字而已，作品的介紹和他們的文學活動的意義，在本文學史完全沒有提到。那就如同本書的「序」中所提到的，資料蒐集的困難也是一個原因，然而最大的原因則是除了考慮到時代的限制以外沒別的了。本書的執筆開始在還是戒嚴令下的一九八三年左右。當時是個經過一九七〇年代後半開始的「鄉土文學論爭」的過渡時期（參照本書第六章），從「鄉土文學」這樣的概念開始，從而產生出紮根於文學本土化、台灣化的「台灣文學」之全新想法，後來台灣文學的概念就固定了下來。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作家的作品，雖然在六〇年代前半開始逐漸被提及，在這個時期也獲得了「台灣文學」的認定，但是若提到那個時期的日本人作家的作品，對被稱為「鄉土文學」作家的戰後作家而言，是非常排斥的。而葉氏正是考慮到了那樣的時代感情。在台灣方面，能夠接受日本統治時期的日本人作家的研究，是一直到一九八七年的戒嚴令解除之後，進入九〇年代以後的事，特別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在清華大學舉行了「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以後。（附記：本會議的主要論文，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以《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為題，由日本的東方書店發行）。然後，

葉氏像是要彌補自己文學史的不足似的，也自這個時期以後在《西川滿小說集1》（一九九七年二月，春暉出版社）翻譯介紹戰前的代表性日本人作家西川滿的作品，還有，在《台灣文學入門》（一九九七年六月，同前）評論西川的業績，肯定他在台灣文學留下很大的貢獻，而且也介紹了其他的日本人作家。除此之外在《台灣文學集1》中，在介紹台灣人作家的同時，也翻譯介紹了濱田隼雄、龜田惠美子、河合三良、梶井基次郎等人的作品。「台灣文學」理所當然是為了台灣人而存在的。但是，如果是在台灣這塊土壤上開花的東西的話，就算是異國的種子，也把它當作裝飾台灣的花朵來欣賞吧！只要它是由台灣的土壤、甚至是台灣文學來培育成長的，這正是葉氏對「台灣文學」的真正想法。在種種的限制下所完成的本書，隱藏著這樣的觀點。

這部文學史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之軛解放出來這件事。雖然感覺和先前敘述過的「台灣文學」的全球化的觀點相反，其實不然。如同前面敘述的一樣，戰前的台灣人作家仍然認為「台灣文學」的根在大陸的文學。在台灣的新文學成立初期，雖然有過「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運動」等等，以台灣話的創立為目標的論爭和運動，但是，台灣人作家所使用的創作語言大概都還是北京話。那是在「七七事變」以後，直到台灣總督府以高壓禁用漢文為止，北京話是台灣人作家抗日、反日的精神性象徵。因此，在使用北京話的作家內心深處，是以漢民族來對抗大和民族，並且隱藏了渴求和大陸的感情聯繫。因為這個原因，總督府也在和中國大陸戰爭開始的期間，對北京話的使用施加壓力，也就是說，當時很多

的台灣人作家並非在表面，而是實際上都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可是，在日本戰敗之後，經過「二二八事件」和緊接著的白色恐怖時代，對祖國、對中國人產生的幻滅變得堅定了，和戰前不同的，對大陸中國人的精神異化加速，產生了第二種「台灣人」意識。這在文學方面，經過七〇年代後半的「鄉土文學論爭」等等，形成了「台灣文學」確立的明確意識。葉氏在本文學史開始執筆的時候，恰似那種意識已經有點漸漸變得明確起來的青黃不接的時期。

關於這點明確的說明，請見本文學史的第六章以及葉氏的「序」等。關於第六章的部份就煩請參照本書譯注的部份，現在，我們先來簡單地看一看關於「序」的部份。

葉氏的文學史，如同前面章節所述的，首次發表在《文學界》雜誌中，之後在《台灣文藝》發表了「序」。然後，一九八七年二月發行了本書，在那個時候，葉氏重新改寫了在《台灣文藝》發表過的「序」並收錄其中。此時在前「序」中有的，表示中國與台灣以及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的隸屬關係的詞句，像是「台灣再度回歸到祖國的懷抱」、「台灣文學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環」、「儘管戰後的台灣文學在和大陸的文學完全地隔離的狀況下，那民族的傳統與寫實的風格還是沒變。台灣文學正是中國文學緊密的一支支流。」等等都被徹底刪除，徹底了結。這一年的七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解除了一直維繫四十年強勢的戒嚴令。但是，葉氏恐怕老早就預測到此事，再加上刪除了前文，他表現出了一向作為一個台灣人作家，隱藏在心中的真情，

也因此可以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而宣言「台灣文學」的獨立。「台灣文學」是由集結在一個叫台灣的島上的人們創始、發展而來的，並且在三百餘年間產生出「台灣文學」才擁有的個性、個別性。這不是中國文學，當然更不是日本文學，這是非得用台灣的土壤培育才能產生出來的文學。文學，也正因为確立各個國家獨自的個性，才能走向世界文學之道。於是，葉氏在本書中所訴求的就是，「台灣文學」的全球化從「台灣文學」的獨立開始，這也是根據其獨自構築的世界觀來確立的。

(中島利郎)

——台灣新聞報，二〇〇一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文學年表

彭瑞金

※本年表之編製係根據葉氏史綱所述及之文學記事，及中島利郎、澤井律之二氏史綱日譯本註釋內容，相關之文學記事編成。

西元紀年	相關紀年	文學記事
230年	三國吳黃龍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吳國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甲兵萬人，浮海來臺，俘數千人。
1297	元大德元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元收澎湖入版圖。1360年設立澎湖巡檢司，隸屬福建晉江縣。
1621	明天啟元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顏思齊、鄭芝龍率眾來臺開墾。
1652	明永曆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明太僕寺卿沈光文(1612—1688)遭颶風漂流來臺。(沈光文來臺時間，有1649、1662等不同說法，這裡根據史綱新版)

1661	明永曆 11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鄭成功 (1624 — 1662) 率兵來臺，明遺臣徐孚遠 (1599 — 1665)、張煌言 (1626 — 1664)、陳永華 (1593 — 1688) 等隨軍來臺。
1662	明永曆 12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明遺臣盧若騰 (1593 — 1664) 來臺，因病羈留澎湖，後病逝澎湖，葬於澎湖。
1684	清康熙 23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福建惠安人江日昇來臺，著有《臺灣外記》，1704 年刊行。
1685	清康熙 24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諸羅縣令季麒光，邀集沈光文等十四人成立「福臺新詠」，後改名東吟社，為台灣第一個詩人結社。
1697	清康熙 3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浙江仁和諸生郁永河 (1645 — ?) 來臺採硫，著《裨海紀遊》，為其採硫記事。
1714	清康熙 53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貴州貴筑人周鍾瑄 (1681 — 1729) 來臺任諸羅縣令，創修《諸羅縣志》。
1716	清康熙 55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福建漳浦人陳夢林 (1670 — 1745)，應諸羅令周鍾瑄之聘，來臺纂修《諸羅縣志》，著有《遊臺詩》、《臺灣遊草》、《臺灣後遊草》。
1721	清康熙 60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十九日，朱一貴 (1690 — 1721) 率眾抗清，史稱朱一貴事件。朱氏是養鴨人，因有鴨母王之稱。 羅漢門養鴨業者朱一貴起義抗清。藍鼎元 (1680 — 1733) 隨族兄藍廷珍總兵來臺平亂，著有《平臺紀略》、《東征集》等。
1722	清康熙 61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朱一貴事件後，清設巡臺御史，清順天府大興人黃叔瓚 (1666 — 1742) 以首任巡臺御史來臺，著有《臺海使槎錄》。
1728	清雍正 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江蘇高郵人夏之芳來臺任巡臺御史，著有《臺灣紀遊詩》，編有《海天玉尺編》。

1738	清乾隆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灣縣人陳輝中舉，連雅堂《臺灣詩薈》整理其作品為《陳旭初先生詩集》。曾協助劉良璧分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1740	清乾隆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湖南衡陽人劉良璧來臺任分巡臺灣道，任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1年刊行。
1741	清乾隆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浙江錢塘人張湄來臺任巡臺御史，兼理提督學政，仿夏之芳《海天玉尺編》編《珊瑚集》，為士人科考範文，著有詩集《瀛壖百詠》，已佚。
1745	清乾隆1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浙江仁和人范咸(1696—1771)，來臺任巡臺御史兼理學政，任內與另一巡臺御史六十七，纂修《重修臺灣府志》，通稱「范志」。著有詩集《婆娑洋集》。
1751	清乾隆1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浙江仁和人錢琦(1704—?)，來臺任巡臺御史，著有《澄碧齋詩抄》。
1755	清乾隆2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章甫(1755—1816)出生於臺灣縣，貢生，著有《半崧集》。
1757	清乾隆2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福建晉江人王克捷，字貽茂，寄籍諸羅，取中進士，著有《通虛齋集》。(史綱誤以「王克捷為王必昌」，亦誤認為《澎湖賦》、《臺灣賦》係王克捷作品。)
1763	清乾隆2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福建建寧人朱仕玠(1712—?)，由德化調任鳳山縣教諭，著有《小琉球漫誌》，1765年刊行。
1786	清乾隆5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因臺灣知府下令逮捕各地天地會成員，會眾逃往大里杙(今台中大里市)投靠林爽文(?—1788)，林氏決定率眾抵抗，是為林爽文事件。清人派兵七萬、歷時十六個月始定。

1786	清乾隆5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林爽文事件發生後，鳳山縣莊大田（1735—1788）受民眾簇擁起事，是為莊大田事件。
1787	清乾隆5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江蘇陽湖人趙翼（1727—1812），因林爽文事件，佐閩浙總督李侍堯幕來臺，著有《甌北詩話》、《二十二史劄記》。
1819	清嘉慶2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安徽桐城人姚瑩（1785—1853）來臺任臺灣縣知縣。1821任臺灣府噶瑪蘭通判。1838—1843年任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著有《東溟文集》、《東槎紀略》。
1823	清道光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竹塹鄭用錫（1788—1858）舉進士，為臺灣本土出生考取進士第一人，因稱開臺進士。著有《北郭園詩抄》。
1829	清道光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淡水頭份莊人黃驥雲中進士，詩作見《彰化縣志》。1837年分校京闈。
1833	清道光1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浙江富陽人周凱（1779—1873），來臺任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1837年卒於任，著有《澎湖紀行》、《內自訟齋文集》、《內自訟齋詩鈔》。
1835	清道光1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淡水廳大龍峒人陳維英（1811—1869），赴福州參加乙未恩科鄉試不第。終身致力於教學，有「關渡先生」之稱，著有《易義經論》、《古今占法》，詩作散見方志藝文志。 澎湖蔡廷蘭（1801—1859）二度赴福州鄉試落榜，返回澎湖時，遭遇颱風，船隻飄至越南，歷經一百多天水、陸行程，始返回澎湖。1836年，將其經過撰成《海南雜著》，1844年進京會考中試，為開澎進士。
1842	清道光2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英人之役，竹塹林占梅（1821—1868）以捐獻鉅款，獲貢生加道銜，1853年林恭之役，1862年戴潮春之役，籌防、募勇、捐輸不遺餘力，也因戴潮春之役，與姻親鄭家興訟，久懸不決，1868年吞金自盡，有《潛園琴餘草簡編》傳世。

1848	清道光2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江蘇通州人徐宗幹(?—1866)，來臺任福建分巡臺灣道，著有《渡海前記》、《渡海後記》。編有《瀛洲校士錄》，收海東書院諸生作品。
1849	清道光2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淡水人曹敬(1817—1859)由臺灣道徐宗幹取錄一第一名補增生。平日假大龍峒港仔墘設帳講學，遺作輯為《曹愨民先生詩文略》。與黃敬合稱淡北二敬。 清福建侯官人劉家謀(1815—1853)來臺，任臺灣府學訓導，在臺四年，病逝於任內，有《海音詩》、《觀海集》等在臺作品傳世。
1859	清咸豐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灣府彰化縣人陳肇興(1831—1866)中舉，與蔡德芳、曾惟精、廖景瀛合稱白沙書院四傑。1862年，戴潮春事起，陳肇興拒與戴氏合作，遁入武西堡(今南投集集)山中。曾謀刺戴氏不成。事平，不仕，設帳授徒，著有《陶村詩稿》。
1862	清同治元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臺灣兵備道孔昭慈至彰化緝捕八卦會總理，就地處決。四月，彰化富戶戴潮春(?—1864)率八卦會眾抗清，是為戴潮春(萬生)事件。 清福建金門人林豪(1831—1918)，應淡水族人林向榮之邀來臺，巧遇林占梅，獲邀為潛園西席四年。因林占梅為戴潮春之役之督辦團練，林豪曾親歷戴役現場，加上訪談野老，撰成《東瀛紀事》。1874年，獲聘為文石書院講席，1878年主草《澎湖廳志》(未刊行)，1882年，返回故里，重修《金門志》，著有《誦清堂詩集》、《誦清堂文集》、《瀛海客談》，僅存詩集。
1863	清同治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林本源記(俗稱林本源家族)代表林維源(1840—1905)，因平定戴潮春事件有功，授三品銜。1876年，捐獻五十萬元，得內閣中書官銜。1894年，日清戰爭爆發後，率家族避走廈門。

1865	清同治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廣東嘉應州人吳子光(1819—1883)中舉。吳子光屢試不第，乃於1837年來台，文風奇特，詩學晚唐。1868年受聘為《淡水廳志》主持筆政。後應三角仔(今臺中縣神岡鄉)呂家之聘，館於筱雲軒，著有《一肚皮集》十八卷。
1869	清同治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福建晉江人楊浚(1830—1890)，應淡水同知陳培桂之聘，來臺纂修廳志。旋又受竹塹鄭用錫後人之託編訂《北郭園詩鈔》。福州私宅度藏有善本書七萬卷，是藏書家。著有《冠悔堂全集》、《島居錄》、《島居續錄》等。
1871	清同治1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淡水廳志》刊行。1723年，淡水設廳後，首由鄭用錫於1834年纂修《淡水廳志稿》二卷，1867年，淡水同知嚴金清聘林豪續纂，成稿十五卷，1870年，陳培桂聘楊浚為總纂，成稿十六卷。
1874	清同治1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彰化鹿港人蔡德芳中進士，1859年與陳肇興同年中舉，曾掌文開書院。1895年，舉家遷泉州。
1875	清光緒元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江蘇寶應人王凱泰(?—1875)，應沈葆楨之邀任開山撫番諸大役，居臺五月，因積勞及受瘴癘，內渡卒於官，著有《臺灣雜詠》等詩作。
1876	清光緒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南安平人施士洁(1855—1922)中進士。其父施瓊芳為1845年進士。不喜仕進，任教於彰化白沙書院、臺南崇文、海東書院。1895年遷居福建晉江，後人輯其詩文為《後蘇龕合集》。

1884	清光緒 10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噶瑪蘭廳頭圍堡（今宜蘭頭城）人李望洋（1829—1901），歷任甘肅渭源、河州、狄道州知州。乞假歸蘭陽，值法軍犯基隆，並有感於宦海浮沉，乃報請開去河州知州實缺，在故鄉協辦勸捐、清賦、團練事宜，主講仰山書院，與鸞堂關係密切，日治時代亦接受紳章。宦遊期間留下《西行吟草》詩集。
1886	清光緒 12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嘉義東門橫街仔人林啟東（1850—？）中進士。曾掌臺南崇文、嘉義羅山兩書院，詩作散見各家詩集。
1887	清光緒 13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廣西灌陽人唐景崧（1841—1903）任福建臺灣道，1891 年為臺灣布政使，1894 年為臺灣巡撫。於臺灣道任內創「斐亭吟社」，布政使駐省會臺北，屢邀文士集於官署為詩酒之會，成立「牡丹吟社」，並輯社員吟詠詩稿為《詩畸》，又因好詩謎，編有《謎拾》一書。
1889	清光緒 15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淡水廳銅鑼灣（今苗栗銅鑼）人丘逢甲（1864—1912）中進士。主講臺南崇文書院、嘉義羅山書院及臺灣府衡山書院。1895 年，日軍登陸台灣，曾舉義軍抗日，不久遁往廣東，著有《嶺雲海日樓詩鈔》。
1890	清光緒 1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南安平人許南英（1855—1917）中進士，1895 年奉劉永福之召，任臺南籌防局統領，事後渡海至福建，病逝於蘇門達臘之棉蘭，有《窺園留草》傳世。
1891	清光緒 17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南胡殿鵬（1869—1933），號南溟，與許南英、蔡國琳（1843—1909）等組「浪吟社」。1895 年，胡氏避居廈門，次年返臺，擔任報社記者，亦為「南社」重要成員。著有《南溟詩草》。以七古長詩五江曲——〈長江曲〉、〈黃河曲〉、〈湘江曲〉……最為特殊，〈長江曲〉達三千餘言。

1891	清光緒1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蔡國琳，臺南人，1882年舉人，曾任文石、蓬壺書院山長。1893年，受命纂修《臺灣通志》。1895年，攜眷避居福建，旋返臺。日治時期，曾受聘編纂《臺南縣志》，任揚文會臺南支會會長。
1893	清光緒1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許地山(1893—1941)出生於臺南，1895年隨父遷往福建。整理《窺園留草》。著有《空山靈雨》、《春桃》等作品。
1894	清光緒2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日戰敗，清國抗法名將黑旗軍劉永福(1837—1917)奉命來臺救援，相持月餘不支，談和未成，變裝亡走。 彰化秀才吳德功(1850—1924)於1891年受聘臺灣省通志局，主修彰化縣志，於本年完成《彰化縣采訪冊》，未及出版，遇臺灣割讓日本而散佚。著有《瑞桃齋詩稿》，戰後有《吳德功先生全集》。日治時代，曾任臺中師範教職。
1895	清光緒2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南汪春源(1869—1923)在北京應禮部試，與臺灣舉人黃宗鼎、羅秀惠等向督察院上書抗議馬關條約之訂定。日人領臺後，舉家遷居清國，1903年，考取進士，為最後一位臺籍進士。在臺時，曾加入臺南崇正社、斐亭吟社、牡丹詩社等。 彰化鹿港秀才洪棄生(1867—1929)，本名月樵，不願屈服日人統治改名繻，字棄生。著有《寄鶴齋詩集》、《八州遊記》、《中西戰記》、《中東戰記》等多種。
1897	日明治3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二月，清治時代淡水廳竹塹人蔡啟運(1862—1911)任苑里辦務署參事，主纂《苑里志》。蔡氏幼有神童之譽，曾倡竹梅吟社，1895年遷居苑里，1897年與施仁思(1858—1897)、洪月樵等人共組鹿苑吟社，亦為櫟社創始人之一。雅好擊鉢吟，所著《養餘軒詩鈔》已佚。

1898	<p>日明治31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五月六日，日治時代最大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創刊。迄1944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共發行15800餘號，是1896年創刊的臺灣新報，與1897年創刊的臺灣日報合併而成。 七月十七日，兒玉源太郎總督為籠絡士紳耆宿，邀集臺北縣下八十歲以上的耆宿三百一十四名，於舞樂堂舉行「饗老典」，有劇、樂表演及餽贈禮物。其後亦於各地舉辦多次。 清浙江餘杭人章炳麟(1869—1936)，號太炎，因參與戊戌變法失敗，來臺主編「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
1902	<p>日明治35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臺灣詩人林朝崧(1875—1915)、林幼春(1879—1939)、賴紹堯(1884—1917)等創設「櫟社」。林朝崧號癡仙，有《無悶草堂詩存》傳世。林幼春號南強，創刊《臺灣文藝叢志》，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去世後，由其子編有《南強詩集》出版。日治時，賴紹堯曾獲紳章，曾任庄長，亦曾被選為櫟社社長，著有《逍遙詩草》。
1903	<p>日明治36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灣日日新報於1899年在臺中成立分社，發行臺中新聞，1901年獨立為臺中每日新聞。本年成立公司，改名臺灣新聞。
1909	<p>清宣統元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柳亞子(1887—1958，清江蘇吳江人，名棄疾)創南社於蘇州，社友曾多達千人，梁啟超、黃遵憲屬之。與1906年創立於臺南之南社無關。
1911	<p>日明治44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自中國逃亡日本的梁啟超(1873—1929)，因結識林獻堂，由日本來臺，與櫟社詩友、中部士紳會談，著有「海桑吟」百餘首。
1913	<p>日大正2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2月18日，總部在苗栗，以羅福星(1886—1914)為首的秘密抗日組織，繼大部分重要黨員被捕之後，羅福星也遭到逮捕，和先前各地發生的抗日被捕事件，合稱苗栗事件，又稱羅福星事件。此事件有1211人被捕，221人判處死刑，285人被判處有期徒刑。

1914	<p>日大正3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中霧峰人林獻堂(1881—1956)出面響應板垣退助所倡之同化會。1919年參加新民會，任會長。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任總理。1949年赴日後，卒於日本。著有《環球遊記》，亦留1927—1954年之日記。
1915	<p>日大正4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六日，余清芳(1879—1916)聯合江定(1866—1916)、羅俊(1855—1915)共謀起事，本日攻打礁吧哖(今臺南玉井鄉)、甲仙埔等地日警，引發總督安東貞美下令圍剿，有上千名村民遭到集體屠殺，余氏等人也先後被捕。此事件有1957人被依「匪徒刑罰令」告發，有1413人被起訴，被判死刑者866人，判有期徒刑者453人。因余清芳密謀起事地點在西來庵，此事件稱余清芳抗日事件之外，尚有西來庵事件、礁吧哖事件及甲仙埔抗日事件等不同稱呼。 九月，中國安徽懷寧人陳獨秀(1879—1942)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遷北京發行)，標榜科學與民主，在胡適之後發表〈文學革命論〉，支持中國的文學改革。
1917	<p>日大正6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中潭子人傅錫祺(1872—1946)，繼賴紹堯為櫟社社長。編有《櫟社沿革志略》，1967年，外孫集其遺稿出版《鶴亭詩集》。 中國安徽績溪人胡適(1891—1962)，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口語文學；揭示八不主義，開啟中國文學改革之先聲，被視為中國文學革命的起點。戰後來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著有新詩《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等。
1918	<p>日大正7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元旦，林幼春、蔡惠如(1881—1929)、林獻堂、傅錫祺、鄭汝南等發起創辦之《臺灣文藝叢誌》創刊。後來易名《臺灣文藝》月刊，自1919年迄1926年，發行長達七年。

1918	日大正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五月，中國作家魯迅，本名周樹人（1881—1936）於《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說。 林獻堂與東京臺灣留學生籌組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推動廢除六三法。但未正式成立組織，後來轉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連雅堂（1878—1963）完成《臺灣通史》，1920年出版。連橫著有《臺灣詩乘》、《臺灣語典》、《劍花室詩集》、《雅堂文集》等作品。創辦《臺灣詩薈》，主持《臺南新報》漢文版等。
1919	日大正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一日，在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有三十至四十名新知識分子宣布朝鮮獨立，謂之三一運動。有農、工、商界人士響應，全國有四萬人以上被檢舉，七千人以上被殺害。 日本以強硬的態度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實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談之會議決議，五月四日，引發北京地區大學生喊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口號，包圍外交總長官邸、放火燒日本駐華公使館事件，是為五四事件。 日本兵庫縣人田健治郎（1855—1930），來臺就任第八任總督（1919年十月二十九日—1923年九月二日），是第一位文人總督。 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蔡惠如等人，與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馬伯援、吳有容、劉木琳，本「同聲相應」之義，組「聲應會」，以結合兩地知識分子之力量。創立後未見行動。 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於本年底，組成啟蒙運動團體「啟發會」，未及運作，旋於1920年一月十一日成立「新民會」，會長林獻堂、副會長蔡惠如，黃呈聰、蔡式毅任幹事。 臺中清水蔡惠如（1881—1929），捐巨款創辦《臺灣青年》。1923年十二月，因治警事件入獄。1906年參加櫟社，1918年於清水創鰲西吟社。著有《鐵生詩草》。

1920	<p>日大正9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桃園大園人林呈祿(1887—1967)擔任《臺灣青年》雜誌社幹事，歷任《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主筆二十五年。1947年，創立東方出版社。 • 七月十六日，在東京成立的新民會，發行機關刊物《臺灣青年》，為漢和文並刊的綜合雜誌。後來易名《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 • 七月十六日，就讀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理財科的留學生陳忻(1893—1947)，於《臺灣青年》創刊號，發表〈文學與職務〉，發出臺灣文學改革的先聲。
1921	<p>日大正10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甘文芳(1901—1986)，於九月十五日發行之《臺灣青年》第二卷第二號，發表〈實社會與文學〉。是臺灣新文學運動之早覺論文。甘氏彰化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41年獲慶應大學醫學博士，返臺後自行開業。戰後旅居日本。 • 林獻堂召集新民會為主的留學生組成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旨在設置臺灣議會，抗衡臺灣總督府之集權統治，至1934年止，十四年十五度向日本帝國國會提出請願。 • 十月二十七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臺北，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林幼春、連溫卿、蔡培火為理事。 • 蔣渭水(1891—1931)宜蘭人，臺北醫學校畢業，開設大安醫院，又經營春風得意樓酒家。
1922	<p>日大正11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月二十日出刊的《臺灣青年》第四卷第一號，刊載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 • 追風(本名謝春木，1902—1969)，於七月出版之《臺灣》第二年第四號起，分四期連載小說〈她將往何處——致苦惱的年輕姐妹〉。追風，彰化二林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曾任臺灣民報主筆，創辦《洪水報》。

1923

日大正12年

- 一月一日出刊之《臺灣》第四卷第一號，刊載了黃呈聰(1886—1963)〈普及白話文的使命〉。黃氏彰化線西人，國語學校畢業後，1925年赴廈門、南京、上海等地習神學，1932年任臺灣新民報社社會部部長。
- 一月一日及二月一日，黃朝琴(1897—1972)，於《臺灣》第四卷第一號及第二號發表〈漢文改革論〉。黃氏臺南鹽水人。1923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再留學美國。歷任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科長，駐外領事。戰後，奉派任臺北市長，1946年起任臺灣省議會議長十七年。
- 一月，治安維持法適用臺灣後，文化協會不得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二月，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前往東京，會合東京幹部後，推定林呈祿為主幹，向早稻田警察署申請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順利獲准。
- 三月十日，無知發表小說〈神秘的自制島〉於《臺灣》第四年第二號。
- 四月十五日，臺灣民報社於東京創刊發行臺灣民報，每月發行兩回，十月改成旬刊，1924年六月，改為週刊。
- 四月十五日，臺南市人陳逢源(1893—1982)，以芳園筆名發表〈對臺灣青年之希望〉於臺灣民報創刊號，勉勵臺灣青年做經世家。陳氏主要任職於金融界，戰後曾任省議員，著有經濟論之外，亦有《溪山煙雨樓詩存》漢詩集傳世。
- 七月十日起連續二期，柳裳君發表小說〈犬羊禍〉於《臺灣》第四年第七、八號。柳裳君本名謝國文(1887—1938)，字星樓，臺南人，早年受漢文教育。1926年，早稻田大學經濟系畢業，生平著作由後人編成《省廬遺稿》，於燈謎投注甚多。
- 七月十五日，秀潮〈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發表於臺灣民報一卷四號。秀潮本名許乃昌(1906—1975)，彰化人，另有筆名秀湖生。

1923	日大正1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二月十一日，雲林北港人蔡培火(1889—1933)於臺灣民報十三號發表〈新臺灣之建設與羅馬字〉。蔡培火於《臺灣青年》創刊時，任編輯兼發行人，推動臺語羅馬字化運動。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之後，推動第四次請願簽署，十二月十六日清晨，臺灣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進行全島性大檢肅，搜捕盟員，有九十九人遭搜查、扣押、傳訊，有十八人被起訴，謂之治警事件。
1924	日大正1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月，連雅堂於臺北創立之漢語文言之文學雜誌，由「臺灣詩薈出版社」發行，整理刊載前人遺稿及著名詩人作品，1925年十月停刊，計二十二期。 二月十一日，施文杞發表漢語文言之小說〈臺娘悲史〉於臺灣民報第二卷第二號。施文杞，彰化鹿港人，1923年留學中國上海南方大學。 六月十一日，新竹人蘇維霖(1902—1986)，號薌雨，於臺灣民報第二卷第十號發表〈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戰後任臺大教授。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東京發行的臺灣民報第二卷第二十四號，刊出北京留學的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掀起新舊文學論爭。張我軍(1902—1966)，臺北人，任職新高銀行廈門支店時，興發留學中國意願。1922年，辭職赴北京留學。返臺後，任職臺灣民報漢文欄。著有詩集《亂都之戀》，其子張光直編有《張我軍詩文集》。
1925	日大正1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一日，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一號，轉載中國作家魯迅〈鴨的喜劇〉。 一月五日，閔葫蘆生於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發表〈新文學之商榷〉，反駁張我軍對舊文學之抨擊。 二月一日，半新舊於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四號發表〈「新文學之商榷」的商榷〉。

1926	日昭和元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臺灣民報刊出賴和〈門鬧熱〉(八十六號)、〈一桿稱仔〉(九十二—九十三號)、楊雲萍〈弟兄〉(一一九號)、〈黃昏的蔗園〉、張我軍〈買彩票〉(一二三—一二五號)等新文學創作。
1925	日大正1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二月十一日，彰化人蔡孝乾(1908—1982)，於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五號發表〈為臺灣的文學界續哭〉。蔡氏於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參加了長征，戰後為中共在臺地下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 三月十一日，楊雲萍、江夢筆(筆名器人)二人合創之《人人》雜誌發行，僅發行二期。第一期僅楊、江二人作品，第二期才有外稿。 • 楊雲萍(1906—2000)，本名楊友濂，中學時代即有作品發表，曾出版詩集《山河》，另有小說作品，戰後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 四月一日、十一日，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號、十一號，轉載中國作家魯迅〈故鄉〉。 • 四月二十一日，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二號，轉載中國作家冰心(本名謝婉瑩，1900—1999)作品〈超人〉。 • 五月二十一日，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五號，轉載中國作家魯迅作品〈狂人日記〉。 • 六月二十一日，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八號，轉載中國作家郭沫若(本名郭開貞，1892—1978)作品〈仰望〉。 • 賴和發表隨筆〈無題〉於臺灣民報六十七號(八月二十六日)。 • 賴和(1894—1943)，彰化人，本名賴河，臺灣總督府醫學學校畢業。開設醫院，加入臺灣文化協會，因治警事件被捕入獄。主持臺灣民報文藝欄，培育青年作家。有《賴和全集》出版。漢語文言詩作品亦不少。 • 十一月二十九日—1926年二月七日，臺灣民報第八十一號至九十一號(缺八十九、九十)，轉載中國作家魯迅作品《阿Q正傳》(未完)。

1926	日昭和元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賴和主持臺灣民報文藝欄。 六月二十八日，全臺性的臺灣農民組合在簡吉、趙港的領導下，於鳳山宣佈成立。 1925年六月，為爭取合理之甘蔗收購價格，二林蔗農率先成立農組，1927年底，全臺已有二十三個支部，會員超過二萬人。1931年，因日警大力取締，組織遭瓦解。
1927	日昭和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二日，臺灣無產青年受到前一年來臺之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小澤一鼓勵，經王萬得、周和成、黃白成枝巡迴全島宣傳，本日集合於彰化街，正式宣告成立。日警也開始逮捕盟員，計四十四人被捕。和此事件相關的作家有楊華、楊守愚、王詩琅等。 彭華英 (1891—1968) 當選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彭華英新竹東人，日本明治大學政經系畢業，1924年與蔡阿信 (1899—1990) 結婚。蔡阿信是臺灣第一位女醫師。 連溫卿 (1895—1957)，臺北人。於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後，代表左派取得新文協領導權。連氏響應世界人工語 Esperanto 英文運動，臺灣支部成立後，任該協會發行之《綠蔭》主編。又因受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影響，被稱為臺灣的山川主義者。 山川均 (1880—1958)，日本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指導者。 一月三十日，陳虛谷 (1896—1965)，於臺灣民報 142 號發表第一首新詩〈秋曉〉，並於翌年起發表小說。陳虛谷本名陳滿盈，彰化和美人，原為漢語文言詩人，二十五歲始到日本就讀明治大學，因投入「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返臺後就獲選臺灣文化協會理事，受賴和影響，加入新文學行列。後人編有《陳虛谷選集》出版。 二月五日，詩人楊華 (1900—1936) 因違犯治安維持法被捕入獄，監禁於臺南刑務所，不到二十天，寫出五十三首詩，題為「黑潮集」，有七首失傳。楊華本名楊顯達，出生於臺北，十七歲遷屏東，1936年五月三十日，因貧病交迫自縊身亡，亦有小說〈薄命〉等名世。

1927	<p>日昭和2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十五日，鄭坤五(1885—1959)等人創辦《臺灣藝苑》，迄1929年1月一日止，共發行二十二號。鄭坤五是漢語文言詩人，卻兼擅各類小說，於《臺灣藝苑》設臺灣國風欄蒐集臺灣褒歌，《鯤島逸史》為其章回體小說名著。 七月十日，臺灣歷史上第一個合法政黨，臺灣民眾黨於臺中宣告成立。 七月十六日，臺灣民報獲准遷臺發行。
1928	<p>日昭和3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十五日，臺共(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分部)在中國上海秘密成立，有謝雪紅(1901—1970)、彭華英(中共)、林木順、林日高、陳來旺、潘欽信(?—1951)、張茂良、溫澤生等人參加。 蘇新(1907—1981)，臺南佳里人，1928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亦參加臺共之創立，1931年在臺被捕，坐牢十二年，戰後任政經報、人民導報編輯。有《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出版。二二八事件後，潛赴中國定居。
1929	<p>日昭和4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一月一日，無產青年周天啟、蔡禎祥等人因遭到台灣文化協會彰化特別支部排斥，憤而退出文協，成立「臺灣勞動互助社」，為無政府主義青年成立之組織。1930年七月，王錦江、張乞食等人創立《明日》雜誌，發行四期，為該組織機關誌。 張乞食改名張維賢(1905—1977)，臺北人。1924年，與陳奇珍、王井泉等人成立「星光演劇研究會」推展臺灣新劇運動。由於張維賢也是無政府主義者，1928年七月遭到當局取締，星光解散。1930年組「民烽演劇研究所」，改名民烽劇團，培訓青年。 王井泉(1905—1965)，臺北人。1938年三月於大稻埕開設「山水亭」餐館，仗義輸財支持文藝活動，於《臺灣文學》雜誌及1943年成立之「厚生演劇研究會」出力尤巨，戰後繼王添灯之後，任《人民導報》發行人。

1930	日昭和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臺灣民報獲大東信託支持，自三〇六號開始改名為臺灣新民報。1932年四月十五日，成為日刊。1941年二月十一日，被迫更名與南新聞。 六月，臺灣共產黨員王萬得與陳兩家、周合源、江森鈺與張朝基合組「伍人報社」，發行《伍人報》，屢遭查禁，仍發行至十五號。後來改名《工農先鋒》。 六月，東京「新民會」出版葉榮鐘著《中國新文學概觀》。（日譯史綱註釋說是臺中央書局出版）。葉榮鐘（1900—1978）鹿港人，日本中央大學畢業，在《南音》以「奇」之筆名撰寫〈序言〉。戰後著有《臺灣民族運動史》，2002年，有《葉榮鐘全集》九種十二冊出版。 八月，高雄人黃石輝（1900—1945）於《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引發論爭，稱為「臺灣話文論爭」或「鄉土文學論戰」。 九月九日，臺南南社與春鶯吟社同仁合力創刊之「三六九小報」出刊。因每逢三、六、九日出刊而名之。以選錄早期佳作及刊出當時小詩社擊鉢吟作為主。1930年九月九日—1935年十月，為期二年，凡四七九期，由連雅堂、趙雲石任編輯。
1931	日昭和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月二十八日，秋洞於臺灣新民報三五三號發表第一篇作品〈保正伯〉。秋洞即蔡秋洞（1900—1984），雲林元長鄉人。先此以「臺灣土話」寫作，發表於新高新報。臺灣文藝聯盟成立，擔任南部作家代表。戰後曾任元長鄉長，並恢復漢語又言詩寫作。 六月，日本政府開始逮捕臺共，八月，簡吉召集未被逮捕黨員成立「臺灣赤色救援會」，延續臺共之活動。 八月十六日，臺灣民眾黨穩健派林獻堂、楊肇嘉、蔡式毅等人，脫黨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有三百零七名成員。

1931	日昭和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二月，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王敏川（1887—1942），彰化人，因文協成員成立赤色救援會，聲援被捕臺共黨員而入獄。 一月一日，去年秋宣佈成立的南音雜誌社，發行《南音》創刊號。迄九月止，共發行十一號，計十冊。《南音》的主要成員有周定山、葉榮鐘、莊垂勝、洪棄生、郭秋生、賴和、陳逢源等人。 一月，臺北人黃春成，筆名郵城，擔任《南音》編輯兼發行人，至第一卷第六號止。 板橋林本源後人林景仁（1893—1940），即林少眉，諳日、英、法文，任滿洲國外交部歐美司司長，著有《東寧草》、《天池草》、《摩達山漫草》傳世。 五月二十五日出刊之《南音》第一卷第七號，改由張星建（1905—1949）擔任編輯兼發行人。張氏，臺中人，曾任臺中央書局營業部主任。 南投人吳坤煌（1909—1989），參與發起臺灣藝術研究會，1935年左右開始於《臺灣文藝》、臺灣新民報、臺灣新聞等發表詩歌、評論。 新竹人蘇維熊（1908—1968），參與發起臺灣藝術研究會，有詩作、歌謠研究發表於該誌。蘇氏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戰後任教於臺灣大學，是詩人及臺灣歌謠研究者。 水蔭萍（1908—1994），本名楊熾昌，臺南人，日本大東文化學院畢業，1930年，在學期間出版日文詩集《熱帶魚》，本年則出版了日文詩集《樹蘭》，小說集《貿易風》。1995年有《水蔭萍作品集》出版。
1932	日昭和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十五日，由東京留學生張文環、蘇維熊、吳坤煌、巫永福等創設之臺灣藝術研究會，創刊機關誌《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發行三期後，於1934年七月號停刊。
1933	日昭和8年	

1933

日昭和8年

- 七月十五日，臺中人吳天賞（1909—1947）發表小說〈龍〉於《福爾摩沙》創刊號，返臺後任記者。
- 七月十五日，彰化社頭人翁鬧（1908—1937），於《福爾摩沙》發表新詩，小說作品則發表於《臺灣文藝》及《臺灣新文學》。1937年有《翁鬧作品選集》出版。
- 十月，廖毓文、郭秋生、黃得時、朱點人、林克夫、王詩琅、黃啟瑞、蔡德音、徐瓊二等臺北文藝青年組成臺灣文藝協會。
- 廖毓文（1912—1980），萬華人，本名廖漢臣，公學校畢業，1930年代曾參與鄉土文學論戰，亦有小說、新詩、民間故事等作品，戰後於臺灣省文獻會任職。
- 郭秋生（1904—1980），臺北新莊人，筆名秋生、芥舟等，二十歲即擔任江山樓酒家經理，1931年，撰〈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聲援黃石輝。作品除論述外，尚有小說及民間故事等。
- 黃得時（1909—1939），臺北樹林人，臺北帝國大學畢業，作品散見《臺灣文學》、《文藝臺灣》，戰爭時期完成〈臺灣文學史序說〉，有志撰寫臺灣文學史，未能終篇，戰後任教於臺灣大學。
- 朱點人（1903—1949），臺北萬華人，本名朱石頭。老松公學校畢業，任臺北醫學專門學校雇員。有漢文小說作品，刊於《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1949年以參加共產黨罪名遭槍決。
- 黃啟瑞（1910—1976），臺北市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1939年執業律師。戰後歷任臺北市民政局局長、市議會議長、臺北市市長等職。
- 林克夫（1907—?），臺北市人，本名林金田，筆名丐、孔乙己等，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作品散見《南音》、《先發部隊》、《第一線》、《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

1934	日昭和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五月六日，有八十二名臺灣人作家於臺中小西湖酒家召開全島文藝大會，成立「臺灣文藝聯盟」，常務委員有賴和、賴慶、賴明弘、何集璧、張深切，張深切為委員長。
1933	日昭和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王詩琅 (1908—1984)，臺北萬華人，本名王錦江。1927年，曾因參加臺灣黑色青年聯盟入獄。曾在《伍人報》、《洪水報》、《明日》、《第一線》等刊撰寫詩、評論及小說，戰後致力於臺灣文獻及民俗。1979年有《王詩琅全集》十一卷出版。 蔡德音 (1912—1994)，臺南人，作品散見《第一線》、《臺灣文藝》，有民間故事、劇作、詩作等。 徐瓊二 (1912—1950)，臺北市人，本名徐淵深，臺北二中畢業，曾參加臺灣文藝協會、臺灣文藝聯盟。歷任昭和新聞、臺灣新民報記者，作品見於《第一線》、《臺灣新文學》。1949年當選臺北市參議員，1950年以匪諜罪名遭槍決。 周定山 (1898—1975)，本名周火樹，彰化鹿港人，新舊文學雙棲作家。原為漢語文言詩人，亦有小說、散文作品發表，有《周定山作品選集》出版。 林越峰 (1909—?)，本名林海成，臺中豐原人，曾任新高新報記者，戰後從商。作品散見《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 水蔭萍、李張瑞、林永修、張良典等人發起創立「風車詩社」，推動超現實主義，十月，發行《風車詩誌》第一輯。翌年夏天停刊。 十二月二十日，劉捷（一九三三年的臺灣文學界）發表於《福爾摩沙》第二號。 劉捷 (1910—2004)，屏東人，評論家，著有《臺灣文化展望》等作品。

1935	日昭和1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月六日，臺灣文藝協會機關誌《第一線》發行，以〈民間文學的認識〉為卷頭言。
1934	日昭和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張深切(1904—1965)，南投草屯人，1917年即赴日留學，青山學院中等部畢業，後赴中國從事抗日運動，曾被捕入獄。有論述、小說、劇本等作品，1938年《張深切全集》十二卷出版。 • 賴明弘(1915—1958)，臺中豐原人，本名賴銘煌，東京日本大學創作科肄業，曾任新高新報漢文編輯主任。1930年代因主張以中國白話文創作，強烈反對黃石輝的臺灣話文主張。負責籌備1934年之全島文藝大會。創作散見於《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 • 賴慶，臺中北屯人，臺中師範畢業，任公學校教師。1933年有長篇小說〈美人局〉、〈女性的悲曲〉連載於臺灣新民報，另有短篇〈妾御難〉發表於《福爾摩沙》第二號。 • 爾摩沙》第二號。 • 何集璧，臺中市人，臺灣文藝聯盟常務委員，把楊達介紹給張深切。 • 六月，吳希聖(1909—?)，淡水人，發表小說〈豚〉於《福爾摩沙》第二號。 • 七月十五日，臺灣文藝協會發行機關誌《先發部隊》，以探求台灣新文學的出路為卷頭言。 • 楊達(1906—1985)〈送報伏〉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楊達本名楊貴，臺南新化人，1925年曾赴日留學，1927年投入農民運動。1949年，疑因發表〈和平宣言〉入獄十一年。2001年有《楊達全集》十四卷出版。 • 十一月五日，臺灣文藝聯盟發行機關誌《臺灣文藝》創刊號。迄1936年八月止，共發行十六號。

1935

日昭和10年

- 十月十日—十一月二十八日，臺北舉辦「萬國博覽會」，即「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朱點人作品〈秋信〉，以此為背景。
- 十二月二十八日，楊逵、葉陶夫婦脫離《臺灣文藝》成立「臺灣新文學社」，發行《臺灣新文學》創刊號，楊逵任主編。是漢、和文並載的文藝雜誌，編輯委員有賴和、楊守愚、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賴明弘、賴慶、葉榮鐘。迄1937年六月十五日，共發行十五號（含一卷十號遭查禁）後，宣佈停刊。另有《新文學月報》二號出版。
- 葉陶（1905—1970），高雄旗后人，曾任公學校教員，隨同事簡吉投入農民組合，1927年為農組中央委員及婦女部長。與夫婿楊逵並肩投注農民運動。作品有小說〈愛的結晶〉及詩作〈我的教練真嚴厲〉。
- 楊守愚（1905—1959），彰化市人，本名楊松茂。曾入私塾，父為清治時代秀才。青年時期，曾因加入「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被檢舉。深刻的漢學研究及社會主義思想，是他作品的基調。受賴和影響走向新文學，作品有詩、小說。戰後任彰化工業學校國文教師。
- 吳新榮（1907—1967），臺南佳里人，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32年返臺接掌叔公開設之佳里醫院，與郭水潭等人成立佳里青風會，臺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催生者之一。戰後，轉往文獻研究，1981年有《吳新榮全集》八卷出版。
- 郭水潭（1908—1995），臺南佳里人，筆名郭千尺，公學校高等科畢業，為多田利郎《南溟藝園》同仁。因寫和歌結識北門郡守，十八歲被雇為郡役。為臺灣文藝聯盟南區執行委員，以詩作聞名。1994年，呂興昌編有《郭水潭集》。
- 王登山（1913—1982），臺南北門人，臺南二中畢業，早年從事俳句創作，為多田利郎《南溟藝園》同仁，作品散見《福爾摩沙》、《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

1935	<p>日昭和10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張慶堂（生卒年不詳），臺南新化人，筆名唐德慶，戰後務農。1936年於《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發表小說及詩作。 二月六日、三月二日，臺灣新文學社發行《新文學月報》第一號、第二號，為十六頁之小冊子。 三月，林獻堂參加臺灣新民報社所組之中國華南視察團，遊歷廈門、上海等地，在上海歡迎會上提到「回到祖國」等語，返臺後於臺中公園遭人毆打，是為「祖國事件」。
1936	<p>日昭和11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中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胡風譯《山靈》小說集，收入楊華〈薄命〉（漢文）、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張赫宙〈山靈〉。 張赫宙（1905—1997），朝鮮慶尚北道人，本名張恩重，日本名野口赫宙，歸化日本籍，使用朝鮮語、日語描寫朝鮮人民的生活、現實。 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中國作家郁達夫應日本政府之聘來臺，於台灣日日新報演講，亦曾到臺南與當地作家舉行座談。 四月一日起，各地報紙陸續廢止漢文欄。 龍瑛宗（1911—1999），本名劉榮宗，新竹北埔人，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改造》徵文佳作。有《龍瑛宗全集》出版。 九月十九日，風月俱樂部發行漢文休閒雜誌《風月報》，迄1941年七月一日止，共發行一三二期。1941年改名《南方》。有徐坤泉、林荊南、吳漫沙、簡荷生等人參與編輯。 吳漫沙（1912—2005），本名吳丙丁，出生於中國福建泉州，1936年來臺，作品有散文、劇本、小說、民間故事等。主編《風月報》六年，主張改名《南方》。
1937	<p>日昭和12年</p>

1937	日昭和1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徐坤泉 (1907—1954)，澎湖人，曾主編《風月報》及任《臺灣新民報》記者，以《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等小說名世。 林荊南 (1915—?)，彰化人，曾參與《風月報》編務，發表作品有雜文、小說，1950年曾遭人構陷入獄二年餘。有《林荊南作品集》三冊出版。
1938	日昭和1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邱淳洸 (1908—1989)，彰化人。戰後任小學教師、校長，作品有短歌、俳句、新詩及漢語文言詩，本年出版日文詩集《化石之戀》，1939出版《悲哀的邂逅》。
1939	日昭和1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日人作家西川滿、北原政吉、中山侑等人，成立「臺灣詩人協會」，出版《美麗島》雜誌。 西川滿 (1908—1998)，出生於日本會津若松，1910年來臺，創辦《文藝臺灣》雜誌，作品有詩、小說，《臺灣縱貫鐵道》為其代表作。 北原政吉 (1908—2005)，日本岐阜縣惠那郡人，1920年代來臺，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任小學教員，詩人，戰後加入《笠》詩社。 中山侑 (1909—1959)，出生於臺北，詩人、劇作家，亦有小說作品，原為《文藝臺灣》編輯委員，後與張文環一起創辦《臺灣文學》。
1940	日昭和1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一日，臺灣文藝家協會成立，發刊《文藝臺灣》。 三月四日，《臺灣藝術》創刊，迄1945年二月止，共發行五十六期。黃宗葵任社長，江肖梅主編，以日本《文藝春秋》為範本之綜合性雜誌。1944年十二月，改名《新大眾》。 江肖梅 (1898—1966)，新竹人，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任小學教師，戰後以督學退休。作品有漢語文言詩、白話詩、小說、臺灣民間故事等。

1941

日昭和16年

- 二月，臺灣文藝家協會改組，西川滿創「文藝臺灣社」發行《文藝臺灣》雜誌，迄1944年一月停刊，共發行三十八期。代表作家有西川滿、濱田隼雄、矢野峰人、島田謹二、新垣宏一、楊雲萍、周金波、陳火泉等。
- 濱田隼雄(1909—1973)，日本宮城縣仙台人，熱衷社會主義及農民運動。中學時來臺，東北帝國大學畢業後，來臺任高等女學校及臺北師範學校教職。《南方移民村》是其代表作。
- 矢野峰人(1893—1988)，日本岡山縣人，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1928年來臺，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為文學研究者。
- 島田謹二(1901—1993)，日本東京人，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1929年三月來臺，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講師，及臺北高校教授。曾在《文藝臺灣》發表〈臺灣的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為文學評論家。
- 新垣宏一(1913—2002)，高雄出生，高雄中學、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畢業，任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教師，作品有詩及小說。
- 周金波(1920—1996)，日本大學齒科專科部畢業，繼父業在基隆開設齒科醫院，以小說〈水癌〉、〈志願兵〉名世，有《周金波集》出版。
- 陳火泉(1908—1999)，彰化鹿港人，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畢業，任職臺灣製腦株式會社，戰後任職公賣局。1943年以「高山凡石」之名發表〈道〉受到矚目。戰後漢文作品則以散文為主，有《悠悠人生路》等作品多種出版。
- 四月十九日，臺灣成立「皇民奉公會」鼓吹臺灣人民為戰爭協力，作家亦有組織建立決戰文學體制以配合戰爭，而有皇民文學奉公會成立。
- 五月二十七日，啟文社(後改為臺灣文學社)創刊《臺灣文學》，張文環任主編，迄1943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發行十冊。

1941	日昭和1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張文環 (1906—1978)，嘉義梅山人，中學即赴日留學，曾就讀於東洋大學文學部，參與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之創設，作品有詩、隨筆、小說等。2002年有《張文環全集》八卷出版。 七月，東都書籍株氏會社臺北支店創刊發行《民俗臺灣》，迄1945年一月止，共發行四十三期。末次保及金關丈夫等人先後擔任主編，實際執編者為池田敏雄。 金關丈夫 (1897—1983)，日本香川縣人，1923年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是醫生，致力於臺灣民俗研究。1936年來台任職於臺北醫事專門學校解剖學教室，研究人類考古學。曾以林熊生筆名發表偵探小說《船中的殺人》及《龍山寺曹老人》。 池田敏雄 (1916—1981)，日本島根縣人，八歲來臺，1935年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任公學校教諭，後轉任總督府情報部囑託，致力於臺灣漢族之民俗研究。1947年與臺灣女子黃鳳姿結婚。 黃鳳姿 (1928—)，臺北艋舺人，1940年二月公學校五年級即由西川滿主持之日孝書房出版《七娘媽生》，同年十一月，出版《七爺八爺》，1943年在東京出版《臺灣的少女》。
1942	日昭和1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臺中一中學生張彥勳、朱實、許世清發起成立之同仁組織，後來加入者漸多，油印出版《邊緣草》(譯名)雜誌，戰後有子潛、淡星、埔金、林亨泰等加入，刊物改名《潮流》，1949年，因有同仁被捕，遭到強迫解散。 張彥勳 (1925—1985)，臺中人，臺中一中畢業，任國小教師。日治時代出版有日文詩集，戰後曾因政治因素入獄，作品有詩、小說、兒童文學近二十種。 淡星 (1927—1998)，即蕭翔文，本名蕭金堆，彰化人。戰後，臺灣師範學院畢業，任教職。出版有詩、散文、小說各一種。

<p>1942</p>	<p>日昭和17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文藝家協會解散，改組日本文學報國會，為國策性文學團體。機關誌為《日本學藝新聞》，後改題《文學報國》。1943年四月十日，成立臺灣分部，矢野峰人任分部長。 • 七月十一日，楊千鶴（1921—），臺北市人。發表〈花開時節〉於《臺灣文學》第二卷第三號。1938年出版有自傳《人生的三稜鏡》。1933年有日文自印版。 • 十一月三日—十日，日本文學報國會於東京和大阪舉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臺灣代表為西川滿、濱田隼雄、龍瑛宗、張文環。其後又於1943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在東京及1944年十一月十二日—十四日在中國南京，舉行第二次及第三次會。第二次之台灣代表為齋藤勇、長崎浩、楊雲萍、周金波。 • 齋藤勇（1887—？），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曾赴歐美留學，為英國文學研究者。 • 長崎浩（1908—？），日本新潟人，1938年來臺，任職於彰化市之圖書館、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總督府情報課，作品有詩及劇本。
<p>1943</p>	<p>日昭和18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月三十一日，張冬芳（1917—1968）發表詩作〈旅人〉等於《臺灣文學》第二卷第一號。翻譯中國作家老舍（本名舒慶春，1899—1966）〈離婚〉，刊於第二卷第二號。 • 四月一日，葉石濤（1925—2008）發表第一篇作品〈林君的來信〉於《文藝臺灣》第五卷第六號。 • 四月二十九日，臺灣文藝協會改組為皇民文學奉公會，隸屬皇民奉公會，發行機關誌《臺灣文藝》，1944年元月起至1945年五月止，計八冊。

1943	日昭和1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三十一日，王昶雄(1916—2000)，本名王榮生，淡水人，日本大學齒科畢業，發表〈奔流〉於《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三號。戰後作品以雜文為主，2002年，有《王昶雄全集》十一冊出版。 九月三日，厚生戲劇研究會在臺北永樂座，演出林搏秋(1920—1998，桃園人)改編自張文環小說之〈閩雞〉劇本舞臺劇。 十一月十三日，臺灣皇民奉公會於臺北市公會堂舉行台灣決戰文學會議，議決《臺灣文學》、《文藝臺灣》停刊等重要事項。 十二月，呂赫若以〈財子壽〉獲第一回臺灣文學賞，坂口櫻子獲第一候補獎。 吳濁流(1900—1976)，本名吳建田，新竹新埔人，任公學校教師，漢語文言詩人，本年秘密起草長篇小說《胡太明》，戰後改題《亞細亞的孤兒》。1964年創辦《臺灣文藝》，設吳濁流文學獎，1977年，有《吳濁流作品集》六冊出版。
1944	日昭和1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呂赫若(1914—1951?)小說《清秋》在臺北清水書店出版。呂氏本名呂石堆，臺中豐原人，臺中師範學校畢業，1939年赴日在武藏野音樂學校習聲樂，戰後任北一女教師。五〇年代因參與政治運動，下落不明，生死成謎。初作〈牛車〉於1935年一月發表於《文學評論》，深受矚目，1995年有《呂赫若全集》出版。
1945	民國3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鍾理和(1915—1960)於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其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 九月至十一月，楊逵編輯出版39期「一陽周報」作為溝通省外民眾和臺灣民眾意志的橋樑。 十一月二十日，葉宏甲、新高漫畫集團成員陳家鵬、洪冕明、王超光、黃金穗、鄭世璠等人合創《新新》雜誌出刊，是民間出版之綜合文化雜誌，迄1947年一月五日止，印發八期(其中四、五期合刊)即停刊。

1945 民國3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黃金穗 (1915—1967)，新竹人，京都帝國大學畢業，戰前曾任職於岩波書店，新竹中學教師，戰後任教於延平大學和臺灣大學。
1946 民國3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十五日，中華日報設日文版文藝欄，由龍瑛宗主編，迄十月二十四日止。 六月九日—十三日，聖烽演劇研究會在臺北市中山堂演出簡國賢原作、宋非我編譯導演之〈壁〉及宋非我編導之〈羅漢赴會〉。 簡國賢 (1913—1954)，桃園人，日治末期即開始新劇創作，1943年二月，即有〈阿里山〉劇作由林搏秋導演演出，戰後更積極創作，五〇年代國民黨清鄉時被捕，1954年四月遭槍決。 宋非我 (1916—1992)，原名宋獻章，臺北社子人，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日治時代即積極參與新劇運動，戰後擔任聖烽戲劇研究會會長。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解嚴後曾返臺，1992年車禍死於中國泉州。 六月十六日，游彌堅、許乃昌、楊雲萍、陳紹馨、王白淵、蘇新等人組織「臺灣文化協進會」，於臺北中山堂宣佈成立，九月十五日發行機關誌《臺灣文化》，舉辦畫展、音樂會等活動。《臺灣文化》由楊雲萍主編，1949停刊。 陳紹馨 (1906—1966)，臺北人，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任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囑託。戰後任臺大文學院教授、考古人類學系教授。 王白淵 (1902—1965)，彰化二水人，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任教於盛岡女子師範學校，1931年曾出版日文詩集《荊棘之道》，參與《福爾摩沙》創刊。任職於上海美專時，遭日軍逮捕，入獄六年。戰後擔任臺灣文化協進會理事、《臺灣文化》編輯。五〇年代兩度入獄。

<p>1946</p>	<p>民國35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九月十五日，臺灣文化協進會出版機關誌——《臺灣文化》，楊雲萍主編，有楊守愚、呂赫若、王白淵、黃得時、許壽裳、臺靜農等人執筆。迄1950年十二月一日止，共發行二十六冊。 • 許壽裳(1882—1948)，中國浙江紹興人，1946年來台，任編譯館館長，再任臺大中文系主任，在臺大宿舍遭人殺害。 • 臺靜農(1902—1990)，中國安徽霍邱人，1946年來臺任教於臺大中文系，著有《靜農論文集》、《龍波雜文》。 • 楊逵出任臺中和平日報副刊「新文學」編輯。
<p>1947</p>	<p>民國36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月，東華書局出版楊達譯、魯迅小說《阿Q正傳》之漢和文對照版。 • 二月二十七日，臺北發生因查緝私菸引發暴動事件，蔓延全臺，是為二二八事件。事件後，所有民營報紙及許多雜誌都停刊，嚴重影響文學發展。 • 五月四日，新生報特闢「文藝」副刊，何欣擔任主編，七月三十日停刊，共十三期。 • 何欣(1922—1998)，中國河北人，1946年一月來臺，戰後任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為英美文學研究者，兼及現代文學研究，著有《西洋文學史》、《從大學生到草地人》等作品。 • 八月一日，新生報創設「橋」副刊，由歌雷擔任主編，因舉辦「如何建設臺灣新文學」之討論會，引發爭論。於1949年四月十二日出刊二二三期後廢刊。主編歌雷於四月六日被捕。 • 歌雷(?—1994)本名史習枚，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四六事件被捕後停止文學活動，後轉任國民黨工。

1947	民國 3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月二十五日，公論報創刊，是由李萬居擔任社長之民營報紙，王聿均主編副刊「日月潭」。1961年三月五日休刊，後雖復刊，但不久即停刊，前後約維持十五年。 李萬居(1901—1966)，雲林人，巴黎大學博士。戰後任職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新報，改名臺灣新生報，任董事長。 王聿均(1919—2007)，中國山東費縣人，1948年來臺，作品有詩、散文、傳記及論述。
1948	民國 37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八月至十二月，楊逵主持出版有《臺灣文學》叢刊三期。
1949	民國 38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六日，楊逵被捕入獄，1961年出獄，原因不明，他自己懷疑是因起草〈和平宣言〉。同日被捕者，另有歌雷及橋副刊作者，史稱「四六事件」。
1950	民國 39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陳紀澄(1908—1997)，本名陳寄澄，中國河北人，1949年來臺，任立法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等職。1950年創重光出版社，長篇小說《萩村傳》一月起於《自由中國》連載，1951年出版。出版著作極多，論述、散文、小說、傳記等六十餘種。 三月，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以張道藩為主任委員，宗旨是獎掖反共文學作品，只「發給獎金，推薦發表」，於每年元旦、五四、雙十節、國父誕辰定期舉辦徵文，共舉辦十七回。 張道藩(1897—1968)，中國貴州盤縣人，英國倫敦大學美術部畢業，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50—1961年任立法院院長。 三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為加強控制媒體、穩定政治局勢，促使各報副刊配合政府政策，成立「中國文藝協會」，簡稱「文協」。經費由國民黨部支應，陳紀澄任主席，謝冰瑩、趙友培、王藍、孫陵、顧正秋任理事。

1950

民國 39 年

- 謝冰瑩 (1906—2000)，本名謝鳴崗，中國湖南新化人，1948年九月來臺，三〇年代曾兩度赴日研究，來臺後從事教職，退休後定居美國。作品有散文、小說、報導、傳記等數十種，不少是在中國時期的作品，最廣為人知的是根據1928年參加北伐經歷寫成的《一個女兵的自傳》，臺灣版易名《女兵自傳》。
- 趙友培 (1813—1999)，中國江蘇揚中人，1949年來台，曾任《文藝先鋒》主編、臺灣師大教授、文協常務理事、國大代表，創辦《中國語文》月刊。著作有論述、散文、傳記等。
- 王藍 (1922—2003)，出生於中國天津市，1949年來台，歷任記者、報社總編輯、國大代表，文協理事、《文壇》社及《筆匯》社社長。1945創立紅藍出版社於重慶，1954年在臺北復社。1979年遷居美國。著有詩、散文、小說十餘種，以中國對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藍與黑》最為著名。
- 孫陵 (1914—1983)，本名孫鍾琦，中國山東黃縣人，1948年來臺，主編民族晚報副刊，創辦《火炬》雜誌 (1950年十一月—1952年八月)，後來從事教職。作品有論述、散文、小說、詩集共十餘種。
- 十月十日，端木方《疤勳章》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篇小說第二獎。
- 端木方 (1922—2004)，本名李瑋，中國山東利津人，1951年來臺，任軍職，後轉任中學教職，出版有《疤勳章》、《四喜子》等小說集及長篇小說。
- 十二月，文協以「文藝到軍中去」口號，推展軍中文藝培養軍中作家，有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高陽、尼洛、張放、田原、楊念慈、魏子雲、吳東權、舒暢、姜穆、呼嘯、鄧文來等人稱為軍中作家。

1950

民國 39 年

- 司馬中原 (1933 —)，本名吳延玫，中國南京人，1949 年來台，曾任《中華文藝》月刊社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作品有散文、小說，以小說為主，已出版五十餘種，《荒原》、《狂風沙》為其代表作。
- 朱西寧 (1927 — 1998)，本名朱青海，中國山東臨朐人，1949 年隨軍來臺，歷任《新文藝》月刊主編、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作品有散文、小說、傳記三十餘種，長篇小說《八二三註》為其代表作，另有《華太平家傳》未完成。
- 段彩華 (1933 —) 中國江蘇宿遷人，1949 年來台，退伍後歷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幼獅文藝》主編，主要作品是小說，已出版有二十餘種。
- 高陽 (1922 — 1992)，本名許安駢，中國浙江杭州人，1949 年隨軍來臺，退伍後，歷任報社主筆、總主筆等職，作品有論述、散文、小說，出版小說達九十五種，根據中國歷史人物寫成的歷史小說是其代表作。
- 尼洛 (1926 — 1999)，本名李明，中國江蘇東海人，1949 年來臺，曾任《文藝月刊》發行人兼社長。有小說作品十餘種及報導、傳記出版。有不少作品是以中共統治後的中國社會為背景。
- 田原 (1927 — 1987)，本名田源，中國山東濰縣人，1950 年來臺，曾任金門力行報、《自由勞工》、青年戰士報、《前瞻》月刊主編，出版長篇小說三十餘種，以中國東北對日戰爭為背景的《這一代》、《松花江畔》為代表作。
- 張放 (1932 —)，中國山東平陰人，1949 年隨軍來臺，曾任《文藝》月刊總編輯，新生報駐菲律賓特派員等。著作有論述、散文、小說，計六十餘種。二十一世紀出版的《海峽三部曲》，以山東流亡學生的經驗為背景，最為特殊。
- 楊念慈 (1922 —)，中國山東城武人，1949 年來臺，1953 年轉往教育界任教職。主要作品為小說，已出版近二十餘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魏子雲 (1918—2005)，中國安徽宿縣人，退役後任教職，創辦《青溪月刊》，與尹雪曼合辦《文學思潮》。作品有論述、散文、小說等五十餘種出版。 • 吳東權 (1928—)，中國福建莆田人，1946年五月來臺，政工幹校新聞組畢業，曾任青年日報主編。作品有論述、散文、小說、傳記，計五十餘種出版。 • 尹雪曼 (1918—2008)，本名尹光榮，中國河南汲縣人，歷任報紙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等職，著有論述、散文、小說、傳記等四十餘種。 • 舒暢 (1928—2007)，本名舒揚，中國湖北漢陽人，1949年隨軍來臺。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及長篇小說七種。 • 姜穆 (1929—2003)，中國貴州錦屏人，1949年來臺，曾主編青年戰士報、《文藝月刊》、《今日中國》等，作品有論述、詩、散文、小說、劇本、傳記等五十種出版。 • 呼嘯 (1922—2007)，本名胡秀，中國福建福州人，1948年七月來臺，歷任青年日報副刊主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總編輯。出版有散文、小說、傳記等三十一種。 • 鄧文來 (1931—2005)，中國湖南醴陵人，1949年來臺，曾任軍中氣象員、《中華文藝》主編，作品有散文、長短篇小說十餘種。
1951	民國4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五月四日，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發行機關刊物《文藝創作》，張道藩為社長，歷任主編有葛賢寧、胡一貫、王平陵、虞君質等人，以獎勵反共文學為目的，迄1956年十二月止，共發行五年八個月，出刊六十八期。
1952	民國4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六月穆中南創辦《文壇》，自任主編，為民間純文藝雜誌，1978年一月，二一期之後，改由朱嘯秋主編，1985年十一月停刊。 • 穆中南 (1912—1991)，中國山東蓬萊人，1948年七月來臺，曾任文協總幹事，設文壇函授學校。有論述、小說、劇本等作品十餘種出版。

1952 民國4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朱嘯秋 (1923 —)，出生於中國福建，1949年來台，曾任文協及青溪常務理事，出版有散文集四種。 • 十一月十二日，廖清秀 (1927 —)，臺北人) 以《恩仇血淚記》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三獎 (一、二獎從缺)。有《第一代》、《反骨》等多種作品出版。 • 十一月，潘人木以《蓮漪表妹》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獎。 • 潘人木 (1919 — 2005) 本名潘佛彬，中國瀋陽市人，1949年十二月來臺，任職於海關總署，以小說《蓮漪表妹》及《馬蘭的故事》聞名，出版之童話故事有一百零八種。 • 潘壘自費出版第一部作品《紅河三部曲》。 • 潘壘 (1927 —) 本名潘磊，出生於越南海防，1949年五月來臺，曾獨資創辦《寶島文藝》(1949年十月—1950年)。後來赴香港任電影導演，並定居香港。出版有長篇小說《上等兵》、《魔鬼樹》及小說集，計二十種。
1953 民國4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李榮春 (1914 — 1994，宜蘭頭城人) 完成八十八萬字長篇小說《祖國與同胞》，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稿費獎勵。2002年有《李榮春全集》十冊出版。 • 林海音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凡十年。 • 林海音 (1918 — 2001) 本名林含英，出生於日本大阪，五歲移居中國北京，1948年十一月來臺。1967年一月創辦《純文學》雜誌，1972年二月停刊，共發行六十二期。1968年創辦純文學出版社，1995年結束營運。作品有散文、小說、兒童文學合計數十種，以北京生活為背景的小說《城南舊事》，最廣為人知。 • 二月，紀弦創辦《現代詩》季刊 (由1952年《詩誌》改名)，發行至1964年二月。
1953 民國4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紀弦 (1913 —)，本名路逾，出生於中國河北清苑，1948年來臺，任臺北成功中學教師，退休後1976年赴美定居。出版有論述、詩集、散文等四十餘種。2001年出版有《紀弦回憶錄》二部。

1954

民國43年

- 中國作家張愛玲（1921—1995），在香港出版中共土改經驗小說《秧歌》。張愛玲是從未居住過臺灣卻被選為臺灣經典文學之作家。
- 三月，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夏菁、鄧禹平等八人籌組藍星詩社，未創詩刊，僅於公論報設「藍星週刊」，1957年八月，出版《藍星詩選》（共二期），1958年—1965年六月，於公論報闢「藍星詩頁」（月刊），共刊出六十三期。
- 覃子豪（1912—1963），本名覃基，中國四川廣漢人，1946年五月來臺僅停留兩個月，1947年以任公職再來臺，出版有論述、詩集、散文計十餘種。六〇—七〇年代，有《覃子豪全集》三輯出版。
- 鍾鼎文（1914—），中國安徽舒城人，1949年來台，任國大代表、報社主筆，著有論述、詩集計十二種。
- 余光中（1928—），出生於中國南京，1950年五月來臺，歷任政治大學、臺灣師大、臺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有論述、詩集、散文計八十餘種出版。
- 夏菁（1925—），本名盛志澄，中國浙江嘉興人，1947年六月來臺，曾主編藍星詩頁、《文學雜誌》、《自由青年》。1984年自聯合國糧農組織退休，定居美國。出版有詩、散文十餘種。
- 十月，痲弦、洛夫、張默創辦《創世紀》於高雄左營，不定期發行《創世紀》詩刊。
- 痲弦（1932—），本名王慶麟，中國河南南陽人，1949年八月來臺，政工幹校畢業，曾任《幼獅文藝》、聯合報副刊主編，《聯合文學》社長，1998年退休後定居加拿大。出版有詩集《深淵》等。
- 洛夫（1928—），本名莫洛夫，中國湖南衡陽人，1949年八月來臺，政工幹校畢業，任海軍編譯官，1969年曾發起組「詩宗社」，退役後定居加拿大。著作有論述、詩集、散文四十餘種出版。

1954	<p>民國43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張默(1931—)，本名張德中，中國安徽無為人，1949年二月來臺，陸軍官校畢業，曾任《創世紀》總編輯，《水星》詩刊、《中華文藝》月刊主編。出版有論述、詩集、散文集計二十餘種。
1956	<p>民國45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邱永漢(1924—)，本名邱炳南，臺南人，1945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228事件後，逃亡香港。在《大眾文藝》連載小說《香港》，獲第二十四回直木賞。 一月十五日，紀弦發起成立現代派詩社，有八十三名詩人加盟，發佈「六大信條」，強調新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 四月，羊令野、葉泥於嘉義商工日報副刊版面，創立「南北笛」，迄1958年五月，出刊三十一期。 羊令野(1923—1994)，本名黃仲琮，中國安徽涇縣人，1949年來臺，曾主持軍中前進報，主編「詩陣地」、「南北笛」及青年戰士報詩隊伍。有詩、散文共十種出版。 葉泥(1924—)，本名戴蘭村，出生於中國山東嶧縣，1950年三月來臺。歷任國安會科長、秘書等公職，及主編《復興文藝》月刊。有詩作、論述、譯作發表，僅出版有《里爾克及其作品》。 九月，夏濟安、吳魯芹與劉守宜創辦《文學雜誌》。夏濟安任主編，1959年三月赴美，交換教師後，由侯健接替，1960年八月停刊，計發行48期。 夏濟安(1916—1965)，本名夏澍元，中國江蘇吳縣人，1950年秋來臺，任教於臺大外文系。1971年有《夏濟安選集》出版。 吳魯芹(1918—1983)本名吳鴻藻，中國上海市人，1949年來臺，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大學等教職，1962年赴美定居，著有《美國去來》、《無涯樓夢鈔》等散文集出版。

1956	民國4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侯健(1926—1990)，中國山東人，曾任臺大外文系教職及考試委員等職，著有《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論述及散文集出版。 • 十一月，鍾理和以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第二獎。(第一獎從缺) • 十一月，彭歌《落月》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第二獎。 • 彭歌(1926—)，本名姚朋，出生於中國河北宛平，1949年來台，曾任新生報總編輯，中央日報總主筆，退休後定居美國。出版有論述、小說、散文合計六十餘種。
1957	民國4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四月二十三日，鍾肇政(1925—)，桃園龍潭人)召集七位本土籍作家——陳火泉、李榮春、鍾理和、施翠峰、廖清秀、文心，組成通訊網絡，由鍾肇政油印各文友信函寄發，亦有議題討論及作品輪閱等，謂之「文友通訊」，迄1958年九月止，共十六次。 • 施翠峰(1925—)，本名施振樞，彰化人，藝術教育家，歷任臺灣藝術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校藝術系教授。出版藝術論述、民間文學研究著作外，亦有小說《龍虎風雲》、《養子淚》等作品。 • 十月，姜貴(1908—1980)，本名王林渡，中國山東諸城人，自行出版《今檣杌傳》，即著名反共小說《旋風》。1930年代前後已有作品在上海出版，1948年十二月來臺，另有《重陽》、《碧海青天夜夜心》等同類作品多種出版。 • 十一月五日，《文星》雜誌創刊，標榜「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基調。六〇年代，大力推動民主與科學思想，1967年遭處分停刊一年期滿，又被告知不宜復刊，共出版九十八期。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發表於《文星》九十七期。
1959	民國4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五月，尉天驄等創辦《筆匯》於臺北。1961年十一月，出版第二卷第十二期後停刊。

1960

民國49年

- 三月五日，臺灣大學外文系學生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葉維廉、劉紹銘、李歐梵等創辦《現代文學》。由白先勇主編，1973年九月刊出五十一期後休刊，1977年七月復刊，旋又停刊。
- 白先勇（1937—），中國廣西桂林人，1952年自香港來臺，曾創辦晨鐘出版社，1963年赴美留學，並任教職於美國。出版有《臺北人》、《孽子》等小說及論述十餘種。
- 陳若曦（1938—），本名陳秀美，臺北人，臺灣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1966年隨夫婿「回歸」中國，1973年脫出仍居美國，1995年返臺定居。出版有長短篇小說、散文等三十餘種。
- 歐陽子（1939—），本名洪智惠，出生於日本廣島，1946年隨父母回臺，1962年赴美留學，定居美國。著有論述《王謝堂前的燕子》、小說《秋葉》、散文等八種出版。
- 王文興（1939—），中國福建福州人，1946年來台，任臺大外文系教授迄退休。有小說《家變》、《背海的人》、論述、散文十種出版。
- 葉維廉（1937—），中國廣東中山人，1955年自香港來臺，赴美國留學後，歷任美國、香港等地大學教職，著有論述、詩集、散文、翻譯等二十餘種。
- 劉紹銘（1934—），出生於香港，1956年來臺就學，再往美國留學，先後任教於香港、新加坡、美國等地大學，退休後定居香港。著有論述、小說、散文等四十餘種。
- 李歐梵（1939—），中國河南太康人，1947年來臺，1961年赴美留學、任教，現居香港。有論述、散文、小說二十餘種出版。
- 九月四日，《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1897—1979，中國浙江人）被捕，雜誌也遭查禁，後被判刑十年，是為雷震事件。《自由中國》1949年創刊，屬以政論為主的綜合性雜誌，亦刊登文學作品。

1962	民國5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十五日，文協和詩人聯誼會主辦的新詩班結業成員，創辦《葡萄園》詩刊。 女作家瓊瑤（1938—），本名陳喆，出生於中國四川成都，發表第一本長篇小說《窗外》，開啟六十多部同類小說創作之先聲。 一月，郭良蕙於1962年九月在高雄大業書店出版之長篇小說《心鎖》，因大膽描寫男女情欲，遭到查禁。 郭良蕙（1926—），出生於中國河南開封，1949年四月來臺，曾任記者，致力於小說創作，出版有長短篇小說近六十種。
1963	民國5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一日，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雜誌，迄1976年十月去世時，已編妥五十三期，其後有鍾肇政、陳永興、李敏勇、臺灣筆會、林文欽、李喬、鄭邦鎮、傅銀樵等人接編。2002年十一月停刊。 六月十五日，由吳瀛濤、林亨泰、陳千武、詹冰、錦連、趙天儀、白萩、薛柏谷、古貝、黃荷生、杜國清、王憲陽等人發起創設的《笠》詩社，發行詩刊。 吳瀛濤（1916—1971），臺北人，臺北商業學校畢業，任職公賣局，日治時代即開始寫作，戰後並致力於臺灣民俗及諺語之蒐集研究，出版有詩集及《臺灣民俗》、《臺灣諺語》等著作。
1964	民國5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詹冰（1921—2004），本名詹益川，苗栗人，日本明治藥專畢業，戰後任中學教師，作品有散文、小說、詩、兒童文學。有《詹冰詩全集》三冊出版。 陳千武（1922—），本名陳武雄，南投人，戰爭時曾為臺灣陸軍志願兵，戰後任職於林務局及臺中市文化中心主任等職。作品有論述、詩、小說、兒童文學、翻譯五十餘種出版。臺中市文化局有《陳千武全集》十二冊出版。

1964	民國 53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錦連 (1928 —)，本名陳金連，彰化人，日治時代鐵道講習所電信科畢業，任職臺鐵彰化站電報管理局，迄退休。出版有《鄉愁》、《守夜的壁虎》等詩集。 • 林亨泰 (1924 —)，出生於臺中，臺灣師範大學畢業，擔任教職。戰後曾加入「銀鈴會」、「現代派」，1998 年有《林亨泰全集》十卷出版。 • 趙天儀 (1935 —)，臺中人，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歷任大學教職、國立編譯館編纂，《笠》詩刊主編，出版有論述，詩集，兒童文學等近三十種。 • 白萩 (1937 —)，本名何錦榮，臺中人，經營廣告美術設計公司，五〇年代即在藍星、《創世紀》發表作品，也是現代派的一員，出版作品有詩論及詩集，計十二冊。 • 黃荷生 (1938 —)，本名黃根福，臺北人，曾任《現代詩》主編，暖流出版社發行人，有詩集《觸覺生活》出版。 • 杜國清 (1941 —)，臺中人，美國史丹福大學文學博士，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九〇年代致力於推動「臺灣文學英譯叢刊」，出版有詩集《島與湖》等十餘種。 • 九月，臺灣大學教授彭明敏 (1923 —) 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遭逮捕，1965 年十一月獲特赦，1970 年一月偷渡出境，稱「彭明敏事件」。
1965	民國 54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鍾肇政主編之《本省籍作品選集》十本，由文壇社出版，「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冊，由幼獅書店出版。
1966	民國 55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十月，尉天驄、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姚一葦、七等生等人，創辦《文學季刊》(至 1970 年 2 月計 10 期)，1971 年一月改稱《文學雙月刊》，四月休刊。1973 年八月，改名《文學》復刊，1983 年第二次復刊，1986 年再度休刊。 • 尉天驄 (1935 —)，中國江蘇碭山人，1949 年來臺，曾任《筆匯》、《中國論壇》主編，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有論述、散文、小說、兒童文學等十一種作品出版。

<p>1968</p> <p>民國57年</p>	<p>1966</p> <p>民國55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月二日，柏楊翻譯「大力水手」漫畫刊於其妻倪明華主編之中華日報，遭國民黨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罪名，判刑十二年。1977年減刑出獄。 • 柏楊(1920—2008)，本名郭立邦改名郭衣洞，中國河南輝縣人，1949年來臺，1954年任職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作品有論述、雜文、詩、小說，二百多種。2000年有《柏楊全集》二十八冊出版。 • 一月，《大學》雜誌創刊，原為青年表達理想之刊物，1971年元旦改組，開始關切現實政治，聯署表達對保釣運動之看法，1973年分裂，迄元月號止，共發行六十一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陳映真(1937—)，本名陳永善，出生於苗栗。1968年曾被捕入獄七年，1985年創辦《人間》雜誌及出版社，1996年任中國社科院高級研究員，現居中國。出版有論述、散文、小說計十五種，1998年有《陳映真作品集》十五冊出版。 • 王禎和(1940—1990)，花蓮人，臺大外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師，電視公司影片組，作品有小說集《嫁妝一牛車》、長篇小說《美人圖》、論述、散文等十餘種。 • 黃春明(1935—)，宜蘭人，師範學校畢業，曾任小學教師、記者、編輯、廣告公司企畫、大學講師。1994年創黃大魚兒童劇團，2005年，創《九彎十八拐》雙月刊。作品有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籬》、《莎喲娜啦·再見》及散文、兒童文學等二十餘種。 • 姚一葦(1922—1997)，本名姚公偉，中國江西南昌人，1946年來臺，任職於臺灣銀行，也在政治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任教。作品有戲劇、文學、美學論述、劇本等二十餘種。 • 七等生(1939—)，本名劉武雄，苗栗人，曾任小學教師。作品有詩、散文、小說，以小說為主，計二十餘種。2003年，有《七等生全集》十冊出版。

<p>1971</p> <p>民國60年</p>	<p>1970</p> <p>民國59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月一日，辛牧、施善繼、蕭蕭、林煥彰、林佛兒、喬林、景翔、陳芳明、蘇紹連、高上秦、黃榮村創立龍族詩社，三月三日發行《龍族詩刊》。 • 辛牧(1943—)，本名楊志中，宜蘭人，曾主編《臺塑企業》雜誌，任《創世紀》主編，出版有詩集《散落的樹羽》。 • 施善繼(1945—)，彰化人，任職於臺北縣工務局，出版有詩集《傘季》、《兒童文學》等四種。 • 蕭蕭(1947—)，本名蕭水順，曾任工專、中學教師，及《詩人季刊》、《臺灣詩學》主編，現任教於明道大學。出版有論述、詩、散文等數十種。 • 林煥彰(1939—)，宜蘭人，《布穀鳥兒童詩學》、《兒童文學家》創辦人，曾任副刊編輯、雜誌總編輯，有論述、散文、詩、兒童文學數十種出版，主要以兒童文學居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吳濁流《無花果》由林白出版社出版，旋遭查禁。《無花果》曾於1968年四、七、十月，於《臺灣文藝》分三期連載。 • 陌上桑、喬幸嘉、黃朝湖、洪醒夫等人，將原創於1965年之藝術雜誌《這一代》(1965年十月—1966年四月)復刊，成為偏重文學之月刊，革新號出版六期後停刊。 • 陌上桑(1940—)，本名郭俊雄，屏東人，曾任臺灣日報駐日特派員，報社總編輯、總主筆等，作品有論述、散文、小說等十餘種。 • 喬幸嘉(1944—2009)，本名陳恒嘉，彰化人，曾到日本留學，歷任國小、初中、高中教師，大學講師，《書評書目》總編輯、副社長，報社編輯等。出版有小說集《譁笑的海》等五種。 • 洪醒夫(1949—1982)，原名洪媽從，彰化二林人，臺中師專畢業，任國小教師，作品以小說為主，2001年，有《洪醒夫全集》九卷出版。

1971

民國 60 年

- 林佛兒 (1941—)，臺南人，曾主編《仙人掌》、《火鳥》、《臺灣詩學季刊》等，創辦林白出版社，《推理》雜誌等，現任《鹽分地帶文學》總編輯。作品有詩、散文、小說十四種出版。
- 喬林 (1943—)，本名周瑞麟，臺北人，任職於榮民工程公司，出版有詩集《基督的臉》等五種。
- 陳芳明 (1947—)，出生於高雄，曾任《臺灣文化》(美國)總編輯，歷任靜宜、暨南、政治大學教授。著有論述、詩、散文等三十餘種。
- 蘇紹連 (1949—)，臺中人，任教於小學，已退休。出版有詩集、兒童文學計十種。
- 七月三十一日，文采、羊子喬、李男、杜皓暉、林南、雲沙、逸林、柳曉、黃進蓮、德亮、凱若、龔顯宗等十二人創立主流詩社，發行《主流》詩刊。其後，又有莊金國等人加入。
- 羊子喬 (1951—)，本名楊順明，臺南人，歷任出版社、報社編輯、總編輯，創辦《欣文藝》，作品有論述、詩、散文計十餘種。
- 李男 (1952—)，本名李志剛，出生於屏東，出版有詩、散文、小說計五種。
- 杜皓暉 (1947—)，本名杜文靖，臺北人，曾任報社記者、副總編輯、主筆等，著有論述、詩、小說、散文等十餘種。
- 林南 (1947—)，本名黃樹根，高雄人，曾任小學教師，已退休。作品有詩、散文、小說十餘種出版。
- 黃進蓮 (1947—)，黃勁蓮之本名，臺南人，曾任大漢出版社長，《臺灣文藝》、《蕃薯詩刊》、《海翁臺語詩刊》總編輯。著有詩集、論述、散文十種。
- 龔顯宗 (1943—)，嘉義人，歷任台南師院、中山大學等校教授，著有詩集、論述、傳記二十餘種。

<p>1971 民國60年</p>	<p>1972 民國61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莊金國 (1948—)，高雄縣人，歷任報社記者、編輯，曾經營主流書局，為主流詩社之社址，出版有詩集《鄉土與明天》等三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六月，臺灣大學外文系創辦《中外文學》月刊，是一文學評論與創作並重，國內國外文學互動的文學刊物，由臺大教授擔任發行人及總編輯。 • 九月一日，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創辦發行《書評書目》，為專業提供書訊書評之月刊，迄1981年九月停刊，共發行100期，先後由隱地、簡靜惠、喬幸嘉等人主持編務。 • 隱地 (1937—)，本名柯青華，出生於中國上海，1947年來臺，政工幹校畢業，曾任《青溪雜誌》、《新文藝》月刊主編，創辦爾雅出版社。作品有論述、詩、散文、小說、傳記等近四十種出版，散文數量最多。 • 簡靜惠 (1941—)，台北市人，曾任中學教師，洪建全視聽圖書館館長，書評書目社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現任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出版有散文、傳記八種。 • 九月，王浩、王潤華、古添洪、李弦、林鋒雄、林錫嘉、林明德、海瑩、陳慧樺、陳黎等人，創辦《大地》詩刊，出版了三一九期，改名《大地文學》。 • 王浩 (1946—)，本名王萬富，王灝之另一筆名，南投人，國中國文教師，主持「大埔城藝文工作室」。著有論述、詩集、散文十餘種，作品以散文為主。 • 王潤華 (1941—)，出生於馬來西亞，曾來台灣及到美國留學，於新加坡任教職，2002年來臺任教於元智大學等校。著作以論述為主，另有詩集、散文，計有二十餘種。 • 古添洪 (1945—)，出生於香港，1965年來臺，任教於臺灣師大、慈濟大學等校，著有論述、詩集等十種。

1972	民國6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李弦(1947—)，本名李豐楙，雲林人，曾任靜宜、政治大學教職，現任中研院研究員，著作以論述為主，另有詩集、散文，共十餘種。 • 林明德(1946—)，高雄人，歷任輔仁大學、彰化師大教授，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著有論述、散文、傳記、兒童文學十餘種。 • 海瑩(1949—)，本名張瓊文，臺中人，曾任職海運公司，笠詩社、蕃薯詩社同仁。作品有詩集、小說集各一種出版。 • 陳慧樺(1942—)，本名陳鵬翔，出生於馬來西亞，1964年十月來臺。臺大外文系博士，任教於臺灣師大、世新、佛光大學等校，著作有論述、詩集等六種出版。 • 陳黎(1954—)，本名陳膺文，花蓮人，曾任國中教師，已退休。著作有論述、詩集、散文等六種出版。
1974	民國6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十一月，蘇紹連、莫渝、牧尹、陳義芝、廖莫白、蕭蕭等創《詩人季刊》。 • 莫渝(1948—)，本名林良雅，苗栗人，小學教師退休，曾任出版公司編輯，《笠》詩刊主編。出版有論述、詩集、散文等三十種，2005年有《莫渝詩文集》五冊出版。 • 陳義芝(1953—)，出生於花蓮，曾參與創辦後浪詩社，主編《詩人季刊》，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任教於臺灣師大國文系。著作有論述、詩、散文等近二十種出版。 • 廖莫白(1956—)，本名廖永來，彰化人。臺中師專畢業，曾任教職，亦曾當選臺中縣長。出版有詩集六種。
1975	民國6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張文環戰後作品、日文長篇小說《爬在地上的人》由日本現代文化社出版。1976年，廖清秀漢譯作《滾地郎》，由鴻儒堂出版。

1975	民國6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五月，羅青、詹澈、李男、張香華等人創辦《草根》詩刊。 • 羅青(1918—)，本名羅青哲，出生於中國青島，1949年來臺。曾留學美國，歷任輔仁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大教職。著有論述、詩及散文等三十餘種。 • 詹澈(1954—)，本名詹朝立，彰化人，曾任《夏潮》、《春風》主編，從事農民運動，著有《西瓜寮詩輯》及散文等十二種。 • 張香華(1939—)，出生於香港，1949年來臺，曾任教北一女等校，為《草根》執行主編，著有詩集、散文等近二十種。 • 八月，黃信介、康寧祥創辦《臺灣政論》，發行至十二月號第五期，即遭到停刊處分。
1976	民國6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鍾肇政出版《滄溟行》，完成《臺灣人三部曲》。 • 二月，鄭泰安等人發起創辦《夏潮》雜誌，由蘇慶黎擔任執行編輯，是一偏向社會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思想者所辦的雜誌，但引進世界新思潮，衍述台灣文學文化、歷史文獻，亦不遺餘力。1979年一月，遭停刊一年。1983年改名為《夏潮論壇》，1986年正式結束發行。 • 七月，岩上、王灝、向陽等創《詩脈》詩刊。 • 岩上(1938—)，本名嚴振興，出生於臺南，臺中師範畢業，曾任國小、國中教師，已退休，主編《南投青年》、《笠》詩刊、《詩脈》詩刊等。著有論述、詩集等十餘種。 • 向陽(1955—)，本名林淇濱，南投人，曾參與創辦《陽光小集》，曾任雜誌總編輯、報社總編輯、副社長等職，現任教於臺北教育大學。著有論述、詩集、散文近五十種。
1977	民國6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三月，以思想、社會、生活、藝術為號召之《仙人掌》雜誌創刊。

<p>1977 民國66年</p>	<p>1979 民國68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三月，《小說新潮》創刊，周浩正任發行人，張恒豪、曹又方、羅珞珈、詹宏志、許素蘭等人任編輯，小說新潮雜誌社出版，第二期改由遠景出版，第三期宣佈由季刊改為雙月刊，1978年五月，第五期出版時則預告將結束發刊。 • 周浩正（1941—），中國江蘇嘉定人，1969年來臺，陸軍官校畢業，退役後轉入文化界工作，曾任《書評書目》編輯，《幼獅少年》主編等，出版有論述《橄欖樹》等二種。 • 張恒豪（1951—），臺南人，東吳大學中文碩士，曾任出版社總編輯。1978年五月，創立鴻蒙出版公司，發行《前衛》叢刊，共三期。著有評論及《覺醒的島國》。 • 曹又方（1942—2009），本名曹履銘，出生於中國上海，1949年來臺，曾任出版社總編輯、副刊總編輯、出版社發行人等，出版有散文、小說及自傳等五十餘種。 • 許素蘭（1953—），臺南人，曾任《書評書目》編輯、大學講師等，著有論述《昔日之境》等四種。 • 五月，葉石濤於《夏潮》雜誌十四期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遭陳映真批判為分離主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陌上塵、向陽、張弓、陳煌、李昌憲、莊錫釗、林野、沙穗等人創立《陽光小集》。 • 1984年六月，發行十三期後停刊。 • 陌上塵（1952—），本名劉振權，苗栗人，任中船技工，真正的黑手工人作家。有散文、小說近十種出版。2008年有《陌上塵作品集》三冊出版。 • 陳煌（1954—），本名陳輝煌，高雄人，曾任副刊主編、雜誌總編輯，目前任中國北京《新銳雜誌》總監兼主編。著有散文、小說等二十餘種，以散文創作為主。 • 李昌憲（1954—），臺南人，任職於楠梓加工區電子公司，參與《也許》、《綠地》等詩刊活動，任《陽光小集》總編輯。現任臺灣筆會秘書長。著有詩集《加工區詩抄》等六種。

1979

民國 68 年

- 沙穗 (1948 —)，本名黃志廣，出生於中國上海市，1949 年來臺。曾任軍職，臺機公司、臺汽公司、法務部高雄女子監獄政風室主任退休。曾創辦《盤古》詩刊，及任《暴風雨》詩刊主編。著有論述、詩集、散文等九種，作品以詩為主。
- 四月，鍾肇政、葉石濤、林海音、鄭清文、李喬、張良澤具名發起興建鍾理和紀念館，為臺灣首座民間興建之作家紀念館，由鍾理和後人鍾鐵民兄弟提供土地。
- 鄭清文 (1932 —)，出生於桃園，臺灣大學商學系畢業，任職於華南銀行迄退休。作品有論述、小說、兒童文學等三十餘種出版，以小說創作為主，1998 年有《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七冊出版。
- 張良澤 (1939 —)，出生於南投，歷任成功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共立女子大學、真理大學教職，主編《臺灣文學評論》，編有《鍾理和全集》、《吳濁流全集》、《王詩琅全集》、《吳新榮全集》、《吳新榮日記》等。出版有論述、小說、散文等九種。
- 鍾鐵民 (1941 —)，出生於中國瀋陽，1946 年二月隨父母返臺，臺灣師大國文系畢業後，任中學教師迄退休。著有散文、小說、兒童文學十種出版。
- 十二月十日，為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的黨外人士集會，引發軍警與民眾之衝突事件，事後黃信介、施明德等《美麗島》雜誌社成員遭到逮捕，移送軍法審判，是謂「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事件中有王拓與楊青矗二知名作家被捕。
- 楊青矗 (1940 —)，原名楊和雄，臺南縣人，任職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任《美麗島》雜誌高雄服務處主任，先後創設文皇、敦理出版社，美麗島事件服刑期滿後遷居臺北，曾任臺灣筆會會長。作品以小說為主，以工人身分及經驗寫出的工人小說《工廠人》、《工廠女兒圈》是代表作，另有散文作品，合計約二十種。

<p>1979</p> <p>民國68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王拓(1944—)，原名王紘久，出生於基隆，政治大學中文碩士，曾任大專講師。出獄後，曾任八〇年代的《文季》總編輯，《人間》雜誌社長，國大代表、立委及行政院文建會主委。作品有論述、小說、兒童文學等十餘種出版。以八斗子漁村為背景所寫的短篇小說集《金水孀》是其代表作。1979年創有政論為主之《春風》雜誌，僅出刊兩期。
<p>1980</p> <p>民國69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東方白開始寫大河小說《浪淘沙》，本年完成第一部《浪》，全書一百五十萬字，於1989年十月完稿。1990年出版。 東方白(1938—)，本名林文德，出生於臺北市，1965年赴加拿大留學，定居於此，著有小說、散文三十餘種。
<p>1981</p> <p>民國70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二月，李喬出版《寒夜》、《荒村》，完成《寒夜三部曲》。 李喬(1934—)，本名李能棋，苗栗人，曾任小、中學教師二十八年，《臺灣文藝》主編，臺灣筆會會長。作品有論述、詩、小說近四十種出版，1999年有《李喬短篇小說全集》十一冊出版，以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埋冤·1947·埋冤》為代表作。
<p>1982</p> <p>民國71年</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葉石濤、鄭炯明、曾貴海、陳坤崙、許振江、彭瑞金等人，創辦《文學界》雜誌，發行至1989年冬季號止，共歷時七年，出版二十八期。 鄭炯明(1948—)，出生於高雄，醫生，歷任《文學界》、《文學台灣》發行人，文學台灣基金會董事長、笠詩社社長、台灣筆會理事長，出版有詩集《歸途》、《蕃薯之歌》、《三重奏》等六種。 曾貴海(1946—)，出生於屏東，醫生，曾任《文學台灣》社長，臺灣筆會理事長，現任鍾理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作品有論述、詩集、散文十餘種出版，以詩集為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陳坤崙 (1952 —)，高雄市人，曾任出版社編輯，1975 年創辦春暉出版社，曾任《文學界》發行人、社長，現任《文學台灣》雜誌社長。出版詩集《無言的小草》、《人間火宅》。 • 許振江 (1949 — 2001)，高雄人，曾任《文學界》雜誌執行編輯，臺灣時報副刊主編，創辦派色出版社。作品有散文、長短篇小說、兒童文學等八種出版，以小說創作為主。
1983	民國 72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七月一日，國民黨文工會創辦《文訊》雜誌，為蒐集文學資料提供文壇出版訊息為主要功能之雜誌。以月刊方式發行。
1984	民國 73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十一月一日，聯合報系投資創辦的《聯合文學》創刊。痲弦擔任社長兼總編輯。

